

邓康延 梁罗兴 等

编者

*Rekindling  
the  
Flame*

# 盗火者

中国教育革命  
静悄悄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邓康延 梁罗兴 等

编著

*Rekindling*

*the*

*Flame*

# 盜火者

中国  
教育  
革命  
静悄悄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盗火者: 中国教育革命静悄悄 / 邓康延, 梁罗兴等编著. —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4.11  
ISBN 978-7-5133-1588-3

I. ①盗… II. ①邓… ②梁… III. ①电视纪录片—拍摄—概况—中国 ②教育改革—研究—中国 IV. ①J952 ②G5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13135 号

---

## 盗火者: 中国教育革命静悄悄

邓康延 梁罗兴 等 编著

策 划: 陈 卓

责任编辑: 陈万龙

责任印制: 韦 舰

封面设计: @broussaille 私制

---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http://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

读者服务: 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mailto: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

印 刷: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60mm × 970mm 1/16

印 张: 21

字 数: 180千字

版 次: 2014年11月第一版 2014年1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1588-3

定 价: 42.00元

---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目录

序一 教育改革的“精神火种” 杨东平 \_ 1

序二 教育与国运 陈丹青 \_ 4

序三 与灾难赛跑的教育 冉云飞 \_ 7

序四 火就是态度 邓康延 \_ 13

## 上辑 | 观火

### 01 重回人的语文 \_ 21

“我们的教材里经常灌输一些‘隐蔽课程’。表面上跟你讲一个故事，但其实是想传递一些观点。比如，你问一个六年级的、受了十二册人教版语文教材熏陶的小学生，你最佩服的人是谁。他的答案多半是毛主席。如果问他，你最讨厌的人是谁？他的回答经常是日本人。”郭初阳担心，语文课本隐藏的政治倾向、刻板思维和道德说教，会让学生的精神变成终生残疾。

## 02 呵护童年 \_ 40

华德福教育本身具有一种加速度的特征。最初很慢、很简单，然后越来越快，越来越广，到了高中，其深度和广度将大大超越主流教育的同级水平。然而，对于这一点，很多习惯了走传统应试教育之路的中国家长并不放心。

## 03 课堂风暴 \_ 52

历史教师魏勇希望他的学生既能应付考试，又能独立思考。“就是两头都得占着，如果你忽略了考试，那你就太傻了，因为这是一个现实的利益选择，毕竟这些学生都是要考大学的。但如果你全部都是为了应试而教学，那你很可能把学生弄成白痴，他将来会恨你的。他会觉得在你的课堂上，除了考试什么都没有。”

## 04 寻找活着的马小平 \_ 67

马小平执教生涯的最后一个学期，一次家长会后，作为班主任的他被二十多名家长团团围住，质问他为什么不教课本上的内容。学生说，马老师“显得很疲惫，甚至有些束手无策”。后来回到办公室，有学生跟了过去，看见马老师在办公室里泣不成声。

## 05 李庆明和他的公民教育 \_ 80

不管是悼念亡人还是为灾难祈福，都是一种以友善待人的公民品质。这是一种高于尊重的公民素养，与人为善、爱己怜人、服务社会，在合理利己的前提下向陌生的“他者”付出一份关爱，尽管它并没有美德伦理和圣德伦理的神圣高度，却不麻木、不自私、不冷漠，这正是公民社会必不可少的公民品质。

## 06 学在民间 \_ 105

对赵明而言，菜园的工作不仅可以维生，还可以教育儿子小宇对自然的认识。“给他讲这叫露水，讲天空为什么是蓝的，讲为什么会下雨。你得有这个闲心，这很重要。我一直认可一个理念：孩子需要家长的时间，而不是钱。”

## 07 断裂的天梯 \_ 115

在留守儿童董仁发的小木屋里，所有的亮光，都来自那些破败的木头的缝隙。他每天点蜡烛做作业，自己捡柴火做饭，晚餐大多是加盐的白米饭或白粥，饮用水要走20分钟的山路到一口荒井去打。一个11岁的孩子，每天躺在那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木屋里，他是想着什么、念着什么又盼着什么入睡的呢？

## 08 乡村职业教育 \_ 127

当年的乡村建设运动，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今天，关心乡村教育的人们，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向乡村孩子伸出援手，不约而同地延续着陶行知、晏阳初们的信条：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眼下，他们能够改变的，或许只是一个孩子、一所学校、一个村庄，但是，他们不约而同地相信：欲撕破黑暗，必先擦亮一颗火柴。

## 09 大学大学 \_ 133

30年后，当王小妮以一名大学教师的身份走上讲台，用诗人的眼睛打量新世纪的大学生时，她在那些年轻的面孔上读到的是困惑、迷茫、贫乏和冷漠。12年的应试教育把他们压成了扁平状，他们精明、现实、患得患失、缺乏常识，他们自私、偏狭、对周围世界漠不关心，日益严峻的就业前景让他们压抑了梦想，无法“站立”，更谈不上“四面张望”……

## 10 在路上 \_ 146

当下中国缺乏一个“高等学校法人财政制度”，学校为吸引人才需要房产，却不能向市场购买，只能等政府分房，甚至购置一台电脑都要等上三个月，人、财、物完全由政府控制。一名校长曾公开说：“某种程度上，中国只有一所大学，就是教育部大学，我们都是分院。”

## 下辑 | 醒言

### 杨东平：好的教育不与学生为敌 \_ 163

我的基本态度是，不要对每一个局部的改革过于苛求，希望它一步到位完成所有的使命，这个不现实。我现在特别主张自下而上的改革，它就发生在无数个学校、教师、课堂、个人身上，这种微改变和自主变革，我称之为“静悄悄的革命”。

### 孙云晓：这是一个让儿童特别恐慌的时代 \_ 185

在孩子的童年恐慌背后正是父母的恐慌、教师的恐慌。而父母、教师的恐慌、焦虑，反过来又加重了孩子的恐慌。83.6% 的中学生父母，要求孩子考进前 15 名；54.7% 的父母，希望孩子将来读到博士学位。这些高期望，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实现。这样的期望和压力到了孩子身上必然变成恐慌。

### 钱理群：所有教育问题的答案都在教育之外 \_ 195

2008 年，我跟我的学生说：从此，世界和中国进入了一个灾难不断、突发事件不断的时代。现在证明我的判断是对的。我们的年轻人，我们培养的孩子，应该是能应对人类灾难的新一代人。马小平曾感叹一个中学教师到底能走多远，他说他一辈子都在追求追求不到的东西。

### 陈丹青：教育是一件去做的事情 \_ 207

所有人在这几十年里都活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赶紧多捞，不要管这个社会，因为你根本救不过来。你到下面走走，就发现，完全是一个赤裸裸的丛林社会。这个时候，居然还有这样一群傻子，愿意反方向地从城里往乡下走，去从事各种公益事业。我敬佩他们，但我不知道他们能走多久。

### 朱学勤：四海变秋季，一师难为春 \_ 221

今天的大学，第一阶段是人抢钱，大学教师都去抢课题；第二阶段是钱抢人，因为就那么多课题，大学教师都被裹挟而去。几乎每一个人，哪怕是一个三流教师，手里都握有课题，但这些课题做出来的都是罂粟。多少年后回头看，我们这个最有钱的大学时代，恐怕是最令人羞耻的一个时代。

### 余世存：真诚的丧失是最可怕的 \_ 231

晏阳初他们那会儿，中国的教育体制跟西方是贯通的，在晏阳初身上是没有障碍的。那个年代有一种混乱的自由，能施展他的理想，而我们当下的这些人都不行。我们这一代人，在做人上面都是成问题的，我们连自己都没有找到立身处世的那种很踏实、很坚固的感觉，所以也很难给孩子提供安全感。

### 周孝正：校长首先得是教育家，不能是政客 \_ 238

原来我们说高考改变命运，现在你把这条路给堵死了，政治家的孩子还是政治家，穷人家的孩子还是穷人。社会的长治久安要有一个制度性的安排，就是让全国的精英，都能通过制度化的渠道上去。如果顶层的人永远是官二代富二代，那他们只能是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了。

### 张鸣：教育只有开放才有希望 \_ 252

我们说民国的教育办得好，为什么？因为它是开放的，他有教会学校和民办教育两个东西撑着。如果国立大学办不好的话，学生就不来了。教育必须开放，才可能办好，如果像我们这样封闭，设立各种制度门槛确保国立教育的优势，那当然是办不好的。教育改革应该是一个全民的改革，不可能是一个部门的改革，一个部门的改革注定是要失败的。

## 熊丙奇：教育改革需要更多自下而上的力量 \_ 261

世界一流大学，基本上都是自主办学、教授治校、学生自治，我们中国哪一所学校能够做到这些？加州大学有一次涨学费，学生全部起来反对，学校里贴满了标语，说我们以学校为耻，要校长下台。如果这种事发生在国内的大学，你觉得会怎样？

## 附录一 课堂实录：鸦片战争的影响 魏勇 \_ 272

## 附录二 课堂实录：如何给《南方周末》评论版投稿 郭初阳 \_ 286

## 附录三 如何跟孩子谈战争 蔡朝阳 \_ 303

## 附录四 沙粒的态度 张良 \_ 309

## 后记一 想象一个孩子的未来 况冶 \_ 313

## 后记二 让改变悄悄发生 梁罗兴 \_ 317

## 序一

# 教育改革的“精神火种”

杨东平

纪录片《盗火者：中国教育改革调查》自2013年9月在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大视野》首播之后，产生了巨大影响。时至今日，它在优酷等视频网站和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教育思想网上仍有很高的点击率。

作为直面现实、深刻反思中国教育问题的纪录片，《盗火者》获得强烈的社会关注是意料之中的，因为中国教育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领域，更因为人们对一场实质性的教育变革的期待。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盗火者》已然超越了单纯的记录，而成为一种积极的社会参与，一种重要的社会动员，传递着知识分子对教育弊病的揭示与批判，以及对以人为本的教育理想的阐述抒发。

与以往同类的影像记录有所不同，《盗火者》不仅揭示了在政治化和市场化过程中人文精神的流失和学校教育的异化，揭示了不断拉大的城乡差距使社会公平的教育“天梯”发出断裂的声响，而且揭示了另一个崭新的教育图景：中国的知识分子起而行动！针对语文教材的异化，叶开发动众人挑错，自己编写教材。深圳的中学教师马小平为了帮助学生找回人的尊严，开展人文教育实验而鞠躬尽瘁，树立了新的教师典范。深圳的另一名中学校长李庆明开展的公民教育探索虽戛然而止，却余绪不绝。山东一所薄弱的农村学校——杜郎口中学发动的课堂革命，在中

国遍地开花。从武汉大学的刘道玉、南方科技大学的朱清时到“洋大学”，高等教育的改革者前赴后继。对应试教育的逃离和自救，形成在家上学的崭新实践。在陶行知的故乡，德胜鲁班木工学校延续着前辈教育家的追求……

超越单纯的声讨和批判，如同《盗火者》的片名，我们看到的是行动、是改变、是唤醒、是点燃、是播火，是新教育生动活泼的民间生长，从而触到了当代教育真正敏感的脉动。众多先行者自下而上开展的局部的、零星的微改变，正营造着体制之外温润新鲜的新教育园地，凝聚着一场实质性教育变革所需的文化和能量。

与《盗火者》的旨意相似，几年前，比尔·盖茨投拍了一部反映美国教育的纪录片《等待超人》，反映的是华盛顿特区一场基础教育的变革。盖茨认为美国现行的公办学校系统，是一百多年前大工业时代的产物，已经完全不能适应知识经济的需要，必须进行全新的变革。但是，谁能推动这一变革，“超人”在哪里？事实上，片中那位锐意改革的韩裔官员，在拍摄后不久就黯然退场。比较而言，中国改革对“超人”的期待更为强烈，更期盼一场从天而降、改天换地、幡然一新的革命。这种老百姓难以祈求的整体解决的思维，却有实际的效用：解除每一个人的公民责任，造就大量的看客和骂客。其实，专家对世界多国的研究已经发现，由政府强力推行的自上而下的教育变革，前景并不美妙，在轰轰烈烈开展之后往往无疾而终。改革结果是不确定的，这一事实本身具有某种确定性，启发我们去探讨有效的教育改革的动力机制。

有一首歌颂盗火者普罗米修斯的赞歌唱道：

沉重的铁链只能锁住你的身躯，

却怎能锁住那颗坦荡无私的心！

难道仅仅是物质的火种吗？

不，你给予我们的

是生生不息的精神火种！

这就是我们盗得的“精神火种”：由学习型个人、学习型组织组成的学习型社会，才是推动复杂变革的真正动力；源于教育内部的这种自下而上的生长，这种“静悄悄的革命”，才是教育变革的真正机制。

《盗火者》中所记录的多项民间教育改革，都在继续深化之中。若干年后，当我们重新审视这一进程，对《盗火者》一书的价值当会有更加深入的领悟。

## 序二

## 教育与国运

陈丹青

当今教育的大荒谬、大荒败，罄竹难书而书之不绝，眼前这部《盗火者》，又是一例。荒谬的证据，是这类议论与著作从不奏效，也休想奏效。写给谁看？给学生看，无用；给教师看，无用。给教育当局看？当然更无用。

除了权力，今日的大学还有什么？你批评教育，你在什么位置？历年来，有权有位的教育长官、大学校长，尚且无能稍稍革除积弊于万一，你无权无位，写这些做甚？

是故近年总有人读到这类议论而来要我再说几句，诚不知说什么，什么也不想说——以下勉强可说者，不着边际，是一点抄来的闲话。

近时读王鼎钧先生长篇回忆录，其中写到民国教育的大量细节。王先生祖居鲁南小镇兰陵，30年代正当学龄，抗战爆发了。逃难中、沦陷时，孩子不曾辍学，因各地乡绅办学，有的是好老师。教他唐诗的是位前清举人之后，人称“疯爷”，学生16岁离开家乡时，成七律诗一首，感谢乃师：

一代书香共酒香，人间劫后留芬芳。

祖宗基业千金鼎，乱世文章九转肠。

盞底风波问醒醉，梦中歌哭动阴阳。  
 无知童子有情树，回首凝望柳几行。

日后，王鼎钧奔赴安徽阜阳，进入战时流亡学校“成城中学”，创校者，是山东籍将领李仙洲。李将军为家乡沦陷区子弟免受欺辱，以军人身份在部队驻防区办学，征战之余，兼任校长。为长久计，乃向重庆上峰申请改流亡中学为国立，俾便经费与师资有所保障。蒋称，学生应上前线。于是，王先生据史料描述如下：

老校长大惊失色，连忙进言：招兵是招兵，招生是招生，如果山东父老以为他用招生的名义招兵，对政府失去信心，他对不起蒋主席。蒋氏要老校长去找陈立夫。陈主管青年政策，长期担任教育部长。成城中学改制，陈立夫愿意促成，山东籍党国要人丁淮芬、空军名将王叔铭也很帮忙，但是管钱的人有异议——从会计观点看，流亡学生是个无底洞，必须截止。老校长着了急，连声质问：“你们懂不懂？青年是麦苗谷种，春种一粒粟，秋收万石谷！”

战时中国，各省有不少类似的流亡学校，成城中学是改制成功的学校之一，设为国立第二十二中学。据台湾国史馆资料记载，战后，该校毕业的学生共 1717 人。五十多年后，陈立夫在回忆录中详细陈述了教育往事，他“不顾当时行政院政务处和财政部内部人员反对”，批准了沦陷区青年方案，由国库支給贷金，供千万名流亡学生完成学业。“这一笔庞大的费用，在国家财务支出上仅次于军费。”

艰难困苦的抗战时期，贫穷纷乱的民国年间，颠沛流离的战时教育，

最终溃败的国民政府……这一切，看看今日，中国教育的国运，简直天堂，提这早先的地狱作甚？七十多年前的旧事与今日相同而相通者，只一项：教育者必须热爱青年，懂得教育，尤其是，必须有权。

今日上上下的教育长官，爱不爱青年？难说（除了他们自家的孩子）。懂不懂教育？更难说（除了将自家孩子送去国外读书）。昭昭可见、凿凿有据者，是今日的教育官员既有权，又有钱——30年来，全国上下的教育给弄成书中所描述的这付德性、这般田地，没有权力，没有钱，万万不可能。

有权，有钱，绝不是坏事。能否变成好事呢？须看人，看会不会用权。昔年李将军有权而缺钱，敢在蒋中正面前陈言，蒋听罢，请出陈立夫；昔年陈立夫有权有钱，但要说服“行政院政务处财务部”种种官员的种种异见，才能行使他的权，用对国家的钱——那是怎样的血钱啊，仅次于军费！

以当年蒋某人、陈某人和李将军的危局，倘若得知今日的国势，真要羞煞；抗战期间中国所能支度的那点钱，在今日国库的充盈面前，更要羞煞。可是，当今教育，问题如麻，单是《盗火者》中说及的荒唐事，就读了起栗，我这里还提这些陈年旧事作甚？所以，此刻也如《盗火者》的作者及无数教育批评者一样，不过是谗妄之人。念及这一层，不如搁笔，请忧心教育而又无可奈何的闲人，来读这无用的书吧。

### 序三

## 与灾难赛跑的教育

冉云飞

学生主讲，互相讨论，老师只稍作点拨和提示，这样的教学场景，你以为是欧美大学里的 seminar（研讨会）吗？更不可思议的是，老师一旦要求学生提出自己的答案，他们即像开闸的洪水，纷纷上前争抢黑板，以至于教室内外除了采光之用的一壁外，其余三面皆布满黑板。

这样乐于表达与展现自己的学生是哪个国家的呢？如果我没有看过《盗火者》一书，真猜不出这是中国的学生，更无法将其与位于鲁西南农村的杜郎口中学联系起来。尽管评价杜郎口中学的标准没有变——即包括升学率、合格率、及格率在内的“三率”（这是一些业内人士批评其并没有脱离应试教育之藩篱的原因，我也认为此一批评有相当的道理），但学生确实学得比原来投入得多，心态更加开放，乐于且善于表达。这无疑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乐于且善于表达”，别说对大多数中国学生来说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就是对中国的成人来说也是不容易实现的目标。因为我们的文化就是鼓励人当哑巴，是保持沉默的文化，这会让很多人的权利受损而无法形成有效的救助。从我们的成语及习俗里，可以看出那种否定与抑制

表达的一惯情形。对年轻人，我们常说“童言无忌”，这说明对言论自由的忌讳已是成人社会从古至今心照不宣的规训；对成年人，我们常说“言多必失”，仿佛稍微敢说几句话的成年人都开了一家祸事工厂。至于那些不成熟的意见，你也不敢表达出来，否则，“满壶水全不响，半壶水响叮当”的批评便会接踵而至。至此，你开始学会了“沉默是金”。恭喜你，终于成为这个对自由言说进行围追堵截的社会所教导出来的合格顺民了。

从大处着眼，教育当然要致力于一个人整全的发展；但朝细部看，则毋宁说教育特别是语文教育，无非是要达致口头表达的生动与笔头表达的灵活。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杜郎口中学的教学方式，无疑更接近以学生为中心的现代教育理念，也更容易做到口头表达与笔头表达的共同精进。西方的学校从初中甚至小学开始就有演讲课，演讲的目的自然不像我们的大专辩论赛一样志在胜负，而是在于言说之有趣、表达之清晰、表情之丰富、逻辑之谨严、说服之有力、沟通之有效，从而为自己铺就一种有意义的生活。而我们的学校与社会，老师只知照本宣科，官员离了秘书便不知如何讲话。民众有口难言，原因固多，教育在其间的“功劳”不可谓不大。

杜郎口中学出名了，参观者达百多万人，自然被参观得“体无完肤”。不仅杜郎口中学因此不停创收，杜郎口镇的经济亦得到拉动，实在是中国教育的一种奇观和悲哀。参观者络绎不绝，蕴含着什么信息呢？意味着中国人的创造力缺失，总想快速复制“成功”，仿佛“我的成功你真的可以复制”。由此不难看出，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山寨化的功利主义色彩之重，恐怕是世界少有的。教育自难幸免。

## 二

由于我一直关注和研究自废除科举制度以来的中国语文教材，因此对以1949年作为分水岭的百年中国语文教材的编写情形、出版状况、理念差异等诸方面的变迁，并不陌生。1949年前，教材的编写真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大出版社如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世界书局、北新书局等争相延请诸如蔡元培、张元济、陆费逵、舒新城、叶圣陶、夏丏尊、朱自清、丰子恺、傅葆琛、陶行知、陈鹤琴、张雪门、赵景深、姜亮夫、蒋伯潜、蒋维乔、庄因等名家编纂教材，其竞争之激烈有目共睹。由于大学是自行招考，故不需要全国统一教材，因此，教材的编辑出版充满活力，老师甚至学生成为教材是否畅销的终极裁判。

更有甚者，即便选择如此之多，依旧有许多老师不选任何已编定的现成教材，而是自编教材，或者是上完一课才油印一课的内容，类同于有名的《中华活页文选》，使得学校教育因教授的知识学养、个人魅力之差异，而呈现出不同的维度，也显得不那么单调死板。再如20世纪40年代读中学的流沙河先生，他的国文老师所选文章多为古文，依然不受学校与家长的干涉。而1949年7月10日的一纸文件，却对此前的教材编纂来了个天翻地覆的改变：“今后全国各地用教科书，除一部分小学教科书有差别外，均应在可能条件下要求一致。华北的教科书编审委员会是作为中央政府的教科书编审机构的基础而成立的。”（见《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中小学教科书问题给武汉市委宣传部的指示》）这种垄断格局即使在信息多元化的今天也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20世纪80年代以降，除人民教育出版社外，少数省级教育出版社以及北师大出版社等，获得了一定的教材编写权，使得教材的编纂从百

分之百的垄断，走向了假性竞争阶段（国营性质的假性竞争并不罕见，如两桶油的中石油、中石化，如通信中的移动、联通，均是看似废除垄断的假性竞争），只有在非应试教育的民间领地，才有一些自我编纂教材的小溪流动。如《盗火者》里“寻找活着的马小平”一章，不只是马小平老师上课吸引人、为人师的风范受人钦仰，关键是他癌症病痛折磨下依旧耗尽最后的才华，编纂了一本生前未能出版的《人文素养读本》（2012年出版时易名《叩响命运之门》），让我们感受到中学一线老师为改善中国教育所做的尝试与努力。

其实，在马小平之前，中学老师自编语文教材或读本而引起我注意的，还有深圳严凌君的《青春读书课》系列、山东王泽钊的《新语文》系列。在看到马小平编纂的《人文素养读本》后，我又接触了四川罗怀海所编的《古蔺中学生文学读本》等。与此同时，也看到了夏中义、丁东、谢泳等人编纂的《大学人文读本》，以及王小平运用民间力量主编的少数民族乡土教材《云上的家园》等。这说明学校教材虽然垄断依旧，但民间教材编纂者也逐渐破壳而出，对当前僵化的教育不啻为一种难得的尝试与改进。至于像《盗火者》书中提到的华德福学校，包括在家上学在内的私塾，大多没有教材，却比不少有教材的学校教学效果还要好。

也有些教国学的私立机构，直接拿《弟子规》、《论语》等作教材，我认为这是一种不得体的偷懒行为。不要以为“三百千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千字文》）之类的蒙学教材用了近千年，就成了一种可以袭用至今的“经典”。其实，中国近代化之前的农业社会，才是这些蒙学教材久用不衰的生存土壤。如今极速变化的社会，在交通、经济、信息乃至教育、政治等方面都处于全球化浪潮的裹挟之下，知识折旧率非常高，若不与现代社会和普世价值衔接，依旧拿几百年前社会

遗留下来的“古董”教材直接袭用，在我看来，害人非浅。即使编纂得还算靠谱的纸质新教材，面对如今彪悍的在线教育如MOOC（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Khan Academy（可汗学院）等，都有不敷应用的可能。

可汗学院的创始人萨尔曼·可汗在其新著《翻转课堂的可汗学院》一书里不无警示地说：“全世界今年（2012年）入学的新生中，有65%的人在未来将会从事现在还不存在的职业——这是一种意义深远的想法。”如果我们不能做出回应，那么，教育何以能够完成其使命并起到拯救社会的作用？

### 三

20世纪90年代，由于多种机缘，加之女儿即将降生，让我与中国教育结缘，并深切关注至今。在这个过程中，得以结识或知晓了许多在一线教书的优秀老师，如李镇西、郭初阳、蔡朝阳、魏勇、马小平、范美忠、苏祖祥、魏智渊、严凌君、王泽钊、梁卫星、史金霞、樊阳、杨林柯、李勇、罗怀海、严伟等。他们求知若渴的探索精神、对教育的不懈热爱，在在使我感动，并深受教益。这些人大都服务于体制内的教育机构，戴着脚镣跳舞，依然做出了不俗的业绩，使我这样为改变教育而敲边鼓的圈外人士，颇受鼓舞。我当然知道制度的变革对教育的全面改善至关重要，但我不再相信一些人所说的只有先改变体制，才有必要在变革教育上劳心费神的冠冕说辞。

邓康延兄近来的努力，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他写了一本《老课本新阅读》的书，因为这与我关注百年中国语文教材变迁的研究有重叠处。

对现代化教育以来的教科书的研究，已有王建军的《中国近代教科书发展研究》、石鸥的《百年中国教科书论》、毕苑的《建造常识：教科书与近代中国文化转型》、吴小鸥的《中国近代教科书的启蒙价值》等，亦有石鸥主编的《百年教科书图说》（1897—1949，1949—2009）两册图文并茂的资料，更有王友朋主编的《中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总目》这样搜罗较为完备的参考书。但邓康延兄这本感性言说民国课本的书，置于众多研究性书籍中，其传播能力无疑更胜一筹，得到了大众传媒的垂注。与彼时热卖的诸多民国语文课本一道，婉转批判了当下中国的人文教育。

后来，与邓康延兄交往日多，看了他与高小龙兄拍的纪录片《先生》，其把民国时的教育家胡适等人重新以影像形式推到观众面前，唤醒了不少人对民国教育的重新认知。特别是今年4月底，我应深圳光明中学严亮校长之请到该校演讲，演讲结束后，与邓康延兄饭醉，得他赠送近几年拍摄的纪录片《民间》、《盗火者》、《黄埔》等。回来即看毕《民间》，以我的眼界，这是第一次用纪录片的形式展示了大陆民间社会和NGO的成长，深感其对社会转型的敏锐触角。再看十集纪录片《盗火者》，虽然与《民间》领域相异，但对民间的重视与关注，却是他所有纪录片共有的底色，正如《盗火者》有一章专门讲了李庆明老师所倾注的公民教育。如果读者不能看到邓康延所做事业蕴藏这样的内在努力，那便无法领会其遥深的旨意。

如今，《盗火者：中国教育革命静悄悄》一书即将出版，遵主事者陈卓兄之嘱，不惮烦絮，芜词如上，以贺邓康延兄及其团队对包括中国教育在内的诸多历史文化及社会现实问题，因不懈批评而取得的不俗成果。

## 序四

# 火就是态度

邓康延

制作《盗火者》纪录片及其衍生的这本书都不是喜悦的过程，中国眼下的教育可用千疮百孔来形容。值此百多年来教育人口最稠密的困境和无奈中，四方良知，焦虑伤痛。原本岁岁蓬勃的行业，却一路僵化保守，既暮气沉沉，又喧嚣攘攘。教育从业者缺乏职业的荣誉、权益和自省，不比混沌的社会清醒，不比教室的孩子纯净，不比民国的先贤有担当，这如何是好？

曾有民国小城的小学校长不愿本校统一校服，担心增加穷困家庭负担；也有当代日本都市小学校长坚持统一校服，以免阔少比拼名牌。手法迥异，仁心相通。而近年有广东英德市的教育局长吃校服回扣连累了近百校长沾灰，若以一所学校一千学生计，十万白蛋被黑大鳖覆盖。

一个人所受的教育，铺开一个人的命运。有哲人说：世界观对了，世界也就对了。而教育则是你在皮肤上感知世界冷暖之前，在心灵上先搭起个世界观的台子。

我在小学一年级时撞上“文革”，有一天，老师合上课本里的水石草木，让大家抄写最高指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很快，所有课本前面都有了闪光的毛主席头像和语录，包括数学、化学、物理应用题都加上了革命的情节。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大中小学校，挥

完皮带的红卫兵跨上讲台。到处都是游行批斗、声嘶力竭、火烧炮打、誓死捍卫。我能感受到老师原本慈爱的眼神里的忧伤迷茫。报纸上伟大领袖还以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里的台词调侃：“老九不能走。”（那时教师属知识分子臭老九，排在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的第九位。）在西安南关小学和西安九中，我几度看过老师自杀，尤其大约三年级时一位老师在厕所上吊，现场他已躺在地上，一张床单下隐约透出他最后的身形，少年的内心充满了恐惧和伤痛。1966年到1976年，我的小学中学被敲锣打鼓的各类最新指示和一张张各色床单裹挟着走了。

我插队广阔天地的第二年，1977年，田野上一声惊雷，恢复高考了。全大队知青都扔下锄头铁掀不顾贫下中农老队长的阻挠，回城急翻出满落灰尘的课本，那一刻才体会到：书到用时方恨少，朝代康复人已傻。我算幸运地考上了恢复高考的第一届77级，全大队五十多名知青，除一人凭跳高成绩考上体院，就数我从“农门”跳上了“龙门”。几年后，许多插友招工回城，潦倒混日。有人在央视高唱“时间都去哪儿了？”，要我说很多时间是被打劫了、被偷走了。几代人的青春绑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上，犹如平地也要修大寨梯田般的荒诞。若无劳筋饿肚的一年下乡，我断难理解鲁迅那句话的痛彻：“人生最痛苦的就是梦醒了无路可走。”

大学四年灯火通明三点一线。十年饿肚，一朝狂吃。记得我们1978年2月进校时，各大学还有二年制的75级、76级工农兵大学生，那都是基层一些根红苗正的工农子女，他们多数人只读过初中，大学老师只能从基础课补了又补。77级从压了十届的学生中激烈竞出，每夜满教室刻苦，老师夜半来辅导也兴奋：“学校十多年没这样亮堂过了。”那时全社会崇尚知识，羡慕大学，“要把被四人帮耽搁的青春夺回来”。我

们班有多位比我大十岁的老三届和“坏成分”家庭子女或农村贫困生，他们一步跨入西安城的大学，迸发的学习激情犹如黄河入壶口。因为多年城乡教育同样赤贫无赖，均愚之下，混沌平等，用功些的农村孩子也能脱颖而出。全然不像今日，京沪教育资源一次次锦上添花，农村则一年年冰寒缺碳。此外，早年的高考，鲜有关系加分、冒名替考、权贵后门、学校作弊等恶风。恢复高考实在是改革开放的第一杠杆，撬动的是整个社会风气。邓小平当年拍板不惜挪用印刷毛选五卷的好纸，去填高考试卷无纸可印的窟窿，后人再无此气魄。一张纸见证了国民经济崩溃的边缘和教育的起死回生。

好日子总是过得快。全民翻书的情景在 80 年代末一风吹过，90 年代开始狂风吹票子。学校分数化、排名化、并校化，推手是官僚化、产业化，豪言壮语要做大，教育工厂扩张流水线，学子翻转腾挪成一块块速成砖。

前 30 年政治挂帅，后 30 年利益驱动，最严重的因是教育不公，果是不公的教育，而不公与歧视本是教育的死敌。从 1958 到 1976，高考实施政审，出身地富、资本家、右派、海外家庭等社会关系复杂的学生不宜录取，甚至扩及中学。待到新世纪，寒门子弟阶层又被金钱权势关系击败，遇上玻璃天花板。较之 80 年代，如今京沪名牌大学的山乡贫困生已是凤毛麟角。教育不公，自戕教育。

邓小平说过，教育的失误是最大的失误。当今国土，比之官员贪腐、社会萎靡、资源耗竭、环境恶化，更可怕的是教育国土的荒芜慌乱。

人生困顿识字始，从幼儿园到大学毕业找工作，千军万马岁岁升学考，万水千山事事拼爹娘。城市学位紧张，独生子女难带，乡村学校荒芜，留守儿童孤独，皆陷入富则溺爱、穷则卑贱的双重厄运。师资良莠不齐，

教育体制和课本无所适从。校长若不懂不爱也不屑于教育，你让教授、教师如何是好？你让那些耳闻目睹社会百态的学子又能好到哪儿去？而学生普遍的心理问题，学术研究大范围的抄袭，官员权贵买学位的恶俗潮流，已漫延为社会疾患。

90年代的高校大合并，一千多所学校，强制合并成412所；随之高校扩招，学生成倍增，学校圈地忙，一口吃成几个胖子。犹似三十多年前高等教育大跃进的重演——1958年229所高校猛增百倍，如注水猪肉，生生为世界教育史编出了一夜致富的笑话。

社会和教育毕竟在进步，封闭的门打开了就再也关不住。比如一些老师在践行静悄悄的教育改革，学校硬件持续改善（一些重点学校的建设已近奢华），还有那些大规模、长时间、低幼化的留学力量，这些都是未来光照故国的希望。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存芳草。

《盗火者》是一些走过以往教育的身心体验者的内心寻找，是历时两年俯身现实的调查，拍摄者和被拍摄者融成一片。不同于以往同类题材的居高表达，总导演刘晓梅带领越众影视年轻的编导团队，遍访教育一线的老师、家长和孩子，并深入采访教改现场的专家学者。此纪录片不是躲在演播室或书斋的政论片，它取景真实的人物、事件和观点，展示我们身边大量存在却未能正视的现象。所聚焦的教育热点、难点和新突破点，或许没有答案，却有一些路径；不是只有悲伤，也有很多希望。

这或许是多年来少有的直面教育现实又对民间教育改革带有敬意的纪录片和书籍。感谢新星出版社谢刚社长和陈卓编辑纪录片内容的重新梳理，并加进了一线优秀教师的课件案例，为更多教师提供了借鉴。

教育是一项很美很温暖的大业，教育是生命，它是皮肤知冷暖，它是眼睛识明暗，它是心灵辨善恶。不管去学校的路有多远，童年都要背

起书包；不管教育改革的路有多险，今天都得去攀援。不懂、不爱、不愿献身教育的人，请离开。

《盗火者》只是当下教育的多元解读之一种，难免偏颇与失误，但它确实是火，不论点燃了什麼，火就是态度。

特此鸣谢诸多机构和个人对十集纪录片《盗火者》的倾情倾力。

**支持机构：**深圳市宣传文化事业发展专项基金、深圳市越众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五星传奇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动画学院、深圳荔园小学、深圳市声之浪潮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凤凰卫视、重庆电视台科教频道。

**学者及受访嘉宾：**杨东平、刘道玉、罗征启、朱清时、钱理群、陈丹青、朱学勤、张鸣、周国平、孙云晓、熊丙奇、余世存、周孝正、王瑛、陈远、陈伟、李玉龙、王小妮、李庆明、吴清辉、林建华、吕效平、张泽、严凌君、李英强、叶开、蔡朝阳、范美忠、何克抗、魏勇、张中和、张健柏、张俐、李泽武、徐添、江忠贤、赵明、张健柏、吴刚、吴恒、崔其升、晏鸿国等。

**事件受访嘉宾：**童蓓蓓、何易、黄素珍、马前、邓白洋、纪群英、周维约、戴炯、张玉恒、刘加胜、郭慧清、王赫、周飞、刘书刚、张连芳、张红、听雪、廖炜、梁琛、曾杰、吴文斌、阮锦辉、李绪莲、于鸿磊、李保国、徐利、张代英、洪华挺、贺飞辉、乔精一、陈辉、谢维、汪鑫、张山峰、林何、董仁发、赵明、赵粒宇等。

**受访学校：**中央教育研究所南山附属学校、今日学堂、鹿鸣学堂、珠海UIC、南方科技大学、成都华德福学校、杭州越读馆、立人图书馆、休宁县鲁班木工学校、北京十一中学、杜郎口中学、湘潭一中、南京行

知小学、荔园小学、东莞中学、丰宁一小、嘎吐营村复式学校、红德小学等。

**纪录片参与人员：**应宪、信一心、闻正兵、刘晓梅、齐良书、况治、陈歌、罗亚琴、梁罗兴、张珀源、夏子池、刘晓江、王猛、何沐阳、史依丽、朱明亮、黄金栋、杜涛、陈莉、时小芳、覃思、李晓艾等。

上  
辑  
观  
火



## 01 重回人的语文

语文，人一生下来便开始接受的母语教育。从幼儿喃喃到稚童诵诗，从一横一竖到满腹经纶，人之沟通互往，文化之传承拓展，甚至政体经用，维系一个社会的融洽和谐，都需要语文。

美国人上语文课，注重阅读分享。他们在中学实行宽松的选课制，无论教育部还是学校，都不会印发统一教材，至于语文课上读什么书，则由任课教师自己来开书单。刚上初中的13岁孩子，一个学期下来必须读6到7种风格迥异的英文作品；而希望上好一点大学的高中生，一学期最少也要啃下10本名著。曾主张学生只该读“精华读物”的文学教授 Mark Bauerlein 表示，学生读《哈利·波特》还是狄更斯都无所谓，关键是在信息时代保持阅读的习惯。

法国人上语文课，注重经典文学的教育。从巴尔扎克到雨果、从拉封丹到拉伯雷，16至20世纪的经典纯文学作品，都是法国中学教师热衷选择的教材。有个流行的说法，“每个法国人一生中都要过哲学这一关”。因此，法国中学生还须阅读萨特和加缪的哲学作品。有一年，法国中学会考作文，就要求考生解释霍布斯《利维坦》和托马斯·阿奎那

的《神学大全》节录。

在台湾地区，不少学校都是采用自编教材。文言文比例超过白话文，一直是台湾国文课本的一大特色，其中先秦诸子的作品尤为盛行，《古文观止》更是每个台湾中学生都精读过的教材。

而在中国，语文课还挣扎在应试教育的泥泞之中，语文教材选编也饱受争议，乃至国家主席习近平也不免发牢骚：“我绝不赞成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说的便是上海小学一年级语文新课本删去了全部古诗所引发的争议。

## 乔乔的阅读障碍

艳阳，老街，树影婆娑，我们推开两扇铁门，走进中国当代文学史重镇——位于巨鹿路的《收获》杂志社。这里是上海文学的根据地，曾走出过王蒙、冯骥才等名家，也有文艺青年喜欢的《萌芽》。作家叶开是《收获》杂志编辑部主任，来自全国各地的大量来稿在他的办公室堆积成信海，我们拍摄的脚步架从中穿插过去，往往会不小心碰到一篇好文章。

叶开跟许多钻进文字堆的作家一样，习惯用笔头勾勒生活的痕迹，文字带有古典黑色幽默。

在语言文学领域游刃有余的叶开，五年前却在女儿的小学语文课上马失前蹄。“有一次，教师请家长，是我太太去的。老师说我们的女儿廖小乔有阅读理解障碍。”

九岁的廖小乔，喜欢读童话、幻想文学，如黑柳彻子的《窗边的小

豆豆》和 J.K. 罗琳的《哈利波特》，很多章节都读得滚瓜烂熟，对世界保持着好奇心。当时，乔乔的功课由妈妈辅导，这位古典文学博士，常被女儿的语文作业弄得手足无措。例如，学到《智烧敌舰》时，作业要求回答三国时期最足智多谋的人是谁？因为刚看过《三国演义》彩图本，乔乔自信地写下了自己的答案，孔明和庞统。这个答案也得到了妈妈的认可。然而，老师却给了一个大红叉，因为标准答案是诸葛亮。

直到亲自走进女儿的课堂，叶开才了解到问题所在。那是一节三年级的语文公开课，课文叫作《带刺的朋友》：

秋天，枣树上挂满了一颗颗红枣儿，一天晚上，新月斜挂，我刚走到后院的枣树旁边，忽然，看见一个圆乎乎的东西，正缓慢地往树上爬。

那个东西，一定没有发现我在监视它，仍旧诡秘地爬向老杈，又爬向伸出的枝丫……

“我女儿是非常积极举手的，但老师从来不问她。”叶开发现，公开课已事先经过排练，甚至简单的举手，也藏着秘密。“举右手的才有资格回答，举左手是假装举。这种造假让我非常不满。”

临下课，乔乔终于得到一个提问的机会。她问老师：“为什么叫带刺的朋友？我看不出来他们是朋友。”

叶开回去后，查找《带刺的朋友》原文，发现上海的教材把中间过渡的自然段给删掉了。“这个文章本身就是个很差的文章。经过上海语文教材编写者的删改，连逻辑都不通了。”叶开这才明白，女儿所谓的“阅读理解障碍”，只是不符合教材的标准答案。而这种标准答案，时常让

文章的原作者也感到莫名其妙。

从此，叶开再也放心不下女儿的语文教育。他拿起了乔乔的课本，这比公开课更让他震惊，并且愤怒。

课本中有一首诗叫《信》，叶开至今也无法理解。“我学会了写信，我代鲜花给蜜蜂写信，邀请蜜蜂说，我已经成熟了快来采蜜吧。我跟女儿讲，鲜花邀请蜜蜂来采蜜，有受虐狂的倾向，这么写是非常可笑甚至可怕的。”

叶开把这类文章称为“课文体”，用非人性、虚假情感、陈词滥调的语言，专门为教材量身打造。“当我们学会认字和写信的时候，首先给谁写信，给妈妈写信，给爸爸写信，给你同班同学写信。大一点了，我们给情人写信，给爱人写信。而这篇课文是云彩给云彩写信，森林给森林写信，弄得跟真的一样，多虚假的情感。真要找描写大自然的诗歌，我会用穆旦先生的四首诗——《春》、《夏》、《秋》、《冬》。”

周国平也遇上过一档荒唐事。一位朋友的女儿有一天把她的语文试卷拿来给周国平看，上面有他的一篇文章。“我还记得那个题目叫作《人的高贵在于灵魂》，她说周叔叔你做做。后来我按照她的题目做完了，她按照标准答案给我打分，69分，勉强及格。她当时好高兴，她说比她还低。所以我说这个东西是非常荒唐的，什么段落大意、主题思想，某一句话的含义是什么，这个词的用意是什么，作者自己写的时候，他有这些想法吗？而且，哪怕作者自己有他的一个想法，他的想法能够作为标准答案吗？”

## 重审语文课本

在杭州，我们找到了另一个和语文教材“杠上了”的人——郭初阳。他曾是一所重点中学的语文教师，五年前告别体制，与友人共创了自己的教学园地——越读馆。2008年，为了给一份教育杂志撰写专栏，郭初阳偶然拿起小学语文课本，一篇课文引起了他的注意，标题是《我选我》。郭初阳说：“这篇课文我小的时候也学过，这么多年过去了，赫然发现它还在那里。”

李小青是我们班的劳动委员，前几天，他转到别的学校上学了，今天开班会，林老师让大家补选一名劳动委员。突然，王宁站起来说：“我选我。”大家都愣住了，王宁说：“我和李小青是好朋友，他爱劳动，爱集体，我要像他一样热爱劳动，关心集体。”王宁的话刚说完，教室里响起一片掌声。（摘自人教版语文教科书第三册课文《我选我》）

“我和前任的劳动委员是好朋友，所以‘我’就可以做一个劳动委员吗？原来那个劳动委员爱劳动、爱集体，所以‘我’要像他一样爱劳动关心集体——王宁只是表了一个姿态，并没有证明他是否真的有这个能力爱劳动关心集体，然而仅仅通过这样两句话，他就秒杀了全体同学，选举真这么简单吗？”郭初阳认为，这样的课文有头无尾，很可能会误导孩子们的价值观。“我觉得这是一个权力的隐形结构，在这个过程中，原本就有权力的人，搞了一个形式，好吧，我们来选举，结果怎么选呢？我选我，大家掌声通过。”

郭初阳当时一直为《读写月报》杂志撰写专栏，他把自己的这些

发现告诉了杂志主编李玉龙。“于是，在2008年的萧山，我们召集了二十多个成员，开了一次会。决定对小学语文教材来一次系统的批判。我们选了三个版本的教科书——人教版、北师大版、苏教版。”

这二十多名成员几乎都是一线教师，他们在2004年自发成立了第一线教育研究小组。绍兴青年蔡朝阳是郭初阳的大学同学，他说：“我感觉很好啊，就相当于是阿Q干革命，同去同去，于是一同去了。”

《读写月报》编辑童蓓蓓坦言：“一开始不知道这个水到底有多深，不知道会怎么样。做事情就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地遇到志同道合的人。”

在“第一线”同人将矛头对准小学语文教材的同时，叶开也在自己的博客上频频发表文章，批判“病态的教育带给语文的痛”。他撰写了《小学语文让我感到绝望》等二十多篇博文痛斥小学语文教材存在篡改、剽窃、不尊重原文作者等问题。他称那些劣质课文比三聚氰胺奶粉的危害还要深远。“因为这是从小孩的课本开始的作假，山寨大国的根源就在这里。教材大量作假，还包括公开课作假，评估作假，小孩子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忙着作假，长大了会怎么样？”

被称为“麻辣教师”的蔡朝阳，业余时间开起了一家小书店，自称“以读书自我启蒙，因阅读而得自由”。在会诊小学语文教材的课题中，他被委以学术主持人的重任。“《自己去吧》这个课文，我已经读过绘本，当我读到这个课文的时候，我非常生气。小鹰跟老鹰说，我想要学习飞翔，老鹰说你去学吧，自己去吧，于是小鹰学会了飞翔；小鸭子跟妈妈说我要游泳，妈妈说好吧，自己去吧，于是鸭子学会了游泳。这是非常典型的中国式思维。过程是不重要的，目的最重要。但人生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体验，从妈妈说自己去吧，到小鸭子学会游泳、老鹰学会飞翔，过程到哪儿去了？”

## 语文教材四宗罪

2009年初，“第一线”提交了一份二十余万字的研究报告，小学语文教材存在的问题，被他们概括为“四大缺失”。

1. 事实的缺失 研究报告称：“为了增强说服力，教科书在名人身上编排事实，虚构情节，大有无所不用其极之势。”

在人教版二年级语文课文《爱迪生救妈妈》中，爱迪生的妈妈得了急性阑尾炎，医生苦于家里只有几盏油灯，无法进行手术。七岁的爱迪生急中生智，利用镜子的反光原理制造出明亮的光线，让医生顺利完成了手术。它附带提示孩子们：所有有成就的伟人，都有着美好的品德。然而，对于这个聪明的发明，郭初阳深表怀疑，他翻阅了商务版拉皮罗夫·斯科勃洛的《爱迪生传》和 Josephson Matthew 写于1959年的爱迪生传记，里面都没提到这一事件。但传记中没有记载，并不能得出这篇课文是虚构的结论。为了验证故事的真伪，他特意联系了当时正在美国留学的学生何易。

何易当时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读书。和所有中国孩子一样，何易一直对这个故事深信不疑。然而，当他向身边的美国同学求证此事时，这些美国人纷纷睁大了眼睛，发出夸张的惊叹。

何易查阅了阑尾炎的相关历史文献，他发现，最早关于阑尾炎的记载是在1886年。“爱迪生是1847年出生的，那个时候阑尾炎手术还没有出现。”而1886年爱迪生已经是一个40岁的已婚男人了。这条线索证明，爱迪生小时候根本不可能有阑尾炎手术，这个故事是虚构的。

然而，课本中怎么会忽然出现这样一篇虚构的爱迪生故事的文章？后来有一名网友搜出来美国1940年拍过的一部电影《少年爱迪生》，

发现电影中有关于爱迪生利用镜子反光照明的故事。而这篇文章的作者，很可能是看了这部电影后编出了这样一个故事。

郭初阳认为：“这样的文章，给孩子造成的最大毒害，是难以分辨真和假。有人认为可以通过编一个故事来传达真理，但是真理从来不是通过假话来传递的。”

叶开在2010年10月2日的博文《上海小学语文教材恶意篡改安徒生童话》中，用具体案例炮轰语文教材。他对比了安徒生和教材编写者的两个不同的开头：

**安徒生：**有一个豆荚，里面有五粒豌豆。它们都是绿的，因此它们就以为整个世界都是绿的。事实也正是这样！豆荚在生长，豆粒也在生长。它们按照在家庭里的地位，坐成一排。太阳在外边照着，把豆荚晒得暖洋洋的；雨把它洗得透明。这儿是既温暖，又舒适；白天有亮，晚间黑暗，这本是必然的规律。豌豆粒坐在那儿越长越大，同时也变得沉思起来，因为它们多少得做点事情呀。（《安徒生童话》，叶君健译）

**教材编写者：**有一个豌豆荚，绿莹莹的，好像一间绿色的小房子，里面住着五颗豌豆，也是绿莹莹的。它们一排儿坐着，谁也不跑来跑去。时间一天天过去，豌豆荚慢慢地变黄了，豌豆也慢慢地变黄了，它们长大了，长得结实了。

安徒生童话原文色彩缤纷，用词精准平实，让人感受到心灵宽厚之美。“虽然编写者的篡改是显而易见的低级无趣且无聊，但还是有人会

说这个改编不错，很符合小孩子的水平。这样一种事先设定小孩子的智商和理解力低级，先打击他们，把他们敲昏，再给他们喂三聚氰胺奶粉的做法，是小学语文教学中的规定动作。”叶开说，故事的每一段都遭到了篡改，这样无耻的做法让人无语和愤怒。

苏教版《云雀的心愿》一文，貌似科学严谨，却连基本的知识都是错误的——“云雀妈妈擦去头上的汗水”——鸟类没有汗腺，哪儿来的汗水？还有《乌鸦反哺》，生物学上已经证明了，乌鸦没有这种习性。可这篇文章，却以目击者的视角来讲述反哺的故事。

在翻看女儿语文课本过程中，叶开还发现上海小学语文四年级第二册中的44篇课文，只有第一篇《燕子》署了作者名，其余全无作者。第二篇《小溪流的歌》剽窃儿童文学作家严文井，第三篇《笋芽儿》篡改浙江作家倪树根……

**2. 经典的缺失** 卡尔维诺认为：“经典作品是一些产生某种特殊影响的书，它们要么本身以难忘的方式给我们的想象力打下印记，要么乔装成个人或集体的无意识隐藏在深层记忆中。”

巴金的名篇《鸟的天堂》入选人教版四年级上册，然而，文学大师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我问过巴金的女儿李晓林老师，她根本不知道入选了，也没给她稿费，关键是不知道被删改了。”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了安徒生身上，著名童话故事《丑小鸭》被删得一塌糊涂，原文有几千字，删了以后仅剩几百个字。甚至一些经典名著如《西游记》，也被任意删改。“教材要传递的是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观，是最优秀的东西。但它却没有把这个意识贯彻好。”郭初阳说。

“第一线”小组还从教材中遴选了描写母亲的文章。在三套教材中，来自经典的文本并不多，并且时有篡改。苏教版共17课，只有4篇可

称经典，包括《游子吟》、《少年王冕》等。但即便是这些经典，只要翻开原著对一下，几乎每一句话都作了改动，面目全非。

有一篇课文《三个孩子》，一位老人坐在路边休息，一个母亲手里拿着沉重的东西，跟他的孩子走过去，这个孩子没有帮他母亲拿东西，而是愉快地唱着歌；又有一个母亲经过了，她的孩子跳着舞，也没帮母亲拿沉重的东西；第三个母亲跟孩子一起抬着这个东西经过了这位老人。经过以后，三位母亲对老人说，你看，我的孩子，多么可爱多么聪明。然而老人却说，我只看到一个孩子。“这是什么意思呢？前面两个唱歌跳舞过去的，就不是孩子，只有能帮妈妈做事情的是孩子，这是什么逻辑！我们一般看到孩子撒撒娇就已经很开心了，不一定非让孩子帮我们洗脚干家务吧？”蔡朝阳认为，许多课文采用了大量捏造的故事，审美恶俗，价值观混乱，罔顾事实，甚至道德绑架。

针对这些恶俗甚至恶意篡改的文章，郭初阳提出了自己心目中描写“母亲”的经典文本：《诗经·凯风》“有子七人，莫慰母心”，《论语》“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杜甫“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阮籍丧母而“呕血数升，废顿久之”，蒋士铨《岁暮到家》中的“见面怜清瘦，呼儿问苦辛”，应修人《小小儿的请求》，顾城给妈妈的《安慰》，于坚《纯棉的母亲》，泰戈尔《飞鸟集》，密斯特拉尔《母亲的诗》，川端康成《母亲的眼睛》，黑塞《幸福的时刻》，帕索里尼《祈求母亲》，塞弗尔特《窗旁》……舍这些优秀文本而不用，不是对中外经典的无知，就是别有用意的思想灌输。

蔡朝阳在报告中写道：“我搬不出大堆大堆的教育理论，无法高屋建瓴从而颐指气使。在考查全部三套教材时，我的底线在于：我是一个四岁孩子的父亲。”

3. 儿童视角的缺失 小学教材的编撰者穿了小孩子的衣服，脸蛋涂了宝宝霜，伪装成儿童腔，却在固化孩子的想象，混淆他们的判断力。

苏教版一年级上册的《汉语拼音儿歌》里有“大喇叭里正广播，爱护大佛不要摸”，“弟弟河边捉蝌蚪，哥哥走来劝阻他”。郭初阳点评道：“小朋友捉蝌蚪多开心，哥哥却说不能捉，诸如此类。到处都是这样的禁止、禁令，你不可以干这个，不可以干那个。”

4. 快乐的缺失 “第一线”的成员发现，大量教科书课文苦大仇深，不快乐。

苏教版里有几篇关于母亲的课文：《沉香救母》，因为他的妈妈被压在山地下了，沉香心里又难过又气愤，恨不得马上去解救妈妈；《孙中山破陋习》，孙中山的妈妈用一根长长的布条，一道一道地给姐姐缠足，姐姐痛苦极了，眼泪直往下流。

“你看，哇，这个太痛苦了，又是绕小脚，又是生病，又是妈妈被镇在山地下了。怎么生活会这么痛苦呢，一点都不快乐。”最不快乐的是人教版的文章《玩具柜台前的那个孩子》，郭初阳曾专门写过一篇文章来批评它。“那个小孩子真的很可怜，买不起玩具在那里干看着，老妈不但没有给他买，还跟那个营业员诉苦，说我们家如何如何惨。这个母亲的观念有问题，怎么可以当着孩子的面说这些呢，孩子想要一个心爱的玩具，你却跟营业员说我们家买不起，这对孩子的伤害简直太大了！”同样是对待孩童，德国政府会帮助有困难的家庭，给他们一张消费代金券，用于购买玩具，以此来维护一个未成年人心目中父母亲的尊严。

郭初阳在做关于“母亲”批评的时候，找了一些可供选择的文本。比如张晓风的《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讲的是发生在家庭生活中的母

子对话：

儿子七岁了，有一天我要他去洗手，他拒绝了。儿子问，我为什么要洗手？妈妈说洗手可以干净。干净又怎么样，不干净又怎么样？干净的小孩才有人喜欢。有人喜欢又怎么样，没有人喜欢又怎么样？有人喜欢将来才能找个女朋友。有女朋友又怎么样，没有女朋友又怎么样？有女朋友才可以结婚。结婚又怎么样，不结婚又怎么样？结婚才能生小娃娃，妈妈才有小孙子抱。有孙子又怎么样，没有孙子又怎么样……

作为一个母亲，张晓风接着说：

我在瞠目不知所对中感到一种敬意，他在成长，他在强烈地想要树立起他自己的秩序和价值，我感到一种生命的振动，虽然我不知道怎样回答他的问题，虽然我不知道用什么方法，能够让一个小男孩喜欢洗手，因为问题是从洗手开始的。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彼此都知道，我仍然爱他，他也爱我。所以他可以这样肆无忌惮来跟我争辩，因为爱人之间才会有这样的争辩，我们之间有无穷的信心和尊敬。

## 从民间发起的炮轰

随着调查的深入，教师们发现的问题越来越多，发给《读写月报》

的文章也变得越来越犀利。然而，作为一份民间刊物的主持者，李玉龙不得不讲求策略了。他和童蓓蓓两人吃住都在编辑部，经常失眠，有时半夜醒来，他便去找童蓓蓓，抓抓头，说：“唉，这样下去不行啊。”“他其实也很舍不得，最后他就从一个媒体人的角度自宫，宫到一个他认为刚刚好的位置。”童蓓蓓说。当时很长一段时间，杂志面临被有关部门毙掉的危险。

“我们的教材经常灌输一些‘隐蔽课程’。表面上跟你讲一个故事，其实试图传递一些观点。比如，你问一个小学六年级的、受了人教版十二册熏陶的小学生，你最佩服的人是谁。他的答案多半是毛主席。然后问他，你最讨厌的人是谁？他的回答经常是日本人。”郭初阳担心，语文课本隐藏的政治倾向、刻板思维和僵化的道德说教，会对学生的成长造成恶劣影响。

《读写月报》的读者大多是一线教师，受众面狭窄。于是，“第一线”将战场转移到互联网。很快，众多家长被吸引过来，天涯 BBS 里的这个话题，转发率和点击率直线上升。童蓓蓓说：“一些有心的父母，看自己孩子课文的时候，会觉得别扭，觉得不自然，但是他说不出到底为什么？当有人说出来的时候他就很高兴，郁闷那么多年，一直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

2009 年，“第一线”的研究报告由长江文艺出版社结集出版，书名被冠以醒目的《救救孩子》。

2011 年，叶开也推出了他的专著，书名更为犀利——《对抗语文》。他历数语文教育“三宗罪”：非语文化，加入太多道德因素；随意篡改文本原意，打断文化传承；选文水平偏低。他一边批判语文教材的毒害，一边提出该如何通过阅读来“排毒”。

民间反响最热烈的时候，“第一线”也曾尝试与相关教材的编写机构取得联系，然而，得到的反应出乎意料的冷淡。发在人教社论坛上的这个帖子，可算是出版方的唯一正式回应。帖子的题目叫《我们应该坚持怎样的价值取向》，部分内容如下：

2009年，一些杂志、网络对小学语文教材里的诸多课文进行了批评，试图运用在西方社会也算不上主流价值观念的思想，来替代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价值观念，笔者实在不敢苟同。

“家”是什么？“家”是血缘和亲情的有机体。教材从最简单的生活小事入手，无非是想让学生从小就能感受到可贵的“亲情”，却无端被扣上“崇高”、“伟大”等道德灌输的大帽子，然后点评人又来质疑道德的力量，说什么“道德的约束，看上去挺崇高，其实隐藏着深刻的矛盾”。由此看来，点评人无非是以课文为由头，凭空假设出一个命题，然后又来批驳这个命题。……那种不考虑具体的社会文化传统等诸多因素，拿出西方的某某理论，以为就可以重新构建一个东方文明古国家庭伦理的新体系的想法，是不能让人接受的……

教材教育学生从孝敬父母开始，这本是最自然、最贴切的角度，体现了人类最质朴最真诚的感情。《论语》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儒家把对父母的孝敬作为一切“爱”的根源和基础，然后推广到兄弟姐妹，推广到世界上所有的人。设想，如果连养育自己的父母都不爱，一个人还能爱他人，爱国家吗？

谦让、宽容和孝道……，是中华传统价值观点的重要组成部分，

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具有普适的意义。在小学语文教材中加以弘扬，是十分必要的，也是不容怀疑的。不能用西方的“契约”取代“谦让”，用“自我”取代“宽容”，用“经济理性”取代“爱的回报”……

然而，站在出版社背后的教育主管部门，却自始至终保持沉默。“这个事情，我们民间热热闹闹，成为一个公共事件，但是它对教育系统内部而言，是没什么影响的。”蔡朝阳对教育行政部门的不作为非常失望。

郭初阳也深有同感：“我们以为放了很大的一炮，结果有点像鲁迅所说的，犹如进入无物之阵。你举起投枪，结果发现没有对手。”

一度，“第一线”希望吸引更多的一线语文教师加入会诊的队伍，因为“只有营垒内部的反戈一击，才最有力量”。然而，迄今为止，这个群体仍然是“沉默的大多数”。记者问郭初阳：“为什么你们不能保持沉默？”郭初阳说：“作为一个人，你是会思考的，机器是不会思考的，如果你愿意把自己看作流水线上的一颗钉子的话，你可以选择不思考。”

也有人质疑，如果教材有毒，“新一线”的教师不也是读这些教材长大的吗？怎么没把他们毒死？蔡朝阳回应：“如果有更好的小学教育、初中教育、高中教育，我们这些人都会更加出色的。他会找到他的幸福感，他的价值观，他在这个世界上的定位也会更加准确。”

## 历史观照现实

2010年前后，对小学语文教材的质疑不断浮出水面。与此同时，几

套被称为“民国老课本”的读物在民间悄悄走俏。一次偶然的机，深圳文化学者邓康延在腾冲的古玩市场中偶遇了一箱旧书。夹杂其间的几本民国时代的老课本，让他爱不释手。“我认真翻了两三则课文以后，就放不下了，课文很短，琅琅上口，又有插图，开始觉得挺好玩的，后来就觉得有种说不出的东西，有种肃然起敬的感觉。‘茶几上有针有线有尺子有剪刀，我母亲坐几前，取针穿线，为我缝衣。’全是白描，没什么形容，但是慈母手中线的那种意境跃然纸上，这是亲情。‘三只牛吃草，一只羊也吃草。一只羊不吃草，它看着花。’最后一句真好，它看着花，你就觉得这只羊是一个艺术家。”

陈丹青的老师木心先生 1927 年生于浙江桐乡，七八岁时在乌镇的一所小学读书，“一个中国乡下的小学，就已经放莫扎特、舒伯特的歌了，还有勃朗宁、安徒生的童话。”陈丹青的母亲也是在民国长大的。“我母亲小时候上学，说有一家风琴，现在她才想起来弹的都是教会里的歌，圣母、上帝，人要爱人、原谅人。”

跟现在的课本相比，陈丹青发现民国的课本都非常善良：“尤其是小学课本，猫、狗、春天、风筝，它真的把你当一个小孩子对待，所有的课文都有种慈悲心、父母心。”比如，民国课本《新学制国语教科》第四册第一课《静听》一文：

哥哥讲故事，妹妹静悄悄。

一面侧着耳朵听，

一面睁着眼睛瞧。

这时候，木马不跑，

土鸡不叫，玩偶不闹。

他们为什么不跑不叫也不闹？

原来是大家听呆了。

透过老课本，人们感受到的是开放而质朴的时代气息。它们的编纂者大多是一时精英，蔡元培、叶圣陶、丰子恺等大家不惜放下身段，为小学生斟酌字句。民国时代，教材的出版呈现开放的格局，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北新书局、大东书局都有自己的教材，学校可以根据需要自行选择。1949年以后，中小学教材的出版权被教育部收回，仅授予人民教育出版社独家经营。

几年时间，邓康延收藏的民国老课本已有二十余册，他把自己对老课本的解读编写成书，名为《老课本 新阅读》。“我觉得说千道万，能把一些普世的、常识的、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道理以及你眼前见到的景观，用最简洁、明朗、生动的语言描述出来，就是好的课文，就能影响孩子们的一生。”

对于语文教育的未来，钱理群先生说：“按道理讲，国家只应该管一个东西，管标准，你学完了，要达到什么标准，具备什么能力，这是国家应该管的。至于选什么，怎么教，是不该你管的。这不是国家的事，应该让各个学校自己去管。”

2001年，教育部颁布《中小学教材编写审定管理暂行办法》，打破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教材出版垄断。据业内人士推算，中小学教材出版市场的年利润高达300亿元，面对这块被切开的“奶酪”，众多出版社跃跃欲试，新的潜规则迅速形成。教育部门、教材编撰者与出版社在此形成了一条关系错综复杂的利益链。“出版权争得非常厉害。因为这个是不得了的。”钱理群对此现象已经观察过很长一段时间，“现在所有的

教育问题，最后都归到教育之外了，也不是理念问题，也不是方法问题，就是一个利益问题。而教育本身恰好又是一个理想主义的东西，是最不讲利益的。”

叶开在研读语文教材过程中，不得不质疑：“人员的组合，台子是怎么搭的，谁在控制，谁在出版？这个事情你一揭出来就是个大事情。”

“真正好的文学作品进不去。”蔡朝阳指出，编写教材的整体工作流程都是相对隐蔽的，不会对外公开，所谓的指导思想就是教育部规定的大纲的要求。

## 建设新语文

因为炮轰小学语文教材，郭初阳、叶开、蔡朝阳等教师遭到许多莫名的攻击，甚至工作也受到影响。有批评家称，他们“只会批评，不会建设，与社会无益”。于是，郭初阳跟朋友合作，在西湖边的一座写字楼里开设了自己的语文课。他把这块自己的天地称为“越读馆”。越，浙江乃吴越之地，与“阅”谐音，表露自己推广阅读的心志，且超越单一阅读的期望。

越读馆每逢周末开课，挑选文本的准则有三：有趣、有料、有种。郭初阳希望自己的课堂，能够让学生“亲历历史，参与到历史的建设中来，让他关注底层，让他站在穷苦的人这一边，让他有同情心，让他有正义感，让他勇于表达，做一个比较合格的现代公民”。

叶开也在进行自己的建设，利用自己的文学见解编制《一个人的教材》。他在微博上与各地知名作家互动，请他们也参与文本的推荐。“我

们需要这样一部教材，更富有人性，更具备基本常识，更靠近普世价值，更具审美感，更有逻辑性，这不仅仅是为自己的利益，更是为了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未来。”

据悉，“第一线”的教师们表示，他们的下一个调研目标将指向中学语文教材。

童蓓蓓乐观地看待教材未来的变革：“柏林墙倒下之前，没有人相信它会倒下。它倒下之后，没有人相信它居然能那么长久地立在那里。人的眼睛看到的東西很有限。”

“教育圈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一个小男孩，在退潮后的沙滩上捡小鱼，看到一条小鱼就捡起来扔回大海。沙滩上全是小鱼。有人跟他讲，你一个人怎么捡得过来？小孩说，对这条我扔回大海的小鱼来说，这就是全部。”蔡朝阳和与他同行的一线教师，决心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畴，推动教材的改良。“我们不能做需要很大能量的事情，但是我能做好我自己的事情。”

## 02 呵护童年

2013年底，亲子互动真人秀节目《爸爸去哪儿》火速蹿红，五个小萌娃游玩在乡村、动物园、海边、森林，与树木、草屋比邻，踏着青草，烧着篝火，他们在奶爸的照顾下拼积木、摘玉米、找食材、照顾小孩，在游戏中学会勇敢、合作、担当，获得成长。他们体验自然，融入生活，一言一行都被摄像头忠实记录，每段天真话语都打动着观者的心。这档节目让成年人更近距离地深入孩童的世界，也获得全国第一的收视奇迹。

在成都近郊，也有这样一所让孩子们融入自然、拥抱灵性的学堂，它就是华德福学校。学校所在地原本是一家快要倒闭的度假村，2004年9月，三位青年把它盘了下来，创立了中国大陆第一所华德福学校。

黄晓星、张俐、李泽武，三人曾在美国、英国接受过系统的华德福教育培训。黄晓星、张俐夫妇留学期间在纽约的鲁道夫·史代纳同胞社区从事华德福幼儿教育数年，随着他们的孩子一天天长大，孩子的教育成了一个大问题，在国内接受应试教育的“荼毒”对张俐夫妇而言不可接受，他们便决定引进华德福教育，自办学校，给中国孩子创造一个自由成长的环境。

## 选择

听雪今年 11 岁，在来华德福之前，她是成都芳草小学的一名学生，考试成绩名列班级前三，是老师眼中的乖孩子。但在妈妈眼中，自从上了小学，曾经活泼可爱的小雪总是显得很紧张，身体也渐渐瘦了下来，整天沉默寡言，除了写作业，就是看电视。“她上一年级之前，整个状态都很放松，那种纯洁和自信，后来都消失了。虽然我做了各式各样的努力，可是传统教育下的这种压力，把她压得很难受。在让她来华德福之前，我有过纠结：是学习成绩重要呢，还是她真正生命的成长更重要？”

2012 年暑假，听雪妈妈在朋友那里第一次听说了成都华德福学校，自由、放松、充满乐趣的华德福教育似乎更适合听雪，而学校恰好正在招收试读生，便打算带听雪来试试。

同样以试读生身份来到华德福学校的，还有深圳女孩梁琛。她因为厌学，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爸爸妈妈决定把她转到华德福，目前母女俩租住在学校附近的小区里。两周的试读结束后，听雪和梁琛将要做出选择，决定是否留在华德福。

周日，一个雾蒙蒙的早上，摄制组来到华德福学校。一路所见，青草郁郁，几个孩子背着书包，由爸爸妈妈牵着手走进校门。校园由一些平房和一大片院落组成，院子外面还有一个池塘。青石横空，杨柳依依，一步一景。阁楼犄角处，是一院子的鲜美蔬菜，几个小孩蹲坐其间，用稚嫩的小手拨开泥土，挖出几根水盈盈的青瓜。

有人说，这不像学校，倒是一个农庄；也有人反驳说，华德福跟民国时期的乡村学校有点类似。“池塘里有一些动物，校园的某个角落，还养了鸭子和鹅。我走进来以后就在想，是不是华德福的校长或老师在

建设校园文化的时候，就把人和自然、人和环境作为首先考虑的事。”郭初阳第一次走进华德福，就被学校清旷天然的环境所吸引。

20 世纪初，奥地利科学家鲁道夫·史丹纳创立了“人智学”，并依据这一理念创办了第一所华德福学校。史丹纳 1925 年逝世，他的华德福学校也开始在欧洲许多国家发展，至今遍布 48 个国家，共有 1100 所华德福幼儿园。最近几年，在东欧、非洲、南美发展较快，目前在亚洲正在兴起。华德福提倡以人文本，倡导身体和心灵的和谐发展，尤其注重在儿童意识发展的不同阶段施以不同的教育，用中国人的话说就是“万物皆有时”。

“我们认为，人在最初的时候，意识都比较梦幻，是逐渐才清醒的。”张俐说，华德福的教育模式讲究天人合一，课程设置依据孩子心理发育程度。“一年级以童话为载体，童话就是没有时间空间的概念。二年级会让孩子发现，人不是那么美好的，我们有性格上的缺陷，像狐狸那样狡诈，像狼那样贪婪，于是学寓言故事。到三年级的时候，孩子进一步觉醒，发现我是活在这个世界中的，要去学习世界怎么来的，就可以讲盘古开天、女娲造人……到了四年级，孩子们会发现，我们有不同的性格特质，有时就像冰与火的碰撞，所以才有北欧神话里比较浓烈的对比。五年级以后，孩子们还需要知道人类是怎么发展的，而不仅仅是关于我的问题。”

## 不分科的主课

华德福没有传统学校的分科制度，而是由教师自己设计融合了语文、

数学、自然和人文学科的综合课程，这便是主课。听雪所在的五年级班，每天早上八点半，上一节讲述印度文明的主课，这个主题涵盖印度歌舞、宗教、神话、历史和数学，通常需要几周的集中学习。

“梵天创世。最初宇宙只是虚无，它存在，它发展……”教室布置有印度风情的绣花，老师也将纱丽缠在身上，学生沉浸在印度佛教的神秘和大智慧中。

梁琛在七年级要上阅读写作课，为了配合本周的主课——欧亚地理，吴文冰老师特意安排了“探索世界”的写作主题。这是梁琛第一次写诗。吴文冰希望学生能够像野马一样去想象：“我不在乎你们写作偏不偏题，我们的课堂从来没有偏题这种说法。”有一个同学写了三行诗，主角是耶稣：“雪花飘落到大地上，温柔而又亲切。干草堆、马槽里，小小的新生命正在诞生。天空上一颗明亮的星星，为那新生命带来祝福。”

梁琛咬着笔头苦思冥想，却还是迟迟不能下笔。“没有写过，但是让我写的话我还是很乐意的。虽然可能写不出来，可如果真的写出来，又感觉很开心。”

吴文冰也没有催促她，而是不断启发她的思考：“坐在窗户旁的时候你会不会想，外面的世界是怎样的。爬山时你有没有想过，在离你很远的一座山上住着什么。在你穿着大棉衣还冷得发抖的时候，你知不知道，有的国家会冷到零下三十多度。”

“人类的价值，被赋予给我们的双手，它将渗入我们的躯体，升起我们高贵的自尊……”华德福提倡头、心、手的教育，伸展孩子的四肢，滋养孩子的灵性。四年级学习动物，五年级植物，六年级矿物，步入七年级，孩子身体逐渐成熟，有了智性的慧根，课程也有了更多开放性的内容，如探险发现、东方古老帝国开疆拓土、西方中世纪宗教贵族，最

经典的一门课便是“丝绸之路”。从丝绸讲起，包括丝绸的制作、汉唐的政治版图和经济文化。老师在黑板上画出一道弯弯曲曲的黄线，从长安到楼兰，伸向中亚，到达地中海地区。老师讲授黄沙遍地的古老商路，孩子们穿越诗人李杜的晨晨暮暮，体会东西方文化的交融荟萃。

学校为这门课程专门组织了一次敦煌之旅。孩子们卖掉自己制做的玩具和小吃，甚至表演相声，自筹路费。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七岁的孩子第一次踏上远途，他们测量地图，计算里程，诵读唐诗，悠悠走上了这条消失了千年的丝绸之路。嘉峪关的戈壁，魔鬼城的风沙，茫茫然与天地一色。孩子们爬上沙山，看蛋黄般的日落。

在学校，听雪开始创作属于自己的第一本主课本。学校给每个孩子发了一个16开的空白小本子，孩子们根据老师讲课的内容，以及生活感受，自己创作课本。五年级这节课讲的是印度神话，孩子们便拿起湿水彩，又写又画，描绘创造神梵天和保护神毗湿奴征战恶魔军团阿修罗的场景。

对华德福的孩子们来说，课本不再是硬生生、沉甸甸、有无数难解之题的“怪兽”，而是可以天马行空、自由想象、活泼生动的心灵记忆。

“公立学校的课本一般都是复印的，图也是配好，但是孩子就没有办法参与。”五年级主班教师曾杰相信，相比传统语文课堂的划分段落、归纳中心思想，华德福的孩子更能享受课堂，开发他们的创造性思维。

## 仿若遗世的乐园

法国教育家卢梭说：“大自然希望儿童在成人以前就要像儿童的样

子。”中国的老师和家长说：“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为此，许多不到十岁的孩子，被家长送到补习班，每天唐诗宋词、英语数学轮番轰炸，为了提高成绩，家长还聘请家教，恨不得快速生产一个“小天才”。随着幼教的兴旺，家长的攀比心理也越发严重，有的训练孩子表演京剧，有的训练孩子钢琴弹唱，越是有大人模样就越受欢迎。这些误入歧途的教育，常常会把孩子教傻。有研究表明，许多接受大量补习的孩子，比其他孩子往往更加内向，不合群，缺乏交际能力。

“起跑线的终点，就是那个功利的目标，考一个好大学，找个好饭碗。”作家周国平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父母的“良苦用心”。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也认为：“这个非常荒唐，因为教育不是短跑，教育是马拉松。”

华德福认为，对于现代家庭，让孩子有规律地生活越来越难，缺乏生活的节奏，会对孩子的身心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华德福崇尚古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然有律的生活，按时吃饭、睡觉，饭前和睡前有简单的小仪式。一年四季的循环，天有时，地有气，让孩子们的生活有白天和黑夜的节奏。

每天早上，幼儿园有晨圈活动，孩子们围成一圈，唱歌、朗诵。有些老师喜欢在晨圈开始的时候点一支蜡烛，朗诵一首诗，与孩子分享当地民歌或童谣。

参观华德福幼儿园的人常常会问：这里好像是过时的地方，电动玩具在哪儿？各种现代学习材料在哪儿？练习册呢？电脑呢？在华德福幼儿园，人们好像生活在19世纪。相比起大多数幼儿园，这里的玩具也显得过于简陋，有些甚至是半成品。

童年时光不到十年，却是一个人最天真的年华，如果我们的孩子缺

失了这样一段本可无忧无虑的时光，生活被无数试卷习题填充，那么很难想象这个孩子将来会成为一个乐观积极的人。华德福教育注重保护孩子的天性，让他们尽可能地远离电磁辐射，使用天然无害的材料，如黄泥、木头、棉布、石头、贝壳，孩子们用这些东西建造自己的玩具。游戏的材料越简单，孩子需要发挥的创造性就越多。

午后，一位老师正恬然坐在摇椅上，用羊毛线织一个没有五官的布娃娃。“这是一个小姑娘，快乐地又蹦又跳，孩子可以想象她在笑；啊，我太累了，我很伤心，找不到妈妈，孩子们可以想象她在哭。这样的玩具我们称为未完成玩具。就是留一个空间给孩子自己去想象。”张俐解释道。在华德福，模仿是一种学习方式。当大人在做针线，孩子也想要缝，身旁的针线盒里有许多花布，孩子们可以蹲坐在大人身边，给布娃娃穿上漂亮衣裳。

华德福校园内随处可见孩子的作品，甚至一些施教器具，也曾有孩子的参与。2005年，张俐与她的第一批三年级学生一起修了一个面包炉。“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学习了测量、计算，还有绘画。而且他们还打报告给财务室，说他们计算出来要用多少块砖、多少水泥，大约要多少钱，请我们审批，同意他们用这个钱，有一个预算在里面。”

在华德福幼儿园，每逢秋收，学园会准备好麦子，孩子们欢坐在桌子旁，一个一个地把麦粒从麦壳中拣出来，再用石磨把麦粒碾成粉状。孩子们可以用这些面粉来制作面包，与大人分享，庆祝食物的丰收。

“揉面包，揉面包，大家一起来。左揉揉，右揉揉，双手揉一揉。做好面包，放进烤箱，香味飘……”孩子们用面包炉烤香蕉泥面包、烤白馒头、烤玉米饼、烤土豆，每堂烘焙课都出产不一样的“伙食”，孩子们围坐一起，吃着自己亲手制作的食物，嘴角一抹，黑乎乎的两道印

痕，又香又甜，还有炉火的温热。

显然，通过劳动促进游戏，可以让孩子们触摸到真实的生活气息，感知身边万物的存在意义。

华德福幼儿园没有传统幼儿园的识字、读写和计算，孩子们不用背字母表和乘法口诀。华德福认为，对幼儿园的孩子来说，过早的智力开发会透支他们的生命力，而学习如何生活才更重要。

不言之教，不教之教，华德福希望给孩子营造一份滋养他们成长的土壤，让孩子的天性充分舒展。相比运动场、教学楼，学校更需要的是秋千、树屋之类可供孩子玩耍的地方。“我们真正在用心力编织一件器物，一横一竖，一笔一画，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体验，就是一个成就。”

## 玫瑰典礼

一个孩子从呱呱落地，发出第一声啼哭，到努力掌握自己的身体平衡，艰难爬起，站立在大人面前，他的每一步都与世界共同成长。

华德福幼儿园坚持混龄设置，从两岁半到六岁，让每个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都有兄弟姐妹般的小伙伴相随，大孩照顾小孩，扎堆玩游戏，其乐融融。

对传统学校的孩子来说，升入一年级，意味着进入一个整齐划一、规则明晰的集体，意味着团结紧张、正襟危坐。而在华德福，迎接一年级的新生的是一段铺满玫瑰花瓣的旅程，心灵的觉醒，从此开始。

大厅里，由花藤编织成的玫瑰门安静地竖立在讲堂左边，爸爸妈妈坐在堂下，孩子们穿得整洁漂亮。随着悠扬的长笛声响起，高年级的大

孩子排成一队，每人手拿一束鲜红的玫瑰，老师叫到一个新生的名字，他的爸爸或妈妈便牵着孩子的手，走到玫瑰门的左边，老师接过孩子的小手牵着他走过讲堂中央，一直走到高年级孩子的面前。高年级的同学把鲜红的玫瑰交到新同学手上，并牵着手把他们送到摆好的小椅子上。

“玫瑰典礼是学校里一个非常有意味的形式。”来访的杭州语文教师郭初阳参加了学校新生的玫瑰典礼，在他看来，这是个有点宗教情结的仪式。“由家长牵着孩子的手穿过这个拱门，然后把孩子亲手交到老师手里。这里面，我所体会到的是家长对教师的一种交托，而这个交托中饱含着信任，更是给了教师一种沉甸甸的责任感。”

作为学长，梁琛将承担起她在新学校的第一份责任。她把玫瑰交给了一个七岁的小男孩，并牵着他的手走到台下，这一刻，梁琛感受到了身为学长的责任。“学长拿一朵花，交给一个刚入学的新生，有一种爱的传递在里面。”郭初阳说，“玫瑰典礼不仅是教师与家长责任的传递，更是孩子之间友爱互助的开始。”

玫瑰典礼上传递的尊己敬人的精神，也体现在日常的师生关系中。华德福学校的老师在每个学期结束时，会给孩子写一份报告。“我们不会以优良中差这样的标准来给孩子做总结，我们都是用一些描述性的语言来呈现这个孩子的状况。如果只写优良中差，则哪里优秀，哪里需要改善，并不清晰。”主班老师曾杰解释说。

在华德福的教育设计中，主班教师是一个重要的角色，从一年级到八年级，曾杰已经陪伴一批孩子走过了完整的童年。曾在重点名校就读的梁琛惊讶地看到华德福的学生与老师打成一片：“什么都敢说，在以前的学校里，同学们只是叽叽咕咕地议论，一看到老师来了，立刻散了。现在发现他们大部分都敢说，那我呢，还没适应过来。”

转到新学校以后，听雪也有很多不适应，在上泥塑课的时候，她把围裙乱糟糟地放回桌上，没有像其他小朋友一样整齐地收拾好。“小家伙还有点紧张，”主班老师曾杰没有责怪她，而是敏锐地察觉到小孩的心理变化，“对于老师和周围同学的反应，她是比较容易紧张、害怕的。总觉得同学对‘我’、老师对‘我’是善意的吗？”听雪妈妈也担心她跟其他小朋友相处不来。

如何让听雪尽快融入新集体，曾杰的办法是尽量忽略她。“整个教室，整个班级就像一个大家庭，家里忽然来了一个大家都不熟的孩子，一开始会觉得像客人，大家都比较客气，可是时间一长，大家是要生活在一块的，就希望她能够把自己真实的一面慢慢地展露出来。所以在教室里，我会给她很大的空间，虽然她坐在第一排，但我尽量不太多地去关注她，让她觉得她是自在的。”

## 现实仍然是只野兽

成都，一座以慢生活著称的城市。游客来到这里，可能眷恋，却最终难以落脚。就像一位国外资深华德福教师所说，在中国，家长们常常被华德福所吸引，被它善和美的培育所感动，而当真正置身于这种教育实践时，他们便开始质疑、惊慌——不成功怎么办？我的孩子离开这里后，如何去适应社会？

儿童心理学家孙云晓一针见血地指出：“今天这个时代，是一个特别容易让儿童感到恐慌的时代。”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连续十几年对全国的中小学生进行跟踪调查，发现近八成中小学生学习超时，睡眠不足，

83.6%的中学生父母，要求孩子考试考前15名，54.7%希望孩子将来读到博士学位。

今天，中国孩子面临的学业压力之巨大，竞争之激烈，前所未有。

“童年恐慌的背后正是父母的恐慌、教师的恐慌。他们的期望之高，是孩子绝对无法实现的。这样的期望、这样的压力到了孩子身上必然恐慌。”孙云晓说。

华德福的教育目标不是培养社会精英，而是培养健康向上的合格公民。他们看上去普通，却能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温暖的种子。

两周的试读结束了，对于要不要留在华德福读书，听雪、梁琛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虽然还有很多不适应，但被问及喜欢原来的学校还是华德福，听雪毅然地选择了华德福。华德福没有八年级，梁琛决定在华德福一直读到明年七年级结束，她已经深深喜欢上了这所特别的学校。

“要有的话，就继续上。反正在这儿能待多久就待多久。”

但听雪爸爸有点担心，因为华德福教育与现行教育不太一样，孩子将来还是要继续升学，华德福并不训练孩子的应试能力，如果将来上高中，成绩可能是个问题。爸爸最后持保留意见，并对妈妈说：“假如你觉得听雪这样一个品学兼优的孩子，有必要去接受华德福那种教育的话，这是你的选择，不是我的。”

国外成熟的案例显示，华德福教育本身具有一种加速度的特征。最初很慢、很简单，然后越来越快，越来越广，到了高中，其深度和广度将大大超越主流教育的同级水平。然而，对于这一点，很多中国家长并不放心。

听雪妈妈最终还是帮听雪在周末找了芳草小学的老师补习功课，希望听雪既在华德福的教育模式下快乐长大，又能把成绩及时赶上来。

2012年9月，深圳的六岁小朋友皓皓要上小学了，爸爸有意把皓皓送到华德福，却遭到家人的极力反对。皓皓爸爸认为：“小孩子现在这时候能无忧无虑地玩，以后不管在哪方面，他整个的心态都会是开开心心的，那我觉得，他这个人生就会过得很好。”皓皓妈妈不同意，她说：“我对小孩的要求更多一点，在学校竞争比较激烈，我希望他可以学到很多课程，有很好的学习能力。”

人各有不同，父母对孩子的想法也常常矛盾。创立人张俐这样回应华德福教育与现行体制的区别：“身体、心灵的力量要同步而行，就像人吃饭，小时候需要母乳，大一点米饭，再大一点才能吃火锅，同样的道理，教育也需要节奏。那么，给予他的知识，给予他的信息，也需要这样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这样的话，孩子心灵的力量会更强大一些。”

张俐坦承，华德福没有做大做强的野心，只希望成为丰富的教育菜单上的一个可供选择的单项，可以真正帮助孩子成为完整的人，让他们成为地球上独一无二的个体。

郭初阳期望像华德福这样的学校越多越好：“希望在不远的将来，能够看到有各种不同教育理念的学校，一起来完善教育这棵枝繁叶茂的大树。”

## 03 课堂风暴

课堂，拉丁语为“lectio”，代表阅读和说出来。每个孩子，从这个世界呱呱落地，便开始了人生的课堂。他们亦步亦趋，牙牙学语，从朝霞看到落日，在袅袅炊烟的人世间，聆听大人的教诲。

六岁入学，课堂成为他们拥抱知识的领地，有爱的课堂，也有恨的课堂，老师的戒尺或许还在，但孩童的天真却在课堂之外，每个孩子都需要一份养育他们成长的原野，让知识、情感、能力在潜移默化中提升。

然而，如今中国的小课堂，成为很多孩子的背负，太多灌输，太多技巧，太多应试的挣扎，课堂变得不再可爱，课桌面前一摞摞的书拔地而起，化成狰狞的魔鬼。

栏目组从全国各地精选有意思的课堂，让父母明鉴，让师者借用。这些课堂在国内都曾掀起波澜，或为改革先锋，或为网友热荐。好课堂不常有，虽然他们未必是最好的，却至少能引人思考：我们该为孩子提供什么样的课堂？

## 杜郎口：一所乡镇中学的自我革命

网上一搜杜郎口，各种教参、视频、模式介绍、推广链接，应有尽有，仿佛我们正在找的是一名摇滚明星，闻名久远。杜郎口中学是一所特立独行的学校，他们的校长拥有对教学莫大的勇气，一所濒临撤并的三流中学，短短几年，便成为站在全国教改第一线的学校。

每年到杜郎口参观学习的外地教师已经超过100万人，其中不乏海外华文学校。这样一所学校的横空出世，如孙悟空从石头里长出来一般让人惊奇。所以，这所学校的真实状况，是《盗火者》摄制组最希望挖掘的教育原生态。

杜郎口地处鲁西平原，山东聊城，跟内地许多城镇相似，城市化建设推平了乡村，一眼望去，两岸都是黄了的阔叶林，麦田也仿佛干枯了许久。

崔其升校长是一位地道的山东汉子，眉宇间露出几丝沧桑，面对我们的来访，崔校长非常淡定，看得出他长年接受媒体的轮番轰炸，对所有问题都信手拈来，从容应答。

关于杜郎口中学变革的故事，以1997年为分野。1997年以前的学校，是典型的三流学校，校园破旧不堪，连个大门都没有，教室四面透风，升学率只有个位数。“最开始的老学校是县里出了名的乱窝子。”老教师徐利自小在杜郎口中学读书，见证了杜郎口中学最糟糕的岁月。他还记得，当时老师不上课，喜欢扎堆打扑克牌，山东人最喜欢的一种扑克游戏，叫打够级。“六个人打，至少还有六个人围观。”每天上午的第四节课和下午的第四节课，老师们都不愿意上。“不上可以回家料理一下家务，做做饭，接送小孩。”当时的教务主任出了一个高招——抓阄，

谁抓到了谁上。

这样荒诞的日子一连过了好几年，杜郎口中学在镇上骂名不断。“乡民都说，这学校连兽医站都比不上，烂到根子里了。”家长也不愿意送小孩到学校读书，虽然地靠杜郎口镇，但生源却一年比一年少，一个班经常只有十几个孩子上课。到了1997年，县教育局终于看不下去了，准备换校长。“再不行就撤掉，烂摊子拆掉好过冬。”当时的一位领导下了命令，杜郎口中学面临被撤并的危险。

但是换校长有一个前提，要有人肯干才行。“当时教育局拟定了好几个领导到杜郎口来任校长，都不来，不愿意踏进这个乱窝子。”最后，县教育局就地点将，委任杜郎口乡的党委书记崔其升为杜郎口中学校长。

“到了这份上，学校快要破产，大家也知道我崔某的干事作风，就想试一试。”1997年4月24日，开学前一周，崔其升来到杜郎口中学。虽然早有准备，但学校涣散的教学还是让这位新官吃了一惊。第一次学校例会，崔其升发现到场的教师寥寥，一打听，原来都在办公室聊天喝酒呢。“主任叫，不去，我这个酒还没喝干，喝干了我才能去。”

当过教师的崔其升一直在思考，教师的角色是什么？师者，为人处世，是学生的楷模，如果老师不作为，学生又怎么能学好？

当时的杜郎口中学，教学条件差，好学生转走了，优秀教师也调走了。课堂上多是睡觉的、打闹的、走神的，小动作不断。讲台上，老师喃喃自语；讲台外，学生昏昏欲睡。崔其升喜欢听课，开学听了十几节课后，有一次，他把学生叫到一边，问：“我在课堂听课，你怎么还睡啊？”学生回答得也很直率：“校长，我也不是不想学，但老师讲的我一个字都不理解，跟不上，像听天书一样，我在课堂上融入不了，没办法不睡觉。”

崔其升不禁回想起自己当学生的时候，高一期中考试，考了全班倒

数第五。当时的他，对学习也几乎失去信心，然而，一件小事改变了他。当时的数学老师，是崔其升叔叔的一位同学。有一次，老师要到县里去，就让他给班里的同学讲数学例题。意外当上小老师，崔其升内心忐忑之余，也有点小激动。“为了把这个题目讲好，讲得让同学们听得明白，我要说得更有道理，我要自学。”

第二天，崔其升在同学的注视下，蹬着凳子，站到黑板前，开始给小伙伴们讲解课文例题，他深入浅出，解题步骤一二三，清清楚楚，让同学们大为惊叹。结果大家都听懂了，很佩服他。讲课结束，崔其升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这时候的他，再翻看那些小蝌蚪般的数学公式，竟有说不出的喜欢。“今天怪了，怎么你讲的感觉比老师讲的都明白。”一位身后的同学用小拳头敲了敲崔其升的背肩，眼神放光地说。

同学们的肯定让崔其升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这次意外的讲课开始，崔其升开始坚持自学，半年不到，由原来考试成绩倒数的学生，一下子成了优秀生。

回想起自己当学生时的这段经历，崔其升对教学有了新的体悟。学校自身师资力量薄弱，唯有从学生对课堂的兴趣入手，让学生主导课堂，打破老师满堂灌的“天书课”，让学生成为课堂的小主人。

“讲课应该是一种心灵震撼的活动。当一个学生把自己的学习成果表达出来，得到掌声，看到同学大拇指高挑，看到老师投过来的赞许目光，你说他心里会有一种什么感觉。他会有一种我比其他没讲的同学高出一截的感觉，这就是人性。”

正是自己的亲身经历，让崔其升开始反省教学与人性的关系，他企图从竞争学和人际学上，尽力提升学生学习的兴趣，从“要我学”到“我要学”，改变学生学习的方式，提高课堂效率。

于是，崔其升索性提出让学生走上讲台，代替老师讲课。不分年级，不分学科，全校同时进行课改。

1998年下半年，课改在全校铺开。崔其升带着校委领导，开始一个班一个班地查课。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的老师便跟校长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

“当时的杜郎口中学，教室都是那种瓦房，有老师一看，领导来查课了，就让学生去讲，领导查完走了，老师再上去讲。还有老师不在台上讲，在台下偷着讲。更有老师让学生给他放哨，一看领导来了，好给老师打招呼。”徐利回忆起当时老师对学校课改的抵触，一脸苦笑，他亲身经历了那段无奈、困惑的岁月。

这样的情况持续了一段时间，崔其升召集全校教师开会，决定让每个学科主任上公开观摩课。“没有路，自己要先站出来。”崔其升确立了“10+35”的教学模式，老师每节课只讲十分钟，剩下的时间让学生支配。

公开课一共办了五节，许多教师开始喜欢上了这种上课方式。“课堂是载体，各个学科是媒介，通过这个介质，锻造学生的性情，比如抢着回答问题。这种积极向上、不甘人后的性格，只有在这种课堂上才能出现。我认为，只要学生能够承担的，老师绝对不能包办和代替，要把机会让给孩子。”崔其升反对学生死记硬背，鼓励学生在课堂上当小主人，大胆采用丰富多彩的课堂形式，如朗诵、诗歌、音乐、对联，甚至二人转。

徐利对崔其升“一面倒”的评课标准记忆深刻：“在他的评课中，只要你在课堂中，让学生去发言，让学生去发现，他对你的课评价就很高。反过来你总在那里滔滔不绝，他对这样的课就不欣赏。”

崔其升说：“世界教科文组织对教育有过注解——教育即解放。我特别欣赏这句话。教育就是要解放人的潜在能力，挖掘人的创造能力，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只有老师首先解放了，才有学生的后续发展。”

在杜郎口中学，我们随处可见学生蜂拥至讲台前，旁若无人，积极抢答，跟许多人印象中农村学生木讷、害羞、不自信的形象大相径庭。我们向许多老师讨教，他们给出了一个共同的答案：氛围。激发学生积极参与的欲望是关键。有的老师身先士卒，一开始他们都不读，老师就领着先读，读出感情；他们都不爱表演，老师就又唱又跳的先表演。有的老师充当学生的伙伴，与学生合作表演节目，让学生爱上课堂。

同时，学校也对学生的发言次数进行记录，针对个别表现不佳的学生，由老师或小组长单独做心理辅导。“平常上课的时候我不敢去发言，怕说错话别人会笑话我。” 兰兰是一位可爱的小女孩，她老家在贵州，到杜郎口中学读书已有一年多，刚开始很不适应这种教学模式，但经过一个学期的学习，在老师的鼓励下，兰兰成了班里最活泼的女生。“我们就抢着呗，有时候抢不过来，因为我是女生，个子也小。” 杜郎口的课堂不需要举手就能发言，也不用坐得整整齐齐，这是她最喜欢的一点。兰兰有一个愿望，中考能考上理想的高中。为此，她决定像一位真正的女汉子一样去争夺每一次的发言机会。

杜郎口中学的课堂，很少有统一的学习活动。同样是对课文的学习，你可以大声朗读，也可以默读，还可以抄写着读。教室取消了插秧式的课桌排放，变为以小组为单位的对桌而坐，八人一组，互相学习，随时讨论。每间教室都标配四面大黑板，学生可以随时将自己的学习所得板书到上面，供老师和同学批改。有参观者说，四面黑板的创意应该申请世界吉尼斯记录。

据副校长张代英介绍，刚开始教室里只有一个黑板，但一个黑板只能容纳 12 名学生在上面写字。这时候有老师就提出，可以将学习园地

也用起来，于是教室后面的学习园地也被学生占领了。有些学生抢不到黑板，就跑到教室的铁门上，把字写在上面。有学生干脆跑出教室，在教室外的水泥地上写字画画。崔其升看到这样火热的上课场景，决定在教室增设更多的黑板，这就是四面黑板的来历。因为南面要采光，第四面黑板便设在教室的走廊上。

如此，坚持一年后，杜郎口中学的中考成绩竟从茌平县倒数第一名跃至中等水平，此后长年稳定在全县前三名。

2005年11月，山东省召开农村教育教学现场会，杜郎口中学的课改成果第一次被整理汇报，省教育厅派专家组到杜郎口研究学习。此后，安徽、河南、河北等省市的中小学校也闻风而动，纷纷派人过来取经，杜郎口中学一下子成为全国焦点。“前几年，西藏、香港、台湾同胞也来了，甚至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瑞典等国家，都派人过来考察。”崔其升自豪地说。

一度，学校周边仿若旅游胜地，为限制人流，学校甚至开始收取门票，每人每天70元，近几年又稍有涨价。

从未流学校到课改成功的典范，杜郎口模式迅速成为舆论的焦点。迄今为止，来杜郎口中学取经的各地教师已经超过100万。一所乡村中学的另类教改，正以一种被观摩的方式传播开来。但与此同时，对它的质疑也不断浮出水面。2012年1月，民间教育杂志《读写月报》推出了评点杜郎口课堂的专刊。杂志主编李玉龙说：“在目前的主流话语里，似乎认为杜郎口的课是好课。但是我们这组专题呈现的是不一样的观点，我们认为杜郎口的课是有问题的。”

这期杂志封面用了两行上下颠倒的字，醒目地标出“杜郎口中学的课，不是好课”，分别通过杜郎口中学的语文课《爸爸的花儿落了》、

历史课《第二次科技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化学课《物质组成的表示》，剖析杜郎口中学课堂存在的问题。

《爸爸的花儿落了》是台湾一位作家的小说，课堂实录中有这样的一段对话：

师：今天，我和同学们一起来学习《爸爸的花儿落了》。同学们对亲情并不陌生，这篇小说也是与亲情有关的，请同学们想一想，在读书过程中，你都了解过哪些与亲情有关的内容呢？可以站出来说说。

生1：我听过一首歌，《烛光里的妈妈》。

师：这位想到了一首与亲情有关的歌曲，其他同学自由站起来说，可以是诗句，可以是名句，也可以是歌曲片段。

生2：我读过一篇文章，《远去了，母亲放飞的手》，里面有一句是：母亲将我放飞以后，我离开那双手，那双给过我无私的爱的手越来越远了，但它给予我的种种人生启示，直到今天仍然能够从细小处挖掘出珍贵的宝藏来。

师：好，这是与亲情有关的一个很好的句子。其他同学还有吗？

《读写月报》的纪现梅老师对此的评析是：“老师在短短的一段话中，‘亲情’一词出现了三次，出现得很自然，很坦然，很理所当然，我们从中得到的信息是：这是一篇关于亲情的文章，这节课就是来赏析亲情的。每一个读过《爸爸的花落了》的人都不会认为亲情是这篇文章唯一的主题。在这里，老师就像一个专制的牧羊人，把羊儿带到草原上，不是让它根据自己的需求去找适合自己的草，而是扬鞭一挥，划出一个

圈子。没有一只羊越过老师划定的圈子，大家都是乖宝宝。”

“它的整个教学还是以应试为趋向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考试而服务的，这是第一个大问题。第二，它的课堂表面上看学生很活跃，但实际上思考还是在一个很小的范围之内，还是自己禁锢着的。”李玉龙认为，杜郎口中学的老师根据教学大纲考试的一些难点重点来制定导学案，然后在课前发给学生，学生通过导学案来完成一节课的预习。“表面上看是没有主导，但实际上教师主导的迹象很明显，所以这种课堂和原来的课堂没有本质的区别。”

## 郭初阳的越读馆

《读写月报》的核心作者大多是全国各地的一线教师，多年来，他们坚持以网络为平台，探讨最新鲜、最迫切的教育问题，由此形成了民间团体“第一线教育研究中心”。2004年，“第一线”成员曾组织发起了对魏书生、于漪、钱梦龙三位中国基础教育界权威人士的批判，反响强烈，一时掀起重新审视中学语文教育的思潮。李玉龙、蔡朝阳、郭初阳等人就是第一线教育研究中心的核心成员。

“‘第一线’让人有一个联想，战斗在教育最前线。”郭初阳曾经就职于杭州市外国语学校，与蔡朝阳、吕栋合称“浙江三教师”。因为共同编写了一本《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他们仨成了挑战语文教科书的“死党”。目前，蔡朝阳和吕栋仍在各自的学校教书，郭初阳则在杭州开了一家“教什么课自己说了算”的越读馆。

“越读馆的含义有好几个，我们很强调这个 reading。而浙江是吴

越之地，我爱这块地方，我个人很欣赏鲁迅的一句话——‘越乃报仇雪耻之乡，而非藏污纳垢之地’。我觉得这句话说得很有力量，所以就用了这个名字。”郭初阳说。

郭初阳外表清瘦文静，一旦坐下来采访，你会发现他语速加快，眼睛发光。他对教育问题随手拈来，熟知各种文学典故，同时容易接受新锐观念，也不乏自己偏执的一面。

郭初阳在课堂上做了很多尝试，自己选教材，将电影、诗歌引入课堂，与英语课合作等。“我们努力让语文课堂变得比较迷人，学生也很乐意上语文课，也很享受。”同时，关注社会和历史，让学生有同情心，有正义感，做一个合格的现代公民。“教师是一个不间断的学习者，一些经典课我们会固定下来，用的文本都是很经典的，这样含金量会比较高。”郭初阳将自己比喻成在教育的菜场里摆摊的小贩，只卖一种产品，这个产品是他自己种的。“我不敢，也从来没有说我这个产品可以提供所有的营养，只不过我这个还挺绿色的，味道也不错，对你的身体可能有一点点帮助，但是你还会吃别的东西。我只是尽自己所能，提供一些我认为好的作品，以供选择。”

学生1：如果你的亲友和熟人愿意坦白他们对你真正的看法，你要不要知道？

学生2：你要不要孩子一生下来，就知道他只能活多久？

学生3：你面前放着十把手枪，其中一把装着子弹，你随便取一把，对着自己的太阳穴扣下扳机，要是不死，就给你一千万。你干不干？

学生4：如果你是上帝，你要把这世界和人类造成什么样子？

学生 5：你想知道自己的死期？

以上是郭初阳的语文课《难题之书》的课堂节选。作者乔治·斯托克，英文名是 *The Book of Questions*。《难题之书》没有人物，没有故事，只有上百个刁钻古怪的问题，致力于将读者推入哲学的两难境地。这些问题，成人都不一定能回答，交给初中小孩，会不会太难了些？郭初阳说：“学生其实是很愿意接受挑战的，老师这么看中‘我’，那‘我’要尽力而为啊！所以，我在发他们讲义之前，做了一些渲染，我说这是一份超难的讲义，你现在也许只能看懂一点点，但是我依然想给你看，因为我知道它很好，我希望你现在就知道它，然后随着你的生命不断扩展，可以重新再看，理解更多的东西。”

郭初阳从这本书里挑了些问题，写在小纸条上，然后装进一个小铁盒。每个学生都可以闭上眼睛抽一张，里面的问题或者刁钻，或者奇怪，但绝对有趣。“你可以看看自己的手气到底好不好。研究一下你的问题，然后每一个同学都说一说这个问题你打算怎么处理、怎么面对。”

课堂越发火爆，孩子们对这些问题的答案也越发引人思考，郭初阳并没有过多干预孩子们的思考，而是让他们充分表达自己的想法：“没有人拥有真理，而每个人都有要求被理解的权利。教师的职能，更多是做一个导演，然后由你来决定，你选哪几个演员，怎么安排、怎么调度；演员恰恰是那些学生，由他们来创造。所以，教师一定要节制节制再节制，用帕克·帕尔莫在《教学的勇气》里面的话说，教师只是平等者中的首席。”

## 魏勇的新历史课堂

魏勇是北京市十一学校的历史教师，他曾做过乡村教师，见证了中国教育垂直分布的海拔和气候。在魏勇看来，知识既传播了真理也传播了谬误，历史学科尤其如此，所以，历史学教的不是知识而是思考问题的方式，要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使学生真正成为关心国家前途和全人类共同命运的人。

魏勇很早就全国著名的特级教师，他身材魁梧、方面大耳、小平头，经常穿皮夹克上衣，派头十足，骨子里热爱历史和政治。用魏勇自己的话来说，他是一个表面温顺、内心叛逆的人。1993年，魏勇在一所县中教初一历史，由于没有升学压力，魏勇决定由学生点课，他们想听什么，他就讲什么。这样自由的日子只过了一年，后来连续多年被学校安排教文科毕业班。“文科不自由啊，教文科，你必须按照考试的套路来，如果你不按照考试的套路，就会耽误学生，按照考试的套路来呢，就是折磨自己，所以我觉得教理科比较好。”这些经历让魏勇逐渐摸索到了打擦边球的技巧和分寸，力图在传达普世价值和高考应试之间寻求平衡点。一边妥协，一边抗争，魏勇秉持中庸之道，课堂也越发活跃，从不乏与教材不同的新观点，总会提出一些有挑战性的问题以刺激学生思考。

在北京十一学校，魏勇的自由度得到充分的延展，他自编教材，只教高中理科班的历史课，习惯用思想的碰撞去激发学生对历史的兴趣。

“我们做文科老师的很辛苦，主要问题不在老师，是环境逼迫的，是因为高考要求这样做，评职晋级又以这些为依据，那我就只能这样去做。你考什么我就教什么，以考定教，你是指挥棒我跟着你走，如果不跟着你走，就会受惩罚。这就是中国的现实。”

魏勇有一节名课《第二次鸦片战争》，长期以来历史教科书的观点是：英法利用进京换约的机会挑起战争以图获取新的特权利益。魏老师则给学生提供了僧格林沁率领军队偷袭英法舰队的材料，又提供了英法方面和中方曾国藩等人的看法，然后向学生提问：战争发起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东西方相互对立的观点是否存有偏见？面对侵略者，我们是否该讲规则？这些问题让学生迅速分成两派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些争论是有益的，学生可以从中学会独立思考，并逐渐学会用事实和逻辑去说服对方，而不是固执于成见。”

北京十一学校的环境设施比许多学校都要先进，教室配备一人一台笔记本电脑供学生上网，魏勇的历史课便在这样发达的信息环境中展开。有节课讲的是辛亥革命成功后为什么没有名至实归，没有真正做到民主。他在课堂上问学生：

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的理想和愿望实现没有啊？没有真正实现。表面上建立了民国，但实际上有名无实，这里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为什么？这边的同学，你们人多，把民国初期政治上都有哪些特点给找出来；你们后面管经济，你们这里四个同学，人少，负责找出民国初期的财政状况，看看这个问题和钱有没有关系？你们几个查国民受教育程度。十分钟，要抓紧。

“我觉得在寻找这些问题的过程中，锻炼了我们搜集信息、整理信息、判断真假信息以及发现真理的能力。”一名学生这样回应课堂上的“随意上网”。

学生分组学习、扎堆讨论，魏勇给他们准备需要的历史材料，提供

搜索关键词，通过互联网获取更多信息。每年的寒暑假，魏勇会跟教研组的老师一起，封闭二十来天，研究史料，从中遴选合适、靠谱的内容，汇编成教科书。

魏勇认为，高效的课堂模式，能让学生注意力集中，且愿意表达。此起彼伏的课堂讨论是魏勇历史课最常见的场景。魏勇反对传统字正腔圆的授课方式：“老师在讲台上讲，学生在下面记笔记听，然后下课就背笔记，这种方式我觉得不是真正的教育。”

即便是课下，有些学生依然兴致不减，拉着魏勇讨论问题。“45分钟没法完全展开，如果能引起一部分学生对某个问题的好奇和兴趣，他课后便会去主动完成。”讨论不会漫无止境，老师要学会在恰当的时候停顿、提醒，或引导学生的思维。“这跟做菜一样，你放多少盐，这是需要感觉的，扔进去不咸不淡。”魏勇说。

这些讨论在传统的课堂中非常少见。魏勇提倡不精确的课堂：“不要预设得那么详细和精准，因为课堂上学生的思维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你事先是无法判断的。当学生出现了一种新的情况后，老师会顺着那个方向、那个气场来走，从而把这个气场调到一个比较兴奋的高度，如果你没跟上学生的节奏，刚刚兴奋起来的那个气场马上就冷下去了。我们上课的最终目的还是要让学生的思维活跃起来，你所做的一切都要服务于这个目的。”

怎样才算一名合格的历史老师呢？“勇气很重要，你不能揣着明白装糊涂，一个装睡的人是永远唤不醒的。”魏勇希望他的学生，既能应付考试，也会独立思考。“就是两头都得占着，如果你忽略了考试，那你就太傻了，因为这是一个现实的利益选择，毕竟学生要考大学。但如果你全部都是为了应试而教学，那你很可能把学生弄成白痴，他将来

会恨你的。他会觉得在你的课堂上，除了应试什么都没有。而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如果错过了接受常识真相和普世价值的机会，他会闭塞很长一段时间，他的人生都不够完整。”

## 04 寻找活着的马小平

一张褪了色的照片，静默地驻在鲜花簇拥的石岗上。石岗上写着几行字：“马小平老师，1956年出生于湖南湘潭，2012年在深圳辞世。历任湘潭一中、东莞中学、深圳中学的语文老师。他是一位值得我们尊敬并铭记的好老师。”

马小平重病缠身，却用颤抖的双手执笔写下了最后的呐喊，他为信仰而活，单纯，不沾世故。最后留在讲台上狼狈的身影，仿佛在说，他还会回来。

我们回忆的，终究会被铭记。

### 同舟人

马小平的女儿马前已经有一年多没见到爸爸了。她想念爸爸的时候眼眶泛光：“我想爸爸了，特别想。想起午后明媚又温和的阳光，想起爸爸的那个书房，想起他精力充沛、神采飞扬的样子，那一切，都似乎

离我这样远了。”

“当我看到人们对自由的追寻，对苦难的悲悯，对他人的关爱，对正义的坚持，当我遭遇所有这些闪耀在精神世界与世俗生活中的趣味和诗意、伟大和纯净，我总是在想，如果他还在，我便要与他分享，像我们这许多年一直在做的那样，他会认同，他会感动，他会与我产生共鸣，他会为我骄傲。”马前坐在北京的家中，阳光透过窗帘洒向地板。

在女儿眼中，马小平热爱诗歌，同情弱者，向往自由，是她的人生导师。“他在很多蒙昧的心灵里，种下了真、善、美的种子，让那些个体生命能够获得更丰富、博大、优美的体验。”

《双城记》、《死亡诗社》、《肖申克的救赎》、《辛德勒的名单》……这些沾满指纹的书和影碟，以及其他许多美好的名字，都曾被一位父亲用来在许多个沉闷的午后给他稚嫩的女儿展示这个世界丰富、通透、真实的一面。“至死，爸爸都是一个坚定的理想主义者，这个情怀延续下来，改变着我的生命。”马前回忆着这些痛楚的、令人心碎的记忆。

那些叶子黄了又绿的岁月，马小平用人文素养和公民意识教育女儿。“很小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不能乱扔垃圾，考试不能作弊，要同情弱者，要尽力帮助他人。稍大一些，他开始系统性地向我传输更多关于自由、民主、平等的思想。我记得他总爱引用伏尔泰的一句话：‘我虽然不同意你说的每一个字，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马小平喜欢胡适，“他跟我说过人们一直以来对胡适的误解，他引用胡适的话说，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胡适回应，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天真的孩童，有父母心的老师，围在一起读书诵典，这是马小平与

他的学生常常在做的事。在流沙般温厚的时间里，马小平用他的生命之言，追寻教育的理想国。他的学生，如同播种在伊甸园的种子，沐浴着清新的空气。

黄素珍十年前就认识马老师，当时正读高一的她，戴着眼镜，秀气文静，不经意间抬头看到教室上方马小平的电视讲座，便再也挪不开眼睛。这是一次关于道德的演讲，马小平向学生们发问：“你们知道，东莞的工厂里，一年被机器切下来的手指可以排成多长吗？”

“他脸上的表情很沉静，但他的声音抓住你，吸引你去听。”马小平的讲座进入尾声，他给全校师生念了来自一所香港中学的祝祷词：

感觉着生命的悲哀，还愿意欢笑的，请受我深深的祝福；

感觉着生命的虚空，还愿意奋进的，请受我深深的祝福；

感觉着生命的卑微，还予人以尊严的，请受我深深的祝福；

感觉着生命的欺罔，还待人以真诚的，请受我深深的祝福；

感觉着生命的寂寞，还可以温暖他人的，请受我深深的祝福；

感觉着生命的残酷，还相信善良的，请受我深深的祝福；

只有你看到生命，生命，用信仰来驱除无望，用爱来补偿孤单。

这首词深深打动了黄素珍，她萌生了认识这位老师的想法。东莞中学，已经是马小平教师生涯的第二站。在这所被城市工业包围起来的学校，马小平的教育实践，如同新鲜的花蕾，绽放得异常耀眼。

莞中的校园草地上，黄素珍背着小书包，偷偷地将一封信放进一辆摩托车的篮子上，她确认这是马小平老师的“座驾”。“觉得这个老师非常特别，然后就有一种想要认识他的愿望。”黄素珍第一次给一名不

认识的老师写信，内心忐忑却满怀期待。

这封奇怪的信写着少女独有的迷茫与困惑：“每个人都有一个属于她自己的地平线，你想要追赶前面的地平线看到更远更多的东西，却发现永远只是在追赶……”

她迫切想跟人分享自己的成长，以至让这封信看起来惴惴不安，浅蓝色的信纸皱着眉头，折痕上仿佛可以看到少女的微颤。马小平回到家，翻看了一遍，便在台灯下写起了回信。隔了几天，他在隔壁班找到了这位学生，并把回信亲手交给黄素珍。这是师生之间的第一次见面，此后多年，两人信鸿不断：

**马小平：**黄素真同学，我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想法，作为一个教师，也常常需要从他的学生那里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支持。但这种支持又往往给他一种莫名的压力。

**黄素珍：**听您讲课，我常有一种感动，想流泪的感觉。您让我明白，一个人读书，是让书中美好的精神来感染自己，让自己的灵魂更清澈，更能成为一个人。

**马小平：**黄素真同学，那天，我读到你的《解读苏东坡》，就急着要认识你。一位老师指着你的背影告诉我，看，那就是黄素真。我和几位老师谈起过你：太纯洁，太善良了。世上居然还有这样美丽而纯真的女孩，这太好了。

**黄素珍：**马老师，我们这一代人流失了很多美好的东西，而我们周围的长辈，很少像您一样，说出那样灵性和智慧的话来指引我们。

**马小平：**我没有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精神斗士的想法，我实实在

在的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因为有了你这样的学生，才使我觉得这种坚持是必要的。

“马老师给予我的影响首先是他的一个信念：从阅读中感受到幸福，建立自己的精神世界。”读书、读风景、读社会、读人的灵魂，仿佛一切生命都可以通过阅读来体验。马小平相信，人幼年时知识有限，但能够培养终生阅读、终生学习的态度和能力。

这种阅读形成的生活方式深深影响了马小平的每一个学生。高中三年，黄素珍陆陆续续收到马小平送的几套好书——苏霍姆林斯基的书、民国时期的作家散文选集、夏中义先生主编的《大学人文读本》、诗人徐刚反思中国自然危机的《守望家园》，甚至康德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和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等。“他还送给我一个对当时普通中学生来说相当昂贵的CD机，热情地介绍我听一套诗歌朗诵的CD。马老师送给我的这些书籍一直陪伴着我度过了整个高中时期，他让我知晓了另一个辽阔世界的存在。”

马老师理想中的师生关系，是相生共济的关系。教师和学生是涉过同一条河的同舟人，学生若登岸，教师也可登岸。

## 追寻意义

湘潭一中是湖南省湘潭市最好的中学，1986年到1992年，马小平在这里度过了六年时光。

在湘潭一中师生的记忆里，马小平留给他们的最初印象，是一个如

饥似渴的读者。马小平当时住在一个简陋的小院里，客厅堆满了书，一直堆到墙顶上，有时候甚至需要搬梯子才能拿到上面的书。就算是卧室，书也堆得满满，经常挪不开脚。“七千多册的书，他每一本书都读过，都做了眉批，并且基本上都记得，可以大段地背诵。”与他一起工作过的同事周维约回忆。

从大学时代起，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就是马小平的精神导师。20世纪50年代，苏霍姆林斯基提出“培养和谐全面发展的人”、“要思考，不要死背”、“把读书作为精神的第一需要”、“走进大自然”、“没有差生”等理念。这些都被马小平奉为圭臬。

在湘潭一中，1986级的3-20班至今仍会被老师们常常提起，马小平是这个班的班主任。那一年，刚刚调进一中的马小平主动找到校长，请求成立一个语文实验班。跟别的实验班不一样，马小平并没有要求学校给予优质生源，只是随机去抽学生档案，抽到哪个就把这个学生编入实验班。“他说，你们被选出来的都是与众不同的，我们会在语文教学上，跟其他班有些不一样。”当年实验班的学生邓白洋说。

以3-20班为起点，马小平开始尝试语文教学的多种可能性。他用两年时间教完三年的课程，初三一整年都是课外阅读。两个小时一堂课，中间没有休息。“大家都愿意听，中间不休息。要上厕所的，自己静悄悄地出去，悄悄地进来，一点不觉得累。”

王翔对马老师的课堂记忆深刻：“马老师是我见过的最会讲课的老师。他不仅是在讲课，更是在创造。他在创造一种课堂，他在把他对教育的美好想象外化出来。”

中外文化故事、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悲悯与痛楚，马小平并没有按照课文亦步亦趋地上课，而是在课文之外，给学生打开一扇看世界的窗

户。许多内容课本没有，而这恰恰是年轻人匮乏的公民素养和人文情怀。马小平希望自己的学生做一个有良知的人。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教育是与灾难的一种赛跑，不管我们未来会遇到什么样的灾难，教育可能是把人从灾难中拯救出来的最后一个方法。”

黄素珍在一封信中这样描述马小平对她的影响：“您让我聆听到了一个真正的教师的生命之言。您的每句智慧的话语，都逼我思考。您让我在忙碌的日常生活中沉静下来，让我摆脱庸俗，再次审视自己的灵魂，重检自己过去的种种观念。或者说，您给我指出了许多道门，虽然门还是关着的，但现在及将来，我都将努力去叩响每一道门，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去打开它们。”

马小平的课堂绝不仅仅限于教室。走廊、楼梯口、池塘边、空旷的操场，只要是能站人的地方，都曾是马小平与学生谈论时事、书籍、音乐，甚至游戏的地方。“有人开玩笑说，跟马小平聊天就不用读书了，因为他已经读过了，他告诉你就行了。”

深圳中学的孩子可能还有印象，一位中年大叔，背着一个书包穿梭于校园间，每每遇到人，他都会笑容灿灿地点头，已经走过去了，突然又站住，问上次给别人的光碟你是不是没有啊，看你面露一丝疑惑，就在书包里翻来翻去，定要找到给你。他的包里总是随身带着几十张光碟，都是他找到的好文章、好电影，甚至动画片都有。他恨不得把自己所爱的一切，都给世间的所有人分享。“这个片子，你一定要看，你也可以跟其他人推荐，如果他们需要，我这儿有母碟，可以拷给他们。”

许多老师和孩子都接受过他的馈赠，这些被马小平珍藏的宝藏，总能轻易地打开一个孩子的心灵，深受学生的喜爱和认同。

1992年，东莞向全国招聘优秀教师，马小平被聘为东莞中学教师后，

举家迁往东莞。那个年代的南方，意味着更多的可能性和更少的禁忌。

东莞中学有一间特殊的办公室，时至今日，人们依然亲切地称它为“马办”。这里曾是马小平办公读书的地方，现已改为会议室。在莞中，马小平被委以重任，主持一项被称为“研究型学习”的语文教学实验。

马小平认为，教育不是折磨，而是当下的幸福。他的课堂，可以听音乐、看电影、欣赏朗诵诗，唯独课本，他常常一节课都不会摸一下。

张玉恒老师曾经帮马小平代课：“他跟我讲，语文课堂有两个很重要的东西，第一是思想，第二是有趣。他说你再有思想，如果没趣，那也是狗屁。”即使是讲授课本，马老师的解读也和教辅迥然不同。他的课堂是有温度的，而这种温度来源于人的生命。许多学生都记得他讲的《孔乙己》，他关注的对象是那个12岁的小伙计。对于鲁迅的《祝福》，马小平没有给课文贴上“封建礼教、吃人本质”的标签，而是让学生们写一篇《与祥林嫂对话》的作文。

## 殉道者的背影

20世纪90年代中期，应试教育的焦虑开始弥漫在中小学校园。对马小平来说，升学压力、教学评估甚至整个教育体制都越来越成为一种困扰。他的教学改革被一些人说成是“花架子”，因为“高考不会那样考”。

在与黄素珍的通信中，马小平不无忧虑地写道：“应对各种考试成了教学的主要目的，掌握各种教学技巧成了教学的重要内容，课堂里弥漫着空虚和无意义的气氛，人文精神丧失了，生活的意义没有了，这已经成为中国教育的基本状况。这样的教育甚至成了一种怪兽，吞噬了学生的天

真和童趣……教育是与灾难的一种赛跑，要赶在灾难尚未毁灭人类之前，把能够应对这种灾难的一代新人培养出来。这是一个紧迫的问题。”

“人心不古，物欲横流。那种物质越发达，精神越糜烂的现状，可能是马老师最忌惮的。”湘潭市第一中学教师戴炯曾与马小平共事多年，在他看来，马小平最担心的事情，是应试教育走入极端，把人都培育成考试的工具，“人就是人，人是有生命的，人是有灵性的，人不能够被物化，不能够被训练成工具”。

“他看得更远。他这个灾难不仅指中国灾难，而是世界灾难，这里就包括全球经济危机、全球生态危机，以及全球性的教育危机。”钱理群说。

2003年，马小平的机会来了，一所筹办中的学校找到了他，希望他做出全盘架构，并担任校长。他期望能把它办成一所中国的苏霍姆林斯基学校。“多年来，我一直在寻找，在等待，在准备，我的一生就为了等一所这样的学校。”

为了这所最初被命名为“松山湖”的学校，马小平写了十几页的学校规划，参与图纸设计，并兴奋地跟每个人分享。“这是一个师生共同的精神家园，学生能够在这里收获生命的成长，教师能够在这里收获职业的幸福。这就是他对这所学校的定位。”周剑光老师说。

遗憾的是，由于投资方内部出现分歧，建学校的计划中途夭折了。几年后，在同一块土地上，松山湖学校平地而起，马小平却只能成为它的“顾问”。没能独立办一所学校，是马小平一生最遗憾的事情。

2003年，在深圳，马小平湘潭时期的学生邓白洋意外地和老师重逢了。多年不见，他看到马老师的坚持，也明白无误地感受到了他内心的痛苦。“他说有些家长会过来看他，说马老师我给你装台空调，马老师

我给你搞个冰箱，经常有人过节时送个红包，里面装着一万块钱。他觉得这是在侮辱他，更是在侮辱孩子。他甚至会很愤怒地讲，你看我们学校有的老师，过来才三年，就在很繁华的地段买了房子，凭他的工资肯定买不起。搞这些东西，是有损师德的。”

2004年11月，在乘车前往松山湖学校讲座的路上，马小平的双手突然抽搐不止。随后，他被查出患有脑部恶性淋巴瘤，发现时已是中晚期。随后的几个月，他病情反复，经常要住院治疗。虽然如此，他仍然乐观，周维约在一篇文章中这样描写马小平当时的精神状况：“他哈哈大笑，癌症病人百分之七八十是吓死的，我不怕死，因此我不会死。他说，我得病是因为上帝打了一个盹，上帝一不小心把我放到那个病人的队伍里面，醒来之后发现错了，会拼命地把我拉回来。”从开颅手术到大剂量的放疗化疗，医生发现，马小平从不过问自己的病情，而是整天在病床上鼓捣笔记本电脑和扫描仪。

病房变成了“马办”。学生来看望他，经常会看到病床旁边堆积起来的书，马小平用颤抖的手，把挑出来的书页扫描并存入电脑，如果要打吊瓶，他使用空出来的手，一个字一个字地在电脑上敲敲打打，他从逾千册藏书中挑选了130篇文章，按类别分成《人文素养比数理能力更重要》、《公民的诞生》等16个篇章，合编成《人文素养读本》。文章的作者有罗素、爱因斯坦、龙应台、王小波、贺卫方……也有的不是出自大师之手，而是期刊上、网络上佚名却感觉不错的作品。

几个月后，马小平带着他的《人文素养读本》回到深圳中学。肿瘤夺去了他的头发、体力和眼睛里的明亮。尽管如此，除了每周例行的语文课，他又在高中开起了“人文素养通识课”。

《人文素养读本》在学校内部刊印两万本，马小平的通识课也广受

欢迎，他还连续三年被评为最受欢迎的老师。然而，随着教育环境的恶化，上通识课的学生越来越少。有人质疑通识课无法给升学带来好处，便再也不来上课了。

马小平去世后，有学生在纪念文章里回忆了通识课上令人痛心的一幕：上课的过程中，门外突然传来了脚步声，马老师以为是有学生迟到了，要来听他的课，于是，他的眼睛就始终盯着那扇门，可脚步声越来越小，并没有人来敲门……

马小平执教生涯的最后一个学期，一次家长会后，作为班主任的他被二十多名家长团团围住，质问他为什么不教课本上的内容。学生说，马老师“显得很疲惫，甚至有些束手无策”。后来回到办公室，有学生跟了过去，看见马老师在办公室里泣不成声。

有一天，阳光很好，深圳中学学生向婧看见马老师站在教学楼下，茫然四顾，脸上带着焦急的表情。原来，马小平因为脑部的胶质瘤，连去教学楼的路都不记得了。这条路，他曾走过千百次。

2012年1月16日，马小平去世，享年56岁。

## 寻找

2012年2月，企业家王瑛在微博上读到一篇《南方周末》记者曾鸣发表的文章《一个中学老师的“教育家梦”》，被深深感动，由此得知马小平。此后，王瑛开始搜索、阅读有关马小平老师的所有文字，包括马小平老师的同事和学生写的十几篇悼念、追思文章……她把陆续搜索到的这些文章通过微博推荐出去。其中钱理群教授为马小平《人文素养

读本》写的序言在新浪微博被转发了上万次。

序言里，钱理群坦言，不要看轻中学教师的意义和价值，更不要低估一个普通中学教师的生命力量所能达到的高度和潜能：

马老师在本书《写在前面的话》里，劈头提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是当代中学生最缺乏的？”——这大概是在重病缠身时，更让他魂灵不安的问题。这一问，却让我，以及所有自称关心中学教育的人羞愧难言：因为我们早已麻木，不去作这样的追问了。

马老师的回答，更是惊心动魄：我们所培养的人才，并不缺乏知识和技术，“他们有知识，却没有是非判断力；他们有技术，却没有良知”，他们患有“人类文明缺乏症，人文素养缺乏症，公民素养缺乏症”。在我们的教育下，很有可能将出现有知识，有技术，但没有文化，没有人文关怀和素养的一代人。

……

这是一个真正的教师的生命之言。《人文素养读本》的每一个字，都是由无数的前人、当代人，以及马老师自己的生命的血肉铸成的，它满溢着生命的智慧和力量。请也将你的生命投掷其中。然后，所有的人，作者、编者、读者一起，尽享生命的欢乐和自由！

通过王瑛的微博，跟马小平一样长期在教学一线坚持对学生进行人文素养教育的老师也不断被发现，如上海的樊阳老师、苏州的史金霞老师、西安的杨林科老师、杭州的郭初阳老师等。他们都是“活着的”马小平。“如果马小平老师在他没走之前，能够知道，其实还有很多和他一样坚持的老师，以及社会各个方面的人，对他是认同的、赞赏的，那

我想，他的努力可能会是另外一种感觉。”王瑛跟志愿者一起，为这些得到普遍认可的一线教师们在网上建立网站，推荐给更多的父母和孩子。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语文教师樊阳，周末开设的免费人文讲座，已经坚持了二十多年。“应试所培养出来的一代新教师确实已经走上了讲台。但是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学习、改变的潜能。在现有的体制下，我们确实出现了很多的师奴。但是我还是觉得，只要我们做起来，会对他们有一些影响的。”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韩愈在写《师说》的时候，不顾流俗，收召后学，与青年交往，知贤而好道，是老师二字最生动的阐述。

中华一脉，自古教育家荟萃，他们或依归底层，培育民族的生命细胞；或以经典传世，供后人参详。师职，明者也。明者，不忘明之衷也。本教为先，如是而已。

## 05 李庆明和他的公民教育

IBBY，全称“国际儿童读物联盟”，1953年成立于瑞士苏黎世，为儿童图书作者和插图画家所设立的“安徒生奖”就由IBBY评出。2007年底，央校（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南山附属学校）与IBBY合作，举办“儿童阅读文化国际论坛”，邀请了张嘉骅、汤素兰、郑渊洁、冰波、星河等三十多名作家，以及国内所有的儿童网站版主、《可怕的科学》作者尼克·阿诺、日本绘本之父松居直等。

论坛有演讲、歌舞活动，其中，“啃书吧”活动最受孩子欢迎，李庆明专门请香港的设计师把一本本书籍制作成一个个蛋糕的模样，一声令下，一起啃书。搞笑的是，以李庆明头像做的蛋糕也在其中，最后被啃的一点不剩。

道家曰：“复归于婴儿。”孟子曰：“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李庆明说：“儿童的纯美天性，是演化了一万年的生命成果，儿童比成人更喜欢刨根问底，是天生的哲学家，我们要做的，是重新唤醒他们的天性。”

## 皈依田园

李庆明的童年，大部分时间在乡下度过，村落炊烟袅袅，田野里的蛙叫和知了的喧闹滋养了这位乡间少年的野性，他迷醉于呼啸的风、恬静的夜和奔跑在田园的稚趣。

李庆明七岁的时候，家乡的小学校因故倒塌，李庆明做教师的母亲就在家腾了一间空房出来做教室，让当地没法上学的孩子都到自己家里上学。那个小教室里只有他母亲一个老师，却容纳了全校各个年龄段的学生。他们或坐或站，手里拿着小本子，外面的风呼呼地吹进小房间，孩子们冻得满脸通红，却快乐喧闹。李庆明就在这间教室的欢声笑语里一天天成长起来，成为一个吹拉弹唱样样来得，还能跳上一段芭蕾舞的英俊少年。正是那段快乐的童年时光，让李庆明从小立志，要成为一个像妈妈一样受人尊敬的老师。

中学毕业后，喜欢文艺、擅长诗画的李庆明，主动回归乡下当了两年农民。这段经历，让他更清楚地认识了自己，并开始从哲学里寻找内心的安宁。1981年，李庆明大学毕业，进入南通师范学校教书，情迷哲学的他，将教育学、心理学融入哲学的底色，深受学生喜爱。80年代中期，李庆明跟随名师李吉林尝试在情境中教学，而田园是给予孩子们的最好礼物。每个孩童，他们的天真与活泼，在田野会得到最大的满足。所以，李庆明决定，到乡下去，把情境教育的种子播洒在农村。

海门市海永乡曾是一个贫瘠而又偏僻的江中小沙岛，四面环水，后来和崇明岛连了起来，但从南通去那里还是要摆渡，交通十分不便。海永小学是该乡唯一的小学，这里没有录音机，没有足球和篮球，陪伴200多名学生的，只有破破烂烂的旧桌椅和一架旧风琴。1999年，李庆

明选择了这里，带着他的六名弟子开始了乌托邦式的“乡村田园教育”实验。李庆明坦言：“我一直在想，可不可以把最前沿的教育方式放到田园里，让孩子们走近现代文明时依然能享受自然之美，第一次走进民风淳朴的海永乡，我就有一种感觉，那里可以让我的乌托邦梦想孕育成长，所以不顾一切就来了。”

海永小学地处偏僻，环境简陋。据当地老师介绍，当时的教室里，课桌就是一块板子搁在土台子上，凳脚少有完好的，都要用绳子或小木板加固，室内光线昏暗……学生多年考试成绩稳居全市倒数第一，五年级的孩子仅有城市孩子二三年级的水平，这几乎就是一个被人遗忘的教育死角。然而，这样资源贫瘠的海永，这样简陋得近乎破败的小学，却是李庆明难以忘却的教育理想地。四年时光，他手把手地教当地老师如何备课、上课、批作业和开班。学校没钱，李庆明便捐出自己的稿费给学校当活动经费。他忙得充实而快乐，常常是早上在南通，中午去别处，晚上又伴着潮水赶回海永。

海永小学一间窄窄的楼梯间，被当地老师亲切地称为“李公馆”。李庆明便住在这里，虫鼠相伴，却安之若素。晚饭过后，李庆明的弟子和当地老师会集中到李公馆，李庆明挨个给他们指导教案、备课，向他们灌输田园教育的主张和理念。一边指导一边示范，一个眼神、一个手势、一句话的语气，都近于苛求。“我在教师队伍里强调田野智慧，做田野方面的研究，在观摩和实际训练时，会渗透一些我的理念。”李庆明说。

李庆明心知，海永小学缺少高素质的教师，只能内部挖掘潜力，办好培训。他还利用自己身兼南通师范学校科研职务的便利，让学校老师分批到南通师范附小培训。

为了解海永学生的家庭情况，李庆明要求老师们跟他一样，利用晚

上休息的时间家访。“农村晚上没有灯，一片漆黑，学校又在坟地后面。要去家访，必须经过阴风阵阵的坟地，教师们每天晚上都被星星点点的磷火吓得屁滚尿流，有时候还碰到夜晚出来觅食的饿狗。于是他们就把我跟野狗排在一起，说是世界上最痛恨的两样东西。”李庆明对教育事业近乎疯狂，也要求弟子和下属同样疯狂，以至于挨了不少人的骂。

为了改变学校破旧不堪的教学环境，李庆明利用一切机会和关系四处化缘，一张嘴、两条腿，先后给学校添置了新的课桌、VCD机、电视机，设置了电脑房、舞蹈室。

田园教育也开始渗透进校园，“情感入课堂，智慧入课堂，活动入课堂，艺术入课堂，生活入课堂”，李庆明期望，教育能真正成为孩子们的福音，让校园成为童年温暖美好的记忆。

在李庆明看来，乡村是跟大自然最亲近的地方，这里有清新的泥土味，这里有强烈的生活感，这里有城里找不到的原生态，是人类文明最清澈的存在。四年时间，李庆明骑着摩托车奔波在城乡之间，行程四万多公里，身体力行地带着海永的孩子在田野栖息、颂诗、跳舞，在树叶斑驳的丛林里领悟孤独。他从南通自费带过来的一架钢琴成了孩子们的最爱，下课后的“哆来咪发”在校园随风飘荡……

学习是快乐的，上课也应该成为孩子们领悟真知的园地。短短一两年，海永的家长们惊奇地发现，自己的孩子像换了个人似的，不再喝生水，见人主动行礼打招呼，学习成绩也上去了。在当年海门市教育局组织的三年级数学调研测试中，实验班学生的优秀率高达74.6%，孩子们还学会了唱歌、跳舞、画画、讲故事……

李庆明的老师、中央教科所所长朱小蔓在细细考察了海永小学的实验情况后评价说：“李庆明在农村这样的现实大地上创造了一个高品质

的教育。”

全情投入工作导致李庆明的生活受到影响，常年在外，与妻子聚少离多，不长的婚姻也在这时无奈终结，女儿交给父母抚养。李庆明从不讳言自己是个离过婚的“单身男青年”，虽然他总是说离婚跟自己的教育事业没有任何关系，但对于他的这种说法，几乎所有老师都不认同。一名女老师说：“校长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教育上，一沾上教育的事，别的事都给忘了，根本不可能顾得上家庭，换成是我，也会跟他离婚的。”

## 艰难的公民教育探索

深圳的学校冠以“央”字头，奇特的命名背后隐藏着一段特殊的历史。央校首任校长陈如平回忆说，2001年9月27日，教育部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与南山区教育局达成共识，签订了《关于联合举办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深圳南山附属学校的协议》，央校成为中央教科所的唯一附属学校。

央校学校管理委员会由七人组成，其中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代表四人，深圳市南山区教育局代表三人。学校管理委员会每届任期五年，负责推荐由中央教科所选派的校长人选。由于人事变动，学校管理委员会较少运作，特殊的外部条件，让央校这棵独苗茁壮成长。“教育的中长期规划是学校要自主办学，而我们央校十年，先尝了这样一颗野果。联合办学这种资质在制度上给了我一些空间。”李庆明说。

在央校筹备之初，时任中央教科所所长的朱小蔓，积极运作李庆明

南下深圳。朱小蔓希望，李庆明能把在海永的田园教育经验移植到深圳来。2003年8月28日，李庆明从江苏老家来到深圳担任央校执行校长，2004年4月起接替陈如平先生担任央校校长。

然而，在就任央校校长不久，李庆明便发现，看似有办学自主权的央校，却屡屡遭遇体制内教育人士的非议和社会舆论的压力。2003年底的一个晚上，李庆明在他的书屋，阅读哲学家舍勒的《情感现象学》至凌晨，内心困顿萦绕，不能安睡。他提笔给老师朱小蔓女士写了一封信，信中这样写道：

敬爱的小蔓师！你还记得我那次在中央教科所的竞聘演讲中说的那句话吗？我说：“教育在任何时候都是需要乌托邦的。乡村需要，城市更需要；过去需要，现在更需要。老实说，我对在一个飞速发展的都市从事教育实验还是有几分担心的。我担心会迁就城市教育过于追求技术、理性化、工具化、市场化的倾向……”据此，我认为，在央校悄悄进行的新教育革命所遭遇的曲折和艰辛也是可想而知的。两个月的经历多少验证了我的这一预感，只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我不仅差点就被这里的一些人造的教育泡沫和纯属虚构的教育神话所迷惑，而且也领教了在乡村绝不可能遭遇的复杂、自私、虚伪和狡黠。……有你和中央教科所的支持，有教师们的默默等待，我是不会轻言退避的！

这封信的背后，是李庆明坚持的教育理想与现行教育体制碰撞的触痛。他在乡村海永所践行的田园教育理念，遭遇了在城市已经规模化、体制化的应试壁垒的挑战。

李庆明希望在央校培育一种新的德育。“我的老师朱小蔓女士，在我来央校之前有个交代，说要做一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实验，做一些教师队伍建设的实验，要做一点‘真德育’。用她的话说就是直面现实的德育，而不是那种假大空的、无效的。甚至是反效的德育。”李庆明认为，现在的德育羞羞答答、畏首畏尾，缺失了培养人的社会热度的东西。

李庆明在深圳的住所有一个简陋的书斋，他喜欢埋首案头，在前人的著述里寻找教育的思源。“我做了一些理论上的思考，开始梳理西方的公民观，同时也对中国近现代的文化思潮特别是改造国民性的思潮，做了一些思考。2004年我带动我的一些同仁开始做这个公民教育的试验。”

在做公民德育之前，李庆明要先回答：什么是公民教育？

公民一词最早出现于古希腊，古希腊文为“Polites”，源于“Polis（城邦）”，意为“属于城邦的人”。亚里士多德曾说：“公民的本质犹如城邦问题，也常常引起争辩；至今还没有公认的定义。”古罗马曾经颁布过“市民法”，用法律的形式确立了罗马市民的地位和权利。而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概念，泛指具有一国国籍，并依据法律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

书斋一年，李庆明把公民概念做了梳理整合，提出了一个更加中国化的说法——新“修齐治平”说。修身就是爱自己，齐家就是爱亲人，治国就是爱祖国，平天下就是爱人类。从这个基础上，他把公民素质概括为“五公”。“我提出五个领域的公民教育：一是公民人格的健全，要有独立意识、自由意识；二是公德基本伦理，这就是我说的消极伦理、底线伦理；三是参与公益慈善活动，要博爱、互助、献爱心；四是公共事务参与，核心是法律意识、民主意识；五是超越国别的公理世界的认

同，同一个地球村，大家要有对普世价值的认同。”

2004年，李庆明邀请了一些国内的公共知识分子，到央校开了一个公民论坛。论坛最后出台了《德育宣言》，第一次比较明确地提出要进行公民教育。2005年，公民论坛获得了陈嘉丙基金会的资助，也就是在那一年的《南风窗》上，著名教育学者朱永新先生提出要推进新公民教育：“一个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人，不必是个血脉里流淌着‘六经’的大写的人，但必须是一个有着现代公民素养的世界人，一个骨子里没有臣民意识的人，一个珍爱公平、自由、正义、平等精神的人。”

《南风窗》的这篇报道对李庆明而言，是一次思想的震撼。报道介绍了朱永新、杨东平等人正在做的一些公民教育的基本建设，如编撰公民读本。“这是我当时没有想到的一块，或者说比较模糊的一块。我是一个对理论有着病态兴趣的人。”李庆明说。

其实，公民教育在中国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据学者考证，上海群益书社1913年翻译出版的《美国公民学》，是中国最早引进的公民读本。192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熊子容主编的《公民教育》，成为中国自己编写的最早的公民课教材。五四运动后，中国曾长期开设公民教育课程。

国民党当政时期，“党义”、“三民主义”等课程靠政治权力进入学校，要取代公民教育，但在实际教育中，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在公民教育体系中，也并非“党义”至上。有这样一个段子，在大学里，许多“党义”课的教员一到课堂上，首先说的一句话就是：“兄弟的课是奉送的。”

早年商务印书馆在不同时期出版的各种公民教科书，除了后来加进了“三民主义”的内容外，关于公民的权利和责任，大体没有发生变化。譬如对政府的认识，其中一章是“政府之弊端及险象”，主要讲对政府之弊端要保持警惕。这也是公民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

中国的公民教育，一直持续到1948年。其后，从课程体系中逐步退出，代替它的是政治教育。“公民”变成了“人民”，“公民课”变成“思想政治课”。而根据教育学者杨东平的回忆，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恢复中小学公民教育的话题曾多次在不同场合被提起。根据中央指示，上海的初中曾在80年代后期一度开设过公民课，但很快便中断了。

## 央校的野望

央校的首批学生面向附近的华侨城高尚社区波托菲诺。华侨城社区的家长大多拥有高等知识背景，他们渴望改变传统机械的教育模式，让孩子自由健康地成长。虽然有中央教科所的支持，但李庆明对于在一个飞速发展的城市做这样的实验还是有一些担心。从招生开始，他便亲力亲为，先是在华侨城社区几次开办央校招生说明会，继而成立家长委员会，每学期定期召集家长开办学校教育理念宣讲。

家长委员会（简称家委会），是可以参与学校日常事务的家长组织，也被称为李庆明的粉丝团。家委会的家长大多支持李庆明的教育实验，他们自发行动，自主管理，有自己独特的称谓。家委会中的女性，有着母爱与义工情结，她们被称呼为“义工妈妈”。“我们搞公民教育，不是有些义工嘛，我们有交通妈妈、环保妈妈、反家庭暴力妈妈、图书妈妈，好多这种妈妈，其实还有男士在里面的。”学校定期与海外的学校交流，2011年暑假，跟随台湾小学生过来的台湾妈妈，在央校的校园里宣传环保，放置了垃圾分类回收的箱子。“这都是他们（台湾妈妈）自己做的，

纸、塑胶、铁罐、铝罐，让孩子们自觉将废品分类回收。”

李庆明在央校被人称为工作狂，刚来仅一个月就听了所有老师的近100节课，还经常通宵达旦地撰写教学论文。他不但自己如此，也要求学校的老师把所有的激情投入到教育事业中，甚至要求老师们利用周末时间到学校接受培训。

有老师把李庆明告到教育局，指责他无情剥夺了教师们的休息时间，侵犯了他们的“休息权”。直到大家跟他熟悉以后才慢慢理解了他。

有人曾这样评价李庆明：“这是一位常常会大胆妄为的校长。”的确，李庆明不喜欢墨守成规。他认为每节课45分钟的“平均主义”并不科学，于是在央校大力推行长短课制度，时间最长的课可能达到60分钟，最短的课却只有20分钟。李庆明将“思想品德课”列入短课行列，引起教育界的非议，许多人谴责李庆明一味追求实用主义，却不注重学生的道德教育。

李庆明回应，他通过调查发现长达45分钟、纯理论教育的传统“思想品德课”内容单一枯燥，已经沦为“学生最难熬的课”。不少学生上课时开小差、打瞌睡，不但浪费了孩子的学习时间，也影响了孩子的学习积极性，难以达到道德教育的目的。因此，将传统“思想品德课”缩短到20分钟，是非常科学也十分符合儿童心理学的做法。

事实上，以追寻新德育为目标的李庆明，早已为央校设计了公民教育的新路线。李庆明认为，孩子们需要接受简单、直白的道德教育，从细节做起，一点一滴地让孩子们养成自觉的、善意的习惯。“我慢慢意识到，有一种比爱更基本的教育，就是尊重的教育、人格平等的教育。你不要伤害自己，不要伤害一些大家共同遵守的游戏规则。最底线的东西，都是不要伤害。”这便是李庆明提出的公民应该有的最底线的道德

教育。而现代中国社会的种种奇观，却在一次次地打破人们内心的道德底线。

为此，李庆明给学生和家长发了一份陋习调查表。让他们说出最痛恨的陋习是什么？“收上来一看有几百条，像在公共场合抽烟，在公共场合挖耳朵、抠脚丫，非常多……”李庆明跟家委会的家长一起，找出了对孩子们来说最急切要解决的 52 个问题，制定了 52 条文明细节。“一年 52 周，每周大家一起解决一件事，我们叫一周一事。”李庆明说，“我们做得很细，多是一些劝告、劝勉，当然也有明确的禁止。我们在起草的时候就尽量用一种可操作的行为来进行描述，让小孩可以去做。”

52 条文明细节不但央校的学生要遵守，也适用于央校的校长、老师和家长。李庆明相信，创设一个孩子认同的日常文化情境，让孩子置身其间，耳濡目染，更能影响和内化孩子的行为。“很多小孩很兴奋，经常对爸爸妈妈说你哪一条不对，很好玩。哪些我做得到，哪些我做不到，他们对照着自我稽查。”一位当设计师的家长用空闲时间义务给 52 条细节配上了漫画。

被学生亲切地称为蕃茄妈妈的家长张红女士认为：“当家长一点一滴在做的时候，孩子看在眼里，他会吸收到。然后，他也会学着去做很多的事情，这个就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谈到李庆明推行的道德教育，教育界至今仍流传着一个颇受争议的故事。那是 2011 年底，李庆明大胆地将悼亡搬进了央校课堂，让孩子们在自己的课堂里为不幸去世的同学举行悼亡仪式。

这年暑假，央校一名学生不幸坠楼身亡，整个校园沉浸在悲伤之中。“在班上组织一次悼亡的主题班会吧！让孩子们通过这次活动，真正学会珍惜生命。”李庆明提议，“直视死亡，让悼亡仪式走进课堂。”但这是

一件前所未有的事，会不会对孩子造成消极影响？一时间校园议论纷纷。

经过几天简单的筹备后，一场别开生面的“主题班会”开始了。在低沉的音乐声中，中央教科所南山附属学校八年级四班的孩子们，手捧鲜花和点燃的蜡烛，缓缓走到教室中央，把鲜花放在正中间，再将蜡烛放置在鲜花的四周形成心形，课堂里鸦雀无声。

这个活动触动了所有学生、家长的心灵。参加悼亡仪式的一名学生说，当自己和父母之间产生特别大的分歧时，他也曾冲动地想结束自己的生命。参加同学的悼亡仪式后，他明白了生命、亲情和友情的可贵，今后将更加尊重自己的生命。李庆明说：“我不在意外界的评价，只要对孩子身心有益，我一定会大胆去做。”

除了悼亡仪式，央校还有一个独特的祈福仪式。从2008年汶川地震开始，李庆明在央校增加了一分钟的祈福仪式。每天清晨，在巴赫名曲《G弦上的咏叹调》的旋律中，“为国家强盛、世界和平和人类幸福祈祷，为灾难中的遇难者默哀，为遭遇困境的人祝福”。

不管是悼念亡人还是为灾难祈福，都是一种以友善待人的公民品质。这是一种高于尊重的公民素养，与人为善、爱己怜人、服务社会，在合理利己的前提下向陌生的“他者”付出一份关爱，尽管它并没有美德伦理和圣德伦理的神圣高度，却不麻木、不自私、不冷漠，这正是公民社会必不可少的公民品质。

## 校园里的“美国大选”

“在教育界，我的确是个另类！”李庆明刚到深圳的时候，经常要

参加一些有关教育的研讨会。一开始，他总是在会上满怀激情地阐述自己关于田园教育、公民教育的理念，每一次讲完后，迎接他的不是“你了解深圳的特点吗”的质问，就是与会人员不约而同的奇怪眼神。

“那种眼神，就像大家突然发现身边有个胡言乱语的疯子。”此后大大小小的研讨会上，李庆明开始变得低调、沉默，他不再积极发言，会下也常常独自一人。

李庆明在央校推行的又一个另类的举措，便是学生校园选举。2004年10月，李庆明选择了四年级的一个班作为试点，让孩子们站到台前表现自己，推选他们心目中的学生领袖。让人惊叹的是，孩子和家长非常热情，给每位候选人制订竞选策略、制作宣传海报。竞选的那一天，站在教室后面观摩的学生和家长挤得满满当当，甚至在当地社区引起了轰动。第二年，李庆明便把竞选推广到整所学校，并将10月15日至11月15日，确定为央校每年一度的“竞选月”。小到每个班的班长，大到学校的少先队大队长、团支部书记和学生会主席，都由全体学生一人一票选举产生。比如学生会主席的竞选，要经过班级、年级到学校的层层公开选举，然后由全校1800多名学生选民投票产生。有许多过来观摩的学者这样评价：央校的校园选举和美国总统大选没有太大的差别。

选举前，参选人要积极到各班拉票，正式选举时要面对全校师生发表竞职演说，并进行才艺展示，甚至还要相互质疑答辩。有竞选愿望的学生通过班级报名，自制竞选海报，学校规定了每张海报的大小、规格，“尺寸是一样的，大家机会平等”。李庆明介绍，这些海报会在竞选期间贴在校园的各个角落，选民可以通过海报来了解竞选人的经历和理念。每位候选人都有自己的竞选团队，几个孩子组织起来，制定竞选口号，比如“选择我，我会给你一个怎样的承诺”、“我当选后会在哪方面做

出改进”。

校园宣讲是竞选中不可回避的一环。在2011年的选举中，就读一年级四班的欧阳简单在班级投票中获票数最高，被推选参加校级的选举。“爸爸妈妈问我，为什么要参加校长小助理的竞选。我说，第一，校长每天在校门口给我们鞠躬，我很爱他；第二，校长每天穿的衣服都是一样的，不过你不要嘲笑他，他很可爱。”竞选期间，欧阳简单跟同学搭建了自己的竞选团队，他们手持海报，到各班去宣传拉票。他们的竞选口号是“简单简单，绝不简单”。

简单妈妈用博客记录了欧阳简单参选的过程：

11月1日，中午，碰到肖羽妈妈，她主动提出替我去给简单加油。回到家，赶紧找简单的舞蹈视频，存U盘，下午二点，简单带到学校给老师，我则在家继续找简单的照片，适合喷绘宣传的，找好赶紧发给简单爸爸：你设计一下吧，孩子竞选宣传用，两张张贴，两张手持拉票用，做好不用给我看了，怕出不同意见，耽误时间。

11月1日，下午四点，我到学校值交通义工，简单在报告厅排练学校朗诵节目，值日完去接孩子。

五点，报告厅，碰到老师，老师说看过视频了，就印度舞吧！

隔壁办公桌老师：郭老师，你们干吗？准备演出的吗？

不是，竞选校长小助理呀！

可是一年级已经选过，是三班的某某，之前你们班不是某某参选了吗，最后三班的被选上了！

啊？！我还预留了我们班选票第一的参加校长助理竞选呢。

公民养成中心，白老师在，和她说明了情况，可能觉得是一年

级孩子吧，不要灭了积极性，就允许了简单参加，不过也增加了老师的工作量：要重新印刷投票单。

11月2日，上午十点左右，我拿到喷绘，赶到学校，由于墙面很不平整，我花了近一小时张贴了两张宣传海报在楼梯过道。

五点，带外教回我们家上简单的第一堂英语课。途中，接到老师电话：制作四个投票箱。

六点一刻，送走外教，我们一家六个大小女人忙碌地找鞋盒，找大张彩色纸，一个半小时后，四个形状颜色各异的投票箱完成。

是日期间，纠结了很久，到底该陪简单、为她加油，还是履行之前的医院约定，带小的去香港看眼睛，答案一直不太明确。

11月3日，一大早，我问简单：是想妈妈给你加油去还是妈妈带妹妹看医生？她想了想，回答：妈妈，我还是觉得身体是最重要的！心肝！真的是像微微妈妈说的，“这孩子懂事得让人心疼”。简单，妈妈爱你！

于是，七点半，我带着妹妹踏上香港的地铁，把简单留给了她自己。在香港，我收到了老师细心的短信：竞选结束，一切顺利，等候投票结果。同样，也收到了我的朋友张倩姐姐的短信：活动结束了，简单表现挺好，放心了哈。隐约中，我感觉，简单可能表现一般，起码应该不如以前。

下午两点，我回到了深圳，电话了张倩姐姐：活动太有意思了，我也开了眼界。简单整体还是完整的，不过没有以前的那份从容。有一点点紧张，有小朋友说她忘动作了，舞蹈还是很好的，一年级，这样已经很好了。

据说一、二年级孩子没有参加投票，这岂不意味着一、二年级

的参选孩子很吃亏？没有得到证实，但据我做的四个投票箱来看，似乎印证了此点……

（补充说明：由于昨晚上博时，简单已经睡觉了，还没和她求证，就上了此段。今天送她去跳舞的路上，问起，她回答：我们投票了，是回到教室写的，每人可以选两人，不过我不可以投票。哇！央校顿时让我更生敬畏了。考虑得太周到了！由此，也郑重地给我上了一课：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为规范校园选举，李庆明甚至组织学校老师一起制定了校园选举细则。“虽然不能跟选举法相提并论，但至少符合选举法的精神，又适合孩子们。”李庆明说。

选举结束，学校封箱统计，竞选成功的同学在全校师生的注目下，走上红地毯，正式宣誓就职。从央校毕业、正在读高中的学生罗宇轩曾经当过校长小助理，他这样回忆央校的竞选：

我记得当年我们那场竞选好辛苦，要贴海报，要准备才艺，要有你的拉拉队、口号，要和你的对手辩论，要赢得台下近千人的青睐，因为民主投票决定最终结果。现在才发现那一场竞选里我获得的远比预想的要多。每个月一次和校长的例会，我们像议员一样提出问题，讨论解决办法。每次开会都从下午开到晚上，校长总是第一个说，差不多了吧，孩子们该吃饭了。

央校的学生自主委员会（简称学生会）下面有几个部门——学习部、社团部、公益部、记者部和督察部，每年通过选举选拔出学生会主席、

各部负责人等。他们每月定期召开办公会议，听取校长工作汇报，传达学生对学校工作的评价和建议，组织近八十多个学生社团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引领学生积极参与到学校的治理中来，培养学生们的社群意识、自主意识，以及参与社会活动的热情和技能，为他们将来走向健康的公民社会，自由、自主、理性地行使公民权利打好基础。

## 鞠躬的校长

李庆明主政期间，每逢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半，在央校校门口，总会看到几位身穿校服、肩挎“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深圳南山附属小学”绶带的小学生，面带微笑，笔直地站在那里，迎接师生的到来。

在他们中间，有一位衣着端庄的大人恭敬地频频向老师、学生、客人鞠躬问好：“您好！你们好！”

他便是校长李庆明。“我要真诚地看着每一个孩子，进行目光上的交流，然后向他鞠一躬，说一声早安，说一声你好。”

一个鞠躬，一份尊重，九年来，只要没有特殊原因，每天早上7点20分学校开门，这位校长一定风雨无阻地站在校门口向学生鞠躬，并要求学生也对他鞠躬还礼。“我来之后没多久，想寻找一个方式，来跟孩子们表达一个相互尊重、人格平等的意思。但是，最初还真的没想太清楚。后来，听说南通老家有一位校长，在校门口看着孩子们进校，点头。我觉得这个挺好，既然能够天天去迎接孩子们，为什么就不能向他们行一个礼，表达卑己尊人这么一个意思？”李庆明解释说。

刚开始，学生们很不适应，反应也大不相同。有的孩子看到李庆明

鞠躬，吓了一跳；有孩子直接愣在门口，半天反应不过来；还有孩子看着鞠躬的校长，错愕地跑进学校里，连头都不敢回。

学校里的老师们也对这个新任校长的“出格举动”议论纷纷。甚至有些陪同孩子上学的家长也一起围观，有人还拍照。李庆明说：“有人问我，你是不是作秀啊？反正，好奇、惊讶，甚至质疑，都有。其实，我只想告诉孩子们，我们彼此在人格上是平等的。”

也有人质疑，鞠躬是否在学日本礼。李庆明回应：“日本礼是有鞠躬，但不是我这个鞠法，这是一。第二，鞠躬是起源于中国的，《礼记》有记载。后来这个礼传入日本，他们保持下来了。而恰恰是握手、拥抱这些西方的礼仪传入了中国并保留了下来。”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个鞠躬的校长，成了校园里的一道风景。“我会要求小孩在回礼的时候，要尊重一下我。因为有的小孩可能没那么当回事，他可能手插在裤袋里，或者嘴上衔个什么东西。我就会要求，你回我礼的时候不能把手插裤袋里，这是对人不尊重的。几年过去，这个情况就慢慢变少了。”

有一个低年级的小女生，经常在鞠躬之后，往李庆明的手里塞上两颗糖，然后飞快地跑走。家长说：“她觉得你是一个可信赖的人，才送糖给你。这种很小的举动可以看到校长在孩子心中的地位是怎样的。”

有一个冬日，一个九年级的女生走进校门，李庆明向她鞠躬，她也还礼，小女生走到李庆明身边，靠着他耳朵说：“校长，天气冷了，注意身体。”

家长张红也记得，儿子头一天到学校上学，她送他到学校门口。起初，她并不知道有校长鞠躬这件事，但儿子背着书包走过李庆明身旁时，他照例向这个孩子鞠了一躬。这时，她看到儿子停了下来，想了一小会儿，

便转身正对着李庆明，毕恭毕敬地鞠了一个90度的躬，然后高高兴兴地跑进了学校。那一瞬间，这个母亲一下子没控制住自己的眼泪。她说：“我从来没有教过他鞠躬这件事，但校长做了，他也照着做，我相信，这会在他心里留下一个深深的烙印，等他长大了，也会同样去尊重别人。”

鞠躬也因此成为校园的基本礼。孩子们跟老师碰面，鞠躬致意；回到家里，有客人过来，也会礼貌地鞠躬问好。“有一次我在逛超市，忽然有一个孩子过来跟我鞠躬，我知道，那肯定是我们央校的孩子。”李庆明回忆道。

除了鞠躬，另一个让央校孩子印象深刻的细节，是每年的圣诞节李庆明都会在校门口扮成圣诞老人给他们派糖。有学生在文章中回忆：“那年圣诞节刚好轮到我们班值周，校长很早就到了，那时候没有多少学生进校门，于是校长换好圣诞老人装后就跟我们聊天。他笑着说，去年那个圣诞老人装质量好差，穿了不到半小时就破了，当时好丢脸啊。他说这些的时候言语里满是懊恼，像个孩子一样不喜欢自己在人们面前出丑。和校长的谈话令人惊异地自然，你以为你会拘谨、没话说，实际却相反，我和他的每一次谈话都像朋友间聊天一样轻松，他真心尊重每一个学生，他会问你要不要喝咖啡，然后补一句，孩子还是少喝咖啡，喝点茶好了。”

有媒体评论称：“多年的鞠躬，李庆明把孩子们的心鞠得纯粹了许多。”

李庆明给学校修建了一个报告厅，名字起得很诗意，叫燕晗山大讲堂。讲堂可以容纳400人，每年邀请国内知名的学者、专家在此演讲。“讲堂墙上挂有三幅画，多多少少能代表我办学的寄托。第一幅是17世纪的荷兰画家德勒夫特的《科学》，我们应该让孩子养成一种科学的

理性精神。第二幅是法国著名画家德拉克罗瓦的《自由女神引领人民》，我想把这种自由精神种植在孩子的心灵深处，那正是我们公民教育的象征。还有一幅，叫《诗人的灵感》，是17世纪法国著名画家普桑画的，代表我们对艺术王国的向往。”李庆明介绍说。

诗与艺术是李庆明在央校推行的校园文化。他先是取消了小学阶段的学生作业，然后招募艺术教师，创办天堂鸟合唱团、西洋管弦乐队、舞蹈社、吉他社、戏剧社、飞盘队、说唱团等近八十多个学生社团，甚至亲自上阵，举办文化沙龙，跟合唱团的孩子合唱。每年的校园文化节，总能看到李庆明参与的演出。

听课观摩、撰写文章、带领教师自驾开展全国名校行，李庆明每天都很忙。办公室、家中，随时备有红牛，困了累了喝上几罐。中午吃饭，别人喝茶喝酒，他点红牛。

## 离职风波

2012年7月7日，就在期末考试结束不久，《盗火者》摄制组探访了有“公民教育之春”称号的南山央校，却意外得知李庆明校长面临下课的危机。这个消息完全打乱了摄制组的拍摄计划。同时，也让《盗火者》的制片人邓康延心生不安。邓康延是李庆明多年的好友，两人都享有“书痴”的美誉。在邓康延眼中，李庆明只是一个有点理想主义、不世故、真正想做事的校长。邓康延在微博上说：

《盗火者》去华侨城访谈南山央校李庆明校长，他刚知晓是任

上最后一天，悲溢校园，有老师抹泪。南山教育局放假前突下辞令，或怕家长学生闹事，甚至取消校合唱团孩子赴京演出。李校长九年来力行公民教育和选举，今晚主持会仍平静处理校务。劣驱良的教育，昏扼智的官员。在等李校长时，拍摄团队遇到一位校长的粉丝、罗湖的妈妈，想把孩子转来，她说很多家庭为上此校愿租华侨城贵房。离别时，李校长说感谢包容的深圳让他做了九年尝试，遗憾的是看得见成效的实验从此打断。我们悲伤，一所阳光校园前景难判。

邓康延的微博在网上掀起热议，一时间，李庆明被辞这一消息受到社会舆论的瞩目。

校长离职的消息不胫而走，家委会的义工妈妈张红接到许多家长的电话：“有的人说我已经关注央校好几年了。我们原打算把孩子送到这样一个学校去的，听到这个消息都很震惊，很难过，大家都问我们到底可以做些什么才能把校长留住。”

在新浪和腾讯微博上，悄然出现了两个新微博，名字叫“李校长你别走”。家长们希望通过微博的力量，引起社会关注，挽留李庆明继续在央校当校长。

2012年7月8日，家长们在央校的知觉书屋聚集，他们准备向南山区教育局递交联名信，做最后的努力。以下是那天家长讨论会上部分家长的发言：

**家长1：**我们到教育局去，只要求校长留下来，至于政府之间怎么协调怎么处理，那是政府的事，和我们没关系。我们是学生家长，我们要求校长留下来。

家长2：绝大多数人都是为了他的理念来的，这样的理念不存在了，校长不存在了，那我们进来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该怎么办呢？

家长3：这里面有个问题，教育局会说你们放心好了，新校长还会像李校长那样管理，你为什么不接受呢？我依然有你的公民教育，有你的道德教育，我没说我要把这个取消掉，我会沿袭。但是我们现在就是要李校长在这儿。因为其他校长做不到九年鞠躬，他们做不到。

家长4：现在多少大学生失业，多少孩子除了考试、看书什么都不会做，他没有朋友、没有爱好，他不知道怎么释放自己的压力，他不知道自己有什么需求。我们孩子读这个学校，他今天说我要当厨师，明天说我要当作家，后天又说我要当科学家，他可以在他身边接触到这样的人，这对孩子的未来是非常好的。这些东西不能用一个指标、一个数字来衡量，它是会影响一代人的。我们家长需要这样好的校长来教导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的孩子长大后成为社会上有用的人，至少他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你说，这样的校长，是谁都可以替代的吗？不可能！就像爸爸妈妈，不是谁都可以替代的。

深圳儿童文学作家陈诗哥的一段话，说出了央校家长在李庆明下课事件中的迷茫：“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教育？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下一代？这个答案到底由谁来给出？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人生？在理想与现实当中，在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当中，我们该如何取舍？”

7月10日清早，李庆明在燕晗山大讲堂举行散学典礼，学生大部分已经离校，校园沉浸在一片安静之中。来自《南方周末》、《南方都市

报》、《深圳晚报》、《晶报》等媒体的记者把李庆明团团围住，这是李庆明在央校最后一次接受采访。

谈起九年探索却只能骤然终止，李庆明忍不住眼眶泛红：“我的心、我的情、我的生命，都维系在这个地方。首先我得感谢这个地方给我这个平台，坎坎坷坷，有争议，甚至有人诅咒你、围剿你，都很正常。2004年我们就开始做公民教育，简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经常被告发，一直没中断过。特别是去年，谩骂攻击从来没停止过，这是九年中最凶猛的一年。当然我也认为这是我学校办得最好的一年。”

虽然万箭穿心，但让他感到安慰的是家长和孩子对公民教育的支持。

2012年8月底，原育才二中校长于建民接任南山央校校长一职。

2012年9月3日，李庆明搭上飞往南通的飞机，离开深圳，学校部分师生为校长送行。

2013年1月，李庆明受邀出任宁波教育集团校长职务。

## 附：李庆明在“央校”的最后一次演讲

6月27号，我在述职报告里，讲了央校诸位同仁艰苦创业的收获和值得我们自豪的成绩。公民启蒙、经典阅读、分享佳作、活力课堂、伸展个性、寻归田园，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自豪的，尽管显得非常稚嫩、非常粗糙，也让我们蒙受了很多的孤独、寂寞，甚至挫败，但它的确值得我们自豪。

因为我和各位同仁，是在与这形形色色的、畸形的、伪善的教育抗争，是在为解放儿童以及自我拯救而奋斗，是在接续我们这个多难多灾的民族曾经中断的精神血脉，是在做前无古人但可以启迪未来的教育实验。它当然值得我们自豪。

这九年，有太多太多的缺憾，我希望革除中国基础教育太多顽疾的那种只争朝夕的急切，给大家带来太多的紧张和疲惫；同时也让我担忧，那些得风气之先的实验，能不能延续下去。我们在磨砺中增强了浓浓的情义，但是，我还是要为你们毫无怨言地承受我的格外严厉而表达一份歉意。我沉迷于教育，却不谙世道的缺陷，从而在我的朋友中造成了一些误会，这些误会可能被人利用，给学校带来了不利影响。为此，我一直深陷焦虑和不安之中。尤其是去年，我们一方面呈现出如日中天的喜人景象，另一方面却出现了一波接着一波对我、对许多领导、对学校的谩骂攻击。沸沸扬扬的社保事件和九年级学生被迫分流事件等，给老师们造成了巨大伤害，让我感到深深的迷茫和痛苦。作为学校的校长，我理应向大家致歉，我理应承担这份责任。

我也要大声说对不起自己，对不起我的母亲，对不起我的女儿。为了这里的事业，我放弃了所有，包括作贱自己的生命。我忙忙碌碌，几乎从没有时间去关心年迈的父母，哪怕是打一个电话。我的女儿，从考取大学，到攻读研究生，我从来没有去过她的学校，现在她面临毕业分配，我至今没有为她跑过一次腿，心存罪感，觉得天理难容。不过，在所有的缺憾当中，最大的缺憾是我自己，也许还有其他同道们，对许多事物的无知。我早已过了不惑之年，也过了知天命之年，但我还是困惑不已，更没有领略天命的玄机和真理。

时间差不多了，告别的时刻已经来临，但时空割不断我们之间伟大的情谊。我将与你们同行，在那越洋渡海的船上，在那不再存在的海洋，我将与你们一道。再见，朋友，请各自珍重，我每天都会为你们祝福。天佑央校，天佑央校所有的孩子和喜爱它的所有老师。

## 06 学在民间

“私人定制”无疑是2014年初国内的热门词汇。在一切追求个性化的当下，服装要私人定制，服务要私人定制，而早在多年前，教育的私人定制也在中国民间缓缓流淌开来。据21世纪教育研究院发表的报告，截至2013年8月，约有1.8万学生走出学校，选择“在家上学”。

到底什么样的人能选择在家上学？在这个利字当道的时代，经济状况往往是我们最先考虑的问题。谈起私人定制，人们总会与高消费、高收入联系在一起，教育也难以免俗。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发表的《中国在家上学现状报告》里，有一组非常直观的数字：家庭月收入在0.5万元以下的家庭占26%，0.5万到1万元的占31%，中间阶段分布较平均，人也相对较少，此外，5万元以上的占到差不多10%。对此，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分析认为：“家庭月收入集中在2万元以下和5万元以上两个范围，位于高低两端。鉴于在家上学有一定成本，低收入家庭可能是由于某种客观原因而不得不选择在家上学，高收入家庭则可能是出于追求更好的教育而主动选择在家上学。”

## 一切从个性出发

在家上学是流行于欧美的一种教育方式，从更宏观的历史来看，早在学校教育诞生之前，在家上学就是教育菜单上名列前茅的选项。在未开化的社会，这种家庭的直接参与几乎成为青年获得群体习俗和信仰的唯一选择。甚至在目前的社会，即使对于那些坚持接受学校教育的青年，家庭教育也提供了最基本的教养。

约翰·杜威在《民主与教育》一书中提到：“每一个时代都倾向于教育它的青年能在目前的世界生活下去，而不是为了正确的教育目的，即尽可能好地实现真正的人性……外来强加的教育目的缺陷很多，教师的智慧不能自由，他只许接受上级所规定的目的，由于是硬性规定，似乎就不必审慎注意具体的情况。”

这也是许多家长对目前学校教育的担心。

在家上学在中国的兴起是有历史必然性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近年来，随着国民素质的普遍提高，对下一代教育的重视程度也在与日俱增，单一的教育形式越来越无法满足日趋多样化的教育需求。这个时候，父母对孩子的了解程度，对孩子教育的重视程度都使得家庭成为学校之外寻找教育归宿的优先选择。

第二，家长对国内教育体制的不满愈发强烈。退一步讲，即便教育体制并不如家长预想的那样不堪，甚至说它本身就是很好的教育，那家长为子女追求更胜一筹的教育也无可厚非。

然而，在家上学于国内而言终究处于起步阶段，面临的问题还有很多。这里也分两大方面，一是宏观政策要解决的问题，二是个体执行中面临的问题。

我们要明确一点，在家上学是高度个性化的教育，每个家庭的具体情况都不一样，因此，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也千差万别。在这一章里，我们将针对几个比较集中的问题来讲述我们一路走来看到的故事。

## 孩子在哪儿，家就在哪儿

赵明的儿子叫赵粒宇，今年五岁。三岁时，他像其他孩子一样被父母送进了幼儿园。可是，和其他孩子不同的是，他怎么也无法融入那个小社会。对幼儿园的抵触情绪让上学成了一件极其痛苦的事，这也导致他无法跟老师同学正常相处。在长时间的磨合尝试失败后，赵明踏上了寻找教育新途径的道路。

在定居大理前，赵明为了给孩子寻找一个合适的教育环境，辗转全国多个省份。为此，他放弃了原本电脑维护和学校辅导老师两份工作。后来妻子也随迁大理，原本一家人五六千元一个月的经济来源彻底切断了。

可是这并没有妨碍赵明对儿子的在家教育。原来，早在赵明开始尝试之前，在家上学就已经在中国民间蔓延开来了。在家上学的家长们为了分享自己的教育心得、解决彼此共同面对的问题，而开创了一个在家上学联盟网站。这个网站还举办一年一度的全国在家上学交流会议，地点就在大理。

于是，越来越多的家长来到大理，苍山洱海的自然景色、大理古镇的人文气息以及同道们共同营造的求学环境让很多家长索性扎根于此。

大理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变成了全国在家上学的教育基地。

有条件的家长们在大理开起了客栈、餐馆，有的甚至还承包了田地，在教育的阳光下，一条绿色产业链在大理破土而出。有了产业就需要人手，像赵明这样的家庭就能在这里安定下来。

采访中，赵明向我们介绍了自己生活的互助社区：

我们这个社区可以叫共通社区，没人规定你工资是多少。这个东西就在于相互信任，如果我不劳动，在这儿天天就是吃啊住啊，那我会觉得很合适，别人为我，我为别人。劳动量与收入不是很明确的对应关系，不是说我今天干了多少活，我的收入就一定是多少，那种很刻板的东西，我们这儿是不提倡的。

这种理念，是说你只要用心去做，那做多做少都不重要，也许我今天生病了，那我就休息一天，不会有人说，你今天休息了，就没有你的工资了。哪怕我病倒一个月，都没有问题。所以说我们这里更强调的是理念。

到了年底，要算一个经济的总账，我们这些人会商量是去再投资，还是分红。平时就是每个月200块零用钱，但这个零用钱也不是很固定。

在赵明看来，不去幼儿园或学校，最大的好处是可以随时随地地学习。赵明和妻子一起打理社区的素菜馆，每天早上，小宇跟着爸爸一起去菜园摘菜，相比其他城市孩子的“五谷不分”，小宇谈起菜园的蔬菜品类头头是道。“看，这是我们的有机蔬菜！”他扒开两旁的叶子，指着地上几根嫩青的豆角兴奋地叫了起来。记者问：“什么叫有机蔬菜？”

小宇喃喃地回答：“就是不放化肥、不放农药的。”

对赵明而言，菜园的工作不仅可以维生，也可以教育小宇对自然的认识。“给他讲这叫露水，讲天空为什么是蓝的，讲为什么会下雨，你得有这个闲心，这很重要。我一直认可一个理念，孩子需要家长的时间，而不是钱。”赵明说。

中午，父子二人牵着手上街买菜。路过一个豆腐摊，小宇嘴馋地问了句：“要不尝尝这块豆腐？”父子二人早有默契，小宇是这次买菜的管家，他大方地询问豆腐的品相、色泽、价格，偶尔还会与人讨价还价。“称一下，多少钱？”他从小钱袋里掏出几块零钱，利索地付了账。赵明偶尔会应答两句，大部分时间都是小宇与商贩交谈。“他跟别人说话是非常轻松的，他的生活更贴近于真实的生活。”赵明说。

或许我们会有疑问，现代人面对这样一种没有固定收入的生活，难道不会心里发慌？赵明对此的回答是：“不会发慌，即使有取舍，过程也很短，因为孩子的教育太重要了，这不是多少钱能换来的。到大理来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想法，可以带着孩子工作生活。我对亲情比较重视，孩子是父母生命的延续，孩子在哪里，家就在哪里。”

## 脱离学校不等于脱离社会

在大理古城的另一个角落，15岁的卷卷已经休学多年，父亲吴刚是位生意人，经济宽裕。卷卷离开学校后，父亲帮他量身定制了适合他的学习计划。卷卷动手能力强，爱好乐高，十几年来，从简单到复杂，从机械到电子，不同难度系数的乐高玩具陪伴了卷卷的整个童年。

吴刚介绍，卷卷有极强的科学嗅觉，喜欢看科普读物，任何东西到他手里，不需任何图纸便能组装起来。但唯独对学校教育十分抗拒，曾一度郁郁寡欢。

为了孩子能快乐成长，2008年，吴刚带着儿子离开四川，迁居大理。

现在卷卷每天大量阅读，学习古代经典和英语，还有充裕的时间留给广泛的兴趣爱好。对比学校教育，吴刚认为：“一个人的成长，要去认知很多东西，知识只是其中一部分，最重要的是要去认知自身所处的这个环境。我们过去的学习是以知识为中心的，把人的价值否定了。就像一个杯子，人们总觉得空杯子是没有意义的，只有装水进去它才有意义。”

对于卷卷的未来，吴刚父子共同的规划是：用两到三年的时间完成全部中学学业，然后背起行囊，四处游学。届时，卷卷已满18岁，他将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并独立支撑未来的学业。

我们发现，孩子的社会化是大部分反对在家上学的家长和学者特别担心的问题，脱离学校等于脱离社会的想法是普遍存在的。离开学校以后，没有固定的班级校舍、老师同学，孩子会不会成了从社会中孤立出去的个体？

实际上，我们在走访中发现，凡是能一路坚持下来在家接受教育的家庭，完全没有受到这个问题的困扰。大理的互助社区并非首创，更不是仅此一家。

杨东平教授在采访中谈到了这个问题：“人们对在家上学最大的担忧是社会化不足。这个问题其实不难解决，因为在中国，孩子毕竟生活在一个人口众多的社区环境中。在美国，他们也通过各种NGO来创设很多虚拟的教育环境，组织集体活动，比如出游、开学典礼、毕业典礼，

给孩子们营造丰富的群体生活。”

熊丙奇教授则强调了家长在这个问题中的重要作用：“融入社会的问题，取决于家长在具体的教育过程中，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如果家长本身就是宅男宅女，不愿意融入社会，把孩子关在家里又不让去接触大自然，不让融入社会，沟通能力就会成为很大的问题。”

## “今日学堂”的启示

拍摄在家上学的过程中，我们一直很关注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孩子未来的出路。如果不能一直坚持在家上学，他们如何与学校对接？除了体制内的学校，他们有没有别的选择？于是，民间私学的教育者进入了我们的视线。

民间私学的办学者多是从在家上学开始的。他们先对自己的孩子实行某种方式的在家上学教育，当这种教育取得一定阶段性成果的时候，周边的部分家长就会开始注意并认可这种模式，继而参与进来。他们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模式千姿百态，在此不一一列举，仅以云南今日学堂为例做个简单介绍。

在云南东部的一座山谷里，张建柏带着他的今日学堂几经辗转，终于落下脚来。2003年以前，张健柏是武汉大学受人尊敬的哲学教授，从教自己的儿子开始，他的家庭学堂一天天声名远扬。最终，他辞去大学的工作，做起了专职的孩子王。

对比体制内的学校，不管从内容还是地理上看，这个学堂都属于偏门。精英教育与大量新颖理念的结合，似乎让人觉得有点缥缈。

先说西学，我们听了两节课，都是平均年龄十岁左右的班级。一节科学，一节美国文化，都是美籍外教上课。课堂是纯英文教学，内容分别是电与磁场、三权分立。纯英文的交流，孩子们的口语几乎完全没有障碍，而且参与交流的热情是极罕见的。很多单词他们或许不会拼写，但是他们会说、会用。对这些孩子而言，英文就是工具，是他们生活和学习中经常使用的东西。

在国学课堂里，对于《道德经》、《庄子》、《金刚经》等国学经典，孩子们虽不能说倒背如流，但你若随意抽取篇章片段来考问，小到词句释义，大到人物性格、情感刻画，孩子们都有明确的思路和自己独到的见解。他们甚至会挑出南怀瑾先生著作中自己不认同的篇章段落进行分析，讲得头头是道。

今日学堂有 83 名学生，年龄从 4 岁到 14 岁不等。作为昔日的哲学教授，张建柏将道家思想作为自己教育理念的底色。“中国古代传统的理论认为，每一种生命，都有自己成长的道路，而我们只要顺其自然即可，这是一种原则。”

不到十岁的孩子就已经掌握了基础的中医医道。孩子们对穴位经络的认知已不是仅仅停留在理论阶段，他们随身携带针灸用的针具。肠胃不适、感冒发烧等轻微的病症都可以自行施针、相互施针。他们甚至会安排中医体检，而进行体检工作的都是学堂里较为优秀的学生，望闻问切，有模有样。

如果你以为这样培养出来的都是书呆子，那就大错特错了。学堂从 3 至 5 岁的明珠班就开始打基础，进行内家拳的武道教育。正巧我们赶上了学堂夏令营到访，除了三五年的老生，还有一些新近报名的新生在场，于是就有了观摩新老学生互相切磋武道的机会。规则是限时一分钟，

能将对方击倒一次得一分。几个有跆拳道基础的孩子原本自信满满，但是比赛的结果却是一边倒，老生的优势是压倒性的。

张健柏说：“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人的修习和静止，应该是一个有机的组合，我们选择的运动都是所谓的东方式运动，或者传统式运动，它最大的好处是能够让自己的身心，让自己的神经系统以及生理系统都保持一个良好的协调和发展。你们可以看到，场下的女孩子看上去很温柔，怯怯的，或者说很文静，看起来特别可爱，但她一到场上去，就好像变成一个小狮子一样。”

虽然习武，但这些孩子全无霸道之气。除了每天饭前的感恩词，孩子们还有专门的感恩课。例如，在孩子们过生日的时候，学堂要求他们背上装着沙子的书包，沙子的重量就是自己母亲怀孕时增加的体重。在书包外面，挂上一个生鸡蛋。从背上书包开始，接下来的24小时必须包不离身，蛋不能碎，由此来体验母亲十月怀胎的不易。每个孩子经过这一课，都对母爱的伟大有了完全不同的理解。

对于今日学堂的学生，张健柏说：“这样一种思想培养出来的人，会更真实地面对生活，而不是去追求一些在外人眼里所谓的光彩的东西，他们会活得更幸福更快乐一些，但不一定会很成功。”

的确，从内容到形式，这个学堂有太多值得借鉴的地方，但是，就像校长张健柏自己说的，他们从没有做过任何宣传，因为他们不需要宣传。他们没有足够的师资，没有剩余的资源去教更多学生，他们更像是一个先驱、一个实验。

然而，今日学堂至今无法取得民办学校的办学资格。从2003年到2012年，从湖北武汉到云南的大山间，学堂完全脱离教育大纲的办学模式一直无法被教育主管部门接受，办学屡遭取缔。

也许，今天的中国不需要这样的教育，但是如果有一天，国运昌，民智开，当大家都需要真正的教育的时候，张健柏的实验可以给那时的国人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方向。

## 07 断裂的天梯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读书，就是攀登命运的阶梯。从古到今，沿着这道阶梯，无数寒门士子学而优则仕，功成名就，光耀门楣。教育决定命运，这千年积淀下来的信条，已经写进了中国人的文化基因。

多少中国父母就是抱着这样的信念，把自己的人生，家庭的资源，家族的力量，还有孩子的童年，全都押在教育上。但是，今天的中国，教育这道曾经让人们向上攀爬的命运阶梯，似乎正在发出断裂的声音。

我们看过太多的含辛茹苦，看过太多的悬梁刺骨。在拍摄之前，数据于我们只是符号，直到我们沿着这阶梯一路走来，才知道每一个数字都是一个孩子的教育冷暖标识，原来，真的不存在所谓的感同身受。原来，教育天梯断裂的声音，那样近，那样振聋发聩。

## 曲折的寻找之路

小学是教育天梯的第一个台阶，它跨越每一个孩子的青少年时期，成为他们成长的最初地基。而社会舆论近年来也开始更多地关注这个阶段，有关乡村和城市差距的报道铺天盖地。在众多的案例里，我们选择了贵州六盘水市红德村的红德小学，而引起我们关注的正是他们特殊的求学路——一条横跨山崖间的索道。在新闻报道提供的图片中，一条并不十分粗壮的钢缆横跨山崖间，山崖两头有负责牵引的工人，一个一米见方的铁笼子里，四个孩子或站或坐，正在渡过这道天险。

报道和图片一经发布，两年里引起了无数关注，关于上学难的讨论空前热烈，这条“危险至极”的上学路备受声讨。

然而，寻找红德小学的过程并不顺利。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铺天盖地的报道过去以后，已然闻名全国的红德小学连地址都无从查起，在社会的“普遍关注”下，竟然还是如空中楼阁般虚无。在联络当地教育局、报社都无果的情况下，我们只好广泛动用社会关系，逢人就打听。所幸，我们在拍摄珠海 UIC 学校时，来自香港的阮纪宏教授从学生那里问到了红德小学校长的电话号码。至此，我们才得以踏上寻访红德小学的道路。

来到红德村的当天，我们就直奔索道所在地。沿着蜿蜒的山路兜兜转转，几经曲折，一个深不见底的断崖终于横亘在我们眼前。这道山崖隔断了很多孩子的上学路。在索道修成前，孩子们只能沿着峭壁上勉强容一人通过的羊肠小路，攀爬三四个小时渡崖。遇上阴雨天气，山路更加湿滑难行。几年前，村里的两个女孩子不幸坠崖身亡，其中一人至今连尸骨都遍寻不得。当地百姓为了避免再发生如此悲剧，自发筹资修了这条索道，至此我们才知道，这条被外界打成“凶途”的索道，竟是当

地孩子上学的绿色通道。

然而，当地政府迫于舆论压力，已然叫停了索道的使用。

## 董仁发和他的小木屋

红德小学有 72 名学生，这在偏远山区的小学校里，已经是不小的规模。尽管如此，学生人数逐年递减依然是大势所趋。校长告诉我们，这里的学生一半以上都是留守儿童。董仁发是我们选取拍摄的跟踪对象，11 岁，五年级，在同班的孩子们里长得算高大的，一张脸有棱有角，稚气未脱，略显腼腆，很少说话，谈话间多是以一个淡淡的微笑表达自己的态度。他父母南下务工，自己独自居住已有两年，家里的一亩三分地由比邻而居的姑姑耕种。以下是栏目组和董仁发的一次对话：

**董仁发：**进来吧。

**盗火者：**有灯吗？

**董仁发：**上面说不能为我单独点一个灯，怕引起火灾。所以我现在是点蜡烛。

**盗火者：**蜡烛不更容易引起火灾吗？

**董仁发：**可不用蜡烛我就没办法了。

**盗火者：**在家里做什么？

**董仁发：**除了写作业就是做饭，吃了以后，想玩就在外面玩一下，想看书就看会书，不想看书，煨水洗一下脚就睡觉了。

**盗火者：**晚上有没有电视看？

董仁发：没有。

盗火者：不去邻居家看吗？

董仁发：这里有电视的没几家，晚上又不喜欢去别人家，就是在家里。

盗火者：你刚才说到初中学校收钱的话你就不读了？

董仁发：没错。

盗火者：真的是这么想的吗？

董仁发：连大人也没法子，所以我只能不读了。我现在什么也不想，想的就是长大。长大以后打几年工，挣点钱回来把我的房子修起来，因为我这房子已经很破烂了，跟邻居家的没法比。算了，不说了。

在董仁发的木屋里，所有的亮光，都来自那些破败的木头的缝隙。

董仁发每天点蜡烛做作业，自己捡柴火做饭，晚餐大多是加盐的白米饭或白粥。饮用水更是要走 20 分钟的山路到一口荒井去打，一个瘦小的身躯颤巍巍地拎着水桶，走在山路上。一个 11 岁的孩子，每天躺在那样伸手不见五指的木屋里，看着头上的空隙里透进来的星光和风雨，他在想着什么、念着什么又盼着什么入睡的呢？

在经济发展裹挟的城市化浪潮中，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据全国妇联统计，截止到 2010 年，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已达 5800 万。调查显示，农村留守儿童的安全和心理健康状况令人担忧，他们的教育也往往停留在最底线，多数上完初中就外出打工。采访前，原以为这只是一个“典型的”留守儿童案例，但当你真正了解后，才发现他并不典型，或许从来就没有什么典型。5800 万的每一个分子，当你和他面对面坐下，

开始聆听他的故事、抚摸他的伤痕，你都会发现他不是典型。他们就那样活生生的在你面前，他们每一个人都有名字。为什么只有当他们组成一个个统计数据的分母，成为百分比里不能被抹掉的一大块，我们才能注意到他们的存在？

### “撤点并校”与“一个学生的学校”

事实上，对于董仁发和他的同学而言，不仅初中学业没有着落，原本可以顺利完成的小学学业，如今也面临着严峻考验。小董就读的红德小学，在未来的几年里随时有被撤并的可能。

2001年中国《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指出，应“因地制宜调整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按照小学就近入学、初中相对集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的原则，合理规划和调整学校布局”。农村小学和教学点“要在方便学生就近入学的前提下适当合并，在交通不便的地区仍需保留必要的教学点，防止因布局调整造成学生辍学”。而撤点并校自实施起，就不断被社会舆论质疑。从2000年开始，我国农村平均每天消失63所小学，30个教学点，3所初中，几乎每过1小时，就要消失4所农村学校。农村小学生的辍学率回到20世纪90年代的水平，初中辍学率高达43%。

红德小学计划在2015年被撤点并校。届时，村里的孩子至少要花4个小时才能到最近的学校上课。这意味着他们要承担更大的交通安全隐患，如果选择寄宿，则要付出更多的生活费、伙食费等教育费用，给不富裕的农村家庭雪上加霜。跟这所学校联系在一起的7位老师和72个

孩子的命运将会变得更不乐观。

在邻国日本，只要能招满 10 名以上儿童，就可以办一所幼儿园或学校，并由国家补贴。

冲岛小学是日本在浮岛上唯一的一所小学，只有 10 名学生。属于日本的公立小学，学校资金来源于日本政府和所辖的八幡市，校长和教师也由日本政府统一派遣。这所创办于 1875 年的小学，至今有一百三十多年的历史。学校内的所有硬件设施，都按日本政府规定的公立小学的标准配置。日本山手县平郡岛上，有一所只有一位小学生和一位老师的小学，然而宽敞的体育馆和各种设施一应俱全。长崎县长崎市西部 80 公里远的离岛——椴岛，还专门为一个学生配备了一所学校。

## 等不到正名的坚守者——代课教师

红德小学连同校长邓家庆在内，共有七位教师。其中只有两位在编的公办教师，其余五位都是邓家庆找来的代课教师。邓家庆告诉我们，公办教师的待遇是 3000 元到 4000 元一个月，代课教师的待遇最早是 500 元一个月，近年涨到 700 元，而且一年只发八个月工资。这些代课教师都是曾经外出打工的村里汉子，现都已成家，700 元一个月的费用即使在贫困山村也完全无法维持生活，老师们唯有在课余时间回家干活帮补家用。

2005 年，教育部的一纸决定，让红德小学面临前所未有的教师荒。

据杨东平介绍，当时教育部出台了一个政策，要清退代课教师。但实际上，在很多贫困地区，代课教师是清退不了的，他们已经工作了几

十年，而且，只有他们能够在农村待得住、留得下。为什么基层政府和学校愿意用代课教师呢？因为便宜，入编一个公办教师的费用可以聘用五个代课教师。归根结底，还是教育财政的投入不足，对在艰苦地区长期从事义务教育的这些老师，没有一个起码的尊重。

2012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首次达到4%。舆论纷纷解读，中国的教育资源正在向农村、边远、民族、贫困地区倾斜，教育公平取得明显进步。实际上，早在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就提到，2000年，这个比例就要达到4%，但直到2012年我们才将将达到，迟到了12年。

教育学者熊丙奇评论说，全世界范围内的平均水平是达到4.9%，欠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是4.1%。也就是说，中国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达到欠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杨东平提出，绝对不能认为，达到了4%，我们就普及了义务教育。不是这样的，现在的欠账太多了。

这些欠下的账，就是每个老师和学生的另一种可能的命运。

## 命运的分叉口——林何的异地高考路

城乡间教育失衡的另一边，同城不同户籍的高考生也面临着一架倾斜的命运阶梯。

同样的分数，在北京参加高考，你就能考上；在外地，就考不上。这样的故事在我们身边早就屡见不鲜，但更有甚者，不公平的制度造成有的人连考试的机会都没有。

林何就是这样一个孩子。18岁的林何看起来和北京孩子没有区别，

然而，他却不是真正的北京人。20年前，何女士从四川广元来京务工，和北京人老林结婚后生下林何。按照当时的户籍政策，林何的户口随母亲。在交了一笔又一笔赞助费后，林何在北京读完了小学和中学。如今，林何的高三变得异常不平静，根据“异地高考”的相关规定，没有北京户籍，不能参加2013年在北京的高考，须返回户口所在籍参加考试。不同版本的教科书，不同的考试科目，高考录取分数差异更不用提。回川赴考对于林何而言，几乎与放弃无异。

对一种制度存在的合理性的讨论，往往都有两种声音。许多拥有当地户籍的父母——尤其在北上广地区——认为外来人员抢占了本来就很紧张的教育资源。对此，杨东平评价道：

教育资源根本就不是属于户籍人口的，是按照社会公平和宪法权利，理论上，或者说在大多数国家，教育本来就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或者至少在一个区域范围内，是常住人口的权利。我在你这个地方生活，我在你这里纳税买房，我就自然应该享有公共服务的权利。所以必须要破除建立在狭隘的户籍制度上既得利益的观念，但这个破除也并不是说要一步到位，全部放开。全中国人都到北上广，从社会管理的角度来讲也是不合理的，需要加以管理和控制。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有一个入籍的管理，都有积分制度。所以，有条件地放开“异地高考”的限制，各地正在进行探索。

户籍制度牵制高考不单体现在“异地高考”政策上，也让高等院校“看人下菜”，北大、清华等院校针对北京当地考生，有一定的录取分数优惠政策。针对这一问题，社会学家周孝正这样评价：

国民待遇的原则，就是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光辉，所以说北京人上大学，特别是北大、清华这些重点大学的比较多，但那不是北京人的，而是全国人民的大学。那怎么办呢？还是改良，就是得有一个过渡。比如说，原来北大、清华这些重点大学的农民子弟比例是很高的，现在却持续下降，你不能开历史倒车。你可以来个比例，比如今年减几分，明年减几分，搞一个时间表。我一再说，特权是既成事实，我们不能一口吃成个胖子，那好，你搞一个五年或几年的计划，给一个时间表，你不能说我要维护我的特权，我要永远的官二代、富二代，官三代、富三代。

在拍摄途中，林何和妈妈一起参加了北京异地高考推动者组织的公益活动。在一个叫作“心有千千结”的游戏中，林何负责协调团队，维持秩序。游戏结束后，主持人总结：“我们现在这群人聚在一块儿，就是在解一个看起来解不开的结。这个困境、这个难题，不是某个人造成的，它是一种社会体制的沿袭。我们大家现在都在解这个结，政府也在解这个结。我希望你们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积极争取，不要失望，不要仇恨，不要抱怨社会。”林何拥着妈妈，在一旁安静地听着。

## 无处安放青春——蚁族访谈

2008年奥运会期间，《北京欢迎你》无数次地在电视循环播放，人人传唱。但这首歌并不适用于所有人。事实上，无论是林何还是董仁发，又或是红德村的72个孩子，从出生的那天起，他们未来可能的路便已

被限制住了。调查显示，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农村学生升入重点大学的比率不断降低。“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这一趋势正在被加剧和固化。没有竞争力的寒门子弟，即使能在“高校扩招”风潮中升入二本三本，四年之后，他们的青春和未来又将如何安放？这些在京生活的所谓蚁族，毕业于二三流院校，在北京住着集体宿舍，“生存以上、生活以下”是他们的常态。

我们采访的这个蚁族群体，有学 IT 的工科学生，有学音乐的酒吧驻场歌手，有学播音主持的文艺男青年。和所有同龄人一样，他们每天出门为生计奔波，为三餐和房租施展浑身解数。养自己很辛苦，但他们也养猫；每天驻唱很辛苦，但他们还坚持创作。以下是栏目组与其中几个人的对话：

**盗火者：**你毕业的学校是？

**潘 乱：**徐州工程学院。

**申 晓：**新乡学院，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

**王尚清：**西安体育学院。我们学校完全没有学习氛围，老师什么的基本都是刚毕业一两年的。

**盗火者：**毕业那一年在干什么？

**潘 乱：**那一年正在流行“伤不起”以及植物大战僵尸，我的同学只是在想方设法地打发时间。

**王尚清：**我就是各种找工作。

**李鹏宇：**我就是卖乐器。当时在西客站那边，住地下四层。

**盗火者：**工作好找吗？有目标吗？

**潘 乱：**面试的时候都说还成，但都没回音。我还在南京有过

十天左右落魄街头的生活，睡马路边，睡公园，睡学校操场。

**秦久惠**（湖北大学毕业生）：我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他要求你必须是“211”或“985”的学校毕业才行。

**王尚清**：我小时候喜欢听广播，觉得当一个DJ挺好的，自己能操控自己。

**盗火者**：现在这些理想还有吗？

**王尚清**：完全没有了。我感觉我现在就是一个没有目标的人。

**潘 乱**：我还想再漂漂，换个城市继续漂。

**盗火者**：你觉得北京属于你吗？

**申 晓**：不知道，怎么样算属于？就是在这儿有归属感？我觉得我现在好像回家也没有归属感了，反而在这边待得更踏实些。

2013年，北京开始取缔集体宿舍的租用，至此，这座城市不再炫耀自己广纳四海的胸怀，下了一道清晰的逐客令。蚁族的生活状态让人揪心，但同时也有一种社会舆论，对蚁族持批评态度，认为他们高不成低不就、挑剔、懒惰。对此，杨东平认为，其背后更深层的原因是应试教育带来的弊端：

应试教育的负面影响，并不在专业能力上，不在于你是学教育学还是学心理学，而在于你有没有学到一种基本的生存的能力、学习的能力、工作的能力。我们过去都认为，高等教育总是专业不对口，专业知识不符合社会需要，但企业不这么认为。我听很多企业人力资源总监聊过，他们说不管你学什么专业，到我们这儿肯定要重新培训的，学校学的东西永远不可能正好符合我这个企业的需要。

周孝正说：“原来我们是很公正的，你是一个穷孩子，但是你脑子好使，十年寒窗苦，你就可以参加公开报名、择优录取的科举，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是一种垂直流动的秩序安排。”然而，为实现公平而搭建的教育天梯已然倾斜。杨东平感叹：“如果我们现在的教育制度堵塞了这个通道，反而变成根据权力和地位来分配机会，那这个社会就非常危险了。”

## 08 乡村职业教育

“我的乡井在四川巴中县，那儿有我多少脚印，它在山之巅，水之涯；那儿埋藏着父母的慈骨，也珍藏着童年温馨的记忆。书声、弦声，以至樟茶鸭、豆豉鱼，都是可以怀念的。尽管最近三十多年来，我常用的是英语，偶用母语，乡音未改。记忆中的故乡随着我环绕天涯。”四川省巴中市，晏阳初博物馆里，一位老人用颤抖的手指读着小册子上的一段话。这位老人，是晏阳初的侄孙晏鸿国，晏阳初博物馆的馆长。

晏阳初是中国 20 世纪的平民教育家，在一次大战欧洲战场 10 万华工中开展识字运动，经历了 20 年代初的倡导全国识字运动，推动乡村建设的定县试验及四川、湖南试验，晏阳初躬身践履，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漫长而曲折的平民教育之路。晏阳初先生把中国问题归结为“愚、穷、弱、私”四字，且“愚”字为先。他在美国总统罗斯福关于人类四大自由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平民应该拥有免于愚昧和无知的自由。1927 年，晏先生发出呼喊：“吾辈羞视三万万以上的同胞，在二十世纪的文明世界流而为文盲；吾辈恐惧四万万的大民族，不能生存于智识竞争的世界。”

离先生实践平民教育的理想，已隔了八十多年。他的余志，虽曾有断代，却一直在中国的乡村萌芽、发光。

80年前，陶行知先生提出平民教育、生活教育的理念，80年后，在他的家乡安徽省休宁县，一所只招收农家子弟的职业学校——德胜鲁班木工学校诞生了。

学校对面，有一座状元阁。曾几何时，休宁被誉为状元之乡，是昔日程朱理学的发源地。史上19位文武状元星光熠熠，礼教之风盛行。如今，这里的教育却出了大问题。

据德胜鲁班木工学校校长张忠贤介绍，由于休宁县经济贫弱，农村人口减少，大部分孩子读完初中便选择外出打工，苦无一技之长，县里便决定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休宁县是林业大县，历史上徽派建筑、家具、木雕、刻板声名在外，但随着现代家具的流行，传统的木匠工艺面临后继乏人的困境。出于培育人才的考虑，2003年，休宁县政府联合知名企业家聂圣哲创办了德胜鲁班木工学校。这是中国第一所，也是唯一一所木工职业学校。

聂圣哲从事建筑行业，他一次性捐资200万元，为学校建设了实训车间，配备实训设备。学校开学后，他从自己的企业派出经验丰富的木工师傅来校授课，并持续为学生提供实训岗位和就业机会。

木工学校的学生，都是来自休宁一带贫困山区的农家子弟。即便是对口招生，进入木工学校的门槛也并不低。“必须是能吃苦的农民的孩子，必须诚实守信、不赌博、不抽烟。”校长江忠贤介绍，职业教育需要持续不断地花钱，特别是木工这种需要大量实训的教育，一个学生人均消耗木材每年便有八个立方米，成本上万，而学费每年不过两千左右。“如

果学生品行不好,可能无法坚持木工枯燥的工作,导致教育资源的浪费。”

15岁的汪鑫不是第一次接触木匠:“以前我们那边有个木匠,他打家具的时候,我去看过,觉得好玩得很,是有创造力的活动。”16岁的张山峰一心一意想学好木工这门绝活,他说:“以前我们那边没人愿意学木匠。小孩子反正都外出打工,学开车什么的,反正不学这个。就是听起来不好听吧,但我不在乎。”

鲁班木工学校注重实训,实训时间比任何一所职业学校都长,其中文化课与实训课的时间比是三比七。实训车间约有774平方米,四五十名学生或刨或凿或锯或拼,两三个上了年纪的师傅在一旁巡视,遇见动作不规范的学生便拿过木条,言传身教。地上随处可见学生制作的小板凳,也有太师椅等较为复杂的木工作品,每年的毕业考试题目就是制作一张八仙桌。

学生刻苦,师傅用心,木工学校的教育有现代职业教育规模化的优势,也有传统弟子与师傅建立的师徒之情。2012级木工班学生吴忌用日记写下了他一天的时间安排:

2012年3月6号,上午到实训车间,程天福师傅向我们介绍木工工具。一、凿子,有1分、1.5分、2分、3分、4分、5分、6分,还有寸凿;二、刨,有粗刨、细刨、敲刨、一字刨、滚刨……

2012年3月19号,一天比一天好,热爱生活,热爱劳动。

2012年3月20号,少说话,多做事。

2012年3月25号,手艺人讲规矩的,杠总是量两次,锯一次。

2012年3月27日,每个地方都能发现许多失业者,和他们交谈,发现他们充满了抱怨、痛苦和诽谤,这就是问题所在——他们吹毛

求疵的性格使他们摇摆不定，也使自己发展的道路越走越窄。

“诚实，勤劳，有爱心，不走捷径。”这是德胜鲁班木工学校的11字校训。做事之前先学会做人，这是学校对孩子们提出的基本要求。

11字校训之下，又有226条涵盖生活、学习、礼仪、纪律等方面的细则，江忠贤将之称为鲁班军规。“在家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在学校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在社会上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都有很详细的规定。总之，就是为孩子提供一个‘规范自己，约束自己’的标准。学生刚来的时候不太适应，但经过实训以后，绝大部分学生都能够自觉地遵守这些规定。”

著名教育学者杨东平也曾在2013年4月来过此地，探访期间，他翻阅学校制定的《木工学校学生制度读本》，发现学校已经在渗透职业精神教育。“就是培养一个人的基本工作精神，职业精神，为人做事的基本态度，这个其实是我们当前的职业教育非常忽视的，我觉得这是鲁班木工学校最重要的一个启示。”

9月，新学期开始，结束暑假实训的孩子们回到德胜鲁班木工学校。在聂圣哲的企业里，他们实践所学，并且第一次拿到了劳动所得。张山峰这个暑假赚了2300元，他打算留1600元交学费，剩下的用作日常开支。再过一年，张山峰就要毕业了。届时，他将拿到一张毕业证书，成为一位“匠士”——全世界绝无仅有的一个学位。

从2005年起，每年在木工学校的木坊下，都要举行一次盛大的毕业典礼。毕业生身着隆重的“匠士”服，头戴“匠士”帽，踏上红色地毯，接过政要名人授予的“匠士”学位，台下老师、父母、朋友起立鼓掌欢庆。

有评论说，“匠士”的创立，标志着世界教育史上首次诞生了职业

教育学位。“一个木工，他为社会创造的财富，他为家庭创造的财富都是可观的，但是他的社会地位还不是很明显。既然高校里面有学士，有硕士，有博士，同样的一个手艺人，他也有技能的等级，他为什么就不能有学位呢？”校长江忠贤认为，“匠”代表一种娴熟的职业技能，一种谋生能力；“士”代表一种现代职业精神。这是一名手艺人的安身立命之本。

汪斌是鲁班木工学校的毕业生，在聂圣哲的公司工作四年后，他回到家乡开了一间木器加工厂，总投入22万，现已全部收回成本。眼下，他正准备扩充厂房，迎接源源不断的订单。“人家跟我们订的东西，一定要做得细，质量过关，不能偷工减料，对客户要有诚信。”汪斌坦言，在木工学校，他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怎么做人。

虽然教育部门不承认“匠士”学位，但社会已经承认了。“到目前为止，很多企业到我们学校来要人，点名要我们的匠士。”对“匠士”的社会前景，江忠贤颇为自信。

鲁班木工学校奉行严进严出，创立者和掌舵者通过细微处的改变来营造适合中国木匠的成长土壤，在本已疮痍的乡土，闯出一条职业教育的新路。“应该把有限的财力用在教育的投入上，让更多的农民得到实惠，受到教育，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在这一点上，国家的重视，政府的投入至关重要。”江忠贤说。

20世纪50年代，晏阳初在东南亚一带宣传乡村教育，在一次演讲中，他说：

中国人说“改造”，“改”就是改变，“造”就是建设。当我们来到一群不拒绝改变的人当中，我们如何知道哪些需要改变，哪

些不需要改变？也许是他们的文化，也许是他们的处事方式，这些都是他们所尊崇的，需要我们进一步去发展它……

当年的乡村建设运动，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今天，关心乡村教育的人们，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向乡村孩子伸出援手，不约而同地延续着陶行知、晏阳初们的信条：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眼下，他们能够改变的，或许只是一个孩子、一所学校、一个村庄，但是，他们不约而同地相信：欲撕破黑暗，必先擦亮一颗火柴。

## 09 大学大学

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说：“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顾制度为一事，而精神又为一事。就制度言，中国教育史中国不见有形式相似之组织；就精神言，则文明人类之经验大致相同，而事有可通者。”

他一言点出大学的要义：“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 高考的变奏

1977年那个冬天，徐友渔、肖复兴、罗中立、王小妮、朱学勤……570万名考生怀着改变命运的渴望，重新走进高考考场。这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考试，直接推动了中国的教育改革和教育发展，为今日中国的经济腾飞奠定了人才基础。

1977年的一个细节令人回味：在滇南某农场，知青陈翔军为了赢得

宝贵的复习时间，让一名“插友”用镰刀砍伤了自己的大腿，淋漓的鲜血最终换来了一纸大学录取通知书。这一刀，饱含着酸辛与痛楚，仿佛一个谶语，回响在几代中国考生的高考路上。

此后30年，中国特色的高考变得越发歇斯底里，千万学子将宝押在“一考定终身”的单行道上，12年的寒窗苦读，只为了黑色6月的一场厮杀。

为了跳出“农门”，扭转贫寒的命运，37岁的湖南汉寿考生曹湘凡在众人看“耍猴”一般的目光中，第12次走进高考考场。他说，每一次高考都让他“小死”一次，但是，除了高考，他的人生没有别的出路。

湖北孝感一中高三某班的晚自习，惨白的日光灯下，几十支吊瓶蔚为壮观，学生们一边注射氨基酸补充能量，一边读书备战高考。

河南南阳八中女生蒋多多在考场上挑战高考，为了得到零分的成绩，她故意用黑蓝双色笔在试卷上写道：“现在有人因为高考自杀和杀人……星星只有在自由的天空才能发光，到了地上就成了冰冷的陨石……”

据统计，恢复高考的36年来，中国共培养了5438万名大学生。在接踵而来的市场化、国际化、产业化的强力漩涡中，我们终于拥有了全世界最庞大的高等教育——千军万马过的不再是独木桥，大学也不再是从前的大学。

## 大学之殇

深秋的早上，江城被一层迷雾笼罩，空气有些湿冷，武汉大学校园，

樱花稀疏地开着，花骨朵上沾着寒露，一位头戴毡帽的老人扶着拐杖从旁路过。他就是前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头发花白，得过重病，已不能提笔写字，耳朵也不灵光，需要紧挨着他坐下才能正常交流。

刘道玉是高等教育界名噪一时的改革家，忧心于大学的现状：“大学的精神，已经丧失了。1927年，王国维先生逝世两周年时，给他树了一个碑，陈寅恪先生写了碑铭：‘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今天，这个精神已经不复存在了。”

民间学者朱学勤惋惜：“最痛切的，就是大学失去了80年代曾经萌芽的那种朝气，失去了80年代那种思想解放的生气。”

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们被称作“天之骄子”，理想主义的光芒在校园里处处闪耀：徐友渔、肖复兴开始发表作品；罗中立画出了让他一举成名的《父亲》；在吉林大学，由王小妮、徐敬亚等人组成的“赤子心”诗社，以其产量惊人的写作，与当时全国诗歌的最高水准保持同步……

然而，30年后，当王小妮以一名大学教师的身份走上讲台，用诗人的眼睛打量新世纪的大学生时，她在那些年轻的面孔上读到的是困惑、迷茫、贫乏和冷漠。12年的应试教育把他们压成了扁平状，他们缺乏常识、精明、现实、患得患失，他们自私、偏狭、对周围世界漠不关心，日益严峻的就业前景让他们压抑了梦想，他们无力“站立”，更谈不上“四面张望”……

清华大学电机系大四学生刘海洋，为了满足邪恶的好奇心，将硫酸泼向动物园里的黑熊；西安音乐学院大三学生药家鑫，驾车撞人后又将伤者刺了八刀致其死亡……易中天说，中国教育是“元凶”。

钱理群认为现在大学弥漫着两种思潮：“一种是实用主义，只相信实用和实利；另一种就是虚无主义。”

陈丹青断言中国现在已经没有真正的教育了，“上学变成了一件很功利的事，就是我要拿学位，我要谋利益，要不就入党，就做生意，就打工”。

## 课堂·偏移

《上课记》是诗人王小妮在南方某大学授课期间的教学笔记。这是第一次，有教育者用敏感生动的笔触，记录当代大学生的心灵困境。它是教育诗，更是惊堂木。这部被称为“大学生心灵调查报告”的《上课记》，是一部沉痛的书，王小妮感叹：“悲从四面八方来。”

《上课记》一书，将大学生这个群体的彷徨、躁动，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他们爱集体鼓掌，在舞台上演讲自己从来不相信的内容，班长热衷点名，学生逢迎、世故、明争暗斗，任何一代人都没有这么快地出现苍老感……

这就是当下高校教育的现实。

在《上课记》里，有一堂课是续写《许三观卖血记》。“当许三观知道一乐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而这个妻子与别人生的儿子又打架闯祸，伤者三番五次上门催讨——我让学生们给出下面的故事进展。”

学生的回答让王小妮吸了一口冷气。

学生A：许三观应该带一乐去卖血，反正不是自己亲儿子对

不对？

学生 B：那不如让许三观带他老婆去做鸡，这样来钱比卖血快得多。

学生 C：许三观只能去跳楼，他活着没有什么意思呀。

这些回答冷漠、自私、充满暴力，王小妮不禁问：“似乎只有这些极端的想法，才能让他们兴致盎然，平淡的解决方式，温润、和善、柔软的力量，他们显然没兴趣。是什么经历在暗中提示了他们，热衷于把痛苦推衍到极致？”

此后多年，王小妮一边教书，一边自己寻找答案。她说：“生活是庸常的，而日常的才最本质。当所有人都在悬空下坠而不自觉的时刻，我得提醒他们，这姿势不正常，不管长久以来你多适应它。”

英国哲学家怀特海在《教育的目的》中写道：“在中学阶段，学生应该伏案学习；在大学里，他该站起来，四面张望。”

## 大学·官场

2004年，归国画家陈丹青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执教四年后愤然辞职，成为当年最轰动的教育事件。陈丹青曾在给院领导的信中解释辞职原因，称“这一决定出于我对体制的不适应，及不愿适应”。

2000年，陈丹青到清华大学不久，便组织了全国首届艺术学院博士生招生。24位各地考生中，五名入围，却因为外语不过关而搁置。2001年，五位访问学者完成博士论文选题，但外语考试再度失败，未能转为

正式博士生，结业离校。

赤裸裸的现实给陈丹青泼了一盘冷水，“我当时满怀热情到清华报到，很兴奋、很好奇，他们给我这么高的规格，又是特聘教授，又是主任，又要招博士生，我就有点将信将疑。美术哪有博士？这事儿怎么弄？于是，我很认真地准备，很认真地招生，但第一个回合下来我就发现，这一切都是错的，都是拧巴的，因为最好的学生根本上不来，首先就卡在英语和政治分数上。”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张鸣称，现在的大学中，行政化现象严重，校长、书记有如行政长官，各部门的领导，就是六房衙役，老师负责干活，学生交粮纳赋。

南京大学师生创作的《蒋公的面子》，堪称2013年最火的话剧。1943年，蒋介石出任中央大学校长前，曾邀请中文系三教授共进年夜饭，在“给不给蒋公面子”的问题上，争执不下：

A：蒋公当校长当多了，就以为什么学校的校长都能当。

B：一个杀过学生的人来管教育，简直胡来！

A：以蒋公的学识，当军校校长尚可，当大学校长，哼！

B：他来掌中大，中大不是变成了党校就是军校，独裁者眼中哪有自由学术之空气！

纠结和调侃中，民国知识分子的风骨和弱点表现得淋漓尽致。事实上，这个故事只是流传在南京大学校园里的一个传说。

近年来，大陆兴起了一股民国热，经常可以在报纸、电视、微博、微信中，看到关于民国的内容。陈丹青说：“民国的校长、民国的教授

和民国的学生，为什么我们今天怀念？因为他们很单纯，政治还没有毁了他们，他们可以有自己的立场，不受当时的政府和党派的影响。”

话剧《蒋公的面子》导演吕效平认为，跟今天的大学相比，民国时期大学的政治化还没那么严重。“1948年，国共战争打成那样，在民国科学院选举的时候，仍然把一些著名的左派人士，像马寅初、郭沫若，都选为科学院院士，你要问蒋介石，他们能当院士吗？蒋介石一定说，他们不可以当院士。但是，他操控不了，他的权力是受到制约的。今天的情况是，权力占满了一切资源。”

中科院院士张泽提出一个例证：“我过去在北京市市属的一所高校里，有一个副处长的位置，涉及一些资源的采购和分配。我奇怪地看到，这么一个位置，竟有三个博导去申请。这就是典型的行政化的结果，你把教授们逼上这条路了，对学问、对是非根本不在乎，只管利害。”

泛行政化的管理机制，同样催生了有“大学小官场”之称的学生会。“大学的团委和学生会，早已成为高校的藏污纳垢之地。”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陈伟这句话在微博上一出现，立刻引来网友的一片哗然，并有学生干部要求其公开道歉。“学生会：大学最阴暗的一角”是陈伟计划写的新生寄语中的一部分，他说：“我选择这个议题，乃出于个人对大学教育工作的严肃思考：我们是要培养什么样的大学生？此外，它还涉及一个民族未来政治中人的素质，是‘统治精英的再生产’问题。”

陈伟曾目睹班里一位大一时比较单纯、有理想的学生，在当过学生会主席后，堕落成一个失去基本道德水准、无知无耻、满口官话的学生官。他接触过的一些在学生会里工作过的学生，也称学生会为“垃圾”。他认为，高校的团委、学生会，某种意义上是中国官场丑陋生态的缩影。学生会的许多做法，是中国体制内最糟糕做法的复制。

学生干部是学校中的特权阶层，有限的奖学金、助学金的申请名额，往往被学生会干部捷足先登，每年换届，竞争对手之间暗中倾轧，手段极其卑劣。

有一天，王小妮正在校园晨练，一名学生跑过来跟她说：“王老师告诉你个事，前几天有一群人为了争学生会的头儿，在食堂打了起来。一个男生被一个女生叫的一大群男生追着打，真打呀，都有人报警了。”王小妮问：“为什么打，就为了争当头儿吗？当头儿有那么大吸引力？”学生回答：“有权有钱呗！”

学生会到底有多热门？在有些高校，甚至比毕业生找工作还困难。据《天府早报》报道，西南交大2011年迎新的最后几天，该校学生会提前招新。没想到，仅仅60个岗位，竟引来约3000名新生报名竞聘，掐指一算，录取率仅2%。

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在2011年开学典礼上说：“当前的大学，包括在整个社会当中暴露出来的各式各样的问题，反映了中国社会精神和价值的迷失。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说，中国的危机，是文化的危机。”

## 论文·创收

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开始施行教育产业化，大规模扩招，学校营利创收、高收费、乱收费，一场轰轰烈烈的高等教育“大跃进”开始了。据不完全统计，2003年审计署审计的18所高校收取各种未经批准的进修费、超范围的学费、代办性收费、重修费、服务性收费等共计8.68亿元。不少高校为招收更多学生，还进行新校区以及大学城的建设，向

银行大量借贷，并指望通过收取学杂费来偿还。

然而，盲目扩招的后果也在这十年显露出来。毕业生结构性失业，起薪下滑，能力弱化，使得家庭负担加重，社会教育的期望落空。

教育腐败等各种不良现象也在这十几年间越发频繁。高校盛行学术造假已经不是新闻，在互联网上输入“论文抄袭”四个字，用户可以得到几千万条搜索结果。2008年浙江大学教授贺海波在国外知名期刊发表的多篇论文存在数据造假；同年，云南中医学院院长李庆生抄袭同行论文；2007年东北财经大学的一篇硕士论文，原封不动抄袭南京财大的学术论文……论文抄袭甚至成为一个新兴产业，近年来，淘宝上出现大量提供“论文检测服务”的卖家，月赚百万，声称能提供“与高校反抄袭检测结果相同的检测结果”，并附送珍藏版论文修改秘笈。

张鸣认为：“本科生发什么文章，简直荒唐！本科发文章肯定都是抄的啊，但它就是鼓励抄。当年本科评估的时候，学校组织起来造假，整个学术道德正在制度化地毁坏。”

朱学勤视这些毕业论文为印刷垃圾：“多少年以后回头看，我们最有钱的这个大学时代，恐怕是最令人羞辱的一个时代。”

## 九零后·独白

九零后是一个分水岭，在王小妮看来，他们自称吃货，以一种集体自嘲的方式活着。《上课记》中这样描述：“生活需要填充物，过去是12年的学习和考试，现在是吃东西，明天则是考各种证书，不然，没有什么能证明这条生命还存在着。这些小生命需要经过吃的过程来赶走空

虚；比起其他，只有吃能带给他们最快、最直接的存在感，由吃饱获得最后的藏身地。”

和王小妮上大学时相比，现在的“吃货”们更敢于直接表达自己。在一场关于理想的讨论会上，九零后们对未来的希望是这样的：

不想考研，年轻人应该更加有活力！

我希望买一套 80 平米左右的房子，把我老爸老妈接过来，每天能吃豆腐脑。

我想保持正直、清醒和善良，一直到死。

不只想实现我爸爸希望我实现的。

我希望全国高校取消英语四级成绩与学位证书挂钩。

我想开一家店，里面卖的都是我自己做的东西。

我希望成为富婆，然后带父母移民新加坡。

我想有一群伙伴，大家出生入死。

减肥，和去年一样瘦！

钓鱼岛是中国的！

希望我父母不要以金钱和权力去评价我未来的老公。

世界不要逼我，不要太多的潜规则。

世界大同。

我想去远方，很远很远。

我希望神能宽恕我们人类。

这些直白的话语让王小妮开始检讨自己：“他们眼下最需要的是怎样就业，怎样顺利轻松地融入社会，怎样过上最好的生活。我能给的，

恰恰不是他们现在想要的。”

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曾讲过一个故事。有一次钱教授去上课，发现有一个男生，坐在第一排，非常注意听他讲课。“而且我在讲的时候呢，他会时刻发出微笑，并立刻做出反应，而且这种反应基本上都在点子上。下了课以后，他走到我面前跟我说，钱教授，你这个课讲得真好。”更让钱理群吃惊的是，这位男生把他的课堂内容总结出五条亮点。“作为一个教师，碰到这样的学生，我当然非常高兴，所以我对他就有好感。四天下来，我对他的好感与日俱增。”到了第五天，这位男生来找钱教授。“他说钱先生，我想到美国留学，请你写一个推荐书。我当然是欣然推荐了。”

让钱教授没想到的是，这位学生从此消失得无影无踪。“我这才明白，他来听我的课，从一开始就有一个功利目的，然后，他的每一次微笑，每一个点头，都是为了这个目的。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够迎合体制的需要，而且很有效果，效率也高。这些人正在被培养成接班人。”

钱理群把他对这个故事的感想发到他的微博：“我们的一些大学正在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这条微博一夜之间转发量高达3.5万次。

钱理群认为，这是我们中国教育的最大失败。“之所以出现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你反过来替他们想的话，就是如今的教育不能给学生提供一种理想，提供一种信仰，当一个人没有理想、信仰和目标的时候，他唯一的驱动力就是利益。”

## 变革·未来

王小妮的学生大部分来自农村，家庭贫困，靠父母种地或外出打工缴纳学费。在教学中，王小妮让学生重新找到了语言的想象力，告别华丽和空洞；每次上课都先用十分钟时间给同学讲最近发生的新闻，以消除学生中普遍蔓延的冷漠；让学生用家乡方言读诗，分享每个人的故事；到大四仍坚持举办诗歌朗诵会……《上课记》中附录了几篇学生习作，记录的是他们身边发生的真实生活，有家长里短，也有纯真感性。

熊丙奇认为，中国教育一定会改，只有改革才能对得起我们的受教育者。

张泽坦言这不仅仅是一个大学自身的事，更需要社会的配合。

朱学勤希望老师珍惜讲台：“你珍惜这个三尺讲台，也许你的课堂氛围，至少就跟隔壁教室的氛围不一样了。”

刘道玉希望大学生要有自己的追求：“一个人能否成才，不决定于名校和名师，也不决定于学历和学位的高低，而决定于你自己，具体来说，就是决定于你自己的理想和执着追求理想的精神。”

虽然许多人认为王小妮在大学课堂的尝试是一个错误，全无意义，甚至飞蛾扑火，那些学生们走出校门，很快便会丧失自我，随波逐流，但她仍然相信教育的力量：“没有理由要求我们的孩子身上不沾污秽，但是，即使发现了再微小的纯净，也一定要说出来。毕竟，希望还在。相信他们在自然长大的过程中自生的判断力，相信唯一的真理——未来只能把握在他们手中。”

《上课记》序言中有这样一句话：“如果它完全是徒劳，也要让这徒劳发生。在大学变革的逆境中，食指1968年作的一首诗《相信未来》，

可当共勉：‘……朋友，坚定地相信未来吧。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毕竟，若连未来都不再相信，我们还能相信什么？

## 10 在路上

2011年4月，清华大学迎来百年校庆。校园内张灯结彩，更有国家领导人亲临讲话，一校之荣，举国瞩目。

在遥远的南方，一位78岁的老人用他脑中风后颤抖的手指，敲打出一份特殊的贺词，通过互联网，寄给了他曾寄予厚望的清华大学。信中，他言辞犀利地批评清华的校庆“缺乏反思精神”，进而痛陈中国高等教育的种种弊病。贺词见报后，舆论为之哗然。

这位“不识时务”的老人叫刘道玉。20世纪80年代，他曾是武汉大学的校长兼党委书记。

刘道玉称，与清华大肆庆祝的活动相比，2011年也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建校150周年，他们不搞豪华的庆祝活动，却用150天进行反思——该如何继续走在世界科学研究的前沿，怎样解决人类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

借清华百年校庆之际，刘道玉说出了他最想说的的问题，却没有得到清华大学官方的任何反馈。有人评论，刘道玉是当代中国最值得记取的大学校长之一，也是最没有权力却最有影响力的教育家。

## 武大“蔡元培”

在武汉大学的校园里散步时，老校长依然会被许多学生认出来，虽然卸任校长多年，但他的故事却在武大一代又一代的学生中口耳相传。

刘道玉的书房，别名“寒戩斋”，取“梅花香自苦寒来”之意。20世纪80年代，武汉大学学生喻杉的小说《女大学生宿舍》被搬上银幕，影片在武大拍摄，片中那位思想开明、锐意改革的校长路石，原型就是刘道玉。

说起武大，人们会想起“珞珈山”这个名字，“珞”有石头坚硬的意思。学校历史可以追溯到1893年，当时洋务派实力人物、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武昌创办自强学堂，这是武汉大学的前身。20世纪上半叶，武汉大学便已成为文、法、理二十多个系的一流大学，那时武汉大学的学生，可以凭借武大的文凭置换英国剑桥大学的文凭。

有一位来华旅行的美国外交官问胡适：“中国究竟有没有进步？”胡适称：“你去武昌珞珈山看看就知道了！”可见他对当时武汉大学的推崇。

1981年，刘道玉被教育部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彼时，十年浩劫刚刚结束，经济改革正在萌芽，高等教育统得过严、管得过死、人才培养模式单一的面貌亟待打破。而武汉大学，也从解放前的全国五大名校之一，跌落至教育部直属23所高校中的第22名。刘道玉发誓“十年雪耻”，“要像越王勾践复兴越国一样复兴武大”。

刘道玉认为：“影响人才培养的是制度，制度不改，杰出的人才不可能培育出来。用制度培育一种民主、自由的校园文化，这是我们改革

的切口。”

20世纪80年代初的大学，全国高校被浓重的计划体制氛围所笼罩，招什么人，多少人，学什么课程都有标准动作。学生有如一个模子压出来的产品，没有个性。刘道玉首先要改变这个现象。他倡导自由开放新风，摒弃刻板严苛的学规，刘道玉回忆：“80年代是一个解放思想的年代，人心思改。中央主要负责人大力号召和支持改革，最明显地体现在胡耀邦同志的两句话：‘允许改革犯错误，不允许不改革。’我在80年代所做的改革，支撑我的力量就是这两句话。”

当时的武大学生宿舍没有统一关灯，刘道玉认为学生已是成年人，有人习惯早睡，有人习惯晚睡，不能强求一致，一切都应由学生自己决定。

此后，刘道玉大刀阔斧地进行教育改革，他在高校首推学分制、双学位制、主副修制、插班生制、转专业制、贷学金制……这些在当时颇为超前的措施，现已成为许多高校的基本制度。“我允许学生不上课，对张三老师的课不感兴趣，可以选择李四的课，对本系的课不感兴趣，可以到别的系选课；允许提前毕业，修满学分就可以提前毕业，完全打破计划经济；允许学生转系，文理科可以转，学校之间可以转，清华大学的，北京大学的，同济大学的，几十个学生都转到武大来了。”刘道玉说。

刘道玉每天步行上班，从家里到办公室只有十几分钟的路程，他却常常要走一个小时，原因是“截道者”众。每次都有学生拉着他问问题，刘道玉也乐此不疲。“学生是学校的主体，一切工作都要以学生成才为出发点。”

生物系有个学生叫田天，他给校长写了封信：“我每天上解剖课，要拿兔子在砧板上解剖，看着它的内脏结构啊、神经啊、细胞啊等，就

犹如自己在被宰割一样痛苦，你救救我吧，我要求转中文系。”刘道玉接到信后深受震动，“任何一个有爱心的、有良知的、爱才的人，都不可能是麻木不仁的，我就批准他转到中文系了。他现在是很有名的儿童文学作家。”这件与学生之间交往的趣事让刘道玉决心在全校推行“允许学生转专业”的政策。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场“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令社会空气为之紧张，刘道玉执掌的武汉大学，成了年轻人向往的清新之地——可以谈恋爱、可以跳交谊舞、可以穿牛仔裤，还有超过400个学生社团可以参与。社团不仅活跃在校内，也有学生提出要在校外办写作班，传授写作知识，培养写作人才，学校都给予支持。“那时候的武汉大学被认为是解放区。”刘道玉说。

刘道玉首创导师制，把经验丰富、学术水平高的教师作为课余导师，每位导师指导若干名学生，改变了当时大学只有政治辅导员的角色，促进了学生的成长。

一位才华横溢的研究生被导师培养成国学继承人，却因“带薪、已婚、来自少数民族和边疆地区”的四条政策所限，毕业后只能回原籍。刘道玉三次上书教育部，以五个本科生换下了他。此人名叫易中天。

易中天曾谈到他在武大上学时的感受：师生思想活跃，言论自由；研究生论文答辩，可以当面顶撞评审委员；本科生学术演讲，校领导坐在下面洗耳恭听。校长、副校长、书记、副书记的家，敲敲门就进去了。教员上课，学生开会，讲什么，怎么讲，没有人横加干涉。

珞珈山下、东湖水畔，刘道玉送走了近两万名天之骄子。有人说，那一时期的武大，可以和北大、清华叫板。众所周知，这位敢跟教育部长拍桌子的大学校长，这位超前的教育改革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988年3月6日，53岁的刘道玉被国家教委宣布免去武汉大学校长职务，被迫提前退休。

被免职后不久，刘道玉上书直言国家教育改革缺乏上层设计：“客气地说，教育战线在全国是最保守的，其原因就在于国家教委保守，主要负责人不放权、不改革、不深入基层。”此后他撰文抨击教育部搞假义务教育，搞假教学评估，他认为教改必须从教育部改起，他吁请中央组织部把遴选和任免大学校长的权力交给大学的教授们。

回忆往事，刘道玉说：“为此我也无怨无悔，我毕竟做了我想做的事情。我觉得一个大学校长，就是要为大学争独立，为教授和学生争自由。”在那些深受改革裨益的大学生心目中，刘道玉是“武大的蔡元培”。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曾在老校长80岁生日那天，写了一幅字送给他：“先生声名重，改革举大旗。敢为天下先，甘做护春泥。桃李遍九州，文章焕万世。八十正当年，百岁众人期。”

## 深圳的大学梦

20世纪80年代，刘道玉领导下的武汉大学被誉为“高校里的深圳”，是高等教育改革的桥头堡。

然而，位处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深圳，却唯独缺一所可以提供高等人才的大学。

1983年，深圳市委书记梁湘决心创办深圳第一所大学，他将这一任务交给了罗征启校长：“这里有一平方公里的土地交给你们了，我们决心贷款来搞教育，卖掉裤子也要把大学建起来！”谁也没有料到，仅仅

八个月时间，深圳大学就在一片滩涂上拔地而起。

回忆往事，罗征启说，那个年代的深圳，“从上到下都洋溢着一股干劲。深圳的领导啊，他一方面全力支持你，同时又不干预你，给你最大的权。他们说，老罗啊，我没上过大学，我们深圳市委常委里没几个上过大学的，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大学，所以，交给你了。”罗征启说，当时的深大被寄予厚望，有充分的自主权，甚至连职工户口也可以自行审批。

学建筑出身的罗征启，决定将图书馆建设在校园的中心，面积最大，高度最高，他有一句著名的话：“高等学校建筑群的心脏应该是图书馆，而不是党政领导的办公楼。”经济学家薛兆丰回忆母校时说：“80年代的深大没有围墙，图书馆的藏书全部开放，学生可以自由借阅港台和外文书籍，一年365天，每天开放到夜里12点，开馆时间之长，为亚洲所有大学之最。学校没有政治课，也从未开过全校大会。没有广播系统，学生宿舍不熄灯，没有铁门和舍监。”

20世纪80年代，罗征启首倡的一系列改革，如学生会直选、学生自治、自由选课、勤工俭学、毕业不包分配等，甚至比今天的很多大学都要超前。

当时全国有1070所高校。罗征启说，就像马拉松比赛，1070所大学比赛，深圳大学是最后一名参加者。我们“要直接建立一个新的大学，而不是建一个旧的再来改革”。

深圳大学的种种惊人之举，引发了全国媒体的集中报道，名气直逼清华、北大。“内地几乎天天一群一群的人来参观，没有人反对，都说很好，但是也说，我们做不了。我们深圳大学就一个‘干’字，而且要快干。为什么要快干？快干是排除一切干扰的最好办法。一快遮百丑。

这是袁庚教我的办法，你别什么事都去写报告，看准了就干，干了以后，中央领导少不了要上你深圳大学参观，参观你就汇报，说我搞了个什么东西，中央领导一听，很好嘛。这不就完了吗？比如说，全国唯有我这儿的学生会主席（后来包括团委）是直选的，结果怎么样？结果是学生在成长。”罗征启说。

刘道玉也认为，80年代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黄金时代：“各个大学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比如上海交通大学的党委书记邓旭初，他首先是从人事制度改起，交大的工资人均都五百了，我们才六十多块，全国都向往上海交大；中国科技大学的改革是少年班；华中工学院朱九思校长也是立志改革的，他在全国率先提出了理工结合……”

一度，锐意革新的深圳大学让人看到了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希望。但遗憾的是，20年后的今天，深大已沦为高校改革挫败的缩影，其学位授予、学科设置、专业设置、招生等，需经国家教育部与广东省教育厅审批，而投资、人事、基建等则受深圳市具体管理，学校体制越发保守。深大前任校长章必功说，当下中国的高校缺乏一个“高等学校法人财政制度”，学校为吸引人才需要房产，却不能向市场购买，只能等政府分房，甚至购置一台电脑都要等待三个月，财、物完全由政府控制。一名校长曾公开吐槽：“某种程度上，中国只有一所大学，就是教育部大学，我们都是分院。”

此后多年，面对强大的现行教育体制，以及已经形成的既得利益群体，高校改革的动力日益缺失，阻力越来越大。

直到2009年，随着南方科技大学的破土动工，深圳也迎来了第二场大学梦。一座以国外名校为标杆的大学，南方科技大学的筹建，被赋予了太多的象征意义。

然而，和刘道玉的时代相比，南方科技大学的创校校长朱清时无疑是孤独的。他力主大学办学自主权：“学校一定要有个机制，不是谁的官大谁说了算，是谁有道理谁说了算。大学一定要独立办学，才可能有自己的精神跟自己的内涵……”

2010年12月，在没有拿到教育部“许可”、尚处于“筹建”的状态下，南科大高调宣布开始自主招生。和当年的刘道玉、罗征启一样，朱清时觉得，“改革不能光等批复”。

朱清时认为，一个学校能够自主招生、自授文凭，这个学校才有真正的自主权。他说：“自授文凭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它让这样的学校背水一战。你只有提高学校的教学质量，你的学生才能得到社会认可，才能受到社会欢迎。一旦这样，你的文凭有没有盖教育部大章，其实并不重要。”

跟高考定终身的选拔机制不同，南科大最初采取自主招生的形式，学生要通过笔试和面试。一位名叫陈瑶的女生对面试当天的情景记忆深刻：“面试时，老师问我为什么要读南科大。我说，我读南科大是因为想当科学家。然后，我发现那些老师都抬起头来，眼里闪着光。”

教改实验班的孩子大多得到了家长的支持，有家长虽然担心孩子的前途，却对南科大的未来抱以期待：“我们对这个学校也是充满着激情和理想，关键是觉得它的理念能够培养出好的人才。”也有家长认为，学校成功的关键在于不断克服外界的阻力。

经过校方组织的各项能力测试之后，2011年3月1日，南科大首次自主招生录取的45名高二学生入学。这一举动令世界舆论为之侧目，美国《科学》杂志将其选为“本年度对全球科技产生影响力的重大新闻事件”。

《科学》杂志发表了南科大教改实验班 45 名学生的一张合照，称他们为“**Young Pioneer**（年轻的先行者）”。朱清时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的学生：“这是国际学术界对你们的评价，因为你们身体力行，用你们的前途、未来，为中国的教改做实验。”

2011 年 5 月 3 日，教育部公布该年度具有学历教育招生资格的高校名单，南科大不在此列；5 月 27 日，教育部发出通知，要求 45 名已入学新生参加高考，对此，朱清时表示不能认同；6 月 7 日，南科大新生无一人参加高考，考场被迫取消。这一事件引发了舆论界的集体狂欢，这次风波被解读为新生在南科大的“抗争”和“胜利”。

此时，一封《南科大一学生致社会公开信》开始流传网络。信中写道：

这里的同学绝大多数都怀着这样的心态——抛下纸文凭，捡起真本事。在现在无数毕业生疯狂报考公务员的情况下，我们从未担心过自己的职业和未来。因为我们都怀着一颗“实验”的心，我们想在培养自己的创新思维和独立精神上作出努力。我们的老师，也在积极地向我们传达着这样的信号。有同学梦想成为中国的爱因斯坦，“**just learn more**”，老师会提供你需要的书籍。这种学习方式激发的是学生无穷无尽的想象力和主动思考的动力。有的同学想训练自己的英文表达能力，大家约好时间，每天晚上外教都在书院的一楼交流，书院制的优点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我们的老师与我们同吃同住，经常可以看到大家围在一起讨论问题……我们对自己的选择坚定不移，对南科大的未来充满希望。但我们同时也是无助的。

现实是一张盘根错节的无形大网，理想的每一步都迈得异常艰难。关于妥协，朱清时说：“就像你要登山一样，有时得走一段下坡路，有时得绕道而行。因此，我们走的是一条迂回、曲折的路，却一直在往前。”

2012年4月，南科大正式获得教育部批准建立。按照教育部的批文，南科大所有办学活动都必须遵守现行教育制度，这意味着，今后，它所拥有的办学自主权将不比其他公办学校大。

朱学勤对这一结果感觉悲观：“包含大学在内，整个社会，还都处于政府管控状态，这个制度不改变，你光让大学变，变不过来的。”

杨东平指出：“当时他们要求自主招生和自授学位，现在看来国家没有让步，还是要把它纳入到国家统一的制度当中，就是说你必须参加高考。”

虽然外界的看法普遍悲观，但朱清时却坚持认为，一定要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依法治理南科大。在朱清时的去行政化改革中，理事会制度是让人注目的一环。朱清时提出用理事会制度保障“教授治校”的思想——教授在理事会中唱主角，指导学校重大决策。然而，在南科大召开的首次理事会会议上，人们发现，行政的影子仍然挥之不去。理事会20人名单中，包括10名厅局级以上官员，一时舆论哗然。

熊丙奇认为：“大学理事会的成立，要有一种广泛的代表性，不能是政府简单的任命，而应该是民选。但实际上仍是政府简单的任命，而且任命中的官员比例相当高。这表明南科大的去官化、去行政化遭遇了严重阻力。”

由于南科大是由深圳市出资兴办的，因此，学校的一切基础建设审批，都需要纳入政府的行政程序之中。每动工一个项目，都要跟不同的政府部门打交道。另一方面，南科大的管理团队大多来自体制内，假如

彻底去行政化，政工人员，甚至包括教师，都要牺牲原有的事业编制福利，成为“体制外”的人，他们的利益也将受到触动。

朱清时承认，依靠行政力量“去行政化”是个难题。“大家应该意识到，学校的真正老板是教授群体。做管理的人，如果眼睛不看着教授，不帮他们解决问题，让他们失望了，能干的教授会走得很快的。说不定很快就散掉了，那南科大就完了。但要让这种文化成为全体教师内在的东西，还需要很长时间。”

2012年6月19日，从全国八个省市遴选出来的一千多名应届高中毕业生，参加了南科大组织的自主招生考试。这是南科大“转正”后的首次招生。这次招生采取“631”模式。“高考成绩占60%，自主测试占30%，平时成绩占10%。但是高考成绩，是从满分750分先换算成百分制，然后再乘60%的。而自主招生呢，就是百分制。自主招生的一分，等于高考成绩的3.75分。所以，自主招生是起很大作用的。”朱清时说，这已是校方在体制内争取到的最大空间。

考生们则一致认为，这次考试远远超出了他们的经验。有考生一拿到试卷便吓了一跳：“它让我在七分钟之内把1到300的数字按顺序写下来。这是考我们什么呀？”也有学生认为，南科大的自主测试有点像智力测试，“就跟平时脑筋急转弯差不多”。

朱清时则回应，南科大的测试是要考察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南科大的定位是什么呢？我们是要回答钱学森的问题，就是想培养一流的创新型科技人才。想象力、洞察力、注意力和记忆力，这些能力加起来，比一个人掌握多少知识更重要。所以，我们就是要测试这四种能力。”

朱清时一度遇到招生困难，曾经有一个学生被南科大录取了，档案也投档到了学校，但后来他发现自己又被清华录取，于是学生家长要求

退出档案。刘道玉认为，导致南科大在社会上地位比较尴尬的原因是政府的过多干预。他说：“用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的一句话说，政府有责任投资教育，但没有必要经营教育。”

2014年，南科大第一届教改实验班的44名学生中，有37位顺利毕业，4位早已退学，另外3位因学分未满要延迟毕业。这18%的淘汰率，与国外的哈佛大学、加州理工学院等名校相近，在中国高校则闻所未闻。

2014年年初，南方科技大学召开干部大会，宣布深圳市公安局原局长李铭接替朱清时任南科大党委书记。朱清时不再兼任党委书记，校长一职也即将到期。

自担任南科大校长一职以来，朱清时就饱受失眠的折磨。现在每天必须靠安眠药入睡，剂量是常人的一倍，比刚来南科大时瘦了十斤。谈及未来，朱清时认为，南科大可成为未来中国高教改革的一个样本。“就我个人来讲，胜算可能不是很大。因为我们面对的状态太复杂。但是我们一直往前走。而且，南科大已经不是单独一个学校，一年多来，南科大在国内外已经引起了高教界的广泛关注，已经有很多学校开始用同样的理念进行改革。我相信，慢慢地，这个火会越烧越大，我相信这是必由之路。”

## 大学的联姻

在珠海市郊的大学园区，有一所新生的大学正在引起世人的注意，它就是珠海联合国国际学院，简称UIC，2005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和香港浸会大学携手创立。201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评价说：“UIC

已从开办初期的地方普通院校跃升为清华北大级的大学，其管理和教学模式，足为内地大学借鉴。”

UIC 校长吴清辉谈起学校创办的目的时说：“教育部对我们的期望是，把我们的教育管理体系以及课程，都带到国内来。我们进来以后，教育部就说香港其他的学校要进来的话，它都不会再考虑。一直到 UIC 第一批毕业生出来以后，才考虑另外的合作项目。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UIC 的确是非常特殊的。”

作为合作办学的试验田，UIC 的理念完全源自香港浸会大学，全英文教学、浸会大学的文凭和课程、来自世界各地的师资队伍，都对内地学生构成了强烈的吸引力。UIC 着力培养有国际视野的人才，除少数与中文相关的课程外，UIC 所有的课程实施教材、讲义、教学、辅导、考试全程英文授课，所修学分在全球范围内广泛获得认可。

学校的教学方式相比国内一般大学更为灵活自由。UIC 的学生说，课堂上，“老师会有很多时间让你自己去思考，然后去总结或发表一个什么样的言论”。虽然 UIC 的学费是国内一本学校中最贵的，但“这笔钱还是值得投入的”。

和内地大学相反，UIC 奉行宽进严出的教育原则，连续两个学期 GPA 没有达到 1.7，学生将被勒令退学。有同学戏称，在国内，如果说上高中是地狱，那上大学就是天堂；但如果选择 UIC 的话，那高中和大学就都是地狱了。

专业学习之外，浸会大学具有悠久传统的全人教育理念也被移植到 UIC 的校园。全人教育注重培养博雅通达、健全发展的人，通过体验式学习，使学生在身体、智力、道德、批判性思维、创造性、精神和价值操守等方面得以成长。

学者陈远认为UIC就是一个小社会：“学生上学期间想开一个商店，可以，学校会给你出钱开；学生想办一个小报，可以，学校给你出资。就是把学生当成一个社会人来看待。我们国内的教育，哪怕到了大学，还不把学生当成一个自然人看待，老师对待学生总是一个监护人的角色，这对学生的成长其实是很不好的。”

以校董会实现教授治校、学术自治，以内阁制和一人一票的直选培育学生的服务精神和领袖才能，UIC自由、民主的校园空气令人耳目一新。每年一度的UIC学生会内阁竞选，竞争激烈，乐行阁、心越阁、承启阁等组织互相“拆台”，争取话语权，有如美国大选。

竞选手段也百花齐放，如召开新闻发布会、拉贴横幅、发送传单、微博拉票、群发短信，他们讨论的问题中，既有“宿舍热水问题”、“校车问题”等学生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也有“路由器的团购”、“赞助三国杀”、“校园跑酷”等特定圈子关注的经费问题。

宁波诺丁汉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上海纽约大学、温州肯恩大学……近几年，“洋大学”在中国越发红火，他们大多由当地政府“招商引资”，借鉴国外办学模式和评价体系，嫁接高考吸纳人才，与国内高校一起走进“婚姻的殿堂”。舆论希望，“洋大学”能够引发“鲶鱼效应”，以现代大学制度的冲击波，激活中国内地的高等教育改革。

“通过体制的多样化，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竞争，来促进公立大学的改革，这是一个最容易做到的路径。你要靠公立大学关起门来自我改革，是非常难的。”杨东平希望，在国内像UIC这样的学校越多越好。“如果我们国家有三四十所洋大学，就会形成一个可以看得见的力量，大家的选择性和竞争性，就会大幅度地增加。”



下輯  
醒言



## 杨东平：好的教育不与学生为敌

### 教育的底线还在下移

**盗火者：**您认为教育的目的是什么？

**杨东平：**教育最重要的价值是促进人的自我发展与个性发展，从而达到社会普遍的进步。而很长时间以来，我们都把教育视为一种国家和社会的工具。

**盗火者：**教师的责任是什么？

**杨东平：**教师的责任在中国历史上被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地位，就是“天地君亲师”的排序，但如今的教师正在走下神坛，越来越被视为学生的合作者和指导者。从“以教为主”转变成“以学为主”，这是世界性的趋势，中国现在也在发生这种转变，就是真正好的老师是以学生为朋友的，帮助学生、激励学生。

**盗火者：**您心目中好的教育是什么样的？

**杨东平：**好的教育，以最低的标准来说，是一种善待学生的教育，是不以学生为敌的，是不用考试和作业压倒学生并使学生感到恐惧的，

这是最起码的。那么，最高的标准就是带着一种人文主义的价值和理想，促进人的自由发展，以自由为最高目标，是点燃、照亮、唤醒、开悟、得道的一个过程，而不是具体的考个公务员、考个律师证，那都是形而下的。用老话说，就是先学会做人；用梁启超的话说是培养“智、仁、勇”这三种基本品质。

**盗火者：**但是现在恐怕大多数家长，都会把好的教育资源当作好的教育。您怎么评价我们目前的教育水平？

**杨东平：**现在很多家长把好的教育等同于重点学校，削尖脑袋非要进所谓的好学校。这主要是由我们现在这种畸形的教育制度造成的。本来，义务教育是一个普世的、公益性的、非淘汰的教育，是为每个儿童提供教育机会，是一种基础性的教育，没有很强的竞争性。很多发达国家极力禁止在小学阶段进行任何竞争性的活动，但我们现在却制造了一种等级化的学校制度——包括超级学校、重点学校、普通学校、薄弱学校，形成了一种倒逼机制。在独生子女的背景下，家长不得不选择所谓好学校，而所谓好的学校，主要是以升学率高为标志的。

**盗火者：**现阶段教育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杨东平：**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还是对教育缺乏足够的重视。新中国在建国 37 年之后也就是 1986 年才颁布了《义务教育法》，在《义务教育法》颁布了 20 年之后，到 2006 年才实行免费的义务教育。1993 年制定的《教育改革纲要》提出，教育经费到 2000 年要达到 GDP 的 4%，实际上这个目标到 2012 年才实现。这就说明国家对教育的基本态度是非常后知后觉的，或者说落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我们现在的教育经费状况、教育发展状况，比柬埔寨、越南这些国家都要落后，现在边境地区很多小孩都跑到缅甸去上学了。

**盗火者：**占GDP的4%，对这个数字您怎么评价？

**杨东平：**这是1993年的时候，很多专家根据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提出的一个目标。现在这个平均水平应该远远高于4%。所以，4%并不是一个终极目标，只是90年代初的一个平均水平，我们居然到2012年才达到。达到了能不能保持住？能不能继续增长？我们绝对不能认为，达到了4%，教育问题就基本解决了。不是这样，欠账非常之多。所以这些年大家可以看到，在农村地区，直到现在儿童都吃不饱饭，冬天没有足够的衣服御寒，甚至要背着书桌上课。我们在农村义务教育的欠债还远远没有还清。教育领域经常有这样的说法，认为现在的农村教育、义务教育已经很好了，应该集中精力发展高等教育，培养世界一流人才。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盗火者：**就是说要做好教育的底线，它应该往下走。

**杨东平：**对，政府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做义务教育。而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赶超战略的引导下，学习苏联模式，教育的重心是放在高等教育上的，这个问题到今天还没有完全解决。中国在五六十年代的时候，教育管理部门——教育部和高教部，是合在一块的，后来发现不行，又拆了，拆了又合。到现在只有一个教育部了，但它实际的工作重心，到底是高等教育还是基础教育，是要划一个巨大的问号的。1986年，胡耀邦总书记在整党的时候，对教育部的整改意见做了一个很重要的批示，他说教育部要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部，而不是你那几所直属院校的教育部。这个问题今天比那个时候更严重了，它的重心就是放到高等教育上，高等教育又特别关注他直属的这几所高等院校，过去是32所，现在是72所。

## 被利益切割的童年

**盗火者：**“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句话，已经说了十年，这个起跑线现在有什么变化吗？

**杨东平：**现在起跑线越来越提前，原来高考被认为是人生的第一场竞争，现在已经提前到了中考、小升初、幼升小。在大城市，幼升小成为一个高度选拔的过程，这是非常危险的。过去，我们讲素质教育，主要还是面对中学生，现在我觉得当务之急首先是要抢救和解放小学生。小学阶段本来是最轻松愉快的阶段，应该保护孩子们的想象力和快乐。从小就生活在恐惧和压力之中的人，第一与幸福无缘，第二也不可能成为有创造力的人才。

**盗火者：**好像从 2012 开始，北京要缓解小升初竞争的激烈程度，您觉得能有用吗？

**杨东平：**他们采取的主要措施是禁止课外的奥数培训。现在看来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奥数现在不能够大张旗鼓地搞了，但是它开始改头换面进入到比较隐蔽的状态。以北京为例，奥数竞赛，只是一个表面，是果，不是因。它的因有两个，一是小升初政策本身，如果这个政策放开了，通过权力、金钱、选拔的途径来上学的话，就违反了义务教育法。第二个更重要的因是学校制度，有一部分学校是所谓重中之重，非常豪华，非常优秀，但还有大量的普通学校，家长不得不择校，砸锅卖铁也要进好学校。北京的这种不均衡，是人为制造的不均衡，是跟当前整个社会的贫富分化和各种权力的介入连在一起的。

**盗火者：**为什么义务教育阶段不准办重点学校？

**杨东平：**因为义务教育是国家用纳税人的钱办的，是一种保障型的

教育，就像政府要设立低保、社保、医保，都是一种保障措施。它的动机不在于选拔优秀，而在于保障每个人能够享受起码的基础教育。它必须符合三个基本价值：第一是免费，因为你要收费的话，很多穷人就上不起学了；第二是免试，不是说你聪明才能上学，每个人都必须上；第三是就近入学，避免因为学校太远，小孩上不了学。所以，义务教育是一个保障型的教育。

**盗火者：**当这种个别现象发展为普遍现象之后，教育部没有制定新的政策来制止吗？

**杨东平：**这涉及另外一个问题。这种变相的重点学校制度、恶性的超前选拔、恶性的校外培训，政府不知道发了多少文、开了多少会，仍屡禁不止、愈演愈烈。这背后有很强大的利益机制和非教育因素。第一，在这些教育机构中，有很多教育部门的身影，它自己的下属机构、人员，在办各种班。此外，像择校费这些事，都是在政府的默许下进行的，政府有一块分红。像前些年的做法，重点学校交的择校费先统一交到区教委的账号上，然后区教委返还给学校一部分，自己拿一部分。

**盗火者：**潜规则了。

**杨东平：**对，他本身有巨大的经济利益，你又让他去执法，那就是缘木求鱼了。还有，重点中学这种特殊学校的另一个功能，就是为一些权势部门和权势人物提供方便，他们的子女可以很方便地获得所谓的优质教育，写一个条就行，也不用交钱。因此，北京的小升初择校，出现了一种新的类型叫作“共建式”，就是国家权势部门、大型国企，跟中学合作。你招我多少个孩子，我给你多少好处，变成了这样一种利益交换，我们称之为“权学交易”或“以权择校”。现在北京小升初有三种：一种是以钱择校，就是交费生；一种是以权择校，就是条子生和共建生；

第三个是以优择校，就是必须通过奥数考试或其他竞赛。所以，很多考奥数的学生家长愤愤不平，认为奥数是无权者的权利，因为我没有权和钱，拼不了爹，只能拼孩子，你把我这条路堵了，但那两条路却没有堵。实际上，以权择校、以钱择校、以优择校，都要逐步消除，这三者都不符合《义务教育法》。

**盗火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这些年对小升初提了那么多的建议，你跟教育部沟通得怎样？

**杨东平：**应该说教育部主管基础教育、义务教育的部门跟我们观点是完全一致的，甚至可以说我们是在帮助主管部门来传递和推进这件事。基础教育司作为主要的管理者，是要贯彻《义务教育法》的，是主张教育均衡的。但是，义务教育的管理权限在地方，基础教育司不可能直接号令天下。你看北京市各个区的小升初政策各不相同，教育部只能倡导一下，它无力扭转基层的实际行为。从国外的情况来看，像这种涉及大多数人利益的社会变革，应该比较广泛的公众参与。如果广大家长能够站出来，抵制学校的行为，把学校告上法院，教育才有希望。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一个重要理念就是通过公众参与来促进教育变革。过去我们只有两条线，一个是政府倡导，一个是学者研究，我们缺的就是社会参与。

**盗火者：**可是我们在采访中有一种感觉，实际上这些家长和孩子也变成了利益链条中的一环。

**杨东平：**因为在中国学校教育的现实中，家长和学生处在完全缺乏选择、被学校控制的弱势一方，他们是没有能力来挑战和反抗学校的，这也是很多学校有恃无恐的主要原因。学校说我一分钱也没收，就没有一个家长敢说不是，其实家长都交了钱，他的小孩正在那儿做抵押呢。

如果我们对学校的可选择性增加了，家长和学生就会有不同的表现。当然，现在最有可能的选择就是出国。

## 教育应该多样化、个性化

**盗火者：**您曾经参观过华德福学校，对这种教育形式您怎么看？

**杨东平：**华德福教育是这些年来进入中国的众多新教育类型之一，它一开始主要是在幼儿教育阶段，现在开始向上生长。类似这样的教育思想，就是崇尚自然主义、尊重儿童、尊重生命。这在其他类型的教育中也有，包括像蒙台梭利教育以及现在很多人办的那种书院。它最基本的一条就是尊重学生、善待学生，让学生在游戏和快乐中学习，这无疑是对单一的学校教育的一个重要补充。但是，这种教育恰恰由于它无法跟应试教育接轨，而引起很多家长的置疑，觉得小孩以后走上社会怎么办？能不能参加高考？台湾有很多“森林小学”，就是以快乐和尊重人性为主。等这些孩子小学毕业，到初中可能没法适应，那就自己再办初中，初中毕业了再办高中，包括最著名的英国夏山学校也是这样。在僵硬的、体制化的教育之外，总有一些人在探索另外一条比较遵从个性、自然的教育模式，但是它跟功利的社会现实之间可能会有一定冲突。很多创办者是充满信心的，因为整个社会的出口越来越多样化了，至少这些孩子中很多可以直接到国外去上学。很多家长相信，只要孩子的教育和自我发展比较健全，是完全有可能跳过中国的高考到国外去学习的。还有很多人觉得自己也不见得非要上大学，可以去学中医或者当教师什么的。

与这种教育理念相伴随的，还有一种新的教育形式是在家上学。很

多人都担心在家上学以后怎么办，能参加高考吗？这个问题很多家长并不是特别担心，就是刚才讲的两个出口：去国外上学；多样化的社会求学，他以后当个电影导演、音乐制作人或画动漫行不行？毕竟现在社会多元化了，你有能力的话，在各个领域都有可能冒尖。

**盗火者：**我们走访了很多在家读书的家庭，他们现在共同面临的一个困境就是非法，我们采访的深圳那些私塾，每年都要被取缔一次。关于这个合法性的问题，您怎么看？它跟《义务教育法》抵触吗？

**杨东平：**西方国家在家上学的合法化是从70年代开始的，一直到90年代，经过了二三十年的时间。我们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推进在家上学的合法化。首先要有这个需求，然后再争取改善它的政策环境。

《义务教育法》只是规定了适龄儿童要到学校接受教育，但它还有一条：地方人民政府可以来认定学校的类型。也就是说，义务教育有两个概念，一是所有适龄儿童必须接受教育，二是到哪里接受教育。是不是只有到公办学校接受教育才是合法的，还是说在民办学校、在家也可以。对这个问题并没有那么明确的规定。当然，美国在家上学的合法化，并不意味着政府放弃对它的管理，他们通常都是把学生挂到周围的学校，然后每个学期期末参加学校测试，保障学业水平得到检验。只要你合格，就可以继续办；如果你不达标，那政府就要收回你这个家庭教育的权利。我觉得这在中国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盗火者：**如果是挂靠学校、统一考试的话，可能就违背了很多孩子和家长在家上学的初衷，他们本来就是为了逃开应试教育。

**杨东平：**他只是接受检验，就是你要达标，而不是要排名或者追求高分。你是在放羊还是在上课，主管部门总要有个评价。事实上，在

家上学的学生的成绩，以美国经验来看，是明显高于公办学校的。就是因为小班化，一个老师对两三个孩子，不用起早贪黑。当然，人们对在家上学最大的担忧是社会化不足。这个问题其实不难，因为在中国，孩子毕竟生活在一个人口众多的社区环境中。在美国，他们也通过各种NGO来创设很多虚拟的教育环境，组织集体活动，比如出游、开学典礼、毕业典礼，给孩子们营造丰富的群体生活。

## 高考状元在美国不值钱

**盗火者：**还回到教育公平的话题，您怎么看现在愈演愈烈的超级中学？

**杨东平：**这些年，各地出现了一批所谓的超级中学，这些学校的特点是体量巨大，通常都是一两万人的高中或者五六千人的初中甚至小学，具有一些特权，可以在较大的范围内来选拔优秀教师和优秀学生。它造成的一个后果，就是把一个地区的优秀学生 and 教师一网打尽，集中在一两所学校内，从而使其他学校丧失了和它公平竞争的可能性。这种做法，从整体上看，破坏了一个地方高中教育的生态。周围其他学校的好老师、好学生都留不住，逐渐垮掉了。那么，一所农村高中的垮掉，就意味着更多的农村学生失去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盗火者：**这些学校有没有享受政策上的特殊待遇？

**杨东平：**这些超级中学都有政府的超常投资，政府对它格外优惠。第一项是学校经费拨款，每个学校有多少学生给多少钱；第二项是专项经费，比如说，我允许你今年新修个教学楼或者扩建个广场，这种项目

大部分都落到了重点学校的头上，所以重点学校年年翻新，年年施工；第三项是择校费，大多数重点中学，平常一个年级就招 20 个班，三分之一是合法的择校生，还招大量的复读生。

**盗火者：**衡水中学有 10 个复读班。一个年级 3000 多人，每个班平均 100 个学生。

**杨东平：**一个班的学生超过 70 人就不可能是好的教育，因为没有一个是老师能够顾及那么多的学生。所以这种大班和这种巨型学校，可以说三分之二的学生都是陪绑的，因为学校的精力只能顾及最前面的 20%，这是应试教育的一个基本现实。为什么说应试教育是一个坏的教育，因为它根本就不关注每一个学生，他只关注一小批高分学生，是以高分学生为本而不是以每一个学生为本的教育。这一点，每个老师、校长都心知肚明。80% 的学生都是炮灰，你愿意交钱你就进来，进来以后自生自灭。

现在的重点大学也是应试教育导向，就是所谓抢高考状元。高考状元放到美国谁去抢啊？不值钱的。在美国考大学，面试一下，看看你会不会说话、会不会做人、懂不懂事、看过几本书、有没有参加过社会服务，要根据这些来判断你是否优秀，不是光靠考试机器。中国的优秀大学，还在恶抢高考状元，打得不可开交，这是重点大学的不自重。

## 教育资源的隐性不公

**盗火者：**高校扩招以后，农村大学生的比例显著提高，这是否意味着教育公平的状况得到了改善？

**杨东平：**农村学生的比例一直是大家关心的一个问题。据统计，在

整个高等教育系统中，农村学生的比例是显著增加了，但高等教育的公平问题，正在从原来显性的总量不公，转移为隐性的结构不公。农村学生主要分布在二本以下的院校、地方院校和高职高专院校，而在最优秀的研究型大学，如清华、北大这样的学校，农村学生的比例还在继续下降。教育部做过一次调查，整个“985”高校，农村学生的比例大概占30%左右。因为这里面还有工科院校，工科院校农村学生比例比较高，但是在清华、北大、人大、交大、复旦等排名前十的学校，农村学生比例明显下降，低于15%。

**盗火者：**我们问过一些清华、北大的毕业生，假如放到今天，农村学生还能不能考上，他们都认为考不上了。为什么会这样？

**杨东平：**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城市和农村文化资本的差距拉大了，城市的孩子三岁就开始学英语，五岁就开始学奥数。等到18岁同台竞争的时候，城市孩子的文化资本跟农村孩子已经不在一个起跑线上了。但是在80年代的时候，都差不多。每人都有一本语文、一本算数，你只要稍微聪明一点，把这两本书读通了，照样可以考出好成绩来，这是社会发展造成的城乡差距。我个人认为，现在的高考制度和高考政策需要更加公正地对待农村学生。比如说高考生源的地域分布问题，清华、北大在北京可能要招400或500人，辽宁可能招80人，河南招90人。这是什么道理？你不是国立大学吗？在河南、湖北这样的人口大省选拔出来的学生，真的就比北京的差吗？

**盗火者：**各省录取比例是什么时候固定下来的？依据是什么？

**杨东平：**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因为我们国家采取的是统一考试、分省定额的制度。每个省的录取线是不一样的，要根据考生的多少和招生名额的多少来定。所以出现了一种地域性的不公平，有些地方高考分

非常高，像过去山东、河北都是非常之高的。

**盗火者：**是因为它们的人口基数大吗？

**杨东平：**一个是考生的人口，一个是高校的资源。省属高校是由省级财政出资，就像美国的州立大学一样，主要是面向本地学生的，理论上不对全国承担责任。我们现在比较容易做到的，是央属高校生源的均衡分配，至少你不要人为地去加剧不公平。比如说清华和北大每年在北京固定的招生名额大概 300 人，可是它另外还采用自主招生的方式招人，所以它在北京招生的人数实际上特别多，这就是一种制度性的不公。高校自主招生的过程，一定会加剧对农村学生的排斥，因为要比才艺，农村学生肯定不占优势。

**盗火者：**教育资源不公，寒门子弟上升通道越来越窄，这种状况逐渐积累的话，会给社会发展带来什么？

**杨东平：**很多农村学生、少数民族学生，在进入高校以后逐渐被排斥，以至于在结业时没有什么竞争力。他们缺乏相应的社会关系，有些农村学生本身能力也不足。前些年福特基金会在西南地区的高校做过大规模的项目，就是针对农村学生的能力提升。后来发现很多学生连普通话都不熟练，不会说普通话，你的社会交往就有极大的障碍。要帮助贫困学生提高能力，不仅仅是助学金的问题，第一是普通话，第二是外语能力，第三是集成性能力。当然，社会上现在比较多的情况是，没有后台、没有背景就无法就业。

教育公平会对社会的和谐稳定产生重要影响，中国传统社会长期稳定的重要原因，是科举制度促进了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群有了一个向上流动的正常通道。如果现在的教育制度变成根据权力和地位来分配机会，那社会就会非常危险。

## 解决异地高考问题需要整体设计

**盗火者：**关于异地高考，您觉得家长的要求是合理的吗？

**杨东平：**这是公民的宪法权利，不需要再争论的。需要争论的是怎么做的问题。

**盗火者：**尤其是北京、上海、广州，当地人认为外地人抢占了本来就紧张的教育资源，他们就一点道理没有吗？

**杨东平：**我觉得没有多少道理。因为这个教育资源根本就不是属于户籍人口的，而是按照社会公平和宪法权利分配的。在大多数国家，受教育本来就是每个公民的权利。我在这个地方生活，在这里纳税住房，就自然享有公共服务的权利。所以，必须破除建立在狭隘的户籍制度上的既得利益观念。但是，这个破除也并非一步到位、全部放开，还是需要加以管理和控制的。像上海有积分制度，根据资源的承受能力，测定出能承受多少人，每年能增加多少人。很多人只知道异地高考意味着对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其实影响的主要是高中教育的机会。在北京和上海测算，如果一所中学有500到1000人的规模，就要建几百所高中，你的土地在哪里？我觉得，对这个问题还是要有一个通盘考虑。首先放开一部分中小城市的户籍管理，先把外围的渠道或者说毛细血管打通，这样，北京、上海、广州甚至很多省会城市的压力就可以缓解。如果保定、邯郸都可以就地入籍的话，那很多人就不一定非要到北京了。全国的城市化进程，要有整体设计，不然所有的问题都集中在几个特大城市就很难解决。

**盗火者：**政府会有一个根本的解决办法吗？

**杨东平：**现在马上要出台的，北京、上海也好，都是一种有序开放

的政策，设立一个比较高的门槛，先做起来再说。因为这个门槛无论你设置得多高多低，肯定是众口难调的。你设计十年很多人不高兴，你设计五年照样有很多人不高兴，但是完全不设防是不可能的。所以，面对这个问题要有一个理性的、建设性的态度。

## 乡村教育的困境

**盗火者：**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在城市化的侵袭下，基层乡村的文化和教育，跟 80 年代比发生了哪些变化？逃离乡村的想法，应该受到指责吗？

**杨东平：**最近十年，农村教育发生了一个极其深刻的变化。2000 年前后，我们基本普及了农村的义务教育，但也是从那个时候起，我们开始了另外一场对农村教育的改造，就是撤点并校，大规模撤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小学、初中教学点。撤并的比例之大，它的后果我们今天已经可以看到。2011 年在甘肃庆阳发生的校车悲剧，让 18 个儿童殒命，背后的原因就是撤点并校造成了农村学生上学远、上学难、上学贵，甚至辍学等一系列问题。撤点并校之后，出现了大量没有学校的乡村，农村文明的生长点消失了。譬如说在内蒙古牧区，所有的学校都集中到旗里，结果迫使牧民必须进城租房陪读，很多旗都有个牧民村，就是牧民陪读的家庭租的房，而这些小孩从小就到县里来上学，不会说蒙语了，回不到草原了。

农民进城分两种情况。一是一部分比较富裕的农民，进城务工或买房，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跟城市化进程相联系。另外一个是由行政化

的力量推动的“被城市化”过程。把你的学校全部拆了，看你进不进城。很多地方这个概念是非常明确的，就是把撤并学校作为撤县建市、拉高城市化率的一种工具。

这种被动的城市化极大地加剧了农民的生活负担，造成了县城的巨大班额。我们去年在河南调查，初中最大班额 126 人，后来调查到邓州市邓县重点小学，平均班额 133 人。这么多农村学生进城，家庭花了很高的经济代价，以为进了重点学校，可以享受好的教育，实际上接受的是恶劣的教育，因为老师顾不上那么多学生。

**盗火者：**确实是这样，我们在贵州采访，他们明知进城后的教学条件也不过如此，但是留在那个村小的话，村小开不了英语课，只有四个正式教师的编制。

**杨东平：**平常你们抽查的学校，他们学生有多少人？

**盗火者：**学生在急剧减少，原来 200 多人，现在只有 70 个人了。

**杨东平：**其实，70 个人，4 个老师，都已经算是比较大规模的学校了。我们知道，全世界各个国家都有这种小规模学校，有的在沙漠，有的在山区或牧区。包括瑞士这么发达的国家，山里也有一个学生和一个老师的学校。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每个国家都有像边境、岛屿这样的地方，不能够简单地撤并学校。当然，这个教育成本会更高。因此，如何改善和提升小规模学校的教育质量是我们关心的问题。如果它的教育质量非常低下的话，把它保留下来确实意义不大。但是，我在一个论坛上听台湾学者说，在台南市，差不多一半以上的学校，都是少于 30 人的，你不能把它撤了，只能去不断地加强它、改善它。

**盗火者：**关于贫困地区教师的问题您怎么看？

**杨东平：**这要看政府对教育的基本态度，是不是真的重视，是不是

真的愿意为它花钱，愿意把投资铁路、化工厂的钱拿出一部分来改善教育。农村的学校，尤其是村小和教学点，质量低下，难以吸引学生。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没有好的老师，这完全是一个政府责任的问题。通常我们会说，教师是最光辉的职业，那么，最光辉的职业也要有最光辉的报酬。只有教者从优，才能够做到优者从教。如果教师不是一个像公务员一样有竞争力的职业，那他就不会吸引最优秀的人。改善农村教师待遇，必须以政府为主，增加投入，没有别的办法，世界各国都是这样，越偏僻越边远的地方，教师待遇应该越高。

**盗火者：**我们去过贵州六盘水，那里编制内的教师待遇已经相当高了，四五千块一个月，可代课教师的工资只有六七百块，差距非常大。他们只有4个正式编制，剩下11个人全是代课教师，他们以各种各样的身份留在学校，炊事员、勤杂人员、临时工等。

**杨东平：**我们对代课教师的问题做过特别关注。当时教育部出台了一个政策，要清退代课教师，但实际上在很多贫困地区，代课教师是清退不了的，他已经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几十年，而且只有他们，才能在农村待得住。新教师、城市教师是待不住的。跟善待学生一样，你对在艰苦地区长期从事义务教育的这些老师，没有一个起码的尊重，完全是违法的，违反《劳动合同法》，违反《教师法》，没有做到同工同酬，而且你亏欠了他们几十年，现在还不应该解决吗？

## 农村更需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盗火者：**现阶段的义务教育普及到初中是合理的吗？

**杨东平：**从统计数字来看，我们现在基本上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但是从实际成效来看，在农村地区，初中阶段的辍学率是相当高的，全国达到了40%左右。从这个角度看，义务教育普及的成效要画一个很大的问号，仅仅是待在学校里还不能叫普及。我们现在提出了一个概念，就是要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什么是义务教育的质量，这又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如果你把升学率作为唯一的标准，那绝大多数的农村学校是无法和城市学校来比的。所以我们在谈农村教育的时候，要回答什么是适合农村的教育，而不应该把它作为城市应试教育的尾巴，在这条狭窄的道路上去模仿城市学校，跟城市学校竞争，是永远没有出路的。

**盗火者：**有人说农村辍学率高是因为新的读书无用论又在农村回潮了，您同意这个说法吗？

**杨东平：**我不同意，因为这个说法把责任转移给了学生和家。事实上，主要是无用的教育导致了读书无用论的存在。为什么初二到初三是一个辍学高峰？因为那个地区高中的普及率可能比较低。譬如说，一个地区只有三分之一的初中生能够升入高中，某些学生到初二的时候知道升高中无望，而基本的读写技能已经具备，对打工来说已经足够，就会觉得没必要再上初三了。总之，我们现在的农村教育与初中教育，都是单一的升学教育模式，只对继续升学的人有用，而对于想要打工的人，对于想要继续在农村生活的人，是没有帮助的，他学不学无所谓，对生活没有什么影响。

**盗火者：**农村的基础教育，该怎么调整？

**杨东平：**农村学校至少要满足三种不同的需要：第一是升学的需要，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学生；第二是城市化的需要，因为大多数学生是要进

城打工的；第三是所谓建设新农村的需要，因为有一部分学生会成为农村社区的生活者和建设者。所以，农村的普通初中，不应该是单一的升学教育。

80年代，很多地方做过这种改革，比方说增加职业教育的成分，在最后一个学期，对农村学生提供一些职业技能的教育。还有一条也很重要，就是公民教育。为进入社会提供必要的准备，包括法律的、城市生活的一些准则，自我学习的能力，文明的言行举止，这些东西都是一个青年在社会上安身立命的通行证。而在应试教育的模式下，这些东西是没有地位的。对很多农村学生来说，初中就是他的最高学历了，那么，怎么在初中的教育中，加入这些东西，帮助学生进入社会，这甚至比狭隘的技术教育更重要。

**盗火者：**有人在做这样的事吗？

**杨东平：**吉林的抚松县，他们在中学阶段就实行这种所谓的素质教育了。他们有两个概念，一个是生活教育的概念，一个是公民教育的概念。他们提出的口号是“为18岁做准备”，就是要让一个农村孩子在18岁离开学校的时候成为一个文明、自信、礼貌、热爱学习的人，这样他就可以在社会上通行。

## “钱学森之问”的答案

**盗火者：**90年代末跨越式的高校合并和扩招，是理性的吗？

**杨东平：**高校扩招与合并，是90年代末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的主要路径。由于80年代末发生的特殊事件，我们采取了一个人为扼制高

等教育发展的政策，甚至中断了研究生招生，造成了高等教育发展与社会需求巨大的差距。当时中国高等教育招生的规模及发展速度，远远低于越南、泰国这些国家的平均水平。所以，高等教育需要一个快速的发展，当时的规划是到2010年达到15%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下限，但我们实际上到2002年就超过15%了。我们的年增长率，不是10%、15%，而是30%、40%。这样的速度显然是很不理性的。

这一轮高等教育的跨越式发展，是跟其他市场因素相结合的。在国家基本没有增加教育投入的情况下，高等教育规模翻了几番，就是靠银行贷款，靠增加学费。它造成了很多其他问题，造成了一个庞大的贫困生阶层，致使大学教育质量低下。这些后果现在都可以看到了。

**盗火者：**今天中国大学的种种弊病中，您觉得最突出的是什么？

**杨东平：**按照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理论，它的量变会引起质变，也就是高等教育内在的管理、办学模式等相应的变化。可惜我们中国特色的量变并没有引起质变，甚至固有的弊端更加强硬和放大了。譬如高校的行政化问题，并没有随着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大而改善，没有给学校更大的自主性。计划、学术和高校办学的等级化，副部级大学的出现等，都加剧了大学的行政化、官场化趋势。

**盗火者：**若您来回答“钱学森之问”，您的答案是什么？

**杨东平：**“钱学森之问”表面上问的是一个人才培养模式的问题，其实中国之所以不能培养出具有竞争力的创造型人才，背后有管理体制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推进“去行政化”的改革，让教育家办学，这样才能真正实现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和多样化。

“去行政化”改革，让大学自己来做是有难度的，但也不是不可能。80年代的教育改革，就是以简政放权、实行校长负责制为核心来进行的，

现在还没能达到 80 年代的高度。想靠改变教学过程、增加实践环节来培养创新型人才，实际上回避了一个制度性的前提。

**盗火者：**有人认为中外合办大学，会产生鲶鱼效应，倒逼高校体制改革，但是熊丙奇认为不会有那么大的作用，还是要允许外国大学直接来中国办分校。

**杨东平：**这两个概念是可以并存的。采用多样性办学模式的大学，只有三四所是不够的，如果我们国家有三四十所洋大学，就会形成一种可以看得见的力量，就不仅仅是条鲶鱼了，大家的选择性和竞争性就会大幅度增加，现在主要是开放不足。当然，如果进一步加大开放力度，允许国外大学直接办分校，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为什么大陆和香港地区大学的合作，具有更大的价值，因为它实际上是按分校模式建立的，而不是发双重学历。我们国家只有一个《中外合作办学条例》，跟香港地区的大学合作，叫参照《中外合作办学条例》，这就意味着有更大的自由度。

**盗火者：**南科大的性质到底是什么？

**杨东平：**是公办的、省属高等学校，由广东省财政尤其是深圳市财政出钱。本来公办学校按照《高等教育法》应该享受充分自主权，但我们现在连民办学校都没有自主权。朱清时所做的努力，就是争取充分的自主权。当时他们要求自主招生和自授学位，现在看来国家没有让步，非要把它纳入国家统一的制度当中。你必须参加高考，必须取得国家承认的学籍，才能颁发学位。但是，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学位都是由高校自主颁发的，每个高校的学历含金量是不一样的。

我的基本态度是，不要对每一个局部的改革过于苛求，希望它一步到位，完成所有的使命，这个不现实。总的来说，我们的改革者、探

索者还是太少了。我现在特别主张自下而上的改革，它就发生在无数个学校、教师、课堂、个人身上，这种微改变和自主变革，被称为“静悄悄的革命”。促进一个教育范式的转变，需要教师、家长、校长、管理者，以及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这样，教育的整体转型才有社会基础和文化基础。

## 公民能力的养成关键在学校

**盗火者：**您参与了推动中小学开设公民课的全过程，这件事最初是由哪些人发起的？为什么教育部几次要上，但最终没有上？

**杨东平：**90年代以来的课改过程中，教育部有人提出传统德育的转型。大概1995、1996年的时候，上海的高中品德课就改成了宪法课，后来被上面叫停了。但在国家层面，对公民教育的重视，最早是2002年中宣部出台了《公民道德建设纲要》，把公民道德建设提到了国家的层面。后来，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公民意识教育”。所以，现在的公民道德教育、公民意识教育都是合法的，被正名了。但是“公民教育”这四个字，还没有完全被正名。那么，我们要通过民间的努力，逐渐来放大和传播这个概念。但是，公民教育在教育研究领域是开放的。十年前，教育部跟美国的公民教育中心合作，在山西、浙江、云南的几百所中小学开展了公民教育。所以说，教育部内部是有一个公民教育试点的，而且范围很大。最近这几年地方自主的公民教育探索也越来越活跃，比如河南的平顶山地区和四川成都温江区，都把公民教育作为地方教育改革的亮点，在主动推进。可以说，公民教育的这种改革和探索，从体制

内到体制外都在进行，而且规模和范围越来越大，这是大势所趋。

**盗火者：**您提到了一个渐进的梯次，最早是公民道德教育，后来是公民意识教育，再到真正的公民教育，这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杨东平：**这涉及对公民教育内涵的理解，通常我们把它分为几个部分：一个是公民的道德，包括一些基本的行为准则；一个是公民文化；更大的一块是公民的参与，就是公民能力的养成。我们过去的教育中，最缺乏的是第三块。怎么做一个好公民，碰到问题怎么解决，就是公民参与的能力。过去传统的德育有一个缺陷，只强调义务，比较忽视权利。就是强调公民应该怎么做，比如必须遵纪守法，而不是强调政府应该怎么做依法行政，或者政府在违法的情况下公民应该怎么行动。

刚才讲的那三个试点学校，他们主要的活动都是在校外，组织学生走出学校，关注本社区或者学校周围的一些问题，比如红绿灯的设置、环境保护等。向地方政府提建议，向社区提建议，然后争取改善。但是，我发现他们有个很严重的欠缺，就是这种公民参与的行为都没有引入校内。譬如学校发生了问题，学生怎么向校长反映，怎么改变一些不合理的现实。实际上，对中小学生的公民教育而言，构建一个民主的学校和一种民主的师生关系是最重要的，或者说是第一步的。

**盗火者：**您的建议是整合中小学的思想品德课，然后加上公民教育的内容？

**杨东平：**对，新改版的小学生品德与社会课，实际上已经渗透了很多公民教育的内容，只不过还没有这么叫。我们当时编《新公民读本》的时候，提出来要把中国传统文化的资源、社会主义教育的资源和西方普世价值的资源这三种东西整合到一块，使它具有操作性和现实性。

## 孙云晓：这是一个让儿童特别恐慌的时代

### 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盗火者：**一个小孩从幼儿园进入小学，环境的改变会让他的心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孙云晓：**全世界有一个共同的发现，孩子在六岁的时候，到了一个非常适合接受系统的学科知识的阶段。所以，各个国家的孩子基本上都是在六岁左右开始上小学。这个时候的孩子，对很多知识都充满了好奇，渴望一种新的生活。他希望学到更多的知识，掌握更多的本领，学校教育可以满足他这种需要。

英国花了几十年研究这个问题，结论是，六岁上小学一年级是最为适合的。我个人认为，让男孩子早于六岁上学，很可能是一个灾难性的选择。美国的研究发现，一个五岁的男孩子，大脑语言水平，只相当于三岁半的女孩。为什么小学阶段男女生的差异非常明显？就是因为男生发育落后。我觉得无论男生女生，都从六岁开始比较合适。有些地方，像美国和澳大利亚，都在倡导，给男孩最好的礼物就是晚一

点上学。

**盗火者：**家长给孩子报很多补习班、兴趣班，您觉得在学校之外的这些东西，能开发他们的智力吗？

**孙云晓：**这个不能一概而论。儿童上小学之后，兴趣变得广泛，有些特长要发展，进行一些训练是可以的，也是需要的。但现在的问题是过于强调课外班的作用，很多孩子负担沉重。

**盗火者：**孩子上学的时候除了教科书还会有一些课外阅读，像童话之类，这些东西对他们的智力开发有什么作用？

**孙云晓：**我觉得阅读对儿童的发展意义巨大，但不能用智力开发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太狭窄了。实际上，阅读对孩子来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使他对这个世界有一种真善美的体验，他的想象力能插上翅膀飞翔起来。它的意义绝对不仅仅是智力方面的，也是情感、想象力、创造力方面的，甚至还可以减轻他的孤独感。孩子经常有无聊的时候，阅读有陪伴的作用，这个意义非常大。

**盗火者：**现在有的小学三年级的孩子就开始读《红楼梦》，您怎么看？

**孙云晓：**在阅读引导中，有一个科学性的问题，即适合的才是最好的。不同年龄的孩子，要读不同的书。比如，学龄前的儿童就适合读绘本；上了小学，他可以继续读绘本，同时开始增加一些童话的阅读。小学时代是童话的时代，故事、儿歌都是这个阶段，但绝对不适合读《红楼梦》，不适合读言情、武侠小说。

## 别梦想成为芭比娃娃

**盗火者：**现在的孩子能接触到许多不太好的东西，甚至社会阴暗的部分，是不是需要限制他们对电脑、网络、手机的接触？

**孙云晓：**英国一位著名心理学家指出，九岁之前的孩子不宜使用电脑，他这个提议我是赞同的。为什么呢？九岁之前的孩子，需要更多地接触自然，和伙伴面对面的接触，对他的身体健康和精神成长都是有好处的。什么叫面对面的接触呢？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绝不是只靠语言来交流，他还要观察对方的表情，甚至和对方碰撞，他的视觉、触觉、嗅觉，整个感官是打开的，通过这些，他才能全面发展自己。如果整天看电视、玩手机，不爱动，虚拟的体验过多，不利于孩子的成长和发育。

**盗火者：**家长是不是该适当为孩子屏蔽掉那些不好的信息？

**孙云晓：**父母是孩子的监护人，职责之一就是屏蔽掉有害信息。为什么电影在欧美国家都是分级的？因为有两类信息不能让儿童过早接触，一类是暴力，一类是色情。儿童会模仿，在没有恰当的性教育的前提下很容易模仿，甚至导致犯罪。

儿童的观察力和模仿力是非常强的，但他的辨别力比较低。为什么有的小孩看了电视之后，走到阳台上，伸开手就跳下去了，因为他认为自己能飞起来。儿童的认知世界一个很显著的特点就是模仿。一些成人世界不好的行为儿童最容易模仿，那么，影视、网络有更直接、鲜活、刺激的信息，他就更容易模仿了。

**盗火者：**您觉得是芭比娃娃、变形金刚这类玩具好，还是像石头、木头这些比较朴素的玩具好？

**孙云晓：**我认为，时代的发展和科技水平的提升，一定会在玩具上

体现出来。但儿童的玩具，一定不能是单一的。一些简单的玩具，比如搭积木，可以让孩子自己动手拆装、拼接、改造，这是最好的。但是，有些玩具对孩子的成长是不利的，比如芭比娃娃就不是好玩具。我写过《拯救男孩，拯救女孩》这本书，里面谈到女孩子进入青春期以后，她的自信心会下降，会特别在意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希望得到别人的好感，希望自己与众不同。芭比娃娃给她提供了女性的标准形象，你看芭比娃娃什么特点呢？特别性感，腿特别长，乳房特别突出。实际上，人腿不可能这么长的，于是，女孩子就会产生自卑感。她希望这样，而自己根本不可能达到。这样的玩具实际上对女孩是一种误导。

## 走出恐慌的童年

**盗火者：**您在《孩子别慌》一书里，提到了童年恐慌，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恐慌？

**孙云晓：**我认为，今天这个时代，是一个特别容易让儿童感到恐慌的时代。学业压力巨大，竞争激烈，孩子惶恐不可终日。我举一个极端的例子。银川市，曾经有一个13岁的小学女生，在毕业典礼当天上吊自杀，给父母留了遗书：我是差生，我没考好，我死了，可以给你们省10万块钱。父母非常痛苦，他们说从来没跟孩子说过考不好就要择校，就要花10万块钱的事。只是跟邻居提起过，孩子考不出好成绩，上不了重点中学，要花10万块钱。那对父母说我们家是做买卖的，花得起这个钱。可在孩子心中，10万块钱是很惊人的数字，她就崩溃了。儿童面临巨大的压力时，因不能理解、不能承受而产生的一种较强烈、较持久的焦虑

心态，就叫童年恐慌。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连续十几年对全国中小学生学习跟踪调查，发现 1999 年的时候，中国有近半数中小学生学习超时、睡眠不足。2010 年第三次调查的时候，发现近八成中小学生学习超时、睡眠不足。在孩子童年恐慌的背后，正是父母的恐慌、教师的恐慌。而父母、教师的恐慌、焦虑，又反过来造成孩子的恐慌。83.6% 的中学生父母，要求孩子考进前 15 名。54.7% 的中小学生家长，希望孩子将来读到博士学位。而这些高期望，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实现。这样的期望和压力到了孩子身上必然变成恐慌。

**盗火者：**这种恐慌要从什么地方打破呢？

**孙云晓：**任何一个家庭、一所学校都有能力打破。孩子年龄越小，微环境越重要。孩子感受不到很远的东西，他就是面对他的父母、老师和同学。当孩子没考好的时候，你跟他说没关系，这只是暂时的，只要你继续努力，掌握了正确的方法，肯定能考好，这样，孩子就不会恐慌了。但许多家长经常会说“我白养你了、你算没希望了”这种话，这就叫消极解释，它否定孩子的能力和个性，会导致孩子悲观、无助。只要父母改变态度，每一个孩子都是有希望的，不是非得等着国家的教育体制改了才有办法。同样的教育背景下，为什么很多孩子成长得很好呢？就是因为有不同的微环境。

忘不掉的才是教育

**盗火者：**您觉得教育改革的重点应该放在哪里？

**孙云晓：**我认为最核心的是评价标准的改革，就是怎么判断好学生和差学生。我们不能以分数取人。现在是尽管你道德败坏、自私自利、心胸狭窄，但只要能考分高，照样可以上名校。欧美国家的教育，评价标准比我们合理，高校录取的时候，非常重视社会实践，要看你做过哪些社会服务工作，看你在实践中展示了什么能力。

**盗火者：**我们之前采访过一个小女孩，她从小就喜欢读书，在学校上课的时候发现自己的观点总跟老师不一样，老师不认可她的答案，还跟家长说你的孩子有阅读障碍。您怎么看？

**孙云晓：**我觉得教育一定要有包容精神。作为教师，一方面要教给孩子一些基本的逻辑和常识。但孩子会有不同风格，教师应该有包容精神，即使对那些剑走偏锋的孩子也要包容，包容之后才会有更好的选择。

**盗火者：**现在有一部分家长放弃了学校教育，让孩子在家上学，或者入读类似于私塾的民间学校，您觉得这种现象好不好？

**孙云晓：**我认为这种方式一般的父母承担不了，如果父母是很有学问、很有能力的，可以考虑。第二，无论是哪一种教育，父母都需要注意，孩子是需要与同伴相处的。孩子在学校学到的不仅仅是知识，很重要的是同伴群体的适应。即使在家学习，也不能把孩子封闭起来。

**盗火者：**您说过，无批评的教育是伪教育，您能具体讲一讲吗？

**孙云晓：**现在的中国社会是开放的社会，大家都在追求新的教育，很多人认为激励教育、表扬教育才是最好的，我认为这是一种误解。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一定会犯很多的错，有些甚至是不能原谅的错。这个时候，批评就是必要的，甚至惩戒也是必要的。我说的惩戒不是打骂，而是一种教育的手段——教育惩戒。我非常赞成韩国一位教授的观点，他认为孩子在两岁到四岁的时候，父母就要敢于对孩子说不，因为两岁

到四岁的孩子，处于建立规则的最佳时期。孩子的骂人、打人、抢东西等很多不好的行为出来，父母要坚决制止。比如说睡觉前吃东西是不可以的，这个时候父母要坚决说不。因为这个时候说不，孩子最容易接受，他虽哭闹，但他绝对相信大人，孩子慢慢就养成好习惯了。当然，从比重来说，我认为表扬应该占到 90%，批评 10%。

**盗火者：**现在，从小学开始，对思想品德课的争论一直很大，您怎么看？

**孙云晓：**有人叫公民课，有人叫思想品德课，有人叫政治课，各种各样，但最本质的问题不在这里。不管叫什么课，从世界各国来讲一定都重视德育。任何国家，无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一定要讲做人，讲道德。

现在的德育，成了一壶烧不开的水，因为方法有问题。你会发现，中国把思想品德课的位置放得很高，德育为首，但完全被道德败坏的社会现实架空了。而全世界任何德育的逻辑，一定是“知情意行”，即：提高认知，培养感情，形成意志，转为行动。

我认为，从认知到行为，只是德育的前 50 度；而如何把偶尔的行为，变成持久的行为，才是德育的后 50 度，这个后 50 度，我们太忽视了。所以我们学雷锋，年年就学一阵，养不成习惯。而没有道德习惯，就不能实现德育的目标。美国的研究发现：一种行为和动作持续 21 天，会初步成为一个习惯，如果这个动作能够持续 90 天，就能成为稳定的习惯。任何人一定是养成了习惯；才能达到自我成长的目标。爱因斯坦说，什么是教育？说句俏皮的话，只有把你受过的教育都忘记了，剩下的才是教育。换句话说，忘不掉的才是教育，而习惯就是忘不掉的。

## 义务教育的两道伤疤

**盗火者：**留守儿童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父母不在身边，对这些孩子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孙云晓：**中国有五千多万留守儿童，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群体。科学研究发现，儿童在12岁之前，特别需要跟父母建立起一种亲密的、依恋的情感，如果建立不好，就会缺乏安全感和幸福感。研究发现，把孩子带在身边的，好过分离的；到处跑的，不如稳定在某个地方的。一切对于留守儿童的救助，都要以促进亲子交流为核心。亲情是替代不了的。父母几年不见孩子，伤害的不仅仅是儿童，父母本身也变了，变得没有亲情，没有责任感。

**盗火者：**那些农民工随迁子女，有的是在原来的乡村接受的教育，后又转到城市，有的可能很小就跟父母来到城市，城乡的教育差异会对这些孩子产生怎样的影响？

**孙云晓：**现在国家正在解决异地高考问题。我曾经给这些农民工讲课，我说你们都是优秀父母，你们能把孩子带在身边就是优秀父母，很了不起。作为城市的原住民，要学会接纳他们、尊重他们。如果这些农民工子女被忽视，将来像巴黎骚乱、伦敦骚乱这样的事件就会在中国出现。所以，解决异地高考问题是一个深层的问题。

一个教育系统的官员跟我说，北京也好，上海也好，某个城市一下来了几十万流动儿童，如果当地政府按照与本地学生同样的费用往里贴钱，一下涌入几十万，那得花很多钱，建很多学校。当然你也可以说他们的父母已经给这个城市做了贡献，理应享受同等的教育资源。但实际上最合理的办法，就是国家给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每人发一张教育券，

你走到哪个城市都可以用这个券儿，这是国家给你的福利。这个学期我在这儿上学，国家就返还多少钱给当地政府，这样就可以减轻当地的税收负担。具体政策还是很多的。

## 正视职业教育的力量

**盗火者：**对于快要上学的孩子，他们的父母会面临很多选择，选择多了就会眼花缭乱，您有什么建议？

**孙云晓：**一句话，适合的就是最好的。现在大家拼命往名牌学校挤，但不是所有的孩子都适合上名牌中学，因为名牌中学往往竞争更激烈，学习负担更重。所以我的孩子在小学、中学都没有上过重点，是他自己不愿意到重点中学去受罪。此外，对那些擅长动手的孩子，可能更适合选择职业学校、专业技术学校。现在中国出现的问题是，职高很不景气，这是很不正常的，国家需要对职业技术教育有更多的投入。有一年我听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讲课，他说深圳有一年经测算需要 20 万职业技术工人，在深圳打工的农民工，超过 20 万，但很多人企业用不上，因为他们没受过职业教育。实际上，中国的发展，一定需要大量的专业技术工人，而且一定要让这些专业技术工人有体面的收入，否则中国的产品质量永远上不去。你看美国、德国、日本，它的专业技术人才非常多。

## 教育改革无处逃避

**盗火者：**我自己上学的时候老师说什么就是什么，现在老师的地位也不是那么权威了。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孙云晓：**现在是老师难当，学生难教。社会越来越多元化，带来人的观念、行为方式的多元化。当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之后，对教育的要求会越来越高，你教师对我有一点伤害我就告你。现在的孩子普遍追求物质享受，性观念很开放，老师的挑战变得非常大。

**盗火者：**您觉得中国教育改革有希望吗？

**孙云晓：**教育改革是必然的，你无处逃避。因为改革不是孤立的事，我们和世界是联为一体的。西方国家评价学生的标准，我们为什么不能借鉴？例如，美国的名校录取学生非常重视社会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高考成绩只占一部分。再比如，芬兰的教育测试指标经常排名世界第一，但是人家的学生，上课时间很少，作业很少。这些经验都是可以学习的。很多难题是逐渐破解的，我对此充满信心。

## 钱理群：所有教育问题的答案都在教育之外

### 大学教授在中学

**盗火者：**什么样的动机让您参与推动中学教育的改革？

**钱理群：**前些年，教育部要搞新课标，请我参加一个座谈会。我的观点他们比较感兴趣，后来就邀请我做新课标的顾问。开始我是拒绝的，因为我是大学教授，中学教育我不是很懂。当时教育司有人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他说现在的中学教育改革，在内部已经推行不下去了，需要外在的力量来推动一下。我想这也有一定的道理，就同意了。但我的出现冒犯了语文教育系统内部的利益集团，后来就把我请出去了。

**盗火者：**他们是以什么理由请您出去的？

**钱理群：**我触犯了一些语文教育界的权威，还涉及一些经济利益的问题。因为重新编教材可能会打破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垄断，所以人教社要赶我走。

当时也是偶然的机，有一批年轻人，编了一本书，叫《舍弃中学语文教育》。那本书其实跟我没什么关系，只有摩罗跟我的一个对话，

他们也没经过我的同意就编入这本书作为代序。然后就抓住这篇代序做文章，针对书里一些年轻人提的比较激烈的意见，说钱理群等人怎么怎么说。首先是告状，最开始教育部还能顶得住，没有理睬他们。后来他们就不断制造舆论，各方施压。后来教育部基础教育司下面的一个处长就打电话给我，请我退出。我的回答是，我个人无所谓，但我希望中国的语文教育改革要继续下去。

我采取的方式是自己直接去上课，你们不是说我这套不行吗，我就讲讲看，到底行不行。退休之后，首先到我的母校南师附中去讲，然后就是北大附中和北师大实验中学。每个学校讲一个学期，每星期讲一次，都是正式课程，学生要考试的。

五四以后的一个传统，是大学教师到中学上课，中学教师也到大学上课，鲁迅、胡适、朱自清都是如此，这个传统现在中断了，所以我想做一个尝试。另外，我直接去上课，学校会配备一些教师做我助手，我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带一支队伍出来。

开始人很多，因为有老师对学生说：你们都向往北大，某个人是北大的著名教授，你现在即使考上北大也见不到他了，因为他退休了，现在到咱们中学来，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其实当时我还有一个想法，我觉得培养人才，需要提前，高一、高二是人的一生中非常灿烂的时期，如果能接触到比较高水平的教育的话，学生就被激发起来了，那是培养创新精神的最好时机。后来去上课，学生越来越少，真正坚持下来的，大概有二三十人，这些学生的水平超乎我的想象。

## 真没想到一线教师能有如此水平

**盗火者：**现在中学生的时间已经被彻底剥夺了，思维模式也已经定型。

**钱理群：**确实。我出过一本书叫《钱理群中学讲鲁迅》，书中我附录了很多学生的作业，从那个作业就可以看出来，学生水平非常高，潜力非常大。关键在你的引导，如果引导得当，他们不仅能够接受鲁迅，而且能够接受更深的东西，他们的理解能力绝不亚于现在的很多大学生，甚至研究生。从这个角度说，我觉得应该是成功的。

但让我失望的是，我没有发现特别出色、特别有发展前景的学生。有一些学生非常主动地和我接触，有很强烈的交流愿望，但这些孩子读书太少，根底太差，这是他们在跟我做更深入的对话时体现出来的。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整体教育的平庸化，特别是人文学科的尖子很难出现。

**盗火者：**您对一线教师有何评价？

**钱理群：**我看到了一批很出色的教师，但同时也理解他们的处境非常之难，需要有人为他们呼吁，然后同道者才能跟上来。因为当他感到孤独时，他会自己找上门来的，包括梁卫星、马玉顺，他们都是先寄文章给我看，其中有些确实非常出色，我真的没想到中学教师有这种水平。我就通过写序、写书评的方式和他们互动，很多人是没见过面的。

马小平有一点特殊，我首先认识的是他的学生王翔。他在中学就出了一些散文集、诗集，我看了以后很兴奋，写得太好了。我非常喜欢这个孩子，通了很长时间的信。后来我注意到他的老师马小平给他的书写的序，开始对马小平感兴趣，然后看到了马老师的第一本著作，我大吃一惊，真没想到还有这样的老师。后来又看了马小平跟学生黄素珍的通

信，给了我很大震动。一个很普通的农村女孩，居然想问题想得那么深，我觉得这是一个教育的奇迹。实际上，每一次跟一线老师接触，都给我带来巨大的惊喜。我始终认为，我们对一线教师的智慧和思想力量估计不足。

## 教育已成谋利工具

**盗火者：**这十多年，用您的话说叫“深度地缠绕”，有没有让您觉得失望或绝望？

**钱理群：**我刚才说我得罪了所谓权威，其实还得罪了一些人。前两年在福建电视台一个节目现场，有一个普通老师问我，你是大学教师，中学是我们的地盘，你不懂中学教育，有什么资格大放厥词。当时我非常震撼，还有这么问的！所以说阻力不仅来自官方，也来自教师自身。实际上，教育圈已经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群体，不仅指官员、领导，也包括一些教师。我跟梁卫星说，有些教师简直是在那儿混日子，他说混日子还算是好的，大部分其实只想从这里谋取一些利益，分一杯羹。我介入教育这十多年，既是中国语文教育改革的十年，又是大溃败的十年，关键问题就是教育的产业化。2001年提出教育产业化是中国教育的一个转折点，从此，教育的公益性质失去了，变成一个可以谋利益的部门，大家争相来吃教育这块肉。

为什么这些年出现学生素质下降的问题，我觉得根本原因是因为教育变成了一个牟利的东西。这十年的教育改革，说得难听点，都是由既得利益者来推动的，而且通过改革进一步扩大了它的集团利益，形成了

一个非常稳固的利益链条。一部分当然跟政府的行政部门有关系，那是主体，另一部分就是教师。

**盗火者：**政府教育部门在这个改革中要捍卫的是什么？

**钱理群：**想真正推动教育改革的大有人在，个别官员也有理想主义。但整体而言，就是谋取利益。为什么越是重点学校，教育改革搞得越厉害，说白了就是在暗地里收钱，这里面的利益太大了，绝大部分教师，也能分得一杯羹，包括补课之类的。像马小平这样的教师要面对多种压力，可谓寸步难行。第一要面对行政部门的压力，第二要面对同行老师的压力。因为你是异端嘛，他们本来可以安心赚钱，被你这么一弄，很尴尬，就非常讨厌你。真正想推动中国教育改革的这波人，正处在一种被重重包围的境况之中。

## 救一个算一个

**盗火者：**我们采访马小平老师的那些同事，他们都提到了他的孤独感。其实，孤独是这种教师普遍的一个处境。

**钱理群：**你要选择做一个合格的教师，就必须面对既得利益群体的压力，我在这一点上是非常绝望的，普通教师基本上无能为力。我经常用相濡以沫来概括我和这些老师的关系，实际上大家都非常孤独，只能互相支持，抱团取暖。我是屡战屡挫，屡挫屡战。我跟他们不一样，一线教师是不能动的，而我毕竟是外来的，这里不行我就换一个地方，换一条路。大学不行就到中学，重点中学不行就到普通中学，城市不行就到农村。我觉得越往下走，越有某种变革教育的空间。比如说，我编《新

语文读本》，目标就是对着农村孩子的。因为城里的孩子对这种课外读物根本不在乎，而农村孩子看到这样的书，就可能改变他的人生。

前几年我到中央民族大学去演讲，有个孩子主动找到我，他说他来自福建山村，偶然看到我编的《新语文读本》，然后全家兄弟姐妹都在读这本书，后来他考上了大学，从福建山区来到北京，带的唯一一本书就是这本，他说他要一直读下去。我当时非常感动，这就是我的目的。但实际上也只是局部会有一点点效果，总体上是进不去的，特别在西部地区。后来我又在东部地区针对当地的孩子编了套读本，就是在不断寻找空隙，只要有可能我就去做一点。后来逐渐形成了一个理念，我们要进行静悄悄的教育变革，我不再从整体下手，因为整体在我能力之外，我改变不了，我愿意从身边开始，从我的每一堂课每一个教育行为开始，帮一个算一个，救一个算一个。

**盗火者：**刚才您谈到静悄悄的变革，其实，我们现在的教育面貌，迟早要变的。您能否预测一下它会发生怎样的改变？

**钱理群：**现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到了一个瓶颈，政治体制不改的话，所有改革都不能进行。比如现在大家讨论的官员财产公示，如果真能做到，在教育上立刻会起作用。至少能限制教育部门的领导甚至校长，不能再那么肆无忌惮地收钱了。既得利益链条不打破，是不可能有任何实际改变的。

我要做的工作就是促进这种变化，而不是具体的介入。具体的教育工作我也做不了。

## 马小平是当代教育家

**盗火者：**我们聊一下马小平，您说他是最具有全球教育眼光的中学教师，为什么？

**钱理群：**马小平和其他教师不太一样，他考虑的是整个教育问题，他是有能力当教育局长的人，是一个教育家的坯子，不是普通教师，他自己的理想也是。

**盗火者：**我们在采访中发现，马小平在不同的学校都在试图影响他的校长。

**钱理群：**对，马小平对中国教育问题看得更远。他说过和灾难赛跑的话，这个灾难不仅指中国灾难，也是世界灾难，他看到的是一个全球性的教育危机。他的忧虑比任何老师都要多。2008年我跟我的学生说，从此，世界和中国进入了一个灾难不断、突发事件不断的时代，现在证明我的判断是对的。我们的年轻人，我们培养的孩子，应该是能应对人类灾难的新一代人。马小平曾感叹一个中学教师到底能走多远，他说他一辈子都在追求追求不到的东西。

**盗火者：**您觉得在中国的教育环境下，一个普通中学教师能走多远呢？

**钱理群：**体制对一个人的限制是非常大的。像马小平，他准备充分，也有条件可以走更远，但最后并没有走多远，这就是体制的问题了。中学教育改革没有找到真正的领导对象，像马小平这样的人，不仅是一个依靠对象，还是一个领军人物。有人说马小平到深圳中学，学校对他很重视，其实不完全是这样。虽然相比别的学校，深圳中学还能容忍他，但并没有真正重视他、依靠他。他比较直率，不肯妥协，在中国的体制

下，不妥协是不行的。很多人告诉他，不要那么早离开东莞，再等一等，也许会有转机。马小平是知青一代，有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气质，和我这一代是比较相近的。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很可贵，却和这个时代太不适应了，这可能是造成马小平悲剧结局的原因。

**盗火者：**您认为好老师的标准是什么？

**钱理群：**我的标准有三条。第一，以学生的健康成长为出发点，在学生成长的同时，自己也成长，自己也快乐。这和追求名利不一样，追名逐利就必然要跟着体制走。第二，教师必须是一个思想者，有独立思考，也能引导学生独立思考。第三条很简单，他必须是爱读书的人。所谓中学语文教育，就是爱读书、爱写作的老师带领着一群学生去读书写作，这就是中学语文教育的全部。而马小平几乎完美地做到了这三点，他是真正的语文教师。但是，这样的教师必然有问题，他不追求名利，又有独立思考，他就必然不那么听话，必然不太容易被体制所接受。本来这三点是一个合格教师最基本的要求，但在现在的体制下很难做到。

## 被权力垄断的教材

**盗火者：**您为什么说教材背后有一个惊人的利益链？

**钱理群：**某个出版社如果掌握了教材版权的话，这个利益是不得了的。它跟别的书不一样，我国中学生是有上亿人口的，而且是必须买的，这个利益就非常丰厚了。

**盗火者：**谁来召集？谁来编？具体环节是怎样的？

**钱理群：**以前是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垄断，而这几年陆续有一些扩散。

大家争这个出版权争得非常厉害，但是听说现在语文、政治、历史要统编了。之所以选择这三个科统编，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最近有一个口号，要使十八大精神入耳、入脑、入心。教育是国家意识形态管制的核心部分，整个教育就是要统一思想，最有效的就是统一学生的思想，教材也要服从这个目的。这就是教材为什么需要垄断，不可能开放的原因，即使开放一段时间，最后也要收回来。

**盗火者：**我经常翻看中小学语文课本，尤其小学语文课本，觉得低劣粗糙，不适合孩童，这是什么人编的？

**钱理群：**这不是具体编写人员的责任，因为指导思想就是要统一思想。自然科学相对好一点。其实，问题最严重的不是语文，是历史。语文还能说，历史根本不准你说。政治课实际上大家都不重视，起不到什么作用，学生也把政治课当成走过场。

**盗火者：**您觉得现在中小学作文课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钱理群：**最关键的是两个问题，一是说大话空话废话套话，现在的文章越写越华丽，越写越花哨，越写越言不由衷，文风有很大问题。我认为这个很难改变，因为统一思想就是要你说统一的话，说大话套话空话，说一些漂亮的、华而不实的话。有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你看现在的中学生，他的语言有两套系统，一套是考试的语言、课堂的语言；而与朋友交流则使用另外一套生活的语言。

**盗火者：**我们采访了一些一线教师，他们对语文课本都有自己的想法，比如说要不要放诗歌、要不要放鲁迅的文章等。

**钱理群：**诗歌我觉得是必须要有的，这是中国很好的诗教传统。我曾经提出过让诗歌伴随你一生。按说人应该一辈子读诗的，生命成长到不同阶段，应该读不同的东西。对于鲁迅，我觉得小学生读鲁迅作品，

其实非常简单，一个是受鲁迅语言的熏陶，另一个是让他觉得鲁迅很有趣、很可爱就可以了。我跟一位老师合编过小学鲁迅读本，对鲁迅的文字有不同的处理。比如说选的文章不能太长，因为小学生能集中注意力的时间不会很长。此外，也不能超越他的理解能力。所以，我主张编选教材时要对鲁迅的文章做处理，不能原封不动。我坚持一个原则：不加不改。可以从他一大段文章中选一小段，比如说从《猫和狗》那里节选一小段，重点讲猫的故事。到了初中，要选和生活接近的，偏向于鲁迅写少年、童年的文章。高中可以接触鲁迅比较深的一些文章，学习鲁迅的思想。

##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盗火者：**您关于“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那段发言在网上传播很广，您真的觉得今天的大学生已经彻底堕落了吗？

**钱理群：**这是我的一种文学概括。我认为，大批量的制造这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是中国教育的最大失败。你辛苦培养的思想尖子，经过大学的深加工之后，会迎合体制、利用体制，而且很有效果。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我们现在不可思议的公务员热。你会发现，公务员中受到重用的常是这种人。比较粗拙的利己主义者，是会被淘汰的，任何体制都不会用这种人，因为比较笨，且手段恶劣。但是那种办事效率高又能领会领导意图的人，如果掌握权力是很危险的，比贪污腐败更可怕。但如果你反过来替这些学生想的话，又是可以理解的。马小平说，中国的教育从小学开始，就是一种缺失意义的教育，不能给学生提供一种理想、

一种信仰。当一个人没有理想、没有目标的时候，他唯一的驱动力就是利益。“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就是这样培养出来的。这种教育从不给学生提供生命意义和生命价值，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如此。在这个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孩子，从小就习惯要做这样的人。我自己的经历也是这样，比如说，北大的团委，是不希望我公开演讲的。他也不是禁止我演讲，却总找各种理由不让我讲。党委反倒不管，那你团委是什么目的呢？他也不是不知道我演讲的意义，更知道学生欢迎我演讲。但有一点，万一我演讲出了问题就会影响他的仕途。他甚至知道我不太可能会出问题，但是他考虑到他的利益，权衡利弊后，仍然不让我讲。

**盗火者：**对大学里的种种怪现状，您最厌恶的是什么？

**钱理群：**我觉得现在的大学有两种产物：一种是实用、实利，另一种就是虚无主义。“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骨子里是虚无主义的，因为他什么都不信。虽然他说得头头是道，什么民主、自由、平等啊常常挂在嘴上，说的比我好听，受的教育比我完整，更熟悉西方，读的书也比我多，但他骨子里还是虚无主义的。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当下中国社会，虚无主义是更危险的、更致命的。

## 从教育之外关心教育

**盗火者：**关于大学生的学费，有人认为太高了，超过了普通家庭尤其是农村家庭的承受能力。有的人，比如说茅于軾，认为还不够高，还可以更高，然后靠高学费建立一个奖学金制度，来助济寒门弟子。您觉得现在的学费高吗？

**钱理群：**我离开大学已经很长时间了，到底多高我不知道。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不可回避的，就是农村子弟的比例越来越小。现在农民的孩子面临两个问题：第一，上大学，特别上重点大学的比例越来越小；第二，毕业找工作越来越难。因为找工作要有社会资源，城里的孩子和农村的孩子完全不同。前不久我看到一个材料，有些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回农村去，又不愿意做农民，就成了游民，这是更大的危险。梁卫星写他的学生，分析过几个典型，有的就成为黑社会的后备军。因为他受的教育使他绝不能回到农村去种地，于是，一部分人就有可能进入黑社会群体。所以，今天这种教育的后果就使学生们一部分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一部分成为黑社会的后备军，而更多数的人就是在混日子。

**盗火者：**听说您打算告别教育？

**钱理群：**我的主要精力已经转移了，我现在的关注点在教育之外，从教育之外来关心教育。我的作用其实一直都被夸大了，实际上细想想我只做了三件事情：第一是编了许多课外读物，第二是自己上课，第三是关心一线教师。

**盗火者：**媒体对您的描绘是身心疲惫。

**钱理群：**我精力充沛，从这当中能知道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我曾经说过我有时候觉得孤独，但是我从来没有觉得空虚过。我活得非常充实，每天有无数的事情要做。我能做的事情，一样没落下过，该做的都做了。

## 陈丹青：教育是一件去做的的事情

### 教育有问题，但不是教育问题

**盗火者：**您怎么评价中国的教育现状，您心目中的理想教育什么样？

**陈丹青：**我离开大学五六年了，教育现状我已经不太清楚，但据我所知没什么变化，过去的那一套还在继续执行。现在大家认为北洋军阀时期的教育可能是中国现代最好的一段教育，第二段就是西南联大时期，第三段是五十年代的教育，教授的素质、学生的素质都远远超过今天。再下一个阶段就是“文革”以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相对来说也不错。但1949年以后的两三个阶段，加起来都不可能像北洋时期那样，因为那时候的国家不能介入教育，那时候的北大、清华根本不听政府的。国民党接管以后，一度想渗入到大学教育，但一直不成功。咱们说的教授治校，在军阀混战时期和一部分国民党时期，甚至抗战时期都是贯穿下来的，彻底改变是从1950年开始的。

**盗火者：**你自己亲身经历的五六十年代的教育是什么样子？

**陈丹青：**我刚才说五六十年代的教育好，其实是要加引号的，因为

五六十年代的教育已经开始有党化教育了，党的意识和国家的意识开始混同，然后就是爱领袖，几乎没有真的历史教育了，也没有所谓世界视野中的教育了。很多课程砍掉了，很多事我们知道了，都简化成一种革命教育——雷锋、愚公移山、为人民服务、共产主义接班人……

五六十年代普遍的理想主义，现在看来有很多虚幻成分，但它是真的，因为那是一个新的政权，充满希望，很多恶果尚未呈现。那时的小学老师、中学老师，尤其是大学里最好的教授，都是从民国过来的。这些人的素质和人格，大多是在民国时养成的，然后留在共和国教小学、中学、大学。他们比现在的老师爱教育，更无私，更单纯。学生不用说了，像今天这种全社会的功利主义、机会主义，完全机械化的考试，那时候没有。所以我会说那个时候比现在要好一点。以蒋南翔为例，他是清华大学的校长，现在大家怀念他，因为在他治校期间，跟今天的清华大学比，要宽松得多。他其实是党派去的，但毕竟还是一个民国青年，他的学术人格，他的行政作风，跟今天的大学校长比，还是要好得多。

**盗火者：**民国人和今天人的精神气质，有什么显著不同？

**陈丹青：**中国人现在的毛病民国时都有，而且一塌糊涂。我并不认为民国人就比今天人的道德水准高，但放到教育领域来看，民国的校长、教授和学生，为什么我们今天还会怀念？因为他们很单纯，政治还没毁了他们，他们可以有自己的立场，不受政府和党派影响。蔡元培是国民党的元老，但他可以拒绝北洋政府的很多措施，北洋政府拿他没有办法，还要重用他。说得夸张一点，整个民国时期教育圈的人，无论师生、官员，都是自由的、认真的，他要做什么事，真的会去做。今天有哪个校长敢完全不理睬政府怎么想，就径直去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有哪个学生敢站起来对校长说“你是错的，你应该下台”？民国时经常发生驱逐校长、

驱逐教授的事情，虽然有点过激，带来了一些不良后果，但不管怎样，那时候的学生是有主见的、有行动力的，而且是有影响力的。五四就是一个例子，“一·二九”也是一个例子，共产党就是从这些学生里走出来的。

民国人跟1949年以后的中国人相比，最大的差异，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文脉没有断。虽然1905年废除了科考，但是两千年积淀下来的读书人的集体人格还在，学问的大脉络还在，一直到建国初年都还在。我小时候见到的初中生、大学生，他们的家教，他们对学问的态度，那种好学、担当、奉献，还没有完全断掉。真正断了是“文革”以后。80年代有那么一小段回光返照，但只持续了10年，90年代又下去了，都变成我要拿学位，或者我要入党，我要做生意，上学变成了一件赤裸裸的功利的事。

**盗火者：**您在清华大学任教期间，体会到这个问题了吗？

**陈丹青：**我当时满怀热情到清华报到，很兴奋、很好奇，他们给我这么高的规格，又是特聘教授，又是主任，又要招博士生，我就有点将信将疑。美术哪有博士？这事儿怎么弄？于是，我很认真地准备，很认真地招生，但第一个回合下来我就发现，这一切都是错的，都是拧巴的，因为最好的学生根本上不来，首先就卡在英语和政治分数上。从第一次招生我便知道，我进入了一个完全不能周旋的游戏。讽刺的是，在这个游戏里，我居然还是那个执行游戏规则的人。这让我想起清华大学的英文老师孙复初，有一次他跟我讲他们那代人40年代受的英语教育，他说他们在高中基本上就已经能够自己阅读，能够用英文写作，用英文唱歌。所以进入大学后，就已经假定你英文过关了。我父亲当时上的是美国人的海关大学，没有中国教师，全都是美国和英国的老师，全部是英

文授课，教材也全是英文的。今天可能吗？今天一个研究生毕业，都未必能张口，未必能读得下来整本的英语著作，可今天的英语考试却是史上最严苛的，这太荒谬了！政治考试从 50 年代一直到今天，只要有这个在，你还谈什么教育？还有人们一直批评的教育行政化，大学成了官府，你要当校长、院长、系主任，前提必须是党员。那你还谈什么教育？

## 民国的课本“好善良”

**盗火者：**民国时代的语文，究竟美在哪里？您曾经说民国的教育好善良，这话什么意思？

**陈丹青：**我说的是民国的课本好善良，尤其是小学课本，有猫、狗、春天、风筝，编课文的人有慈悲心、父母心。你看周海婴回忆录里提到的他在上海念小学时的成绩单，包括品德、智力、勇气、谦让、礼貌等项，没有一项是所谓爱党、爱国。这就是把你当一个小孩子、当一个人看。木心先生幼年在乌镇的小学上文学课，一所中国乡下的小学里就已经放莫札特、舒伯特的歌了，还有勃朗宁的童话、安徒生的童话。他都不知道谁是莫札特，当时小嘛，七八岁。我母亲小时候学校里有一架风琴，现在她才想起来原来老师弹的都是教会里的歌，圣母、上帝，人要爱人、原谅人。你再去看《早春二月》还有其他民国电影里的老师和孩子，都是非常善良、非常简单的。他们相信这个社会、相信人，心态是好的。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他真的相信这个社会。他一生出来父母就告诉他，你要当心，不可以这么简单地跟人交往。这种善良的教育已经完全灭绝了。今天的小孩刚上幼儿园就知道要和哪个阿姨搞好关系，哪个阿

姨父母是塞了钱的。他的童年记忆、少年记忆，就是一长串的人际关系和一长串的利害关系，哪有善良的余地。然而，这份人际关系不交代清楚，你的孩子怎么混？出了家门怎么活？

我后来之所以知道我们这代人变得这么复杂，是我到了美国以后，非常惊讶，原来美国人这么简单，所有人都很简单，都假定你说的话是可信的。可我们从另外一个空间出来的人，就是所有事情我们都怕上当，而且要骗别人，要隐瞒自己的真实想法，这已经变成我们的生理密码，我们一路就是这样被教育过来的。小孩嘛，你给他什么，他就接受什么。一个孩子从小是唱少先队队歌还是唱圣母颂，人格和教养肯定是不一样的；正如一个孩子从小读《三字经》还是《毛主席语录》，长大后肯定也是不一样的。

**盗火者：**您是说现在的孩子都是伪天真、伪善良吗？

**陈丹青：**从幼儿园开始，孩子长期受的就是伪教育，都是装出来的开心、装出来的惊喜、装出来的激动，而且一装就是一辈子。从演员你就看得出来，你比较民国的电影和80年代以后的电影，一个是语言的格式化，全是标准的普通话，一个是表情的模式化。这就是为什么我不看中国的联欢晚会，大部分中国电影我也不看。他可能也是很真诚地在表演，但人的五官的千千万万种组合的可能性、情绪的可能性，都被纳入几个固定模式。民国很多演员，演技其实不如今天，但是他率真。你看阮玲玉、周璇、赵丹这些民国时的影星，她们受到西方话剧的影响，也在模仿，但他们模仿的时候有百分之百的真挚和热情，还没有形成模式。这就是为什么像《十字街头》、《马路天使》，到今天看还是经典，最难得的就是那份真。这份真一直保留到五十年代。为什么《小城故事》后来重拍了一遍，味道就完全不对了？因为所有的剧组人员和导演，都

不自觉地在一个模式当中，虽然拿出了百分之百的真挚，却再也演不出那份真了。1949年以后，所有人都是在单位里长大的，都是在一个开会、表态、喊口号的文化里长大的，然后忽然解放了，说你自由了，你想怎么表达就怎么表达，但他已经模式化了，他的人格、他的生理反应都模式化了。现在的主持人，仍然在传播一种伪真诚、伪感动，很少几个稍微跳出这个模式的人，立刻变成最受欢迎的了。

## 鲁迅是把双刃剑

**盗火者：**鲁迅的几个名篇在中小学课本中被剔除了，为什么？

**陈丹青：**因为鲁迅是黑色的，他是阴暗和悲观的，这是党和政府从来不希望孩子有的。他们一直要传达一个讯息，这个国家非常好，你们现在最幸福。鲁迅在民国的时候，就不同意把他的文章编入教科书。他在一篇文章里说，我不要年轻人读我的书，我心里很阴暗，不想把这种情绪传染给青年，青年正在成长，世界刚刚展开，不要给他们制造我这样阴暗的心灵。其实，每个国家都有几个黑色的、阴暗的、刻毒的作家，比如尼采，木心先生书里谈到很多，包括耶稣。这些“有毒”的文学，只对某些有特别敏感、强韧的性格的孩子有帮助，但对绝大部分青年而言，未必一定要去读，读了也没用。

**盗火者：**现代作家，您倾向于选谁？

**陈丹青：**我主张给稍小一点的孩子看最易懂的东西，外国的《安徒生童话》和《格林童话》都挺好。如果要读比较艰深的、复杂的、有哲理的，等孩子到高中和大学时可以让他自己去选择。

我女儿在美国读小学时，《圣经》他们会读，希腊神话也会读。木心先生给我们上第一堂课讲希腊罗马神话时，他问在座的哪位读过希腊神话，班里面年龄有快50岁的，也有我们这一辈30岁左右的，没有一个人举手，我们全都没有读过，因为教科书里没有。只有我女儿举手，她说我读过希腊神话，木心讲的故事她知道。她到了大学，要选六门课，其中有一门就是《神曲》，结果来了个老头子，这个老头子教了一辈子《神曲》，将近10年。他会讲维吉尔带但丁游地狱，游完以后要到天堂了，维吉尔就消失了。老头子每次讲到这里都会泣不成声，在课堂上大哭起来，这就是我说的善良。咱们今天有这样的老师吗？他讲了40年，重复了上千遍，可每次讲课还会受不了，眼泪喷出来，这就是教育。

## 乡村已经变味

盗火者：我们讨论一下乡村教育问题吧。

陈丹青：别谈乡村教育了，这是最伤心的事，现在哪儿还有乡村啊？

盗火者：乡村是怎么消失的？

陈丹青：我只承认现在有很多农民和非城市居民住在农村，但那个不叫乡村。乡村是有自己的结构的，这个结构在1949年以后被彻底摧毁了。

盗火者：乡村曾经什么样？

陈丹青：乡村有乡党，有乡绅，有乡民自己的组织、自己的教育。整个中国两千年的文化，一直到民国，甚至到五六十年代，最好的苗子

是从乡村出来的。现在每年的高考状元，绝大部分都是城市里的，从乡村出来的已经很少了，顶多是从县城或二三级城市出来的。可是从前真的是从村子里出来的，胡适老家那个胡村现在还在安徽，你能想象那里再走出一个胡适吗？不可能了。你稍微考察一下五四的精英都是从哪儿出来的，就知道中国的乡村现在还在不在了。梁漱溟那个时候搞乡村运动，从草根做起，现在哪儿还有草根？

**盗火者：**现在的乡村什么样？

**陈丹青：**现在的乡村就是一大堆没有尊严、没有土地的人，完全被抛弃的人，贱民，然后变成流民。实在压榨得太厉害了，就免税，稍微喘口气。当然，现在很多农村富了，但这个富背后的代价是乡村的沦亡。

**盗火者：**您下乡时的乡村是什么样子的？

**陈丹青：**我下乡的时候，乡村已经很惨了，人民公社就像集中营，所有村民都没有了土地，被赋予一个公社社员的称号，好像很高尚，其实饿得要死。农民过着一种从秦汉以来从未有过的生活，他的口粮是定量的，壮劳力一个月 42 斤粮食，像我们这样的知青一个月 36 斤，妇孺大概就 30 斤。农民太不习惯这个了，我是种粮食的，可是我要定量吃，如果稍微饱餐一顿，到月底就没粮食了。

**盗火者：**你们下乡的时候，有知青在村里当教师吗？

**陈丹青：**有，但很少。知青运动有一个正面作用，在那些没有文化的山区，开始有城里的青年带来文化，教孩子怎么用电，什么是数学，还有认字。但在古代没有这样的事情，因为古代每个乡村都有自己的老师，自己的学术权威，自己的长老。因为那是个前现代社会，交通不发达，所以每个穷乡僻壤都是一个自治的小社会。现在这个社会崩溃了，所有乡下人要治病、要求学、要有出息，只能离开家乡，跋山涉水到外面去。

从前只是进京赶考，其他事情他的小社会都包了。

**盗火者：**现在的留守儿童非常惨，我们看到的都是正在合并的学校，孩子们走很远的路上学。但我们遇到的每一个农村的家长和孩子都认为，无论多远，也要进城。

**陈丹青：**他们当然应该进城。这样毫无尊严感的乡村谁要待？我要是一家人还在农村，当然只有一个志向，就是赶紧离开这里，没有任何可以留恋的。所有生活的乐趣和活着的价值在乡村都没有了，就守着那么几亩地有什么出息？我当然要到城市去，我要为后代着想。

**盗火者：**那城市化的结果，就是要取消乡村教育吗？

**陈丹青：**我不能说城市化进程不好，它能大幅度改善大量人群的生活，可你看看日本的农村，还有法国、德国、意大利的农村，他们也无可避免地经历了一个城市化、现代化的过程，但他们农村的社会组织还在，大户人家还在。虽然也在不断地没落，但整体的社会结构没有经历过我们这样的冲击。虽然经过二次大战，但摧毁的是建筑，没有摧毁社会结构，更没有摧毁人。你如果去过意大利、法国的小镇和乡村，就会知道，所谓田园，所谓鸡犬相闻的生活都还在，小镇上的文化生活非常丰富，钟声一直在响，圣歌一直在唱。很多人在城里工作，周末回到乡村，这种流动是双向的。反观中国，有太多的角落，政府也好、民间也好，都是够不到的，只能靠小范围的芸芸众生自己想办法。城市已经富成这个样子，GDP都世界第二了，教育经费却还不肯增加一点。就算增加了，也是一路层层盘剥下去。乡党消失了，传统的乡村社会结构消失了，可另一个非常残酷的结构形成了，那就是各级官员编制的权力网格。这些官员大部分是败德者，他们根本不爱自己的家乡，就是赤裸裸的掠夺、霸占。我听过不少乡一级的官员，因为土地拆迁，竟然上房揭瓦，痛打

老人小孩，为了把你撵走，杀人放火的事都干得出来。

## 对教育，我没有资格失望

**盗火者：**现在有一股潮流是知识分子到农村去，您怎么看这种行为？

**陈丹青：**我很尊敬他们。我们那个年代，大量知青下乡是被迫的，现在终于有人愿意主动去，当然是好事。好人永远都会有，傻人也永远会有，这叫作理想主义。我知道有个德国人长期待在云南，受尽各种挫折、屈辱，但他仍然待在那里。这不奇怪，西方传教士几个世纪都在做这样的事，中国一定也有这样的人。但是，所有人在这几十年里都活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赶紧多捞，赶紧安顿好自己的生活，不要管这个社会。你是救不过来的，你真的到下面走走，就知道，完全一个赤裸裸的丛林社会，大家都信奉丛林法则。这个时候，居然还有这样一些傻子，愿意反方向地从城里往乡下走，去从事这些公益事业。我敬佩他们，但我不知道他们能走多久。

**盗火者：**您还是比较失望的？

**陈丹青：**不是失望，我没有资格失望，我也没有资格希望，因为我自己没有做这些事情。我很惭愧，现在总被当成一个可以来谈教育的人，但其实我更相信教育是一件去做的事情。我非常尊敬他们，我只是担忧他们能走多远。不能要求他们牺牲自己的前程、家庭幸福。你难道真要把自己全部奉献给这个穷村子吗？那是不对的。每个人都先得把自己安顿好、把自己的生活质量提高才是，你现在把自己奉献出来，我很尊敬，但等到你40岁、50岁了，你还拿那么点儿钱，你又该怎么办？当然，

会有很多财团、企业家愿意资助，但是我也听到很多负面的消息，里面有很多猫腻，事情办起来了，最后发现不是那样，变质了。

## 要听话，不要一流人才

**盗火者：**现在有些家长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在家上学，或者去私塾、书院；但有人担心这样长大的孩子，将来不容易融入主流社会，您怎么看？

**陈丹青：**这在今天的中国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大家对社会不信任，对教育、医疗更不信任。医疗你没法自己医，教育还可以自己教。我不担心小孩在家上学将来就无法在社会上生存，正好相反，人的适应能力远远超过自己的想象，在各种环境当中，人都会成长。我痛恨现在的教育，是因为他假定人必须进小学、进中学、进大学，才能变成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我不太相信，一个人非得经过学校教育，才能变成一个社会人。

**盗火者：**钱学森临死前问了三个问题，其中一个是现在的中国教育为何不能培养出一流人才。您的答案是什么？

**陈丹青：**我的回答很简单，中国的教育就是希望不要培养出一流的人才，而且做得很成功。这五六十年来的教育只在做一件事，就是控制青年，让你被动，不要主动。

**盗火者：**很多年轻人觉得中国的教育体制没有大家抨击的那么差，比如说对从小所接受的一贯的教育，他们觉得这样过下来也挺好的。

**陈丹青：**所以我说这个教育控制得很成功嘛。我们那一代，他打你

你还觉得痛，现在这一代你再怎么控制他，他也不知道痛了，因为他的生活全是这一套了，他不知道还有其他成长方式，他会很奇怪你们为什么说这个教育不好。

## 我非常重视奇怪的人

**盗火者：**有一个学生家长，把孩子带到国外去之后，说中国的基础教育是世界最扎实的，甚至有华裔把子女送回国内中小学接受基础教育。您怎么看这种做法？

**陈丹青：**这个情况一定是真实的。中国这样的教育制度，一定会产生全世界所谓基础教育最扎实的一个群体。但什么叫基础教育？基础教育应该包括哪些？如果是指考试能力，中国学生绝对世界第一。这是一种大规模的长期渗透的强制教育，几乎等于军事训练，它一定会见效的。我在美国接触过很多留学生，他们告诉我，所有中国学生进入学校，立刻就成为这个学校最好的学生，美国学生根本不是对手；但等他毕业后进入他所从事的那个领域，最优秀的立刻全变成美国人或其他国家的人了。差距就在人格培养，缺少了个性、自由、想象力、勇气和好奇心。我非常重视奇怪的人——用通常的规范无法解释的人，美国多是这样的人。

**盗火者：**这样的孩子在国外会不会受排斥？

**陈丹青：**在美国，你想干嘛，想变成什么人，你都可以试着做。在中国，如果你是个特别的人，从你的家里开始，一步一步，一直到学校、社会，没完没了的管束和指责，耽搁你、恶心你，甚至毁掉你。

## 现在的大学就像高级监狱

**盗火者：**您成长的年代，正值“文革”，教育几乎停顿。今天的年轻人如果像您这样，靠自我教育成才，条件比您那个时候是有利还是不利？

**陈丹青：**我们这代人的自我教育只是个形容词，我们其实都有老师。我说我是自学的，只是指我没有从学校教育这个管道出来。五六十年代出生的这一拨所谓知识精英，在整个成长期，没有人管。我们在农村，可以找书读，可以写文章，可以辩论，是在一个非常自由的环境中长大的，只是看不到出路，而且很穷苦。忽然，等到成长期快要终结的时候，“文革”也结束了，还可以考大学，所以我说我们实际上是很幸运的一代人。那么丰富的江湖经验，考验了我们的承受力。我最可怜现在的大学生了，一点都不自由。我到北大去讲演，发现学生不可以有任何自己的告示牌，不可以有任何自己贴到墙上去的东西。而国外任何一所大学，走廊里有成百上千的同学自己贴的东西，换宿舍、换教室、找项目、参加活动的，丰富极了。学生是学校的主人，可你一进中国的大学，发现学生是最次要的群体，所有校园都在提醒学生谁在管你们，你们应该听谁的话，应该怎么做。这叫什么教育？这叫什么大学？

**盗火者：**您上大学的时候是怎样的？

**陈丹青：**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可以举办化妆舞会，可以自己找各种人来讲演，每个宿舍都亮着灯辩论，大家互相赞美，也互相不服。这是80年代的气氛，现在有吗？我有时候到大学去，总能感觉到现在的学生有多无聊，那根本不是青春，简直像待在高级监狱。

**盗火者：**您认为中国教育改革的着眼点在哪儿？

**陈丹青：**真正改变的动力、改变的可能性，尤其是改变的具体方案，还是来自党，来自政府。哪一天真的想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了，哪一天真的想改变教育结构了，上面发命令就行，真的能做到。70年代末就是一个例子，恢复高考恢复自费留学，全部是自上而下的。我对民间机构试图改变中国某些领域的做法不抱希望。我尊敬他们，但我不抱任何希望，很简单，因为他们没有权力。

**盗火者：**您对现在的年轻人有什么建议？

**陈丹青：**我们都给绑起来了，但如果你是个有些想法的人，你会让绑着的四肢没有那么痛。“文革”中斗人，斗完以后有些老先生会交流经验：“我跪了四个钟头，因为我发现有种跪法没那么累。”我不是讲笑话，每个青年在今天的形格势禁之中，都要自己想办法，找到哪怕一点点空间，让自己能够相对正常地成长那么一点点。绑是肯定要绑着的，只要大环境不变。

**盗火者：**那家庭教育呢？

**陈丹青：**多数家长都是失败的一代，扭曲的一代。我很少遇到有眼光的家长，但我也理解，他们只有一个孩子，只是这孩子太惨了，那还叫孩子吗？所以，我认为家长是第一凶手，学校是第二凶手，他们合伙把孩子弄成跟他们一样，这些孩子长大后又成了下一茬凶手。每个中国孩子的自杀之路，从他生出在一个中国家庭的那天起就已经开始了。

## 朱学勤：四海变秋季，一师难为春

### 曾为高考假离婚

盗火者：1977年恢复高考对你们这代人意味着什么？

朱学勤：恢复高考是我们这一代人命运的转折，但是在这之前，我们已经进入了一种无意识的准备。我们这一代知青里喜欢读书的人，已经意识到这个时代会结束的，所以“文革”后期在农村我就开始跟着美国之音《英语900句》读英语。另外，同学之间经常会交流一些灰皮书，像《赫鲁晓夫主义》、《新阶级》等。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已经进入到一种正常的大学生活才能提供的思想状态。这种无意识的准备持续了四五年时间，但我不知道大学会不会招生，只是觉得“文革”长不了，这个民族还是需要思想、需要精神的，我们个人就在为这个东西做准备。在大学已经关闭的情况下，我们读书并不是为了进大学做准备，而是在摸索这一代人应该有的知识、思想。那几年可以分为两段，前一段在农村插队，后一段在工厂。农村插队时我们那个集体户的学习氛围比较好，九个人，除了我是初中生，另外八个人都是高中生，而且是上海一些重

点中学的高中生。然后就到了工厂，体力劳动很繁重，但也给自己制定了一个自学计划，先从历史开始，然后是哲学，进入一种知识探索的状态。所以，等到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我们这个集体户的很多人，都顺利地考出来了。他们原来的数理化基础就很好，我自己因为个人的一些原因，1977年参加过高考，后来错过了录取的机会，错过之后，就开始自学，准备考研究生。

**盗火者：**您能说得再详细一点吗？

**朱学勤：**可以说有两次错过。一次错过是1977年恢复高考，当时在河南当地有一个政策，就是25周岁以上结了婚的，和25周岁以下没结过婚的，录取标准不一样，等于放两个榜。分数的差异可以达到100分。当时我压力很大，因为我是一个初中生，跟那些高中生一起进入考场，又要高出100分，所以自我期望值不是很高，但是榜发下来一看，我居然进入了录取范围，但可选择的学校不是很好。我第一志愿填的北大、复旦，几乎不可能了。那年我正在工厂的子弟中学教书，暑假回上海探亲，当时河南有一个学校要录取我，跑到我所在的单位了解情况。工厂里的人就说，他们这批上海知青眼界很高，你们又不是全国重点大学，录取了他也不会去。那招生的人一听就放弃了。等我探亲结束，回到工厂，才知道这个情况。我一听就很着急了，那个时候管他什么学校，只要能上学，都愿意上。所以我赶紧跑到郑州市高教办去问，他们说确实有这个情况，听说你眼界高，我们也不想放弃这个名额，就录了别人。这是我的第一次错过。

那时候规定，高考政策三年不变。我想既然三年不变，那我第二年也就是1978年好好准备一年，1979年再考，肯定能考得很好。结果1978年我跟我爱人复习了一整年，谁都没报名。后来知道1978年实际

上是我们这批知青录取最多的一年。

结果，1979年，当我们信心满怀地准备报名的时候，突然说政策变了，结了婚的、25周岁以上的不让考。当时我们很惊讶，觉得怎么能这样说话不算话呢？但是，《光明日报》已经登出消息说今年的政策就是结了婚的一律不能考。

不让考怎么办？为了适应它这个荒唐的政策，我们就办了假离婚，结果又闹出一个大笑话。那时离婚必须组织开介绍信、盖公章。我教书的那个工厂子弟学校，支部书记跟校长两个人搞权力斗争，校长同意后，支部书记就怀疑，说校长批准小朱去离婚是不是在拉帮结派。因此，支部书记无论如何也要坏掉这件事。他跟我说，第一，你即使离婚也是无效的，你不能报名；第二，你现在已经离婚了，就不能回去住，你回家就是非法同居。于是，每天晚上我就卷个席子到我们厂的青年职工宿舍打游击，谁上夜班了，空一个铺，我就在谁的铺上睡一觉，这成了我们厂的一个大丑闻。人家说某某为了考学居然离婚，搞得现在有家没法回。

这个时候我们工厂来了个一把手，是厂革委会主任，叫张易之。这个人我到现在都很感谢他，写过怀念文章。他是从河南省政府秘书长下来的，是个老干部。1949年进城的时候，他是纪登奎的上级。这个人有文化，也爱才，他到这个工厂，听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我的事。他内心很同情我，就背着我开了几次座谈会，了解到底怎么回事。后来他明白了，是那个支部书记在报复我。所以，他在这个工厂的第一批干部调动的指令中，就把这个支部书记调走了。然后，他找我长谈了一次，说第一，立刻复婚，结束目前这种尴尬状态。第二，高考虽不能够参加，为什么你没有志气干脆考研究生呢？国家政策是允许你们这一代人，以同等学力报考研究生的。经他指点，我放弃了本科的梦想，直接考研究生了。

## 生活垫高了我的视野

**盗火者：**后来做了什么样的准备？

**朱学勤：**这个准备比较辛苦，以我那么单薄的知识储备，要考正规的研究生，坎坎坷坷就很多了。三年考了四次，每一次都有故事，反正不堪回首就是。到考第四次的时候，自认为是最后一次，不想考第五次了。我觉得太难受了，年年都发生一些让人咽不下去的不公正的事情。但第四次我碰上了好老师，就是我后来的硕士导师何汝璧。

他看完卷子后很惊讶，因为他自己带的本科生大概有八个人考，他可以有一到两个名额。我总分考了第一名，专业课也是第一名，他就不相信，觉得一个校外的，而且是同等学力，为什么考得比本科生还要好呢？他要亲自主持面试。

面试是1982年的6月1日，我到西安去，面对面跟他谈。他要我谈我自学的过程，读了哪些书，有什么证明。我正好带着一大包卡片、笔记本，就放在他跟前，他看完之后就相信那些卷子是我的真实成绩了。于是，他做了一个决定，自己的本科生都不要，就取了我一个人。

其实，何老师是30年代初期入党的一个老党员，满脑子都是非常正统的观念。我的硕士论文是有点另类的，我那个时候对一些正统观念已经开始怀疑了，我那个论文实际上是从侧面质疑法国大革命的，按道理是跟他的整个红色知识体系正面碰撞的。但何老师最好的一点是他除了那些党文化的框框之外还有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底色，特别爱惜人才，不摧残人才。他不断地鼓励我，让我把自己的想法写出来，只要在史料上不出问题，在逻辑上自圆其说，就放我过关。

我跳过了大学四年，和77、78级的同学们一起进入研究生一年级。

第一年，我还觉得有点自卑。但到第二年的时候，他们反过来说幸亏你没跟我们一起读那个四年，否则你就不是今天这个精神状态了。到第三年的时候，我开始庆幸，也许他们说得是对的。本科四年我没有和他们一起在教室里度过，这对我的思想和人格独立，不是一个伤害，而是一种保护。

**盗火者：**您的这种不一样，根源于什么？

**朱学勤：**根源于“文革”中后期的地下读书运动。1967年，大城市的红卫兵思潮退潮之后，很多人开始来到农村，农村反而进入了一种学习状态，开始读很多灰皮书。如果你有幸接触到这些灰皮书的话，就意味着你那个时候就开始进入启蒙状态。我写过一篇文章叫《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把那一代人称为“68年人”，就是说1968年我们开始获得了独立思考的机会。那时候读的书，比如德国哲学、俄罗斯文学、法国历史、马克思选集，还有“文革”前给高级干部们读的一些内部参考书，对我启发极大。后来我进入研究生阶段，虽然是同等学力，但相比那些四年本科过来的人，一点不逊色，我觉得是1968年到70年代初期的那段读书生活垫高了我的视野，而这种东西确实是在大学四年里学不到的。

## 大学的衰败，远超我的想象

**盗火者：**在大学教书之后，有没有碰到过像您这样的学生？

**朱学勤：**碰到过，但是很少很少。我现在基本只招博士。90年代之后的硕士生，进入博士这个门槛时，大多数人还没有鲜明的问题意识，多数老师都是手把手地教，给他们一个现成的题目，然后告诉他，材料

在哪里。我恰恰不是这样，我原本以为一个学生硕士毕业，应该有非常独立的问题意识了，然后老师再给他一个平台、一个机会，博士阶段的前两年不要强求他，让他顺着自己的问题意识自由发展，就行了。但等第三年他们的论文初稿交上来，我才开始觉得意外，怎么一个博士生写的东西是这个样子，然后再开始从严要求。这是我自己做老师后发现的问题，这种情况实际上深刻地反映了两个时代的差别。70年代后期的那批学生因为“文革”被耽误了好几年才进学校，但也歪打正着，这正迫使他们先到社会这所大学摸爬滚打。也许对学理工科的人来说，这是无法挽回的损失；但对学文科的人来讲，这是一段非常必要的社会训练。

一个学文科的人，如果对这个社会没有自己的阅历，总是从书本到书本，学问是做不深的。而我们这批人心中，对这个社会是什么样的，书本和社会的差距在哪里，都比较明确。做学问到底是从真实世界里挖掘题目，还是到那个有点虚幻的符号世界里去拼凑题目，我们自己心里都有底。90年代之后的大学，实际上又重新封闭起来，绝大部分孩子从小学到博士，就是念书，从小只在符号世界里摸爬滚打，根本不知道符号世界下面还有坚实的社会土壤，不知道真实世界和符号世界是有差别的。此外，现在的学生每天接触到的全是一些令人沮丧的信息，都会加剧他们生存竞争的压力。所以，很多孩子在硕士、博士的第二年就要开始考虑谋生，有很多世俗的压力。这个社会能够给年轻一代提供的正能量太少太少，负能量太多太多。所以，当他们回到老师身边，回到符号世界里，带回来的社会信息就会负面的多，正面的少。

正因为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我们才没有太多世俗的考虑。如果考虑世俗，我就不会拿起书本了。这一道巨大的滤网，就把一大批不愿意读书、只愿意服从生活逻辑的人过滤掉了。我们当时的基本想法，就是

读书，追求知识，更深刻地解释这个社会，甚至改变这个社会。而现在的孩子，更多的不是要深刻地解释这个社会或尽可能地改变这个社会。面对这个社会的灰色大网，他们觉得自己是无力的、渺小的。

**盗火者：**所以这就使他们的知识体系更趋于工具主义。

**朱学勤：**他们会觉得，我念个硕士、博士，就是个敲门砖，老师你就放过我吧，别用你们当年的标准要求我们，外部的世界已经变了。90年代之后，我们整个社会的变化，包括校园的变化，都在向下走。1989年之后，整个中国社会都带着鲜明的被重金属碾压的痕迹，尤其它的精神世界。那么，作为被碾压得最直接的大学校园，它的痕迹就特别明显。我对这个有思想准备，但90年代之后，大学生活的衰败，它往下走的斜率，还是远远超过我的想象。1997年之后，一方面扩招，另一方面政府加大对大学的投入，我们的大学越来越有钱了，但整个大学的内核是用钱撑起来的，不堪一击，甚至已经被击溃了。

我曾讲过一句话，今天的大学第一个阶段是人抢钱，大学教师都去抢课题；第二个阶段就是钱抢人，因为课题就那么多，大学教师都被裹挟而去了。几乎每一个人，哪怕是一个三流教师，手里都会有课题，你看看这些课题做出来的是什么？全是罂粟！多少年后回头看，我们这个最有钱的大学时代，恐怕是最令人羞耻的一个时代。

**盗火者：**一个大学教师想营造不一样的空间，还有没有这个可能？

**朱学勤：**空间很小，事在人为。但如果你想这么做的话，得有思想准备。第一，你得放弃在这个体制里面的所有好处，比如说你今天要当个主任，明天想当个院长，你要明白：这跟你无缘了，你不能再追求这些东西。第二，你不要被那些课题卷进去。你宁可不申请课题，也要保留自己的独立思考。做到这一步，已经不容易了，不能要求所有教师都

这样。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跟着你的学生可要倒霉了，他不可能分享其他老师带的学生的那些好处了。要让跟着你的学生也像你这么想，我觉得对他们就有点太苛刻了。所以我现在招的学生越来越少，道理就在这儿。有时候我不太忍心让自己的学生再顺着自己的路走一遍。我和这个体制处于一种不合作状态，放弃了体制里面的好处，因为我已经出名了，但我有权利也要求他们这样吗？我很矛盾！

**盗火者：**这样做的老师现实处境都不太好。

**朱学勤：**不太好，拿我来讲，由于种种原因，我跟上海大学的关系，就处于一种不战不和、不弃不守的状态。到现在，我觉得大家都摸出了一个交往的规则，就是我从不过问这个体制内谁上去了，谁下去了；但你们也不要过问我在想什么、写什么。你不管我，我也不烦你，就这样一个状态。

**盗火者：**南科大的整个诞生过程，您应该有所了解。

**朱学勤：**我注意过。倾巢之下，岂有完卵。南科大的这种遭遇、这种坎坷，都是意料中的。如果在80年代，南科大能得到的空间要比今天大得多。他的艰难不在于深圳这个特区已经没有一点特区的味道了，跟内地其他省份差不多了。艰难在于，90年代以来，四海变秋季，一师难为春，整个社会发生了一个丕变，一个溃散的丕变。

## 钱伟长的三句肺腑之言

**盗火者：**中国高等教育的面貌肯定是要变的，您觉得它未来可能的变化在哪里？

**朱学勤：**目前不可能变。葛剑雄说过一句话，我很赞成，大家都在

抨击大学的行政化、官本位化，他说这是废话，整个社会都行政化、官本位化了，你叫大学校长没有官衔，没有一个相应的行政级别，他怎么跟社会衔接？怎么到社会上去办事？其实就是我现在那个意思。包含大学在内，但是比大学大得多的整个社会，都处于那个状态，大环境不改变，你光让大学变，是变不过来的。

**盗火者：**自上而下的变化很难发生，自下而上的呢？

**朱学勤：**我觉得事在人为。每一个老师面前都有三尺讲台，今天这个三尺讲台，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有一定的空间的。你如果珍惜这个三尺讲台，你课堂上的氛围也许就跟隔壁的教室不一样了。这也是我一直坚持在做的，但我从来不奢望微观世界里某一个人或团体的努力和坚持，能够改变外部环境，我觉得不可能。

**盗火者：**去年有一个现象，就是众多的中外合办大学，在上海可能更多。

**朱学勤：**这是一个好现象。这几年，香港、台湾的大学到大陆来招生，以至于很多当年的状元，放弃北大、清华去念香港大学。这是值得肯定的鲶鱼效应，但时间长了会怎样，我是不乐观的。

**盗火者：**您觉得他们会被同化？

**朱学勤：**对。我举个例子，1997年香港回归，然后台海两岸开始正常化，很多朋友把希望寄托在这个上面。有种说法，井水可以改善河水、澄清河水。我当时就说，井水水小，河水水大，很可能是河水污染井水。以至于今天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香港大陆化、台湾香港化，香港这条鲶鱼也逐渐转基因了，开始沾染上大陆的基因，更不要说更小的鲶鱼了。

我讲一个上海交通大学和上海大学之间的故事，你就知道我为什么不乐观了。大概是2001年的时候，上海交大要恢复它最早的南洋工学

的规模，开始办文科，曾经想让我到那边去当历史所的所长，给的条件很好，而且他们知道我在上海大学并不是很得意。但我一说走，上海大学的党委书记、副校长就觉得面上很挂不住，不愿意放，谈了几次谈不下来，我还是要走。最后他们没办法了，使出了杀手锏，找到钱伟长，上海大学的校长，说我们劝不下来了，只能让老爷子劝你。这样我就跟钱伟长谈过一次，那年他八十多岁，一见面就开门见山地说了三句话，这三句话都是肺腑之言。第一，他说你要吸取我 1957 年的教训，不要搞得自己 20 年无法正常工作。我们都知道钱伟长 1957 年被划为右派，代价是 20 年无法正常工作。第二，只要我在这个学校，有风浪我还能保护你，你到其他学校去，他们现在说得花好桃好，一旦有事，他们能保护你吗？我在，我就能保护你，他们不敢。第三，我这个办大学的理念，有多少人能理解？教育部长理解吗？复旦大学的校长理解吗？他们见过真正的大学吗？你算是理解我的，知道我办这个大学的苦心，连你都要走，这个大学交给谁办？这三句话，真是打动了我。我说，算了，老爷子，就冲这三句话，我留下来了。

我觉得这个故事很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民国过来的一个老教育家，前清华大学的副校长，他是怎么看我们这个教育体制的。那一刹那，对教育的这些理念，以及教育改革的艰难，我觉得我跟他是有共同语言的。

**盗火者：**钱伟长在上海大学确实有一些不一样的作为。

**朱学勤：**对他的一些教改计划和理念，当时的教育部是有保留的，只是看他老人，又是政协副主席，才迁就他的。我知道他这个大学理念是 30 年代在美国留学时形成的，然后又移植到今天的中国来。按道理，30 年代大学的理念到了 21 世纪，应该过时了，但它放在中国的教育环境里，居然还是那么超前。

## 余世存：真诚的丧失是最可怕的

### 每个自己都在沦陷

**盗火者：**您认为教育的目的是什么？

**余世存：**当然是培养人，一个全面的人。就是我们小时候说的启蒙。

**盗火者：**那老师的责任是什么呢？

**余世存：**当然是让孩子找到自信，学会理性地思考。

**盗火者：**教育体制改革应该从哪里做起？

**余世存：**最终还是要靠教育工作者和社会上有良知的人一起来做。

现在这种教育腐败，不仅是制度性的腐败，也是全社会性的。如果真的想打破这个铁板的话，就是谁意识到这一点，谁就从自身做起，互相抱成团来做，像郭初阳、魏勇他们的尝试，我觉得就蛮好的。社会学上有个三分之一定律。任何一件事，如果有大概三分之一的人在从事反对它的实践，那么这个规律就会被打破。但现在做这件事的远远没有三分之一，我们需要更多人来斩断腐败的链条，推动教育制度的改革。我们在经受一个漫长的冬天，要想让它长出一些春天的花朵来是很难的。我们

现在从事的工作，只能是相互取暖。

**盗火者：**我们采访了立人乡村图书馆。它这个概念是怎么形成的？

**余世存：**建立乡村图书馆，跟李英强对自己的人生设定有关系。一次，他们李家人在河南鹿邑开老子研讨会，邀请我过去。我跟英强几个人在路上聊天，我说我这么多年居无定所，没有自己的房子，书到处乱放，现在特别想把这些书拿回老家，或者搁我们村里都可以。他说这个主意好，他也有这种想法。回到北京后，他又做了一些调查，最后就把我们几个人找来，成立了立人图书馆。

**盗火者：**“立人”二字有什么特殊的含义？

**余世存：**李英强受鲁迅的影响，说人生要志在立人，让自己立起来，也让别人立起来。他们的努力虽然是杯水车薪，但用英强自己的话说，救一个算一个，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盗火者：**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您怎么看？

**余世存：**目前中国的生态环境和世态环境都遭到空前的败坏，这是比大炼钢铁还要坏的一次社会改造。农村已经快被推倒了，城里也没有老房子了，每个人的家乡确实都在沦陷。其实大家都意识到了这一点，但还是停不下来，没有人阻挡得了这个进程。我们正处于赤裸裸甚至血淋淋的国家和资本的合谋中，只能忍受，无能为力。王怡后来信基督教了，把自己交给了上帝，对现实也是无能为力。这是一个很痛心的事实。

我们很多人，一方面说自己爱国，一方面又把自己的护照都换成国外的，弄虚作假，撒谎成性，对自己不诚实，对社会也不诚实。所以，家乡的沦陷，不仅是一个制度问题，而且变成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麻烦的是，我们已丧失了改变的勇气，就像我们都不喜欢北京的空气和食品，但还是愿意苟活在这里，没有回家乡。这是一个很大的悖论，也是

一个很大的讽刺。

**盗火者：**这种逃离家乡的现象，应该受到谴责吗？

**余世存：**不应受到谴责。你不逃离家乡，会死得更惨。因为家乡已经沦为被土豪劣绅霸占的一个地方，而且没有多少资源了。我回去生活过两年，发现它比北京上海广州的都市化更糟糕，更血淋淋。你在那个地方生活，会被它那个绞肉机绞碎的，特别是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资源跟它对抗的话。已经有很多这种悲惨的例子，像作家洪峰最后被迫当街乞讨，慕容雪村家的老房子被强拆，你想建设家乡都不行，你报国无门，报家乡也无门。

**盗火者：**那么，像李英强这样的知识分子到农村去，是不是更多的是一种自我安慰，会起到实质作用吗？

**余世存：**我比较悲观。第一肯定是自我安慰，第二是能救一个是一个。他毕竟有勇气踏出这一步，那些没有勇气的人，可能更愿意把自己的资源贡献给他。这也是李英强的立人图书馆这几年在年轻朋友和媒体圈中得到广泛支持的原因。

**盗火者：**您小时候在乡村，有阅读吗？

**余世存：**我们家户户只有一套书，《毛选》四卷，上小学会识字了，基本上《毛选》通读了好几遍。另外，每个村都有几个爱读书的人，他们会买一点，比如《说唐演义》、《岳飞传》等，我当时看的主要就是这些东西。

**盗火者：**那现在乡村的孩子呢？

**余世存：**现在获取信息的媒介发生了变化，而且这个变化是非常快的。很多80后，不仅读书人，就是那些打工的、当老板的，全都用电子产品来获取信息了。所以书在目前的乡村，也是很少见的。我回农村

去我哥哥家，他家里就没几本书，都是孩子的课本、教辅那些东西。

**盗火者：**现在做乡村教育和晏阳初那会儿，有什么不同？

**余世存：**非常不同，因为我们就是问题本身。晏阳初那会儿，中国的教育体制跟西方是贯通的，在晏阳初身上是没有障碍的。那个年代有一种混乱的自由，能施展他的理想，而我们当下的这些人都不行。教育是要身体力行的，自己的身心先要健全。然而，有的教育者，包括志愿者，认为自己就是一个失意者、失败者，是心理不健康的人，在城市被排挤，只好去做一下志愿者，来慰藉自己受伤的心灵。这种状态，怎么能给孩子以温暖和力量，做不到的。

## 公民素质与人文教养的双重缺失

**盗火者：**我们现在的大学，包括北大清华这些名校，都存在一个腐败的问题，您怎么看？

**余世存：**现在的学校教育普遍是驯化教育，校长、老师就是大大小小的螺丝钉。资中筠先生说过，中国的大学就是聚天下英才而毁之。

**盗火者：**中国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真正的公民教育课。

**余世存：**对，我参加过一些公民教育课的设置。公民教育不是培育良民和顺民，不能把人从这种被统治的角度去看待。公民教育最重要是提倡国民的政治责任、政治伦理，而不是所谓的生活伦理和社会伦理。其实，官方对公民教育是非常忌讳的。官方的政治课虽然也有老一代的教育工作者愿意放一些修身的内容，包括提倡现代公民责任感等，但跟民间相比还是要慢几拍，而且政府对公民教育有天然的不信任。

公民这个词我最初是从李慎之那里知道的。90年代，我跟李慎之、何家栋的交往比较多，他们都胸怀天下，希望对社会有所贡献。有一天，李慎之跟我说，等他退休了，他愿意做一个公民教员。我就问，什么是公民教员？他说就是教导国民怎么在现代社会立足，怎么做一个公民。他跟我说了这些想法，我才第一次知道了公民这个词。包括后来他跟何家栋相约一起编《公民读本》，整个过程我基本上也参与了，后来还听了几次课，开了几个研讨会，虽然他们没有做成，但公民这个概念却由此在中国传播开了。

**盗火者：**公民教育的缺失之外，还有人文素养的缺失，您怎么看？

**余世存：**人文素养缺失是非常严重的，过去师傅带徒弟，最重要的是教养，东西方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一个人跟着另外一个人，不是说他读什么书你就读什么书，而是你要学他如何潇洒应对，这是最重要的。老辈的读书人，你在他面前，会感觉如沐春风，内心宁静。80年代，很多人到梁漱溟家里去，一推开他的门，老先生坐在那个藤椅上，看着你，两眼放光，好像你的五脏六腑都被他罩住了，有种肃然的感觉。

## 中国孩子早早就丧失了天真感

**盗火者：**学生对老师开的选修课有一种排斥心理，反正考试不考，为什么还要教我们这些没用的东西。

**余世存：**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这些孩子没有意识到，他们做人的真实感或者自然感已经丧失了。邓康延有一次演讲，我在场，有个小姑娘举着话筒对在场的学者说：“你们放心，我们还是有希望的，我们知

道考试的时候应该怎么考，知道他们给的答案是什么，我们会按照标准答案来回答，但是我们内心知道，真正的答案是什么。”这番话得到全场学者的掌声，我都不好意思反驳了。这种话怎么能被鼓励呢！一个孩子为自己那种两面性自鸣得意，你还把她看作是未来的希望，这怎么行呢？人的真诚没了啊！

**盗火者：**是不是外界的压力，让孩子们形成了这样一种思维？

**余世存：**我们这代人，包括上一代人，在做人上面是成问题的，我们自己都没有找到立身处世的那种很踏实、很坚固的感觉。我们至今还在寻找，所以很难给孩子提供安全感。我们这代人的孩子，是没有家教的，家庭教育几乎是个空白，孩子从我们这里没有得到自然的情感交流，或者说一种天真的乐趣的分享。而一个孩子，在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中，最重要的家庭教育没有了，那他只好受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的污染。孩子会清楚地看到，自己的父母，在做人方面也不是那么真诚，甚至很虚伪。那么，他自己就会活得很惶恐，很飘忽不安，这就是天真感的丧失。我觉得生命本体意义上真诚的丧失是最可怕的。

## 教育是这个浮躁时代的镇定剂

**盗火者：**您觉得教育革会从什么地方撬动？

**余世存：**我觉得还是要靠民间的力量大规模地介入进来，在正统之外能够立住，就可以去教训正统，并且让正统跟过来。中国人有个传统观念，就是成功或富裕了，会去办学，去做一点公益。这个东西虽然目前中国的企业家阶层做得比较少，但这条路是必然的。等他们大规模的

资源进来，民办教育，还会有一次新的突破，甚至会良性运转起来。

**盗火者：**在正统教育之外寻找教育的力量，您认同这个观点吗？

**余世存：**现在的中国读书人跟传统读书人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举个简单的例子，原来的读书人，是通六艺的，六艺中有一个是武术，现在的读书人基本都不会了。朱熹说，他是半日读书，半日静坐。还有唐君毅，也是每天都要静坐的。顾炎武是个武学高手，林则徐是太极大师。我觉得从自身入手，对自己的身体，对周遭环境要有一种体认。但这个东西目前来讲，无论学生，还是老师，都很欠缺。这就导致中国人都被所谓的专家牵着鼻子走，都被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决定了、左右了。假如我们大家能够在教育之外，培养一种修身的生活方式的话，可能也算是一个镇定剂。不然的话，我们都那么浮躁，都在时代的漩涡里打转，这个社会很难沉淀得下来。

## 周孝正：校长首先得是教育家，不能是政客

### 高等教育资源分配不公，远甚科举时代

盗火者：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您对我们今天的教育状况如何评价？

周孝正：1977年，邓小平在科教座谈会上做了一个重要决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恢复高考。教育就开始拨乱反正、走入正轨了。但是到了90年代以后，我们的教育在开倒车。教育本来就是不患寡而患不公，科举制度从隋朝到清末，一千三四百年，就是解决稀缺资源分配的一种制度性安排。现在是你有了官位你就变成了教授，比如王立军，国内外二十多所大学聘他作客座教授，变成“官而优则仕”了。从1977年恢复高考到今天，高考仍然是最公正的一种教育资源分配方法，你如果在高考中作弊，要按刑事犯罪处理。有一年漏题，被抓的那个人据说判了10年。剩下比如说考博士、分房子、评职称、涨工资，哪一个制度安排能像高考这么公正？所以现在像什么重点中学的校长推荐，什么北大、清华提前招生，这都是倒退。

原来我们是很公正的。比如说你是一个穷孩子，没有财富，没有权力，

没有声望，但是你脑子好使，苦读十年，就可以参加科举。如果你中了举人当了状元，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就是说早晨你还是一农民，可一旦当了状元，晚上就能进中南海被中央领导接见了，它是垂直流动的一种秩序安排，很合理。现在中国高等教育的资源分配很不均衡，谁的孩子不愿意享受优等教育资源呢？但是，外地跟北京的招生名额，有的差了37倍，这就是所谓的地区歧视。新出台的自主招生政策，实际上是在加剧这种不公平，破坏了中国资源分配领域的唯一一块净土。

## 高考有疾，但不可废

**盗火者：**这三十多年最突出的就是高考制度不公平的加剧。

**周孝正：**对。比如像我们那一级，全国1200万的考生去竞争不到60万的录取名额，录取率大约是5%；现在比例很高，像北京已经接近80%了。资源供给增加了，可是毕竟还有20%的人考不上。应该怎么办呢？当然是大家统一考试，你怎么能每省自己出题呢？原因在于一些有权力背景的孩子基本都在北京，他们有特权，可以享受优等教育资源。现在又是推荐，又是提前招生，又是几个大学弄一个所谓联盟，这都是在进一步破坏公正，所以必须得恢复全国统一高考。

**盗火者：**您觉得高考现在已经变质了？

**周孝正：**变质了。但是你得提高教育评价的水平，不能说我就废了高考。1966年，北京四中高三（五）班和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搞了一个废除高考倡议书，登在了1966年6月8号的《人民日报》上，落款就是“北京四中高三（五）班和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全体学生”。

我恰好就是高三（五）班的学生，可是这事跟我没有任何关系，那是我们班的几个高干子弟起草干的。他们有机会主义心态，因为他们从高层得到一个消息，就是高考不可能再举行了，而且毛泽东也有废除高考的想法，于是他们就抢先登了一个倡议书。当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就批准了，用现在的话叫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当时强调说，废除高考并不是中央和毛主席想废，而是底下的人想废，是高中生想废。实际上这是一个阴谋。就是上边要废，只是玩了一个花活。

**盗火者：**当时你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受害者。

**周孝正：**我们当时有种从众心理，那时候也没有票决制，人家把你的名署上了，是瞧得起你，你怎么敢给脸不要站起来反对。况且，在《人民日报》上发一个倡议书，当时认为是光荣的啊！可是后来我跟他们谈过，他们也没想到这一废就废了将近十年，他们原本只是想放一个长长的暑假。

**盗火者：**您怎么评价这教育荒芜的十年？

**周孝正：**后来中央有文件，管这十年叫“十年动乱”。我也是十年动乱的受害者，我19岁就高中毕业了，结果20岁下乡，我上大学那一年已经31岁，一下耽误了将近12年。大学本科毕业，我已经35了。中央规定35岁以上的本科毕业生，不能再报考研究生，所以我们这批人几乎没有硕士和博士，而没有硕士、博士，你就不能评高级职称。

**校长应是教育家，不是政客**

**盗火者：**现在“北上广”有一个群体，多年来都在争取异地高考的

权利，您怎么看？

**周孝正：**2001年中国政府做出了一个重要决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有一个原则，叫国民待遇原则，说白了就是不能看人下菜碟，不能欺负人。但现在的高考政策就是赤裸裸的地区歧视，欺负人。当时青岛的三个高中毕业生状告教育部（当时叫教育委员会），说你违宪了，宪法说受教育权是平等的，你却搞赤裸裸的地区歧视。当时山东的高中毕业生，如果考同样的大学、同样的专业，大概得比北京的学生高出70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应该按照改良的思路。今年山东比北京差70分，明年差60分，后年差50分，七年以后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但是他们不这么办，他们说不能统一出题了，让山东和北京自己命题。北京命的题内部有指示让他们容易点，这样的话北京的孩子分就高。不但没有解决教育资源分配的公正问题，反而更不公正了，于是又搞了一个提前招生，北大、清华可以自己出题，之后又搞了一个高中校长可以推荐，这是错上加错。

**盗火者：**另一种意见说要废除统一高考、各校完全自主招生，您怎么看？

**周孝正：**这是非常荒唐的。我们高等教育是行政化的，就是说高等学校的校长不见得是教育家，他们基本上是政治家，说难听点就是政客。尤其现在官员腐败如此严重，你再让大学校长手握大权，岂不更加危险？在这种情况下，让各大学自主招生，就必然腐蚀掉很多大学以及教授。此外，大学校长都是任命的。发达国家的大学校长是任命的吗？他们是官员吗？不是。所以他们有一个社会基础。我们改革的方向叫小政府大社会，可实际上现在的政府越来越大，你再让各大学自主招生，那不就彻底腐败了吗？

**盗火者：**您理想中好的教育是什么样的？

**周孝正：**就是传道、授业、解惑。所谓传道，用官方的说法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西方的话叫伦理道德。授业就是教一门或者几门专业，教人一种谋生的手段。解惑，就是不回避学生提出的任何问题。

**盗火者：**我们现在的教育传递的是正确的价值观吗？

**周孝正：**正人首先得正己。现在有些教授，就是“会叫的野兽”，在那儿胡说八道，被利益集团绑架了，给点钱什么都敢说。有教授说三聚氰氨对人的生命没有损害，包括认为转基因食品大可放心吃。但到底有没有害，现在只能存疑。存疑就不能吃，谁愿意吃，你得给钱，因为它有风险，那叫实验。我曾说过，现在有三个事绝不要低估：第一，绝不要低估人民群众的愚昧程度；第二，绝不要低估官员的贪腐程度；第三，绝不要低估知识分子的堕落程度。所以，我觉得教育最大的问题是教师队伍，而教师队伍的问题是校长。校长首先得是教育家，不能是政客。

让孩子有一个幸福的童年，是最大的成功

**盗火者：**有句话叫“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您认为这个提法有问题吗？

**周孝正：**有问题，这句话太功利了。《中国青年报》有一篇文章叫《成功就是一粒毒药》，说得非常好。所谓成功，实际上是一种价值取向——内心充满善意，不懈追求完美，努力维护公正，完成内心超越。这就是成功。什么叫乐？孟子说，第一，仰不愧于天，俯不忤于人。就

是抬头低头没做过亏心事。第二，父母俱在，兄弟无故。就是说亲情、友情、爱情都不缺，缺一个我们叫遗憾，缺两个我们叫痛苦，三个都缺那叫虽生犹死。第三，得天下英才而教之。这就是成功。现在可好，当了大官就成功了，发了大财就成功了。“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无非就是让他成功。而他们理解的成功，无非就是出了大名，赚了大钱，当了大官。但实际上，让孩子有一个幸福的童年，才是成功。亲情最为关键，父母子女是亲情，手足之情也是亲情。现在独生子女达到1.4个亿，他们就缺失了这一份手足之情的陪伴，或多或少在人格上有些缺陷。

## 义务教育要公平，不能总想着选拔

**盗火者：**现在教育界在提倡一个口号，叫作教育均贫富。

**周孝正：**均贫富是不对的，因为从来没有一个社会均过富，只均过贫。

**盗火者：**您觉得应该提倡什么原则？

**周孝正：**应该有教无类。九年义务教育不能择校而应就近入学。但是，学校有优劣之分，家长都愿意让孩子上好学校，怎么办呢？就要把那些相对落后的学校变成好学校。缺钱的拨钱，缺好老师的，分配一些好老师。总之要有物质刺激，比如轮换着到贫困地区当老师，你去三年，这三年给你涨工资，提高待遇。九年义务教育阶段要强调公平公正，不能总想着选拔。比如说打篮球个高的占便宜，因为篮筐3.05米，像姚明2.26米，一伸手就接近篮筐了，因此，离篮筐越近，他投篮的命中率肯定越高。怎么办呢？设置了三分的规则，就是三分线外投一个算三分，此外，篮底下投，不能超过三秒。这就是博弈，定规矩的水平也

要与时俱进。我觉得，每年一次高考，可以改成两次，春天一次，秋天一次，而且免费。你春天考不上秋天再来，别急着自杀。

**盗火者：**国家教育部对重点中学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政策？

**周孝正：**有。重点中学还分什么区重点、市重点。所谓分槽喂养，就是给一定的特权。重点中学是行政的产物，是官本位的一个结果。官本位在改革开放初期是被批判的，现在则变本加厉了。

## 屌丝与富二代的壁垒

**盗火者：**现在寒门子弟的上升通道越来越窄，这对未来社会的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

**周孝正：**地区差异越来越大，造成发展的极端不平衡；收入差距越来越大，造成阶级矛盾，影响到教育。比如考公务员，有些热门专业恨不能万里挑一，冷门的则没有人去。有一银行招职工，其内部规定被曝光了，原来，他们招人得看你的背景，你必须是官二代或富二代，这样就形成了所谓的阶级。为什么我们说科举不错？因为各阶层是可以流动的。中国一千三四百年的科举考试，共出现了十万多个进士，最后一调查，这些人一半以上三代之内都不是读书人。你想想，在传统社会，三代之内没有读书人，毫无疑问你是弱势群体，但只要你用功读书，就可以由底层到中层，由中层到上层，我们叫社会的垂直流动，他有一个制度性的安排，给了穷孩子一条路。原来我们说，高考改变命运，现在你把这条路给堵死了，政治家的孩子还是政治家，穷人家的孩子还是穷人。社会的长治久安要有一个制度性的安排，就是让全国的精英，都能通过

制度化的渠道上去。如果顶层的人都是官二代、富二代，那他们只能是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了。

## 蚁族无出路

**盗火者：**对90年代末开始的大学跨越式发展，您怎么看？

**周孝正：**跨越式发展是一种机会主义的心态。为解决当时就业难的问题，我们决定扩大招生，扩招无非就是推迟就业嘛。本来你高中毕业想工作，先让你上大学吧，大学四年后你再念个研究生吧，现在研究生都一百多万了，无非就是为了推迟就业高峰。就业高峰哪儿来的，当然是人口政策造成的。刚解放的时候你说人多是好事，生五个孩子的母亲叫英雄母亲，上主席台给你戴大红花，现在又说人多是坏事。人口政策大起大落，就业也变得大起大落。老教育部长蒋南翔说宁缺毋滥，后来他退了，就给改了。就业市场的实际情况是：很多人没活干，很多活没人干。

**盗火者：**现在政府号召蚁族回到家乡，回到二三线城市，您同意吗？

**周孝正：**如果我们想要城乡经济一体化，就必须打破城乡分割对立的二元社会结构。毕竟中小城市的就业机会相对很少，而留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就不一样了。北京有总部好几百个，而且总部的待遇肯定比下面的高，他们为什么留在“北上广”，因为就业机会多，简单说就是挣钱多。可是如果都留在“北上广”，就会形成一种残酷的竞争。怎么办？城乡一体化是出路。现在，北京人想在农村买个房子政府都不许，因为那是小产权，不受法律保护，能随时给你拆了。这都是人为的壁垒。你

说市民为什么不可以买农民的房子？农民可以到城市里来，那市民也可以到农村去，特别是退了休的市民，他去农村买一套房，种个花养个草，不是又便宜又好吗，政府凭什么不许？

## 中国没有教育部，只有破坏教育部

**盗火者：**在城市化的侵袭下，您觉得农村的文化和教育发生了哪些深刻的变化？

**周孝正：**前段时间我们做了一个节目，农村的一个教师，也是一个大学毕业生，愿意在家乡教书，后来当地政府欺负人家，说他是民办教师，一个月就给几百块钱。实际上人家已经当了18年教师了，有经验，水平也不低，为什么你不给人家转正？人家在艰苦的地方干了18年，那点钱太可怜了。

**盗火者：**实际上，现在农村的精英都在往城市走，您觉得这正常吗？

**周孝正：**这是伪城市化。现在的发达国家都在逆城市化，干嘛要把这些人都弄到一个特大城市？这叫城市病，而且病入膏肓。你看中国现在的大城市千城一面，非常丑陋。而且高楼都得用电，一旦停了电怎么办？所以说这种城市化，跟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盗火者：**2006年，教育部发文，清退代课教师。到现在显现了什么后果？

**周孝正：**跟赤脚医生一样，虽然医术可能没有达到正规医生的水平，但他毕竟解决了好多问题，民办教师水平可能不太高，但也不能一刀切，

最后搞得连以前的效果都比不上。

**盗火者：**我们到湖南比较贫困的地方走了一趟，代课教师还是大量存在，因为学校需要。现在换了个身份，以前叫代课教师，现在给安排成学校里的临时勤杂人员，但还是跟正式编制的教师上一样的课，数量往往还大过正式编制的教师，工资却只拿六七百块。

**周孝正：**这就是教育部高度官僚化的后果。北大一个教授说，咱们国家没有教育部，只有一个破坏教育部。现在有2.5亿农民工，农民工的孩子也开始上学了，怎么办呢？要么当留守儿童，要么带在身边，于是就有了打工子弟学校。结果，北京市一道命令，北京的小学拆、改，为什么？因为北京市的孩子少了，小学就多了，就把小学校拆了，腾出地来干别的，搞房地产。

**盗火者：**农村现在有一个现象，就是初中这三年，学生的流失率达到30%，您觉得农村初中生辍学率高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周孝正：**女童的辍学率远远高于男童，当然还是经济动因，干活的不挣钱，挣钱的不干活。他们的子女就很难受到正常的教育。现在中国是世界工厂，其实应该叫世界的血汗工厂，许多农村孩子都想趁年轻力壮出来挣点钱。还有一个原因是虚拟经济挣钱太容易了，于是造成实体经济萎缩，比如说你真要在农村种地，种三亩地，你想到北京买一套房，至少得种一千年。相对而言，去城里打工能赚得多点。

校长成了政客，教授成了包工头

**盗火者：**今天中国大学的种种现状，您最痛切的是什么？

周孝正：大学校长里很少有教育家了，都是政治家或政客。大学不能有级，不能说你是副部级还是正局级，不能用官职评判价值，因为大学不是政府。如果校长一门心思就是想升级，那这个大学就完了。本来改革开放是去行政化，不要近亲繁殖，可现在近亲繁殖比那个时候厉害多了。都是只要我当了头，就把自己的研究生留下来，你是研究生，人家是你导师，你能反对你导师吗？我记得刚到人民大学的时候，是不能留自己的研究生的，现在愈演愈烈，全是自己留的。

盗火者：教授有教学上的自由吗？

周孝正：教授一般就不教书了，都接课题。现在研究生跟导师叫老板，老板接了课题给研究生做，物美价廉的劳动力，做完了教授挂名，申请经费。因为体制内的那点钱并不多，而课题经费现在挺多的，几十万、上百万，大课题能上亿。上亿那就等于包工头了。钱理群有一句话，他说，我希望我的学生，毕业后走到社会，不要当奴隶，不要让人欺负；也不要当奴隶主，不要去欺负别人。但有的学生就说了，现在这个社会是你不欺负人，人就欺负你。所以有些事也不能完全怪学生。

## 我不看好南科大

盗火者：我们采访的UIC，他办了几年，虽然默默无闻，但确实办得不错，招生已经从三本升到一本了，假如这样的学校多了，会不会产生影响？

周孝正：人怕出名猪怕壮，他默默无闻是对的，证明领头人的理念还是不错的，可是他一旦出名，必被封杀，绝对派一个党委书记去管你。

南科大的办学经历多坎坷呀，你想按照外国大学办，开什么玩笑。教授治校，那是向校党委夺权。这是党的教育事业，觉得管着你。

**盗火者：**但是今年这个口子确实开了。

**周孝正：**开了口子是进步，但想解决根本问题是绝无可能的。简单说，猪养肥了才杀呢，现在你还是个瘦猪，先让你自己发展壮大着。

**盗火者：**所谓的鲶鱼效应其实就是一种竞争。

**周孝正：**对，但这得看你是跟谁竞争。教育制度的改革，必须有个前提，那就是政治体制的改革，但这个过程我预计需要30年到90年。这些教育变革者的努力探索，我们都支持，都是有意义的，但不要有幻想。

**盗火者：**那南科大呢？

**周孝正：**即便南科大的改革成功了，它的经验也很难推广，因为你面对的是一个体制，而我们这个体制经常是开倒车的。比如说2010年10月25号，深圳市率先提出把深圳变成一个“公民社会”，后来上面说，不许提“公民社会”，于是就改成了“公共社会”。这不就是倒退吗？中国的改革永远是进三步退两步，官话叫“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 教育的多样性不容破坏

**盗火者：**有些家长不准备让孩子参加高考，而是送他们出国或进行家庭教育，这种形式您觉得可行吗？

**周孝正：**可取。教育分成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各有千秋。当今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教育也应该丰富多彩。科举就是有教无类，但是比较

死板，破坏了多样性；而私塾、家庭教育，实际上是增加了多样性，还可以跟国际接轨。

**盗火者：**有心理学家说，这种孩子脱离了集体，将来会不会社会交际能力低下？

**周孝正：**学校教育倒是社会化程度高，可都变成官僚了，张嘴就是官话套话，也不见得是好事。

**盗火者：**在家上学也好，书院、私塾也好，现在有一个共同的困境就是合法化的问题。政府的顾虑到底是什么？

**周孝正：**中央有两句话，一个叫顶层设计，一个叫首创精神。要尊重民间社会的首创精神，在家上学、私塾这些新的教育路径，我们都应该积极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实践是需要时间的，政府不要过早下结论。

## 做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公民

**盗火者：**中小学的公民课始终没法启动，您觉得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周孝正：**还是体制的原因，因为中国问题的总病根就是权力过分集中，国家总想把人变成一个驯服的工具。国家就是一台强大的机器，每个人都是螺丝钉，一切听党的安排，“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实际上，公民是个法律概念，我们的身份证叫居民身份证，居民是个世俗的概念。第一代身份证叫居民身份证，反面叫居民身份证号码；第二代身份证正面叫居民身份证，反面叫公民身份号码。人大代表强烈呼吁，将来的第三代身份证，正面要改成公民身份证，反面要改成公民

身份证号码。

**盗火者：**我们走访了一些地方，他们在学校里也会搞一些公民训练、公民实践，但我们发现这其实是一种伪公民教育，更多强调的是义务。

**周孝正：**现在只能是在夹缝中生存。权利和义务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如果过分强调义务，就把人变成了驯服工具，变成“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突出权利这一面就是要培养自由思想和独立人格，做一个自由的负责任的公民。

**盗火者：**假如有一天真的在中小学开设公民课，我们的课本可以照搬西方吗？

**周孝正：**其实用不着照搬，借鉴就行。一切人类的文明成果，都用不着照搬。比如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这个精神谈不上什么照搬不照搬，美国也得实事求是。美国的枪很多，校园枪击案就多。怎么办？就开始全民讨论，弄了五条方案，让大家讨论，你支持哪一条，然后排序。这就是公民社会。

**盗火者：**您觉得现在教育改革最大的阻力是什么？

**周孝正：**最大的阻力当然还是朱镕基那句话，叫壮士断腕，或壮士断臂。可是我们绝大多数人，连手指头都舍不得断。不能指望既得利益集团把自己的利益让出一部分来，这是非常非常难的。但我相信，只要扩大开放，深化改革，或者叫“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地对外开放，中国的前途还是光明的。但如果重新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就没戏了。

## 张鸣：教育只有开放才有希望

### 大学成了衙门

**盗火者：**您觉得教育体制改革最大的阻力在哪里？

**张 鸣：**教育改革，喊了很多年，已经怨声载道，不光是民众不满意，连官员都不太满意。为什么改不好、改不了，主要原因就是它会触动一个利益格局。中国的教育实际上是一种行政化、官僚化的体系，它对于这些利益集团来说是最好的。比如说，可以垄断教材，包括教材辅导书等，背后都存在巨大的利益。

**盗火者：**现在这个改革是谁在推进？

**张 鸣：**教育改革应该是一个全民的改革，不可能是一个部门的改革，一个部门的改革注定是要失败的。现在就是教育部在做，但教育部本身就是利益集团，教育部是行政化、官僚化的罪魁祸首，你让他把自己的皮剥下来，怎么可能！这是一种畸形的垄断产业，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你要不服气你就出国。

**盗火者：**有没有可能自下而上地改革？

张 鸣：可以啊，我当时就说，中国的教育，包括中国的改革，根源在于开放，不开放就没有改变。我们说民国的教育办得好，为什么？因为它是开放的，他有教会和民办教育两个东西在撑着。如果你国立大学办不好的话，学生就不来了。教育必须开放才可能办好，如果像我们这样封闭，用各种制度门槛保证国立教育的优势，那当然办不好。

盗火者：中国现在有世界一流的大学吗？

张 鸣：没有，而且离一流越来越远，我们这儿只有副部级大学。中国大学连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大学自治这最基本的三个指标都没有，怎么世界一流？师生连基本的学术讨论的自由都没有，怎么世界一流？

盗火者：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怎么一回事？

张 鸣：中国所有的地方都是党领导下的行政体系，他们从来没有把教育当成一个特殊的领域。一般情况下，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就是党委书记说了算。但有时也看党委书记、校长谁更强硬一点，谁更有来头。但不管是党委书记说了算，还是校长说了算，本质上都是官僚说了算。

盗火者：我们的校长跟国外的大学比，他的权力到底是大还是小？

张 鸣：校长在学校内的权力是很大的，因为学校是一个行政单位，没有校董会，不为校董负责，也不为师生负责，只为上级负责。他在校内是不受制约的，他就是天，想干什么干什么。比如学校的学科分类，我们中国的学科分类很怪，每个学院都不一样，就是因为校长不同，他说怎样分就怎样分。但另一方面，校长的权力又不大，没有自治权。所有大学办得都一样，大学的同质化现象很严重。教授里面，如果有一两个像我这样的刺头，他也没办法把我怎么样，所以说他的权力又很小。但一般来说，很少有人会反抗他，大家都听话，因为他手握着很多资源。

**盗火者：**假如碰上一个好校长，他有才能、有想法，愿意把自己的人格融入到学校的风格上，有这个可能吗？

**张 鸣：**现在的空间是越来越小了，因为校长要面临很多行政化的指令、干预、评比，他必须得屈从。考核指标上不去，他什么资源都拿不到。他必须拍上级的马屁，不拍就没资源，就算上面不把他罢免，他也没资源了。但三拍两拍他自己就完蛋了。总之，他如果想要个性，就一定干不下去。

**盗火者：**您看到过真的可以称为校长治理的吗？

**张 鸣：**刘道玉是，但刘道玉不是很快就被罢免了吗？其他的我基本上没看到有什么教育家，大家都是官僚，只是好点的官僚和差点的官僚而已。

## 权力学术与理想坠落

**盗火者：**关于学术造假的问题您怎么看？

**张 鸣：**其实，学术造假还不是最严重的问题，最严重的是学术平庸化，就是低水平重复。多数大学教授并不是学术人，尽管有教授、博导的头衔，但不是学术人，不懂什么是做学问，但现在的高校评价体系又很严格，他需要这些指标、这些发表量。他有时候让学生帮他做课题，学生不愿意做，就抄袭别人的，学生抄袭他也不知道，然后就被人揭露出来造假了，其实他本身是不想造假的。有时候他还告诉手下的硕士生或者博士生，你必须完成一些任务，然后才能毕业。归根到底还是这套评价体系有问题，基本上都是学术官僚在做评审，都是院长、校长、副

校长来当评委和评审处长。这些人大多数都没有学术水平，他们只看表面数字。现在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一篇文章要价很高，这种风气就是在培养学生造假。

**盗火者：**您理想中的学术和权力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张 鸣：**权力不应介入到学术中来，但现在就是官大学问大。从学科本身的规律来说，根本没有权力什么事，但官方通过课题设置等方法，大规模地介入。中国有权力经济也有权力学术，有些人是因为当了官之后才变成教授的，“仕而优则学”。

**盗火者：**钱理群说现在的大学生都变成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您同意他这个说法吗？

**张 鸣：**同意，尤其是名牌大学的学生，他们都有很强的精英意识，都很功利，严重缺乏基本的道德感。尤其是靠近团委、学生会那批精英更是如此。

**盗火者：**这个变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张 鸣：**90年代以来，理想坠落了，大家都去迎接利益，学生当然也不例外。但学生的变化让人感觉特别痛心，下坠速度如此之快，变成利己主义者，变成利欲熏心之徒。

**盗火者：**现在人们对大学辅导员有一些非议，您怎么看？

**张 鸣：**那就是党化教育的一个齿轮、一颗螺丝钉。有些是好人，有些从良心出发，像保姆似的，但即便这样的好人，也有问题。学生实际上需要培养的是自治能力，不需要保姆。

## 教育就是赔钱的

**盗火者：**现在，农村初中生的辍学率是最高的，有的地方都达到了40%，为什么？

**张 鸣：**虽然现在农民在家种地的条件比以前好了一点，但他仍然挣不到钱，只有出来打工，那留守儿童的教育肯定有问题。跟父母进城的话，如果上打工子弟学校，条件又很差，所以辍学率就很高。其实，说到底还是城乡隔绝这种制度歧视导致的。在西方国家，农民进城打工，就是城里人了。

**盗火者：**现在农村的职业教育有什么问题？

**张 鸣：**关键是有效性的问题，职业教育到底能不能教给他们技能，能不能在市场上派上用场，是很重要的问题。因为职业教育要求动手能力很强，实习环节如果放羊的话就很麻烦。如果有实习工厂这种场地的话，会很赔钱。赔钱的事没人做，但教育就是赔钱的。很多中国的职业教育就是先在学校学一点可怜的理论知识，然后就把学生放到工厂打工去了。实际上，职业教育应该有大投入的实习场所，实习工厂做出来的废品很多，不能指望学生迅速做出好产品来，那你当然要赔钱了。现在别说职业教育，就连北理工这样好的工科大学，实习工厂都是欠缺的，连这种名牌大学的工科生你都不好好培养，怎么还能指望办好农村的职业教育！

**盗火者：**现在实际上有很多职业教育是交给民办学校办的。

**张 鸣：**民办不是不能办，但问题是现在的民办教育就是为挣钱，这肯定不行。教育实际上不是不能挣钱，但是挣钱你先得有一个大投入之后才可能。当年陶行知、黄炎培他们不都是办的民办教育嘛，但不能

交给一些唯利是图的商人来办。

**盗火者：**我们在安徽采访了鲁班木工学校，那是国内大家公认的真正为农民子弟开办的职业学校，校长觉得最大的难处是，你要指望有情怀的企业家来举办这种不以赚钱为目的的教育，几乎是不可能的。

**张 鸣：**这跟制度有关系，企业家很少有做长远打算的，追求的都是短平快。教育是一个长线事业，除非这个企业有信心办 100 年以上，他才可能办这种职业教育。但是有几个民营企业能有这样的情怀，或者说敢有这样的情怀？因为整个制度环境并不能给人以安全感。

**盗火者：**造成教育不公的根源是什么？

**张 鸣：**是制度。各方面都在制造不公、制造等级，教育也不能例外。发达国家也有私立学校，富人的孩子上学的机会也比穷人多，但不会像我们这样形成制度上的隔阂。

## 教育不是短跑，是马拉松

**盗火者：**大学自主招生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教育部门肯定也明白这一点，那为什么不推行这个制度？

**张 鸣：**各个学校不愿意招，不愿意费事，也担心乱，各校乱招就没有尺度了，就会把有钱人都招来。但总的来说这就像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一样，总得要变。为什么企业不会徇私舞弊呢？因为最后需要社会检验，大学也是如此。还有一个原因是中国有一个庞大的考试系统，这里有大量的人员和机构，自主招生关系到他们的利益。

**盗火者：**对“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口号，您怎么看？

张 鸣：这个非常荒唐，因为教育不是短跑，是马拉松。起跑线是一个商业口号，而且是一个坑人不浅的商业口号。就是让人拼命地去买儿童保健品，拼命去搞婴幼儿早教竞赛。让家长都很恐慌，于是拼命买各种早教产品，拼命折腾孩子。

盗火者：每到年末的时候，都会看到一个关于大学生的就业率，这个数字是怎么统计出来的？

张 鸣：学校一般都会造假，因为一个专业如果就业率不高的话，下一年就得停招甚至取消，为了保住这个专业的饭碗，大家就会作假。随便找个亲戚的单位盖个章就算就业了，所以造假率很高。

## 逃离“北上广”是个伪命题

盗火者：我看到您为蚁族写过一系列的文章，您认为这个群体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张 鸣：一个是就业市场不正常。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学校教育有问题，培养出的学生既没有素质，也没有技能。

盗火者：现在政府在疏导他们，让他们去二三线城市，您为什么不主张他们回去？

张 鸣：因为他们本来在家乡就是弱势，父母无权无势，回到家乡也没有机会。中国越是比较闭塞的地方，被权势家族把持的现象越严重。他们回家不论是做公务员、进国企、找私营企业或自己创业，都没有机会。所以他们回不去的，不是说他们不想回去，是真回不去了。“逃离北上广”是一个伪命题。

盗火者：那政府为什么要提倡他们回到家乡小城镇就业？

张 鸣：这不跟以前提倡到农村去一样吗？他们总得到人少的地方去会有机会。其实不是这样的，人越多的地方才越有机会。还有号召他们到西部去，就更是如此了。我们目前制造了新一轮的城市化浪潮，这个浪潮中农村是在衰败的，这种衰败是不可避免的，没有人愿意回去，包括打工子弟也不愿意回去。那么，你把钱投入到打破城乡壁垒上，为进城的农民工投资教育，给他们提高福利不是更好吗？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面子工程呢？

## 有人挤，门才会开

盗火者：您怎么看现在中小学的思想品德课和大学生的政治课？

张 鸣：应该废止。但同时这又是利益问题，你要动的话，上百万的政治老师怎么办？而且政治课还要考试，还要辅导，这是很大的一块利益。实际上没有人在乎这些知识，也没有人相信，学了这个东西就真能给学生灌输一种什么思想。

盗火者：您所理解的公民教育，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张 鸣：就是把一些普世价值，一些基本的行为规则教给大家。没有什么所谓中国特色的公民教育，中国特色这个词是很荒唐的，就像吃饭，大家都在吃，你用筷子还是刀叉这都是手段，方法上可以有特色，但是内容本身不存在特色，所有人都是一样的。

盗火者：有一种看法，觉得应该把儒家的优良传统加到公民教育里面。

张 鸣：这个很荒唐，儒生不是公民，有人喜欢儒家，他可以自己学，可以开私塾。但是，儒家那套根本培养不出公民。更荒唐的是你把《弟子规》也放进去，那不是开玩笑嘛，那是臣民教育啊！儒家教育我不反对，但你不要强制成为全民教育，不要把儒家变成儒教就行。现在的问题是提倡儒家的人，总想把它变成一种强制的东西，变成一种新的马列主义。

盗火者：我们的公民教育，应该由哪一方来推动？

张 鸣：本来是政府的事情，现在只是民间在推动。教材自己编就行，各个地方的学者、专家、民间社团都可以编，谁好用谁的。教育部可以有一个尺度审核，大家互相竞争，不同的学校、不同的人可以自由选择。

盗火者：我们采访了南科大，您觉得南科大有可能成为中国高校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吗？

张 鸣：不可能。我当时对它很抱期望，现在看来不可能，它必须对体制进行妥协，妥协来妥协去就完蛋了。但必须有一批这样的学校整体去推进，整体倒逼才有可能。必须有人挤门，门才会开，不挤，门是不会自动开的。

盗火者：现在有个潮流是中外合办大学，您怎么看？

张 鸣：我觉得最好能把教会大学引进来，教会大学外面有资金，不像我们的私立大学，很多特别逐利，进来就想捞钱完事。最好有一些不太在乎利益的大学进来，这样的大学多几所就有戏了。所以我希望教会大学能够恢复，以前中国最好的大学就是教会大学，不是北大、清华。

## 熊丙奇：教育改革需要更多自下而上的力量

### “在家上学”问题多

**盗火者：**关于在家上学，您了解到的情况是怎样的？

**熊丙奇：**我有一个朋友的孩子就是在家上学，而且是真正意义上的在家上学。早上，他给孩子上语文，他的爱人给孩子上数学和英语。中午，孩子跟着家里的阿姨做家务，大概半个小时。下午，他带着孩子去游泳，或者去做其他体育锻炼。晚上，三个人一起分析这一天的学习进展，评估每一个学习项目的好坏，让孩子自己打分。

**盗火者：**这个孩子在体制内学校上学有问题吗？

**熊丙奇：**这个孩子上的是体制内一所非常好的学校，他也跟得上学校的教学，但是他觉得不快乐，父母也不快乐，觉得让孩子每天这样反复操练运算不是他应该接受的教育。经过一段时间的在家上学之后，他们家庭的幸福感比以前增强了，因为整天都很充实。更重要的是，把半天的时间归还给孩子，孩子可以做知识教育之外的事——体育锻炼、参与劳务，孩子过得很快乐。

**盗火者：**他们是怎么打算的？

**熊丙奇：**他们考虑今后把孩子送到华德福这样的学校去。或者在进一步学习之后，如果家里的教学无法胜任了，也可能到国际学校。有些在家上学的家庭，会考虑出国留学，但很多人因家庭条件所限还是要回到体制内，因此也很纠结。在家上学是教育多样化需求的一个必然结果。美国经过多年的争议，后来立法允许在家上学。首先，我们知道，受教育者的需求是多元的，但学校教育再怎么多元化、个性化，也无法满足个体的需求，因此，在家上学实际上是一种多样化的教育需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把在家上学也当成一所小学来对待。既然是一个微型的小学校，就必须要注意师资、教学方式、教学质量评估等问题。中国现在对在上学没有明确的定义，就会出现非法上学，甚至辍学。以在家上学的名义把孩子领回家，却不教学，这不是辍学了吗？以在家上学的名义把孩子送到一个机构，这个机构没有注册为合法的教育机构，不属于非法办学了吗？另外，要看父母是不是具有教师资质，在美国，要求父母至少一方要有资质。

**盗火者：**这个所谓资质，是要考取一个什么证书吗？

**熊丙奇：**它就像中国地区教育委员会的一个认证，由专门部门来管理。教育学、心理学都要懂，否则你怎么对孩子负责？孩子不是你的私有财产，他是未来的社会公民。如果你乱培养那最后不是既祸害孩子又贻害社会吗？此外，上什么样的课，也要注意。有些家长说，我自己教孩子，上什么课是我的自由。没有这回事！你要达到义务教育的要求，这是公民的义务，也是国家的义务。因此，它有课程的要求，比如科学课程都是要学习的。还有质量的要求，现在的义务教育有合格率，那在家上学也会有一个要求，不能说 I 上了，孩子却没学到。

在家上学要有这样一系列的规范，我们现在都没有。师资没有要求，课程没有要求，质量也没有要求。这些问题在美国是怎么解决的呢？首先是师资，美国有专业教育委员会来认证，不是政府操控的。他的课程由专业教育委员会和社会机构来提供建议，评估也是社会专业机构来做。可以说，推进在家上学的过程，就是教育改革的过程。

**盗火者：**在家上学对学校教育有没有一些触动？

**熊丙奇：**触动很小。因为中国在家上学的群体还很小，而且我从不认为在家上学可以替代学校教育。我们应该以多元的视角来理解在家上学，千万不要说我选择家庭就是否定学校，我选择学校就是否定家庭。教育应有多元的生态，满足各种不同的教育需求。

现在的制度造成千校一面，我们推进改革的目的，不是用一个去否定另一个。我们强调多元，强调个性，不是去搞对立和排斥。有的家长说，凡是学校里教的我就不要，在家上学就只让孩子读所谓的国学经典。我们要培养一个合格的公民，光靠读国学能行吗？包括让孩子去读私塾，如果孩子有反对意见，你允许他表达吗？学校教育目前最大的问题是灌输教育，老师讲，学生听。如果在家上学，我们依然采取灌输的模式，有价值吗？让孩子自由思想、自由表达，才能培养出现代社会的公民。我们要解放而不是禁锢思想，教学内容很重要，但教学方式和价值理念更重要。

## 教育经费缺乏监督，恐遭滥用

**盗火者：**现在的教育拨款制度是什么样的？存在哪些弊端？

**熊丙奇：**全世界范围内教育经费的平均水平是达到 GDP 的 4.9%，欠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是 4.1%，也就是说，中国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达到欠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根本原因是我们的教育拨款制度有问题。我们实际上是一个政府说了算的制度，政府想拨多少，就拨多少，不拨你也没办法。如果有一个健康的、良性的拨款机制，这个问题就不会发生。发达国家一般都有一个国家教育拨款委员会，或者地方教育拨款委员会，由这个委员会来制定教育预算、监督政府拨款。也就是说，政府如果不按照预算拨款，就要被问责。

其次，教育拨款委员会不但可以保障教育投入到位，还能让经费用到刀刃上。现在的拨款由于是政府说了算，在决策过程中出现了很多不科学的问题，比如铺张浪费，有些大学建豪华校门，还出现了上亿元的小学。如果有教育拨款委员会，就可以监督你履行预算，那么制定预算的时候你就会好好想想这个钱用到哪些地方是合理的。

**盗火者：**现在的经费使用情况是怎样的？

**熊丙奇：**长期以来，我们更多的是保障高等教育，或者说用在能够出政绩的方面。对一些薄弱环节，政府是不关注的。因此，教育资源严重不均衡——城乡不均衡、地区不均衡、校际不均衡。另外，拨款有时会被侵吞、浪费。就像我们现在重视学生营养改善，推出了营养午餐计划，政府新增投资 160 亿，这本来是个好事，但有些地方给学生喝过期牛奶，有些地方学生吃不饱，为什么？缺乏监督机制。我们怎样去招标？怎样去防止供应过程中的财务不透明？这些东西都应该有社会公众的参与，现在却没有。

上不了一本，就不算上大学？

**盗火者：**农村学生在重点大学的比例越来越低，您觉得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熊丙奇：**第一，跟目前的高考制度有关。它按计划来录取，把名额分到相关的省市，发达地区的高等学校多，尤其重点学校多，当地给的名额就比较多，这就导致不发达地区的学生享有的进入名校的机会减少了。第二，我们现在是按照单一的分数评价体系来录取学生，在同一个地区，所有的农村和城市考生去竞争重点大学的名额。这表面上是公平的，一张卷子，分数比高低，但实际上，农村孩子由于在乡村接受的教育质量并不高，很难拿到高分。这就导致一个结果：农村学生升大学的比例在提高，而进重点大学的比例反而在下降。农村生更多是进入二本、三本、高职、高专，而城市学生更多的进入了一本院校。这种单一的分数评价体系，对农村学生来说是不公平的。第三，农村学生的家庭资源也影响到他进好的大学。比如，城市家庭有条件让孩子去上培训班，这就进一步拉开了城市学生和农村学生的差距。综合这三方面的情况，农村的生源在重点大学的比例越来越低。

要改变这个现状，第一要改变高考录取制度，推行高校自主招生，建立多元评价体系，考虑地区教育因素和家庭教育因素，对来自农村和薄弱地区的学生可以加分。同时，自主招生是可以调整生源比例的，因此我们可以明确规定，重点大学招收农村生的比例不得低于30%，这个比例绝对超过现在任何“211”学校农村生的比例。美国大学就是这样，哈佛大学在录取的时候，都给贫困地区、薄弱地区和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加分。自主招生的本质是给学生选择的权利，是让一个学生可以报考

若干所大学，拿到若干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再来选择。

我们现在只是打着自主招生的旗号在反自主招生。真正的自主招生是把选择学校的权利交给学生，学生可以监督学校、评价学校，那时，学校的猫腻是不是逐渐就阳光化了？大家非常清楚，目前的权力掌握在政府部门和学校手上，而绝对的权力后面是绝对的腐败，当学校总搞猫腻，这个学校就堕落了，很快会变成三流学校，这是一个市场选择的结果。没有充分的市场竞争，何来一流大学呢？而竞争来自于自由选择，要把选择权交给学生，这才是真正的自主招生。

第二，如果你认为只有进重点大学才是农村学生的出路的话，那中国的教育是永远没有出路的。一个国家，哪怕你高等教育数量达到世界第一，你最好的教育资源，也永远只有10%，如果都想做这10%，那我们对教育的焦虑就无以复加了。我们为什么不让更多学生进入所有学校都能够成才呢？每个学校都办成自己的一流、办出自己的特色，不是很好吗？我可以进北大，也可以选择一个工人学校，如果我进北大和进工人学校地位是一样的，今后得到的社会认可也一样，我为什么一定要选择北大？

所以，打破教育等级，取消“985”和“211”工程，让学校平等竞争；取消一本、二本、三本、高职、高专，让学生平等竞争；在社会用人制度方面，取消学历歧视，打破学历门槛，真正回归重视能力的选拔，这才是我们高等教育改革的方向。而我们现在关注的是教育的等级，而不是教育的质量。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悲哀的现实，中国现在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到30%，但我们的高考焦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为什么？因为我们只追求上一本。在很多地方，上不了一本就不是上大学，这样下去

能有希望吗？中国教育要有出路，就是让各类教育平等竞争；中国学生要有出路，就不能只盯着一本，而是进任何学校都学有所成。

## 教育危机酿成国家危机

**盗火者：**中国的教育改革，能否完全由政府自上而下地推进？

**熊丙奇：**自上而下的改革是我们期待的，但是要推进这个自上而下的改革，就需要自下而上的参与。2010年，国家制订了《中长期教育改革规划纲要》，但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这种自上而下的行动，因此非常不乐观。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需要更多的自下而上的力量，包括一线的教师、学生。这几年，我们不断看到有学生开始通过微博、博客曝光侵害学生权利的事件，也有学生通过撕书、焚书表达压抑和不满，这都是学生权利意识觉醒的表现。家长选择在家上学，老师对教育制度提出批评，这些都是推进教育改革的力量。同时，企业家要参与到改革中来。企业是教育的最大用户，学生最终要符合企业的要求，现在不是招工难吗？人才是第一竞争力，中国的企业已经开始有这种焦虑了，但是不敢发言，发言之后会受到政策上的制约。中国很多富豪对教育很不满，而表达不满的方式就是选择移民。这对中国是不利的。

**盗火者：**企业能以什么方式参与呢？

**熊丙奇：**第一，改革用人制度，不看学历，只看能力。只要企业做出这个改变，社会价值观马上就改变了。第二，企业可以参与办学，帮学生建立实习平台，设立奖学金，甚至捐建实验室，设置一门课程，这都是可以去做的。

企业家也可以通过自己的社会影响力，以自己的教育观、人才观的改变为起点，参与校企合作，推进教育改革，这在国外都有成功的先例和模式，没有那么难的。

还有就是 NGO 的参与，做政府没做的事，包括向政府建言、参与学校的师资培训、贫困学生的救济等。

这种自下而上的力量强大了，自然会推进自上而下的改革。当然，自上而下的改革还是越早启动越好，虽然有很多既得利益团体不愿意推进，但有些时候因形势所逼也不得不为。我们现在面临着非常严重的教育危机，如果不重视，会演变成深刻的社会危机。千万不要觉得这是危言耸听，要知道，美国动不动就会把教育问题上升到国家危机层面。1983 年美国出台了一个报告叫《国家正在危机中》，讲的就是美国的基础教育问题。

## 合作办学不如分校模式

**盗火者：**现在有一批中外合办的大学开始登陆中国，有些人对此寄予厚望，您好像不是很赞同？

**熊丙奇：**我不认为现在中外合作办学的模式，会对中国的教育改革产生多大触动。中国的教育改革，需要更加开放，而开放最主要的方式，应该是引进国外的大学来中国直接办分校，让他们自主招生、自主办学、自授学位，这样才能在中国高等教育里产生竞争的压力。而中外合作办学的模式，起不到这些作用。由于招生和管理纳入内地统一的高等教育体系，所以他们实际上就是一所体制内的学校。

我去年参加了卡塔尔的实践教育创新论坛，卡塔尔在新世纪开始之后做出了一个战略——引进世界一流大学去办分校，他们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引进了八所最著名的院校，采取的模式就是分校模式。我们办了多少年了？到现在中国国内只有三所类似的学校，接下来可能开始增加了，但增加的学校全是中外合作办学的，只是在中国找一所母体学校，招生计划、办学模式、课程都要经过审批。世界一流大学，基本上都是自主办学、教授治校、学生自治，我们中国哪一所学校能够做到？加州大学有一次涨学费，学生全部起来反对，学校里面贴满了标语，说我们以学校为耻，要校长下台。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国内的大学，你觉得会怎样？

**盗火者：**您认为政府应该怎么转变职能？

**熊丙奇：**政府不要干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要让学校有高度的独立性，这是最核心的地方。如果校长是行政任命的，那学校要做到学术自由、教授治校是根本不可能的。

**盗火者：**教育部最近批准了许多中外办学的项目，是不是表明他在下决心改呢？

**熊丙奇：**没有，这是两码事。他只是引进优质教育资源来办学，并没有说要促进中国教育的改革。现在很多地区把国际化办学当成政绩亮点，鼓励各个地方引进海外的优质学校来办学，却都采取合作办学模式。我们要看到，它的运作是有很大问题的。因为采取合作办学模式，海外学校从经济角度的考量就比较多，会收取巨额学费，当地政府还要大量贴补，可能几个亿。这个问题如果公开会引起大家的置疑，你为什么花这么多钱去建一所国际学校？为什么不把它纳入分校模式中？如果是分校，这个学校就是独立运营，就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募款，学生的学费可

能只补贴一部分资金。但现在这个模式，学校实际上是只赚不赔的，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也不可能真心纳入全球的募款体系中来，反正钱不够了，找政府要呗。

**盗火者：**整个过程，会让它失去独立性。

**熊丙奇：**对，越依靠政府部门，你的独立性就越弱，全球范围都一样。美国私立学校的独立性肯定高于公立学校。财政的独立是学校独立的根本所在。

## 扩大受教育者的权利，才是真改革

**盗火者：**南科大走到今天这一步，您怎么看？

**熊丙奇：**南科大最初提出的改革理念，是很令人振奋的，有两个方面的理由。第一，南科大提出要去官化、去行政化、自主招生、自授学位。作为一个学校，有这样的想法非常好，而且这个改革也符合中国教育改革的方向。因此，我们曾一度把南科大看做中国教育改革的一个样板。然而，我们看到，首先是深圳市政府出面给南科大招局长级别的副校长，这就意味着南科大的去官化、去行政化改革遭遇到严重阻力。第二，深圳成立了南科大理事会，这是好事。但是大学理事会的成立，应该有一种广泛性、代表性，不能政府任命，应该民选。但实际上，最后任命的官员占的比例相当之高。虽然建立了大学理事会，但这个理事会可能比没有还要糟糕，很多决策，貌似是通过大学理事会做出的，实际上还是一种行政决策。第三，财政上没有建立一个南科大的基金会，要钱还是向政府报批，审批过程非常漫长。同时，政府也会通过财权来干涉学校

的办学自主权。

**盗火者：**在采访朱清时校长时，他说现在寄予厚望的就是基金会，他希望这个基金会尽快建立起来，很多企业也表示了兴趣。

**熊丙奇：**我曾经跟朱校长说，要设立一个南科大基金会来支持南科大的建设。卡塔尔有教育科研和社区发展基金会，是政府出资的一个私人性质的基金会。卡塔尔的整体教育发展、科研发展、社区发展都是通过基金会来运作的，而我们现在很多民办学校没有理顺机制。怎样让民办学校保持它的公益性呢？应成立一个基金会，基金会下面设立大学理事会，选拔校长，这才是一个合理的方式。我们现在是向政府要钱。南科大需要的资金是很大的，那为什么不能成立一个南科大教育发展基金会？一部分资金来自政府，一部分资金来自社会捐赠，公开透明，然后由理事会决定怎么用这些钱。去行政化就应该有实质的行动，财权、人事权不下放给学校，还紧紧地握在政府部门手中，怎么去行政化呢？

我们现在很多教育改革是走错方向的，说是改革，但后来发现都是反改革或伪改革。我评价改革只有一个标准，就是受教育者的权利有没有扩大。如果受教育者的权利扩大了，就是真改革；如果受教育者的权利没有增大，就是伪改革；如果受教育者的权利反而减少了，就是反改革。

## 附录一

## 课堂实录：鸦片战争的影响

授课教师：魏勇

师：同学们好！今天我们是第一次见面，大家可能不认识我？先作一个自我介绍，我的名字叫魏勇，简单地说，我是一个有问题的人，一个有严重问题的人，我想培养同样有问题的学生。下面问题开始了，请大家注意。今天我们这里有些同学是学理科的，以后高考不会考历史，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学历史？

生：可以以史为鉴。知道历史，可以懂道理，尤其是做人的道理。

师：这是关于这个问题最主流的看法，大方向是对的，但还可以具体一点。我们学历史是为了分享前人的生存智慧，了解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以便我们能够对现实的挑战做出正确的回应。今天发了资料，是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从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很多。要追问历史，首先要再现历史。请大家回忆一下《南京条约》的内容，共四点：割地，赔款，开放口岸，协定关税。哪位同学具体说说，这里有话筒，可以大胆一点。

生：割让香港岛给中国（众人笑）。不对，是给英国。

师：你不要紧张，我才紧张。下面有很多老师用内行的眼光看着我，你没看见我刚才去喝了口水吗？

生：赔款 2100 万银元；开放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英商进出口的关税，中国需与英方商定。

师：这位同学记得又快又完整。下面再挑战一下《南京条约》附件的内容，即《虎门条约》和《五口通商章程》。快速记忆，时间一分钟，抓紧。

哪位同学愿意说一说附件的内容？

生：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租赁土地建造房屋永久使用权。

师：这后来就成了一个产物……？

生：租界。

师：记得不错。还有一个，中美《望厦条约》

生：第一是美国军舰可以到通商口岸巡查贸易，第二是美国人可以在通商口岸建立教堂和医院。

师：说得很好，为什么不举手呢？你的眼神告诉我你知道。

最后一个，中法《黄浦条约》。我们时间稍短一点，因为我相信记忆越用越好。

生：外国人除了享有《望厦条约》一切特权外，还可以在中国通商口岸传教、建造坟墓，中国政府需派兵保护。

师：非常好，历史了解到这一步，我们基本完成了任务，下面我们就来追问历史、反思历史。假如我们就是鸦片战争时期的中国人，洋人提出这些条约，我们能不能答应呢？当然，我们战败了，必然要付出代价。但是我们还是想一下，哪些条约内容我们可以接受，哪些我们不能接受，哪些又是说不清的？我们同学好比是道光皇帝时期的文武百官，议一议，提出意见给我，就当我是那个勤奋而平庸的道光皇帝，请众爱卿认真对待军国大事，提出你的奏折和建议。记住，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

（学生热烈讨论）

师：哪位同学，哦不是，哪位大臣说说看法？

生1：我觉得可以接受的是中美《望厦条约》里面的建立医院。

师：为什么？

生1：因为西方可以帮助中国医学进步。不能接受的是割地，因为破坏中国的领土主权，还有五口通商，它破坏了贸易。（有学生不赞成）

生2：我不赞成把五口通商划入不可接受的那一类，开放可以扩大对外贸易，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我不同意的是赔款。我觉得五口通商是可以接受的。

师：对于通商这一条，赞成可接受的或赞成不可接受的，你们有没有要补充的理由？

（同学举手）

生1：清王朝以封建自给自足经济为主体，不宜开放。

生2：我认为开放了之后可以促进与各国的贸易，打破闭关锁国，是一种进步的表现。

生1：我认为不能这样说，输入的是鸦片，鸦片是坏的。

生2：但是开放的不仅是鸦片啊。

师：是呀，开放是不是只把鸦片带入了中国？当然不是。你们知道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目的吗？

生：扭转贸易逆差。

师：所以英国的目的不仅仅是输入鸦片这么简单。继续讨论。

生：开放通商口岸有副作用，它破坏了清朝自然经济的生长。

师：自然经济是先进还是落后的？

生：落后。

师：落后的东西被破坏不是很好吗？

生：中外经济的落差太大，我国需要慢慢发展。

师：所以，一下不能适应，应该慢慢破坏？（众笑）

生：我觉得五口的开放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

师：那你对通商口岸的开放究竟持什么态度？

生：对加速清王朝灭亡这点我持肯定态度，所以，总的来说，我改成说不清楚。

师：看来这位同学的想法作了一定调整，变成说不清，究竟能不能说清呢？这五个口岸现在的状况如何呢？

生：发达。

师：大家知道上海是现在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但是当时只是一个县，元朝的时候叫松江县。在清朝时，上海并不占优势。由于近代以来外国的侵略，我们被迫开放，由于开放，沿海地区发展了，没有被侵略的地方保持了原来的样子，相对发展缓慢，侵略是否有理？我们该如何评价？

（学生沉默）

师：这个问题有相当的难度，也是史学界争论得比较激烈的问题。我们需要用更多的史料来说话，所以把这个问题放到课后，也许我们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来探讨。继续看课文，还有哪些条款是可接受的，哪些是不可接受的？

生1：中英《南京条约》中，赔款是不可接受的，因为要支付赔款，清政府就要加重对劳动者的剥削，人民更苦、更穷。我觉得协定关税应该是说不清。我不知道这对中国有什么坏处，觉得肯定是对英国好处比较大，对中国也许是有利的。

师：同学们同意吗？

生2：不同意。我想协定关税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如果英国进出口关税再由中英协商，中国就失去了关税自主权。

师：失去了关税自主权有什么影响呢？

生 2：我们的税收会减少。

师：这位同学说得有道理，但是关税不能自主的危害不仅仅是税收可能减少的问题，还有其他的危害。大家知道不知道什么是关税？

生 3：我知道，关税是外国商品运到中国，由中国政府征收的一种税。

师：基本正确。那么是不是关税越多，国家的收入就越多？

生 3：也不是，因为关税太高，外国商品就不容易进入中国市场，而我国需要他们的商品，就会影响经济。太低，商品进入得多，也会影响中国经济。

师：有道理。

生 2：我放在不可接受里面。英国主要目的是赚钱，占领中国市场。

师：我个人认为……好，既然还有同学举手，那就请这位同学发言。

生 4：是说不清楚的。因为英国和中国商定关税的税率，应该是很低的。既然关税太低不好，为什么中国现在实行零关税呢？

师：反问得好！请刚才认为关税过低不好的那位同学解答。

生 2：首先是现在中国商品在某些方面比较落后，需要进口补充，所以征收的关税比较低，以鼓励进口。

师：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但如果让外国商品比较畅通地进入中国，对我们的同类商品是不是有利？

生 2：补充一下，我们需要进口的应该是技术。

师：如果这样，对中国发展就有利了吗？

生 2：会有利……

师：不见得，引进技术可能比单纯进口商品有利，但未必一定有利，比如现在我国大众轿车引进的是德国技术，但缺乏自主知识产权，利润

大多被德方享有。我同意这个结论，即协定关税这项要求是不可接受的，但我不太同意你的理由。关税是一种贸易壁垒，除了增加国家收入这个作用外，还有保护本国幼稚产业的功能。哪位同学愿意继续阐述？

生 5：我觉得低关税产品恰恰应该是中国有竞争优势的，而不是弱势产品，比如现在的家电。为什么？因为咱们有实力，能够与同类外国产品竞争，不需要保护，所以关税低；反之，我们没有相对优势的产品才需要关税保护，所以比较落后的产业，我国征收的关税往往比较高。

（同学鼓掌）

师：感谢这位同学给我们进行了非常专业的论述。事实上，我国目前征收零关税产品是极少的，据我所知，也就只有对台湾某些农产品和水果实行零关税，这里面主要还是基于统战的考虑，算的是政治账而非经济账，这个例子不能作为关税低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论据。为什么我说是不可接受呢？还有一个理由，请同学们想一想。

生 6：关税优惠应该是相互的，不是单方面的，不能说我们的产品进入英国市场时，却不能享受商定关税的权利。

师：这位同学很有洞察力。我们现在加入 WTO，降低了一些商品的关税，但这是互惠的，别人也会降低我们某些商品的关税，请同学举一个例子。

生 7：我们逐年降低了汽车进口的关税，而西方国家则逐年降低了对我国纺织品征收的关税。

师：这位同学总结得好。所以我们把协定关税纳入不可接受的范围。下面我们继续讨论其他条款。领事裁判权，大家如何看待？在正式讨论之前，我们先要弄清楚领事裁判权的概念，大家来复习一下。请一个同学起来朗读一下。（出示课件）

领事裁判权的基本内容：①中国人与享有领事裁判权国家的侨民间的民事刑事诉讼案件均依被告主义原则适用法律和实行司法管辖。②享有领事裁判权的国家的侨民之间的争讼由所属国领事法院或相应机关审理，中国司法官员一律不得过问。③不同国家的侨民之间的争讼，一般均适用被告主义原则，由被告一方所属国法院或相应机关审理，中国司法官员亦不得过问。④享有领事裁判权的国家的侨民与非享有领事裁判权的国家的侨民之间的争讼案件，如前者是被告则适用被告主义，如后者是被告则由中国法院管辖。

（学生朗读）

师：它的主题是什么？

生1：当外国人在中国领土上和中国人发生司法纠纷的时候，外国人不受中国法律的管辖。

师：大家觉得能接受吗？

生2：不可接受。

师：为什么？说出理由。

生2：因为外国人在中国犯罪，如果不加以制裁，会引起中国人不满，这样就不能安抚民心，可能会发生暴乱。

师：同学的回答是从统治者的利益受到损害的角度来看的。问题是，老百姓的感受你考虑了吗？

生3：中国人的民族感情会受到伤害。

师：有道理。不过这个问题不这么简单。为什么洋人要提出这一条？大家回忆一下，清朝时中国的司法体制是怎样的？大家把在电影或电视上看过知府或者知县审案的情况描述一下。

生1：一般是这样的，衙役们高举着回避的牌子，口喊“威——武——”，然后大老爷升堂：“刁民你招还是不招？”知府大人惊堂木一拍：“给我拖下去重打四十大板。”（众笑）

师：这是当时中国的司法状况，当时的英国呢？

生1：法官和律师都戴着假发，法庭可以辩论。

生2：英国废除了肉刑，允许辩护、上诉，有初审、复审、终审等一套完整的程序来尽量防止冤狱。

师：假如你作为一个外国人，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国度，不幸和当地人发生了司法纠纷，那么，你希望在什么司法体系下进行裁决？

生：英国的那种体系。

师：是呀，人人都希望自己能得到文明公正的审判，我们不能不承认一个痛苦而基本的事实，西方的法律体系比中国的更加文明。见到知县，草民必须下跪，单单是这一点西方人就不能接受。除了上帝，西方人不对任何人下跪，包括国王。大家觉得可以理解吗？

生：可以理解。

师：如果可以理解，那外国人就理所当然地可以在中国横行霸道了？中国还要不要自己的司法主权？这似乎是一个两难选择，怎么办？你能否尝试设计一个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

（学生沉默）

师：这里有一个材料，可以给大家一个启示。日本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产生和废除的过程，大家看看。我们参照日本，想想中国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出示课件）

1853年5月26日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官佩里率领军舰航行日

本，于1854年（安政1年）3月31日缔结了日美亲善条约（即所谓安政条约）始，日本在列强舰队的频繁“来航”和强烈要求之下，相继缔结了日英亲善条约（1854年10月14日）、日俄亲善条约（1855年2月7日）、法国舰队司令官凯兰与琉球缔结的亲善条约（1855年11月24日）、日荷追加条约（1855年10月16日）等一系列条约。根据一系列的“条约”，众列强取得了增开港口和开放城市、给予列强领事裁判权、议定关税、允许外国人在开放地区永久居住并有不受限制的贸易权。

——刘宗绪主编：《世界近代史》

日本法制史学者福岛正夫指出，这个鸦片战争（1840年）以来蒙受西欧列强直接侵略，被抛入半殖民地境地遭受异民族统治的大国，给为维护民族独立和谋求各方面发展的日本，提供了具有生死意义的教训。在日本近代法的形成方面，绝不能重蹈清国命运的覆辙这样一种信念在各个方面发挥着强烈的作用。

——福岛正夫编：《日本近代法制的形成》

民法法典的重要，不仅因为它是构成私法根和干的法律，在法律制度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且其在质量上，实是日本有史以来最早的大法典，还因为其制定是为在明治时代日本最大事业之一的治外法权的废除作出了巨大贡献的法典，是在日本史上具有极其重大意义的法典。

——星野通：《明治民法编纂史研究》

师：我们来看这三个材料，讲的什么情况？像学语文一样，概括中心思想。

生：材料一讲的是日本遭受西方列强侵略的情况。材料二是日本学者指出的，中国事件给日本提出了具有生死意义的教训。材料三讲日本民法典的制定为废除治外法权创造了条件。

师：概括得很好。解释一下，治外法权指的就是领事裁判权。日本是这样处理的：明治政府上台后，一方面以天皇的名义对外承认了幕府所签条约，承认领事裁判权等有其合理性，一方面对内强调将努力修改条约。但遭遇列强的拒绝，理由之一就是日本不开化，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日本各项制度还没有与西方接轨。为了接轨并进而使领事裁判权（治外法权）等不平等权利丧失其存在于日本的合理性，1886年前后，日本外相井上馨主张“改变攘夷锁国之感情”，“进化到泰西文明，在亚洲创造泰西文明国同胞之一”，“改善文物制度，俾使我国地位与泰西诸国无大差异”。这样，日本为修约做出了四十多年的改革和外交努力才最终废除了所有不平等条约，又推动了社会进步。大家想一想，对待领事裁判权，我们中国是什么方式？

生1：谴责。

生2：愤怒。

师：有没有想过洋人提出领事裁判权也许有其合理的一面？

生：没有。

师：中国和日本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有什么区别？

生1：中国缺乏反思。

生2：在废除不平等条约方面，中国的效果没有日本好。

师：为什么没有日本的效果好？

生 3：因为我们缺乏反省。

生 4：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国力比中国强盛。

师：四位同学都讲得有一定道理，最后一位同学分析得更加全面。

那我们应该怎么应对挑战呢？

生：我们在面对外敌挑战时，既要勇敢应战，更要自我反省、改革内政、强大自身。

师：同学们的思想越来越锐利。真正的爱国不是建立在一味的仇视西方列强的情绪上，而是建立在自我反省的理性基础上。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有句名言：“爱国主义有两种，一是本能的爱国主义，二是理性的爱国主义。”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爱国主义？

生：（齐答）理性的爱国主义。

师：下面我们继续对条约进行甄别。

生：片面最惠国待遇应该是说不清的，因为我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意思。

师：今天的世界还存在这个概念吗？

生：存在。

师：现在可接受吗？

生：可以。

师：什么是最惠国待遇？

（学生沉默）

师：那我们先看看它的定义。（出示课件）

最惠国待遇，是国际经济贸易关系中常用的一项制度，又称“无歧视待遇”。它通常指的是缔约国双方在通商、航海、关税、公民

法律地位等方面相互给予的不低于现时或将来给予任何第三国的优惠、特权或豁免待遇。条约中规定这种待遇的条文称“最惠国条款”。

师：请同学用自己的语言概括一下。

生：中国给予了英国以外的国家某种权利，英国也将自动享有，这就是最惠国待遇。

师：基本准确。最惠国待遇本来是国与国之间相互给予对方在贸易、关税等方面的权利，这是正常的国际关系。但是当时我们得到的最惠国待遇有一个限定定语——“片面”，意思是什么？

生：英国只要求中国给他待遇，而不让中国享有该待遇。

师：是否可以接受？

生：不可接受。

师：还有其他的。美国军舰在通商口岸巡查贸易以及传教等权利，我们都需要一一加以辨别。由于时间关系，请大家在课后继续辨析。凡是敌人赞成的我们就反对，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把矛盾双方的斗争绝对化了，没有了双赢的概念。所以学历史更多的是要学习思考问题的方式。下面我们再来思考战争对中国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的课本是怎样概括鸦片战争对中国的影响的？

生：鸦片战争是资本主义的英国用武器打破中国大门的侵略战争，导致社会性质变化，社会主要矛盾变化，革命的任务变化。

师：概括得很好。那么，哪一个变化是最根本的变化？为什么？

生：社会性质的变化。因为这个变化影响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和革命任务的变化。

师：非常好。那社会性质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生：从封建社会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师：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含义是什么？（出示课件）

“半殖民地半封建”不能理解为一半是殖民地一半是封建的，也不能理解为政治上是殖民地，经济上是封建的。“半殖民地”是指丧失了部分而不是全部的独立自主权；“半封建”是指既保存了封建主义，又发展了资本主义。“半殖民”和“半封建”都有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内涵。

师：需要说明的是，这不是一个学术概念，而是一个政治概念，最初由列宁提出，后来在中共三大文件里有明确阐述，而在西方学术界没有这个概念。了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含义，主要是因为这是考试的一个重点。让我们抛开考试，结合自己所看过的电影、电视、图片、历史资料等，直观地谈谈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社会变化。

生1：有了机器，有了工厂。

生2：有了外国军舰，有了租界。

生3：以后还有了铁路、矿山、轮船。

师：同学们列举了一些直观的变化，能不能对这些直观的变化进行抽象，用一两句话概括鸦片战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生：一方面中国开始受西方的压迫，另一方面也有可能丰富了老百姓的生活，使中国走向现代。

师：对。这位同学说到了一个关键词——“走向现代”，我觉得这是我们理解鸦片战争影响的一把钥匙。鸦片战争是中国从古代走向近代、现代的起点，所以才把1840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我们在初中学

过中国近代史，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走向近现代的过程是顺利的吗？

生：（齐答）不顺利。

师：我们应该从这场战争中反思什么？我们先不急着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的前人用了一个半世纪来思考，直到今天，这种思考仍未结束。我们不妨来看看日本人在受辱后是怎么反思的。（出示课件，配乐《走向共和》片尾曲）

这是日本首相吉田茂的一段话：

所谓文明本来就是一个整体，并不能单独使用它某一部门的科学文明。例如：为了要求西方的军舰和武器，就必须建设生产它的造船厂和兵工厂；而为了有效地发挥造船厂和兵工厂的技术，又必须使构成基础的经济活动顺利开展。于是，这便同以追求利润为不道德的儒家伦理发生了矛盾。因此，要拥有军舰就不能不使该国的文化深受影响。

——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

这段话如此重要，以至于可以作为中国在反思时的一面镜子，我愿意把这段话提供给大家思考。

下课。

## 附录二

## 课堂实录：如何给《南方周末》评论版投稿

授课教师：郭初阳

师：同学们好。

生：老师好。

师：请坐。大家看郭老师手上有一份报纸，这份报纸的名字叫……  
(举起报纸)

生：《南方周末》。

师：对，大家以后看到这份报纸，都要知道它每逢周四出版，在报刊亭可以买到；而且《南方周末》这四个字，是——鲁迅写的（有同学知道，很了不起）。《南方周末》上有一个版面叫评论版，今天讲义上的这些文章都来自于各期的《南方周末》，总共八篇。这些文章绝大部分都是小学生写的，最小的是一年级，比各位五年级小很多，当然也有六年级的同学写的，还有两篇是成年人写的。大家还有一点时间，请把这八篇文章默读一下，等一会儿我会邀请你站起来，选择其中的一篇来朗读，就读你最想读的那一篇，然后说一说你为什么选这篇。好，请各位准备一下。

(生默读)

师：我们这样，同桌配合一下，等会儿一组一组地请同学站起来，一位同学读，另外一位同学说一说为什么要选这一篇。

（同桌商量）

师：好，请抬起头来，有谁已经完全准备好了，想给大家示范一下？

（一组同学举手，师递话筒）好，你们自己分工，一位同学朗读，另外一位同学给我们说一说，为什么选这一篇来读？

生：我要读《点滴推动胜过抱怨》。（朗读）

同事姜雄坐火车出差。进站时，警察拦住他要查验身份证。姜雄脸上留了络腮胡，看上去不是个“好人”。姜雄说：“看我的身份证可以，但是我要先看你的证件。”警察勃然大怒，多年来都没碰到过这种事。警察没有携带证件，无法出示。姜雄不依不饶：“今天你不给我看你的证件，我是不会给你看我的证件的。”吵闹声引来了警察的上司。上司也没辙，只好让他走了。姜雄出差回来后，仍一次次打电话投诉。最后，公安局有关领导与那名警察上门来道歉。

姜雄说：“大家都在抱怨这个世道很糟糕，如果你连自己的权利都不去争取，那你又能怪谁呢？”这样的言论应是常识，不过人们多是说说而已。相对于说，做，更有成效。不必求远，不必宏大，你我何不从小事做起，来推动社会一点点变好？

师：非常好，请坐，姜雄要是听到这么好的朗读一定会很开心的。好，请同桌点评一下。

生：我选这篇文章，是因为我觉得社会不是我们一个人能改变的，但要是每人都能改变一点点，相信我们的社会不久之后就会变得十分美好。

师：非常好，请坐。每人改变一点点，整个社会就会好起来，点滴的努力很重要。

第一组的两位同学，给我们起了一个非常好的头，还有没有别的小组想来选文章读一读的？（师递话筒）我们请里边的这两位。

生：我要读《我不喜欢猎人》。（朗读）

语文期中考试有道阅读题。猎人外出打猎，没碰到鹿、狼、野兔，但他没放弃，就算被树枝划破了手指也不在乎。终于他发现了一只布谷鸟，他想打鸟，又看见两只正在听布谷鸟唱歌的小松鼠向他扫了一眼，像在说：听，多美的歌声呀！猎人也被迷住了，也就没打死布谷鸟。问题是：你喜欢这个猎人吗？为什么？

我答道：“不喜欢，因为他是猎人。”这道题我被扣掉两分。老师说，要宽容，因为猎人知错能改。我知道我的表达有问题，但猎人为什么那么晚才知错能改？他以前没听过小鸟哭泣、鹿儿哀求、老虎咆哮？再说他这次不杀死小鸟，不等于他以后不会杀其他动物呀。

师：说一说你们为什么选这篇？

生：因为有时候我也跟他有同感，跟老师要求的意愿不相同，但是为了能得分，不得不写违背自己意愿的话，我希望以后老师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判分。

师：最好这两分不要扣掉，又能写出真实的想法，能得分。

（生点头）

师：看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碰到这样的场景。好，第三组同学打

算选择哪一篇呢？（递话筒）

生：我想读的是《12月13日上〈木笛〉》。（朗读）

学期初，刚拿到语文课本，发现有篇课文叫《木笛》，这是一篇关于南京大屠杀纪念日的文章。从此，我记住了12月13日。2012年12月13日，上学时，我边走边想：要不要去跟教语文的史老师说今天上《木笛》？呵，这样做很有意义，但又怕被老师说我“多事”。我就找好朋友金帅交流了一下，金帅也觉得这主意不错。最后，我们鼓起勇气走到史老师面前要求上《木笛》。没想到，史老师答应了，还表扬了我和金帅。南京大屠杀纪念日那天，我们上《木笛》。我突然觉得，采纳我们建议的史老师比平时更高大了。这节课，同学们似乎比平时更投入了。

师：好，请评论一下。

生：因为每年的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纪念日，当年的这一天，日本人血洗了南京城，而每年的这一天南京上空都会拉响防空警报，这是在警告后人。我觉得在12月13日这一天上与南京大屠杀有关的课文，很有意义，可以教育同学们不忘国耻。

师：非常好，请坐。这篇课文大家都上过吧？

（生摇头）

师：哦，可能我们用的教材有点不一样。要是在南京，在这一天，来上这篇跟南京大屠杀有关的文章，会让人印象特别深刻，它的含义会很不同。所以这个建议还是挺合理的。

## 变成编辑 I：范例与方法

师：好，我们刚才请了三组同学，选择这八篇文章里的三篇来朗读，也做了一点分析。接下来我希望大家能够转换一下角色，因为这些文章都是发表在《南方周末》评论版上的，而很多小学生希望自己的名字有一天也能出现在这份报纸的评论版上。那么，怎样才有可能让你的名字出现在这上面呢？

我希望各位现在转换一下角色，假设你是《南方周末》评论版的编辑，然后请你以这八篇文章为例，来给小学五年级的学生讲解一下：“小朋友，文章要这样写，才有可能刊发在评论版上面……”先请各位研究一下，等会儿我想请你讲解讲解，至少给出三条标准，或者三种方法，或者三个原则，诸如此类……

（生默读、思考；师巡视，适时补充说明）

师：什么样的文章才有可能被刊登在这个版面上呢？请各位准备一支笔，圈画一下，做一些笔记，可以帮助你思考。有没有发现这些文章的一些共同点。我希望每个同学都写三点，你的文章如果这三点都满足的话，就有可能被报纸采用。

有同学速度超快，已经完成了。（师最后绕行班级一周，查看学生书写情况）各位做得很好，你可以用一个很短的句子来表达，甚至可以用一个词语来表达，都很好。

我们马上要开始讨论了，在讨论开始之前，无论如何你要想三点，不要只想一点哦。

## 变成编辑Ⅱ：四人小组讨论

师：好，接下来我们分一下组，四人一组，小组讨论的时候，每人交换一下彼此的看法。如果每人发现了三点，那么四个人就有十二点了，也许会有些重合。大约有三到五分钟的时间来讨论，讨论完了，老师会邀请小组里的同学，依次来说说自己的发现是什么，我们会在黑板上罗列一下。好，前排同学转过来，前后四个人，讨论一下。

（小组讨论五分钟）

师：小组讨论有一点点成果了，接下来还有一两分钟时间，我希望各位把自己的讨论所得，用非常简练的话概括——因为等会儿老师要把你的观点写到黑板上，你不能说四百个字让我写哦——把你们讨论所得提炼一下，最后一点时间。

（小组继续讨论）

## 变成编辑Ⅲ：全班交流

师：好，请各位都转过来，我们按照顺序，公平一点；也就是说我们先走一轮，每个小组请一位同学。第一轮，我们请每个小组的A同学（师指点示意）来讲；如果意犹未尽，就继续请同桌B同学来讲，补充到我们不能再补充为止。还有个话筒在哪里？好，我们先请第一组的A同学，给我们讲述一点你们探讨之后的发现。

生：我是这样认为的，首先要敢于说真话，说出自己内心的想法，贴近生活，然后为民众考虑。

师：请坐，我们只能围绕一点来噢。敢于说真话，说出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师板书：说真话，内心）很好，把话筒往后传，继续补充。

生：我们这组讨论的是：题目新颖，主题明确，语言精炼。

师：稍等，我们就来探讨一下题目。（师板书：题目）关于题目的问题，你们有什么发现，这些题目有什么共同点？

生：题目是新颖的。

师：可以举一个例子吗？

生：比如说《12月13日上〈木笛〉》。

师：的确，这个标题呈现了一种非常新颖的观点。关于题目，除了新颖之外，还有什么特点？

生：主题明确。

师：好，请坐。后面的小组可以继续补充哦，如果你们探讨的也是这个问题的话。好，继续来，你们组。

生：要有现象和具体证据，以让人信服。

师：（板书：现象 + 证据 = 信）针对一个现象，你要出示证据，才可以让人来相信它。非常好的概括！第四组。

（生沉吟）

师：你可以提供新的观点，也可以就上面的观点做一些补充。

生：我觉得，必须要有自己的看法，然后才能让别人相信你的观点。

师：也就是说，在说出自己内心想法的时候，并不仅仅只是一种情感态度，更多的是要有自己的“看法”，对不对？（板书：看法）很好，请坐。（示意）继续补充。

生：我认为像《我想上体育课》这篇文章里，说到“在刚刚过去的全国两会上，温家宝爷爷……”，引用了温家宝爷爷的话，然后就增强

了说服力。

师：（板书：引用）请坐。这是一种非常聪明的文学技巧，当你想让别人相信你的话，想让自己的话变得更有力量的时候，你可以适当引用某个知名人物，让他来帮你说话。这是一个非常敏锐的发现，很好。

（示意）把话筒往那边传，请讲。

生：我觉得在“说真心话”那一边，可以加上要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师：怎么讲？

生：就是不一定跟大家看法都一样。

师：可以举一个例子吗？（板书：独到见解）

生：比如说《我不喜欢猎人》这篇文章，作者说“我不喜欢，因为他是猎人”；老师说要宽容，因为猎人知错就改，而作者不这样认为。

师：也就是说，学生的见解和老师的见解，是不一样的。而且说出这个观点之后，还会被扣分，但是这个见解却是非常独到的。如果你有一个独到的见解，你愿意把它说出来吗？

生：我愿意把它说出来。

师：如果会被扣分呢？

生：我觉得我可以跟老师探讨。

师：可以跟老师来探讨一下。当然，我们都能体会到，说出一个独到的见解还是需要那么一点点……

众生：技巧、勇气。

师：嗯，有同学说“技巧”，有同学说“勇气”，都很需要。请坐。（板书：技巧、勇气）继续。

生：首先，他们这几篇文章都有自己的观点，不是人云亦云；其次，写出了自己内心的感受，是从我们孩子的角度来写的；第三，都针对每

件事提出了建议。总而言之，是有自己的观念和真情实感。我觉得可以用三个字来概括一下，就是：真、实、感。

师：太好了，你最后终于用三个字来概括了。语文老师真的好可怜，你不能把所有的弹药都射过来啊。最后那三个字，再说一遍好吗？

生：真、实、感。

师：请坐。（板书：实、感）这个概括很有意思，这个“真”我们都很明确，说真话，说内心的想法，还有一个“实”，这个“实”怎么讲？

生：“实”的意思就是实实在在的，不像浮云一样随便乱讲。

师：是负责任的，是这个意思吧，请坐。我还想再听听其他同学的想法，关于“实”和“感”，你还有补充吗？

生：我觉得“实”讲的是真实发生的一件事；“感”是这个作者对于这件事的感受、意见或想法。

师：（板书：一件事）哦，请坐，我明白了。看来这个“感”和这个“看法”联系在一起；“实”是一件事，也可以和我们前面所说的“证据”联系在一起，让这件事情更真实。

好，这样一轮下来，我们的讨论成果在黑板上都呈现出来了。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一下你的职业发展方向，当编辑是不错的！我们讨论五分钟，就给出了很多很深刻的见解。

这是第一轮，还有同学觉得这上面说得不够完美，需要补充吗？接下来可以有更自由的发言。谁想补充、修订或者增加？（递话筒）好，请后面这位同学。

生：我觉得文章是可以不论长短的，但是文笔要流畅，要精彩，有详有略，要有重点。

师：非常好，请坐。其实评论版上的这些文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特点，同学一开始说了，这些文章长不长啊？

生：不长。

师：（板书：短）都不长，都挺短的，这是我们可以做到的，文章很短，却很精彩，让人印象很深。还有补充吗？

生：我认为题目不仅要新颖，还要一目了然，能够表达整篇文章的中心。

师：你可以给我们举两个例子吗？

生：比如《我不喜欢猎人》就是这样的，它表达了文章的中心。

师：虽然老师喜欢他，可我就是不喜欢他。题目一目了然地表明了态度。可以再举一个例子吗？

生：《未发夏装，不用穿校服吧》。

师：对啊，我们读一下这个题目，就知道了它要说的核心内容了，非常好，请坐。

各位，在你投稿的文章里面，题目真的是很要紧的。“目”是什么意思？眼睛是吧，做动词是看的意思。“题”什么意思？你看看郭老师就知道“题”是什么意思了，（示意自己的额头）脑门。

（生笑）

师：明白了吗，所以题目题目，就像我们看一个人，看一下你同桌，你看他哪里呀，不就是看这一带嘛（示意头部），对不对，不会说把你的脚趾头给我看一下。所以一篇文章的题目，就像一个人最核心的部分，非常重要。好，还有补充吗？把话筒继续往前传，请那位男生来说一说。

生：这些文章有几个共同的特点：首先，它们的现象都非常简单，直接讲出了什么事，为什么；然后，在评论部分都提出了自己的疑惑；

在最后提出自己想法的部分，观点都非常鲜明，还提出了改进的方法，点明了中心。

师：（板书：简单、疑惑）把你说的倒数第二句话再说一遍好吗，就是点明中心之前的那句话。

生：提出了改进的方案。

师：各位，正如我们刚才这位同学所说的，在独到的见解里，往往都给出了一个改进的方案。（板书：改进方案）这个方案最好还是可以来操作的。所以，给出改进方案这一点特别要紧。

最后我想请一位同学，把黑板上这些内容给我们简单总结一下，谁来？有难度的噢。

（多人举手）

师：（递话筒）真是太喜欢你们了。来，就黑板上这些内容给大家稍稍总结一下，怎么样我们才有可能让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南方周末》上？

生：我们的文章要有事例，要有自己的观点，要有独到的见解，还有就是我们的题目要一目了然，在描写事例的时候，要描写一些简单的现象，文章不要长，只要有内涵就可以。

师：非常好，请坐。都是小学生嘛，写的自然都是我们身边非常简单的事情，这些事情，大还是小？

生：小。

师：非常非常地小，这是非常小的一件事情。（板书：小）但是它跟别人有没有关系呢？

生：有。

师：有关系，跟很多人都有关系。校服你要穿，你同桌要不要穿？

全校的人都要穿啊。对不对，所以你在讲这个小事的时候，其实讲出了很多人内心的想法。

## 我是作者 I：事件与题目

师：各位请拿起笔来。我们每个人有一张方格纸，请在方格纸上写上班级和姓名，写完之后请各位把这张方格纸翻过来。我们先做一件事，请每位同学认真想一想，拟定两个题目，只是题目，一个题目一行。再想两个方案，每个方案只提供题目就可以了。大约有两三分钟的时间思考一下你可以写什么？

（生思考）

师：（巡视、补充）一定是在你身边的，你非常熟悉的一件小事；也是你思考了很久的，你挺想说的一件事；这件事情跟挺多人都有关系，而且这件事好像有那么一点不太合理，你想给点意见，甚至有很好的解决方案。抓住你的灵感，把它写下来，有的同学已经写了一个题目了。

（生继续思考）

师：大部分同学都拟了一个标题，有一半的同学想了两个方案，接下来把你这个想法告诉一下旁边的人，大家交换一下看法。如果你有两个方案，你问问同桌：“你看，我的哪个方案更好？”两个人商量一下，给同桌一点建议。

（同桌讨论）

师：你可以把你的想法跟旁边的人好好聊一聊，如果说你想听一听成年人的意见的话，你也可以举手邀请我，我也愿意表达我的观点。两

三分钟以后，我会邀请同学来说一说。

（同桌继续讨论）

师：再过 60 秒钟，我将要让这个话筒在全班都传一遍，所以各位，擦亮你的题目哦。好，还有一点点时间了。

（同桌继续讨论）

## 我是作者 II：说出我的题目

师：好了，如果你拟定的是两个题目的话，请选择比较优秀的那个就可以了，读一下自己的题目，好不好？我们从这边开始，（递话筒）你的题目是？

生：我想写的题目是《小区车满为患》。就是说我们小区本来地盘就很小，但是很多的外来车辆总是停在小区里。一次，我要上学，爸爸停车的位置左右两头都被堵住了，我们就出不去，只好请妈妈从楼上下下来，骑自行车把我送到学校，差点就迟到了。我觉得，小区本来不是对所有人都开放，最主要的是小区不是停车场，你不应该把自己的车停到小区里，这样就堵塞了交通，给人们带来了不便。

师：请坐，说出了很多人共同的感受，因为车子实在是太多了。等会儿你讲的时候，我希望你的题目，一念，我们都明白，如果觉得很有必要，你再稍做补充。（示意）把话筒往前传好吗，前面的同学，你的题目是？

生：我想的题目是《新疆不盛产小偷》。昨天我在路口看见一个人，他在一个大学生的后头翻口袋，接着赶紧跑回后头的摩托车，开走了。

那个大学生好似丢失了什么东西，翻翻口袋后，焦急地望着四周，寻找那个可恶的小偷。后面的行人都说，那个小偷一定是新疆的，只有新疆人，才会偷别人的东西。我认为新疆不盛产小偷，为什么要把小偷这个罪名压在美丽的新疆上呢？我认为人们的观点是片面的，他应该全面地思考，而不是把原来盛产水果的新疆，改为盛产小偷的新疆。

师：非常好的见解，请坐。新疆，我们知道，盛产的是葡萄干、哈密瓜，《新疆不盛产小偷》这个标题非常一目了然地表达了作者的态度。

（示意）继续来，你的题目是？

生：我的题目是《只为了多赚一点钱》。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我跟父母一起去海南玩，去之前，我们在网上做了功课，听说海南那边的小贩都会赚黑心钱，于是我的爸妈就带着一个弹簧秤去了。

师：你爸妈好有远见。

（众笑）

生：那天我们下楼去买水果，一个小贩在那里，我爸妈挑了几个山竹，说你帮我称一下，于是那个小贩就拿出了一个秤，那个秤是他做过手脚的，就十个山竹，他称出来竟然有八斤。

师：天哪，这么重的山竹。

生：我爸爸感觉很奇怪，就问那个小贩怎么回事，小贩说：“你们不信，我再换一个秤称一下。”其实那个秤也是做过手脚的，一称还是八斤，爸爸说，那我们买了吧，于是就回宾馆了。结果拿弹簧秤一称，只有三斤。这个小贩真会赚黑心钱，看来这些商人不值得我们信任，以后我们买东西的时候可一定要注意。

师：非常流畅的一篇叙事。但郭老师有个建议很希望你转告爸爸妈妈，既然弹簧秤都已经带过去了，为什么不随身携带呢，没派上用场嘛，

可惜了。

（众笑）

师：请坐。（示意）继续往前。

生：我讲的是《吐瓜子的启示》。我每次都是步行回家，经常会看到形形色色的人。有一次我看见一个漂亮阿姨在嗑瓜子，我本以为她会像其他人一样，把瓜子壳吐得满地都是，但是我很惊奇地发现，她非常有公民意识，拿了一个塑料袋，把瓜子壳都吐在塑料袋里了。但是我也想给她提一点意见：一个亭亭玉立的阿姨，在街上嗑瓜子，形象很不雅观。

师：请坐。虽然拿了一个塑料袋，依然有损形象，所以这位同学出了一个改进的方案：最好不要在街上嗑瓜子。有篇文章是丰子恺先生写的，就是关于吃瓜子的，他觉得中国人就在这样“咯啦哒、咯啦哒”的嗑瓜子的声音中消耗了自己的生命。生命多宝贵啊，怎么会有这么多时间来嗑瓜子呢？

哎呀，最后只能再请一位同学了，有没有同学觉得自己这个方案好得不得了，一定要举手来说一说的。（示意举手）来吧，你来。

生：我讲的题目是《吐痰》。现在人们都遍地吐痰，但是我从吐痰这件事里也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之所以有这么多痰，主要是因为南京这边有很多的工业，把空气都污染了，我们会自然产生很多的痰。所以说干什么事情都要先把本质弄清楚了，不能说只解决表面的问题，要先把根打扎实。

师：你的意思是说，要先把这个PM2.5给治好了，我们才可以不吐痰，是吗？

生：把浓烟什么的尽可能地减少之后，起码我们就不会时时刻刻都

觉得嗓子痒了。

师：哦，请坐。这真是一个非常新奇的观点，这位同学给出了一个更为深层次的原因——是不是因为空气不好，才会让我们整天咳嗽不止。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是不是根本就不会有痰呢？这个建议真的是很有意思，没想到雾霾和吐痰之间有着这样一种深层的联系。当然，关于吐痰这个行为，我们自己还是可以控制的，对吗？不管怎样，今天郭老师收获很多，大家说出了很多很有意思的想法。我们知道，这样的文章其实正是评论文章。

## 尾声：批评与赞美

师：请各位把目光转向我们这份讲义第二页的最右下角，有一行很小的字，是法国作家博马舍的一句话，这句话很有名，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生：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

师：再来一遍，一二开始。

生：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

师：抬起头来，我们一起背诵一遍，一二开始。

生：（背诵）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

师：我们要学会批评，要学会建设性的批评，我们要学会怀着一颗爱心来提一些批评意见，因着我们的批评，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郭老师万分渴望看到你们的名字能够出现在《南方周末》评论版上，投稿邮箱讲义上有，你可以定一个计划，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里来做这个尝试。好，今天就上到这里，下课。

生：起立。

师：同学们再见。

生：老师再见。

师：谢谢大家。

### 附录三

## 如何跟孩子谈战争

蔡朝阳

菜虫曾经问我，什么是大扫荡。当时他读小学一年级，正在学语文课文《王二小》。菜虫放学回家，吃点心时，冷不防就问：爸爸，什么叫大扫荡啊？我一怔，大约停滞了几秒钟，就跟他说，大扫荡就是捉迷藏啊。

关于我的这个回答，虽说是一时急智，但其实恰是我与菜虫一贯的交流方式。我常天马行空，给菜虫一些不着边际的解释。比如曾解释“地球是粒费列罗”，而菜虫的“嗯嗯”一直被冲到了厦门鼓浪屿。所以这个解释在不同家庭文化的朋友看来，未免有些轻率，或者简直是在糊弄，而在我与菜虫之间，则顺理成章。

另一方面，这个解释，也符合我的一个观念：我们需要温和地保护孩子的不知情权。

《王二小》一文，出现在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第二册。课文大意想必是个中国人都知道。放牛郎王二小，把敌人带进了八路军的埋伏圈，自己却牺牲了。课文中王二小具体年龄不详，但众所周知是一个儿童革命英雄。《歌唱二小放牛郎》的作曲者李劫夫的儿子李定国在回忆文章中，认为王二小的原型是一位勇斗日寇而光荣牺牲的儿童团员。这一序列里的儿童英雄很多，可以列举如下：刘胡兰、小英雄雨来、潘冬子，

1949年之后还有草原英雄小姐妹、赖宁等。1949年以来的基础教育中，这些小英雄被我们称颂，并需要加以学习。但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的观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时至如今，我们基本上会有一个共识，就是儿童的安全是第一位的。2006年，中国政府通过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其中第40条规定：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和公共场所发生突发事件时，应当优先救护未成年人。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进步标志。那么，我们的教育是不是也应符合这一法律精神，贯彻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意识呢？

国际上，对儿童权利的保护，早有共识。著名的《儿童权利公约》(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CRC)，是一项有关儿童权利的国际公约，联合国在1989年11月20日的会议上通过该公约，并于1990年9月2日生效。该公约第三十八条一共四款内容，直接与战争状态有关：

1. 缔约国承担尊重并确保尊重在武装冲突中对其适用的国际人道主义法律中有关儿童的规则。

2. 缔约国应采取一切可行措施确保未满15岁的人不直接参加敌对行动。

3. 缔约国应避免招募任何未满15岁的人加入武装部队。在招募已满15岁但未满18岁的人时，缔约国应首先考虑年龄最大者。

4. 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律规定，缔约国具有在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人口的义务，应采取一切可行措施保护和照料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儿童。

简言之，战争是军人的事，孩子不应参与其中。对未成年人权利的

保护，可以说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时代，是否文明的标志之一。这样来看，《王二小》一课值得商榷的地方太多了。

就个体而言，孩子在某一时间段关注的内容是不一样的，所谓万物各有其时，孩子若关注到某个具体问题了，我们自应与他讨论。“大扫荡”亦如此，为何我不展开跟他讨论日本的近代化与中国的近代化的纠葛，以及甲午海战以来中日之间的恩怨，那是因为，菜虫七岁的时候，他最关心的，还是台风的风向。当一个孩子还在关心台风的走向时，讨论中日之争显然为时太早。

但吊诡处在于，我的有意回避还是出了一点问题。学完《王二小》一课没多久，菜虫的词汇库里，程度最重、骂人最凶的一个词语，就变成“日本鬼子”了。我若强迫菜虫做某事，他强力抗议，便大骂我是“日本鬼子”。亏得我还给菜虫看了不少美好的日本动画片，包括《哆啦A梦》，宫崎骏什么的。

这样，朋友们对我的质疑就显得尤为尖锐。我说要温和地保护孩子的不知情权，那么，朋友质问：国家保护了吗？在当下的教育体制中，单一价值观的灌输不遗余力，从来不保护孩子们的不知情权，我们家长则是欲保护而不可得。

但我想，温和地保护孩子的不知情权，不是用一种同构的方式去针尖对麦芒，也不是简单告知另一种对立的现成答案，更不是将孩子放在一个温室里用无菌环境保护起来，而是针对不同年龄段、不同认知水准的孩子，以不同的方式、立场乃至腔调，跟他们谈论遇见的问题。所谓保护，并非闭目塞听，而是适时适度。

其实，我很期待菜虫学到另一篇课文，就是《黄继光》。这一篇课文出现在人教版四年级上册的语文教材里。故事内容大凡中国人都知道。

学到这个课文时，我打算与菜虫讨论一些基本的物理学常识。比如，可以提出一个质疑：尽管现在已经无法确切考证，但我们知道，朝鲜战争中美军常用的轻机枪的实际型号为M1919，亦或7.62mm口径、初速每秒792—823米的M1918A2，后者可打穿10mm钢板，能在人体造成的球状冲击波直径接近于一枚鸡蛋，前者的威力亦相差无几，总的来说此类子弹近距离击中人体后一定立即贯穿，黄继光堵枪眼基本上是白搭。

多年以前，“第一线”教育研究小组在审视小学语文教材时，曾提出“事实的缺失”这一批评。现在，《王二小》与《黄继光》两课，也存在着这样的嫌疑。总之，在涉及“战争”这一重大话题时，多数版本的小学语文教材谈得很不专业。

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就不需要跟孩子们谈论战争了，关键在于谈论的方式。法国人碧姬·拉贝在《写给孩子们的哲学启蒙书》第二册里，用了整整一个章节来跟孩子们谈论战争，话题很大，落脚点很小，从争夺一只作为猎物的羚羊说起，谈到联合国与“世界警察”的必要性，有故事有道理，语言幽默风趣。我读到此书时已经年近四十，仍然津津有味，还把其中很多内容拿出来跟菜虫现炒现卖。其实，重大的话题也可以跟孩子谈，关键是用怎样的方式谈。

跟孩子谈战争的书其实并不少，绘本有著名的《大卫之星》和《铁丝网上的小花》，史料有《安妮日记》等，都是可以跟孩子们讨论的。我所列举的 these 与战争有关的作品，有一些基本的共同点，都与菜虫课本里的战争故事迥乎不同。首先，不塑造战争英雄，无论主人公是成年人，还是未成年人。其次，作品里呈现的战争面貌，首先表现为苦难。

北京蒲蒲兰绘本馆曾出版过一套“和平绘本”，由中日韩三国作家联袂创作。第一辑中，有两种是大陆作家的作品，一种是姚红的《迷戏》，

另一种是蔡皋的《火城》。我认为这是国人原创的较好的跟孩子们直接谈战争的书。主题虽是战争，主要谈的却是美。一般而言，国人谈起抗战，便是要铭记、要控诉。而姚红与蔡皋两位作家显然见地不凡。他们没有忘记惨剧，但各国之上，尚有人类在，饶是黑暗的时代，仍有人性之美，这便是人类的高贵之处。

多年前，读黄仁宇《黄河青山》，有这样一个细节，一个日军士兵的尸体，孤独横陈于热带雨林。当时仍是战时，但黄仁宇想见的，却是这个士兵也是一位母亲的孩子。这便是一种超越敌我利害计较之上的人道主义关怀。战争带给人民的灾难是多重的，而最直接的受害者便是青年人以及孩子们。作为交战国另一方的河合隼雄，也在回忆录中有相似的描写。他的哥哥作为军医，战争结束归国，河合隼雄去载满伤员的火车上寻找，兄弟相见万分激动。对河合隼雄而言，激动的原因只有一个——哥哥还活着！作为平民，对于和平的祈愿，不分民族、不论国别，都是相似的。

因而，作为这套绘本主要发起人之一的滨田桂子的著作《和平是什么》，最令我赞叹的地方便在于，她在“和平”这个词语背后，有一种更为宏阔而绵长的价值关怀。战争与和平，都是抽象的概念，怎么跟孩子们解释呢？滨田桂子将这两个概念引入孩子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能近取譬，深入浅出。和平，并不仅仅意味着没有战争，而文明对于暴戾的驯服，使得这个抽象的词，有了具体可感的含义。孩子们日常生活中的争执，若没有规则的指导，便易于走向强权横行。自由，首先意味着规则，意味着责任。和平也是如此，和平是一种生活理念，是一种从此理念出发的生活方式。

时下承平日久，战争在孩子们眼里，自然遥远。就像拉贝在她的书

中说的，法国的孩子，不知道战争已经五十多年了，他们每天睡到自然醒，免于恐惧。和平就在日常之中，有何可贵？几年前，有个叫甘赛尔的德国导演，拍摄了一部名为《浪潮》的电影，讲的是七天之内，纳粹复辟的可能性。之所以这个电影由德国人拍摄，大概就是德国人特别具有反思精神。这个电影告诉我们民主是多么脆弱而独裁是多么易于被蛊惑。和平也一样，因为稀缺、易于被打碎而更加难能可贵，更需要成年人世界的不断反思。在这个意义上，我想说，既要温和地保护孩子们的不知情权，也要积极捍卫孩子们对这些命题的知情权。

## 附录四

# 沙粒的态度

张良

人们所知的沙堆理论是这样的：有一个庞大的沙堆，但并不是固定和静止的。在它的上面，不断有一粒一粒的沙子落下。看起来，这些沙粒对沙堆并不会产生什么影响，连形状都改变不大。但是，在某种神秘规则的作用下，这个庞然大物会毫无预兆地突然坍塌。

内部粘连的力量和外部持续的压力之间，当力量发生逆转，重构就变得不可避免。这个自然的规律现在越来越多地受到社会人文学者的关注，因为它展现的法则并不仅仅适用于自然。

没有人能预测改变的时间，我们能做的，是为改变做好准备，思考在一个新世界中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

在教育界，有越来越多的沙子开始落在沙堆上。这些不断落下的沙子，包括学生、家长、老师、研究者、程序员、资助人、决策者等等。

这种冲击持续而坚定，传统教育模式的几乎每一个方面都在被重新建构——有些成为正在实施的行动，有些成为共同的意志。

在中国，影响范围最广的莫过于始于2001年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这个被简称为“课改”的行动在过去十多年虽然争议颇多，涌现出来的各种课改模式也是各领风骚三五年，但无可否认的是，它开启了现代教育观念的大启蒙时代。形式多样的课改实验如果说和传统模式有哪些一

致的区别，那就是对人的综合发展的重视。即使是一些笨拙乃至形式化的动作，也是在试图打破学生作为记忆工具和考试机器的固有定位。

以课改典范山东杜郎口中学为例，以小组学习为基础的自主合作探究、先学后教的教育新流程等，离我们心目中的理想教育还有很大距离，还不是我们所期待的那柄打破铁屋的大锤。但是，在一个混沌体系中，一粒沙子的冲击也是强大的。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有两百多粒沙子——全部或者部分移植杜郎口模式的学校——在这种冲击下开始滑动，试图摆脱原有体系的束缚。

悲观者会认为，当以高考为代表的考评体系没有变化时，一切的变化都是虚无。暂且不论这种一锤定音式的改革期待的偏颇，即使是看似牢不可破的高考，也开始出现松动。这种松动虽然十分轻缓，但也让很多深埋在沙堆里的沙子们感觉不适。江苏、北京、山东，越来越多的地区开始从英语入手，打破原有高考格局。几年后，会有什么更深刻变化呢？

比较起来，这些体系内的改变仍然显得缓慢，更多外部的压力开始按照自己的节奏来参与改变。

数万名在家上学的孩子和他们的家长开始用脚投票；每年20万以上出国留学的学生选择更坚定的告别；更多让子女留在学校的家长在现实面前开始思考更复杂的未来。原有的社会配套体系——大学或名校毕业就意味着好职位和高薪——已经被打破，身边活生生的例子会告诉他们，这个自动匹配系统已经出现问题。

对困难家庭来说，当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近年来屡创新低时（2013年仅为30%），这种期望已成为不切实际的奢望。而对很多中产家庭，在他们热衷的“比孩子”游戏中，现实也开始教训他们：三五年时间内，

孩子间的发展就开始出现明显差异，而新的排序显然不会是过去成绩表的翻版。这会让他们思考：学校的教育到底缺失了什么？

一些校长已经感受到了家长传递过来的压力，那些现实前面的“先知先觉者”明确提出，不希望自己的子女绑在学校的考试战车上，而要求校长提供“另一套”教育。武汉的一批联合起来拒绝作业的年轻父母不过是其中的先锋，在他们后面，还有更庞大的主力军。

9月的一天，当我站在上海兴韦学院空旷的校园里时，一名学生正在和一名外教交谈。他不是标准意义上的学生，因为在过去的几年他没有待在学校，这个上海男孩选择到云南一个小地方的面包房打工。用传统眼光看来，这是发疯的举动，因为他离开的是上海的顶级中学——华东师大附中。不过，他的清华大学毕业的父亲并没有那么担心。两年后，他想上大学了，他和兴韦相遇了。

在正式的录取序列上，兴韦只是一所技术类大专。但是，这所由哈佛毕业生回国创办、按照美国标准的文理学院模式建设的学校显然不会被级别束缚雄心。十多位来自美国大学的教职人员，不超过五十名的学生，在一所能容纳数千人的校园里进行着悄无声息的变革。他们提供完全不同于常规的学习内容和学习方式，试图培养具有领导力的人才。期待改变社会以及具备行动力的人，正是他们想要的。

这种深层的变革还没有被媒体关注到，关于上海高教的新闻，人们熟知的是纽约大学上海分校的建立。不过，当上海分管教育的副市长在这所特别的学院参观过，激动过，并要求上海的大学向他们学习时，我们知道，这名副市长同样是一颗有态度的沙子。

在各地，这种体系外教育的创新实验正风起云涌。就像所有行业都不得不重新“互联网化”一样，教育也无法躲进小楼成一统。互联网化

不是把现有课程搬到网上，做成在线教育的模样了事。互联网化的核心是开放，这恰恰是现有教育最为欠缺的。

当层出不穷的学校砸学生手机的新闻出现时，我们其实可以感受到学校内心深处的恐惧。当信息的不对称优势不再具备，几本武林秘籍一样的教师参考书不再神秘，搜索引擎成为新的信息入口时，老师和学校开始成为学生学习的障碍。学生与世界的无缝连接和充分选择将成为学习的前提。

看看这段有趣的报道：虽然哈佛公开课《公正》在互联网上有数以千万的点击，但桑德尔教授大概没料到自己今年的中国之行会遭遇如乐坛巨星演唱会般的豪华阵仗。近年来走红的西方大学公开课带给中国高等教育的，不仅仅是国外名师的教学风采，更是一面镜子，折射出我们自己课堂的沉闷与无趣。

《公正》是一粒沙子，可汗学院的数千个微课程更是无数的沙子，MOOC（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风潮带动的可能就是一场沙尘暴了。

无数的沙子正在表明自己对教育的新态度，那么，我们的教育会给出什么样的态度呢？

后记一

## 想象一个孩子的未来

况冶

亲切，是我对杭州独立教师郭初阳的最初印象。一开始通过微博取得联系，沟通片子的想法，确定拍摄日程。对一个未曾谋面的小编导及其摄制组，郭老师极为支持。就连食宿出行，他都处处为我们着想。这样一位老师，怎能不让人喜爱？

事实上，我通过《盗火者》接触到的所有拍摄对象几乎都是如此，亲切、诚挚、细心、宽容。在拍摄《寻找活着的马小平》时联系的每一位马老师曾经的同事、学生、朋友，都异口同声地表示，为了马老师，义不容辞。每一个人，哪怕是校园中随意采访的小孩子，都是这部纪录片的灵魂。

拍摄《盗火者》对我来说是一段学习与回忆的经历。从12岁那年到日本读书，我就脱离了中国的教育体制，对奥数、小升初、中考、高考等这些人所皆知的东西均无体会。为什么存在这么多问题？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要在体制之外寻找更好的教育？随着桌上的书一本一本叠高，问题也一个一个看得清楚了。但是答案，仍隐藏在每一位拍摄对象的故事里。

在学习的过程中，我自然而然地回忆起自己所走过的求学路。去日本读书，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并没有闪耀着“留学海外”的光芒。我只

知道我要去日本，是因为家里交不起北京高额的借读费。（因为父母早年留学日本，并留在那边工作，我作为随亲子女过去是相对方便的。）从小把我带大的外公外婆并不认可国外的教育，他们一再向我妈妈强调，大学一定要考回来读。

然而，当他们看到在国内“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我，到了日本，能在父母出差时料理好自己的生活，会制作海报参加学生会竞选，还写出一张张稚气但充满理想的人生策划书（日本的学校每年都要交的课外作业）时，就没有再说过“大学一定要考回来”这样的话，并且赞同我的想法，说：“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吧。”

我想这就是教育的力量。它改变的不仅是孩子，包括他们的家庭，以及更大的环境。这也是我在《盗火者》拍摄中所体会到的。杭州独立教师郭初阳、绍兴高中教师蔡朝阳、深圳中学教师严凌君、北京高中教师魏勇等，他们都在以不同却又相似的教育理念影响着一方天地。已故中学教师马小平就更不用说了，在他留下足迹的每一个地方，我都感觉到了他的声音和思想。每一节课，每一次采访，我都感觉到，整个摄制组，连摄像师都被带入了思考之中。每次拍摄归来的路上，大家还经常对那些话题讨论不休。那真是一段快乐的回忆。

拍摄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不仅仅是老师，还有孩子们。最难忘的一次是去贵州六盘水拍摄留守儿童，当下了绿皮火车走上山路时，我就感觉到这将是一次终生难忘的拍摄。远处是连绵起伏的山脉，近处是不戴任何安全防护、站在万丈深渊上的架桥工人。满脸皱纹的老奶奶背着装满树枝的箩筐，弓着腰走在山路上。我们的目的地是那所因一张孩子们坐索道上学的照片而出名的小学。我们去的时候，索道已被停封，其代价是孩子们每天要多走两个小时的山路。

到了学校，老师推荐了一个四年级的男孩子让我们跟踪采访，他并不是一个很典型的留守儿童，因为他的父母几乎没有可能回到他的身边了。他带我们来到他住的地方，一间用木板拼搭起来的小屋，到处都是缝隙，为了防火，不能用电，他只能烧柴火、点蜡烛。这些细节书中都有，此处不赘，我想说的是，在拍摄完这个男孩之后，我们看到不远处一家门口站着一个小女孩，也是同一所学校的孩子。我们上去跟她打招呼，才知道她也是留守儿童，在等奶奶回家。我们看她在吃地瓜，就开玩笑问她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个，她说可以，就去给我们洗地瓜了。在她洗的时候我才发现，小女孩的左手除了拇指，其他四根手指都没有。她用右手把洗好的地瓜递给我，左手已经悄悄地藏到了袖子里。我有一种说不出话来的感觉，我无法想象这个年龄还没有我一半大的孩子经历了什么，我不知如何面对眼前的现实。

那天晚上，我们住在学校的老师家里。山上天一黑没什么事可做，七点多大家都就寝了。因为睡得太早，半夜里我就醒了。但我不知道我的眼睛是睁着的还是闭着的，因为我能感觉到的只有一片漆黑和从未有过的恐惧。我什么都不敢想，就在那里等着时间一秒一秒地流过。第二天向大家告别下山，在车站等车的时候，我才开始思考在六盘水的这一天，还有之前所有的拍摄过程。教育是什么？如果说是教育让我走到了今天，那六盘水的这些孩子们，他们要走向怎样的未来？

临走之前，摄制组每个人凑了一些钱给了那个接受采访的小男孩，每个人的心情都很沉重，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些钱不能帮他解决任何问题。校长说，时不时会有支教的志愿者过来，一队一队，来了又走了，学校还是那个样子，孩子们还是那个样子。

《盗火者》是我们交给这个社会的一份调查报告，提出了问题，却

没有答案，只有各种各样的路径，以及走在路上的人们。路，还在走着，我与许多拍摄对象都保持着联系，因为我想看到他们接下来的故事，想知道那些孩子们的成长和未来。每一个人都无法脱离教育，也没有哪种教育是适合所有人的。教育必须多元化，也因它的多元化让我们发现了这么多精彩的人和故事。

再次感谢所有为教育尽了一份力的人们。

## 后记二

# 让改变悄悄发生

梁罗兴

纪录片《盗火者》最初取的名字是“教育启示录”。彼时，《先生》正在全国热播，展览也从深圳蔓延到北京、南京等城市，在全国掀起一阵民国热。制片人邓康延感慨，今日教育之疮痍，前所未见，我们纪录民国先生，更要把当下教育之现实呈现于今人，非谓黄钟大吕，只求唤醒人心。

说易行难，我们拍《先生》，脑海里便会直接蹦出胡适、蔡元培、马相伯、张伯苓、梅贻琦等大家，以时空为轴，便能很清晰地找到诸位民国教育家的精神文脉。但拍摄《盗火者》，哪些该说，哪些不该说，哪些必须说，都处于一种朦胧模糊的状态，需要真正深入进去，以教育之本义为线索，从当代一些新闻报道的蛛丝马迹中发掘教育的原生态，需要跟众多教育家、民间研究者、一线教师和学生面对面接触，才能一步一步地走向真实。

原凤凰卫视纪录片编导刘晓梅成为了这部纪录片的总编导，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担当总策划，制片人邓康延还邀请了近十位著名教育学者撰写脚本，试图用更专业的角度来解读中国当代教育的发展路径。最终整理出十个维度：童年、语文、天梯、乡村、课堂、大学、老师、自学、公民等，是一个人从幼儿到社会公民的成长过程，也是一国城乡

差异发展的真实写照。我们循着这样的脉络，从城市到县镇，从乡村到山野，开始了全国范围的教育调查。

《盗火者》开机第一拍在深圳，2012年7月2日，我们见证了南山央校校长李庆明被辞职的一幕。开始放暑假的央校校园里，学生已经陆续回家，有十几位家长到学校打探进一步的消息。摄制组早在几天前便约好了来央校拍摄，却未料出现这样的局面。校长走了，片子怎么拍？

我们在燕晗山大讲堂见到了身着唐装的李庆明，他依旧风度翩然，儒雅可亲，正在跟一位想让孩子来央校念书的妈妈交谈，这位妈妈是李校长的粉丝，多次听过他在幼儿园的演讲，儿子刚好快大班毕业，便想着让他来央校接受公民教育，为此还在学校附近的社区租了房子。

随后几天，我们跟踪拍摄了整个事件的发展，有家长抱团向教育局递交请愿信，也有早就毕了业的学生重回学校与校长见最后一面，微博上更是沸沸扬扬，七八家当地报纸都集中报道了李庆明离职的消息……记得在采访李庆明时，他讲过一个故事。有一只小鸟，跟一棵树相约来年春天为它唱歌。等第二年小鸟来了，发现树不在了，变成了树桩，小鸟就问树桩，树哪儿去了，树桩说，被伐木工人砍了之后，拉到厂里做火柴了。小鸟再跑到厂里一看，发现火柴已经运到村子去卖了。它再赶到村子，看见一个小女孩划亮了最后一根火柴，她告诉小鸟，火柴虽然没了，但是它点燃的火，还在灯里亮着，小鸟瞪着眼睛看了一会儿，唱起歌来，唱好了，又看几眼，就飞走了。李庆明说，火会熄灭，一棵树最后变为无形，成为一缕青烟，但它是存在的，是有力量的，这就是不朽。

李庆明讲这个故事的时候眼睛湿热，我知道他想到了自己。他一直坚信公民教育能给孩子带来更丰盛的精神滋养，让他们更好地面对这个

世界。2012年8月，央校新任校长人选已经公布，李庆明离别深圳返回家乡。他说，教育本身的探索就是一种漂泊，正像诺瓦利斯说的，怀着乡愁的冲动去寻找家园，没有永恒的终点，但他会坚持走下去。

为了让纪录片更具有可看性，《盗火者》第一次大量使用了情景再现的拍摄手法。我们集中一个月的时间，邀请深圳的荔园小学、育才小学、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协助拍摄再现镜头，《重回人的语文》一集中的“乔乔”、《大学大学》一集中的“王小妮”、《天梯》一集中落水的小女孩等，都是真人真事的生动再现。有件趣事值得一提，《盗火者》第一集讲了作家叶开和他女儿的故事，里面“情景再现”中的女士和女孩都是友情串演，叶开的某些老同学看过后打电话“祝贺”他说，老廖，你终于换了！叶开赶紧发微博声明：“没换，老妻和小女都是原来的，只是她们不肯出镜。”

2013年8月，《盗火者：中国教育改革调查》十集制作完成。由于部分题材相对敏感，我们一度对播出不抱希望。最后，凤凰卫视伸出了橄榄枝，我们得以赶在教师节期间给全国的师生送去节日礼物——一份横跨中国城乡、历经两年积淀的教育记录影像。

首播五集，差不多每一集都戳到中国教育的痛点，每一集都不留情面直指教育弊端。用总编导刘晓梅的话，我们把最难播出的几集都合一块播出了。虽然如此，在首播当晚，她看完电视台播出的片子后还是忍不住给邓康延发短信：“精华都给删了，唉……”邓康延回：“不要紧，我们出碟。这毕竟发出了语文批判的声音。”

《盗火者》播出不到一周，凤凰网同步推出的视频被大量点击，成为《凤凰大视野》节目当季热度最高的纪录片。部分网友评论如下：

**安然茶舍：**教育、卫生本来是公共服务机构，现在却成了大卖场。

**月牙弓弓：**总觉得有问题，可是无法言说，看此视频豁然开朗，知道为什么班里不爱死学的同学进入社会反而更能适应，究其原因就是没被毒害得太深。

**Grant\_Lo：**现在的大学培养的都是公司员工，不是做学问的！

**一笑而过：**此片值得所有人深思，不光教育专家，包括家长。小学语文教材是一个民族文明的底线，可孩子在这些课本里都学到了什么？

杨东平看完片子后，兴奋地发微博说：“《盗火者》拍得很好，超出预期！”

立人图书馆创办人李英强评论：“用影视的方式介入教育问题，《盗火者》算是一个高度，虽然播出来的片子还是有很多对教育改革的呼唤和盼望，但总算有人把目光向下，看到民间，看到“野草”，看到真实的中国和真实的行动者。”

就像独立教师郭初阳所言，教育不是灌满一桶水，而是点燃一把火。所有编导日日夜夜的付出，让这部纪录片有了尖锐的视角和理性的光芒。我们曾经为某个细节争吵不休，为某个镜头攀上悬崖索道，为孩子们悲惨遭遇暗自落泪，但一切的辛劳都是值得的。《盗火者》所引起的民间讨论热潮，必将改变国人心中教育的情状。

2013年底，越众影视与新星出版社达成协议，开始编撰以纪录片《盗火者》为蓝本的同名书籍。制片人邓康延称，纪录片传播途径有限，如能改编成书，可以让更多城市县镇甚至边远山区的学校和孩子了解他们正在经历的教育变革，或许这颗教育的火种能稍微温暖他们，或许更多

微力量的参与能改变我们下一代的教育生态。

邓老师的殷切之言，让负责编写此书的我深受震动，我也在不断思考，到底什么样的话语方式，能让更多人接受，让这本书的传播更为广泛，也让中国教育的先行者稍感慰藉？

我想起小时候语文老师曾经教我的一句话，让细节充满情感。《盗火者》片中每一集都有一些让我们心灵微颤的人物、故事，或许是哭泣的留守儿童，或许是含泪离开的校长，或许是不知未来如何的蚁族，或许是为教育担心的学者……他们在现实的碰撞中跌跌撞撞，如江海浮木，却是我们身边人的写照。他们质朴、简单的话语，便如磁场效应，虽然波动微弱，却能引起共振，打动人心。

自此，决心将《盗火者》中人与事的纠葛、情与理的相生、梦想之伟大与现实之卑微细致打理，读者诸君如能从中受些启发，便不负本书的立意。

首先要感谢我的两位同事——张铂源和张睿娇，协助我编撰此书。铂源是《断裂的天梯》、《学在民间》两集的编导，同时承担了片子中许多镜头的拍摄，对其中的辛酸与苦楚感同身受。阿娇性格开朗，然而在看到那些留守儿童的照片时也忍不住潸然泪下，她撰写的《断裂的天梯》一文，字里行间透着小女生的温情与暖意。

新星出版社的编辑陈卓兄长与我长期沟通，从编写方向到稿件修撰，他都尽心尽力，为书稿成形付出了不少心血。编导刘晓梅、信一心、闻正兵老师也提供了许多中肯的建议。同时，更要感谢杨东平、陈丹青、冉云飞老师抽出宝贵时间为本书作序，感谢崔武先生将他还未出版的有关公民的著作予我参考，感谢陈歌、况冶、苏恋婷三位同学对书稿文字的更正。

另外，我们还将随书附赠一段时长近半小时的影像资料，内容为《盗火者》主题曲的MV以及十集纪录片内容集锦，其中大量内容为首次披露。

教育改革注定是一条崎岖难行的道路，但改革需要信念，只有信念才能影响信念。我们所能做的，便是凝聚更多民间的力量，让改变静悄悄地发生。

好的教育，以最低的标准来说，是一种善待学生的教育，是不以学生为敌的，是不用考试和作业压倒学生并使其感到恐惧的。最高的标准是带着一种人文主义的价值和理想，促进人的自由发展，以自由为最高目标。教育是点燃、照亮、唤醒、开悟、得道的过程，而不是具体的考个公务员，考个律师证，那都是形而下的。

——杨东平

一个人所受的教育，铺开一个人的命运。有哲人说：世界观对了，世界就对了。而教育则是让你在皮肤上感知世界冷暖之前，在心灵上先搭起世界观的台子。教育有生命，它是皮肤，知冷暖；它是眼睛，识明暗；它是心灵，辨善恶。不管去学校的路有多远，孩子都要背起书包；不管教育改革的路有多险，今天就要去攀援。

——邓康延

我们现在很多教育改革是走错方向的，说是改革，但后来发现都是反改革或伪改革。我评价改革只有一个标准，就是受教育者的权利有没有扩大。如果受教育者的权利扩大了，就是真改革；如果受教育者的权利没有增大，就是伪改革；如果受教育者的权利反而减少了，就是反改革。

——熊丙奇

上架建议：社科·教育

ISBN 978-7-5133-1588-3



定价：42.00 元